

房良地区古代最高学府——书院

刘佩伍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民间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萌生于唐,发展于宋,废于清末。据《寰宇通志》、《畿辅通志》、《房山县志》、《良乡县志》等古籍记载,房、良地区早在元代初年便建有文靖书院,清代乾隆年间,又建有房山云峰书院和良乡卓秀书院(前者为私人创办,后者为官府创办)。书院主持人称山长或堂长、掌院、院长等。学习的主要教材为儒家经典和理学大师的著作、语录、注疏等。书院都有自己的学规,讲学活动都有一定的仪式,尤以“讲会”、“开讲”仪式更为隆重。除讲学活动外,祭祀也是书院的经常性活动:除祭祀孔、孟等先师、先贤外,还祭祀本学派的代表人物或与本院有关的先贤。书院的教学特点为私人讲授和个人自学,允许不同学派互相讲学、论难,教学形式多采用辩论、问难方式。起初,书院一般不以科举入仕为目的,后来官学化与科举化日趋严重,终于与官学合一,形成以“考课”、“举业”为办学宗旨的教育教学机构。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学田地租收入和士绅捐赠。

文靖书院

始建于元代初年,院址在房山县城西南七十里的抱玉里(今云居寺附近),为元代里人总管赵密和宣德府教授贾壤所建。赵、贾二人曾从师于容城儒学大师刘因,深得师学之真髓。后以之教房山之乡人,受益者颇多,于是筹资创建书院并在院中设立刘因祠堂以奉祀之。元代皇帝赐额为“文靖书院”。从此,文靖书院便成为房山学子切磋、玉成之地,学者讲学、论难之所。文靖书院延续元、明两代,历时三百五十多年,废圯于明末清初。存在期间,与建于京都的太极书院和建于昌平县城的谏议书院媲美。曾有人写诗赞美:“化雨自能露士类,书声时听度邻墙。嵩阳、白鹿千余载,美誉应同永播扬。”文靖书院因年代久远,遗址日已圯毁无存。

云峰书院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由房山县知县邱锦创建。院址在房山县学宫义学旁(今房山中学),地基由山羊村苗氏所捐。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房山县县令黎德符会同本县进士徐梦臣等筹资增建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六间、大门及照房七间,并亲自制定《云峰书院条例》《条例》中规定:“设掌院主讲席”,“设斋长主诸务”,供“诸生朝夕攻磋”、“请益”;“书院悉肄业之所,勿许闲杂人居住”、“勿得循情专擅”;“士绅义捐地亩,系专为士人膏火之资,勿得指名挪用”,从此,书院规模、设施、规章日趋完备。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房山县县令杨源钜会同本县举人李心莲又筹建讲堂三间,诸生就学其间,习作“八股”,交掌院批阅。院外生亦可附课、请益。书院规定每月两次考试,成绩前列者获奖赏。这里的学子都是准备应“乡试”、走“仕宦”道路的。清光绪二十年(1895年)书院购置新书,伏下变革之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学董赵连城、陈智、赵宗瀛等将书院改办为房山县县立高等小学校,即现在房山区城关小学的前身。

卓秀书院

清乾隆年间，原建在良乡县城东门外的皇华馆，创建人不详。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良乡县知县程仁杰迁址改建在良乡东街路南(今良乡小学)。并将隆峰寺抄产地租的一半拨给书院，以为修脯膏火之资，另一半解给北京金台书院。书院每月初二日开堂课，十六日设斋课，自此书院学风日盛。办院宗旨、机构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与房山云峰书院略同。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学董见之深等在卓秀书院基础上，改建为良乡县立高等小学校，即今良乡小学的前身。

总之，房良地区书院的设置，在北京地区是名列前茅的。房良地区，地处京畿，物华天宝，人口稠密，车楫辐辏，自古以来就是尊师重教、人材荟萃之地，除设有书院之外，还有遍及城乡的官学、塾学之设。据《房山县志》、《良乡县志》记载，仅明清两代通过科举考试就有五百零三人获取功名，其中包括进士三十九名，举人一百三十六名，贡生三百二十八名。封建社会尚且如此，当今社会主义年代，我们更应奋发图强、尊科重教，培育高质量的有用人才，为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做出贡献。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作者系原房山中学高级教师

房良地区古代官办学校——官学

李增祜

根据史书记载，北京地区从西周燕国开始，就有政府办的学校，按周朝制度，这种学校称为“官学”。秦王朝“焚书坑儒”，既不立官学，又严禁私学。因此，这个时期北京地区无学校可言。以后历经汉、北魏、隋、唐、辽、金、元、明、清九个朝代。每个朝代在北京地区都设有各级地方官学。元代北京地方行政区划称大都路总管府，设有大都路学和州、县学。据《房山县志》记载，元至元三十一年(1295年)，房山县建学宫，这是房山县最早的官办学校。明、清两代，北京地方行政区划称顺天府。当时的地方官学有府、州、县学。明万历六年(1578年)，良乡县建学宫，从此良乡县才有官办学校。

房良两县的学宫，建筑布局与府学大致相同，只是规模较小。房山县学宫在今房山中学院内。良乡县学宫在今良乡中学北院。根据《房山县志》记载，房山县学宫的“明伦堂”在县城东街路南，即解放后县委会旧址。由此可以想象出房山学宫的一般规模了。元明清三代对地方学宫，曾多次修葺扩建。据《良乡县志》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知县洪一谟建学宫后，经清顺治十年(1653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道光十六年(1836年)、同治十一年(1872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和光绪三十年(1904年)，先后六次不同规模的修葺扩建，这所地方官办学校才得以延续到清末。

房良两县的官学都设有学官主持学政。每县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县学有学田，以其租入为

经费。按明初规定,县学学田租入限定为六百石。县学学生名额规定为每县得招“生员”二十人。范围只限本县境内官民子弟经考试合格者。入学考试分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三试皆中者才取得生员资格。清代俗称生员为“秀才”,凡未取得生员资格的读书人,不论年纪大小,都称“童生”或“儒生”。因此,清代称三级入学考试为“童试”。县试在县城举行,由知县主持。考期通常在二月。考生先向县衙礼房报名,并须有五人联保及一名本县生员(廪生)担保,方准应考。出身倡、优、皂隶之家及居父母丧者,不得应试。县试分四场或五场,考试内容为四书文、试帖诗、《性理》或《孝经》论等。一般首场合格即被录取,由本县造册送顺天府应府试。府试在府治北京城举行,知府主持。考期多在四月,各场考试内容与县试类同。取中后由本府造册送直隶学政,以应院试。院试亦在顺天府治举行,直隶学政主持(学政又称提督学院,故称院试)。考试程序及内容与府试、县试类同。院试取中后即获生员资格。考中的生员由学政、府官根据考试成绩及其它条件分别选送到府学及各州、县学去学习。

元明清各代对官学的教授内容控制很严,生员学习什么课程都有严格规定。规定以外之书一律不准教授,即所谓“非圣贤之书,士子不得诵习。”根据规定,清代县学的教授内容主要为十三经、二十二史、《性理大全》、《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文章宗正》、三通、《大清律》以及四书五经等。

县学的生员分廪生、增广生、附学生三类。初入学者为附学生,修业一定时间后,经考试合格,方能逐步升为增广生和廪生。廪生、增广生的名额有限定,附学生则无。在学生员免本身徭赋,廪生并可每年从县府领取廪饩银若干两。家贫不能自给者,发给学田租谷。

为督促生员致力于学业,学内设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有月考、季考和岁试、科试两类。前者考核平日学习成绩,由学内自行,教谕主持。岁试每年一次,科试每三年一次,皆由直隶学政亲临主持。岁试以六等考核诸生并升降之:考列一等者,增、附生递升廪、增生,二等者给赏,三等者无赏罚,四等者受挞责,五等者递降一级(附生则降为“青衣”),六等者除名。科试主要决定生员科举资格:考列一、二等及三等前十名者,可应顺天府乡试,其余各等的升降赏罚,一如岁考。

明清两代官办最高学府称“国子监”。当时的国子监设在北京城内。县办官学得按生员资历(在学时间长短)贡廪生入国子监。名额为每岁一人,称“岁贡”。每三至五年不拘资历择优贡生员一人入监,称为“选贡”。县学生员与国子监贡生都要通过顺天府乡试,才能步入仕途。

房良地区的地方官学,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5年)建立,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废科举,兴学堂”的《癸卯学制》,共经历六百余年。这种学制为封建统治者培育了众多人才。据《房山县志》、《良乡县志》极不完全的记载,仅明清两代,两县通过科举考试就有五百零三人获取功名,过去历代王朝,重视教育建设,完全是为巩固其封建统治。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作者系原房山二中高级教师

房良地区的塾学

刘佩伍

塾学(俗称私塾),是我国封建社会遍及城乡的一种办学形式,是少年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重要场所。我国自古就“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借以“明人伦,端教化,美风俗”。房良地区塾学之设,起于何时,已无据可考。但自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不少边远地方,仍有塾学的存在。

据查,房良地区塾学的办学形式,大体有四:1私塾:由未进学的童生或落榜的秀才,在自家或借用寺庙,自行设馆授徒,由学生家长出具“束修”,送子弟前来就读。例如:清末,沿村秀才白师曾,家贫操洁,以砚田为业,课徒乡里,七旬开外,尚课读不辍,一时入邑庠、入工举业者,多出其门。2村塾:由自然村或邻村利用公产、庙产收益或按地亩征收一定学租,延聘塾师,多在寺庙设馆,教本村和联村子弟学习。这种塾学进入民国以后,经过改良,多数改成村办小学。3家塾:由家庭出资延聘塾师,在自家设馆,教自己的和亲戚的子弟学习。这种塾学多为封建地主或官宦家庭所办,进入民国以后,已为数甚少。例如琉璃河镇吕筱亭就曾创办过“吕氏家塾”。4族塾:多田大姓望族,利用宗族公产收益延聘塾师,在本族祠堂设馆,教授本族子弟。

就房良地区来说,以私塾、村塾为主,家塾次之,族塾则更少。每所塾学,学生多则四、五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至于当时入学儿童有多少,已无法统计。据查,清末民初,几百户的大村,入学儿童仅有三、四十人,入学率约占本村学龄儿童20%左右。由此可见,得以入学,多为殷实富户子弟,广大贫苦农民子弟,为饥寒所迫,多被拒之门外,可望而不可及。

每所塾学,一般只有一名塾师,一部教室,学生年龄大小不一,学习年限长短不等,学习内容各不相同。学生入学后先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继而读《四书》、《五经》,也有加学《弟子规》、《名贤集》、《宋词》、《唐诗》、《论说精华》、《古文观止》的,一般农家子弟,还要读些四、五、六言杂字,但多数读到两三年后,认识了一些常用字,能开便条,会打算盘,能记“豆腐帐”,也就退学务农或学徒经商了。

塾师的教学方法,采取混合教学,个别授课,主要特点为念、背、写、打。新生入学多是每年冬至,除年节和大、麦二秋外,别无假日。凡塾学都尊崇孔子,课堂正面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画像或牌位,学生每天到校,先叩拜孔夫子后,才能入座,入座后,再出课堂,必须请假,如上厕所,每次只许一人,且需手持“出恭牌”,不可逾越雷池一步。塾学特别强调尊师守纪,塾师的话,学生要绝对服从。学生在学习上不符合塾师要求或有违纪现象,轻则责骂、罚站、罚跪,重则打耳光、打手心、打屁股。学生对这种体罚,虽内心反感;但不能溢于言表。学生每天上午到校就座后,先写大楷或小楷,等塾师就座后,逐个到塾师前“正书”(即塾师直接教学),然后回桌放声念背,直至午前再到塾师前“回书”(背诵),下午亦是如此,根本没有什么课外游戏活动。凡塾学都强调写字的基本训练。学生从入学起,每天都要写毛笔字。毛笔字,分大楷与小楷,一般先练大楷,后练小楷。写大楷,先从“照格”练起,然后练“跳格”,最后才能“临帖”。人们俗称“字是脸面”,学生字写得好坏,也是衡量学习好坏的重要标志。

塾学的课堂,一般都是借用庙宇的禅堂或民宅住房,阴暗、潮湿、光线不足者居多。课桌椅,多是学生自带,方桌条桌大小不一。再加塾师的严酷的面孔,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说是上学读书,倒有“犯科、坐监”之感。尽管如此,但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起到传播文化、培养人才的作用。

清末民初,房良地区究竟有多少所塾学,多少名塾师从教,现已无法统计。仅就萧硕儒、王文敏、吕培

厚等几位八、九十岁老人回忆，房良城关和琉璃河三地较为著名的塾学如下所示：

塾学名称	地点	创办时间	执教人	学生数
西关帝庙私塾	良乡罗府街	清光绪年间	莫尔根宝	30 多人
天王寺私塾	良乡罗府街	清光绪年间	莫尔成宝	近百人
北街村塾	良乡北街	民国初年	刘伯银	20 多人
东街私塾	房山东街	民国初年	李文翰	30 多人
众仰私塾	房山南街	民国初年	高养廉	30 多人
城皇庙私塾	房山城皇庙街	清 末	李印堂	40 多人
北关村塾	房山北关	民国初年	张××	30 多人
吕氏家塾	琉璃河吕家胡同	民国初年	吕筱亭	10 多人
张家私塾	琉璃河东后头	民国初年	张建业	30 多人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古代房良地区的社学和义学

李增祜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培养选拔人才的三级教育体系，这就是京城国子监(太学)，府州县的官学、书院，以及遍布城乡的社学、义学和塾学。所谓“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就是古人对这种三级教育体系的描述，其意思是家庭、宗族、城镇、国家都要办学。(党：宗族的意思；庠 xiang 序：古代乡学，泛指学校。)

国子监(太学)是古代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在国子监学习的学生大部分是“贡生”，而贡生又是从各府州县的官学中选送上来的。根据《房山县志》记载，房山县每两年须选送贡生一名，即“二年一贡”。府州县的官学、书院属于古代封建社会的中级教育机构，在其中学习的学生为“生员”，清代又称生员为“秀才”。在社学、义学、塾学中就读的少年儿童，称为“童生”或“儒生”。童生要升入官学，必须经过三级考试，即县试、府试、院试。三试皆中后才能取得生员资格，才可以进入官学或书院中去深造。

遍布古代城乡的社学、义学和塾学，是封建社会对少年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教育组织，也是整个封建教育的基础。社学产生于元代。根据《新元史·选举志》记载，元至元二十三年(1268年)皇帝命令“诸县所属村庄，五十家为一社，”“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问有成者，申复官司照检。”可见这种社学是一种官办的初级学校，在农闲时学习，招收的对象是农村中的少年儿童。即“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开设的课程是五经四书，它的任务是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人才，即“如学问有成者，申复官司照检。”以后，经过将近百年左右，到了明代，仍沿袭元制，称基层教育为社学。明代建国之初，于洪武年间，皇帝曾经三次过问社学之事，洪武八年(1375年)下诏：“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诏书：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社学的性质仍是官立初级学校；第二、选聘教师的标准是请熟悉儒家学问的人做教师，即“延儒师”；第三、社学招收的对象是民间子弟。洪武十六年、二十年，又两次下诏，对什么人不许做老师，以及教授内容做了补充规定：第一、那些曾犯过过错的人不许做老师，即“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第二、

社学还要教授“大诏”和“律令”。对能诵读者，根据“所诵多寡，次第给赏。”正统元年(1436年)，皇帝又“令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并明确提出，社学中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选送到府州县官学中去深造，即“其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以上均根据《明会典》卷七十八《礼部》)，根据《日下旧闻考》和《房山县志》记载，房良两地都建立过社学。良乡曾有社学六所，是知县余镗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所建。这六所社学的名称是美化社、厚俗社、燕谷社、旧店社、交道社、官庄社。据今所知，“燕谷”指的就是现在的琉璃河镇。而“美化”、“厚俗”、“旧店”，现已不知所指为何处了。房山的社学，设在北大街，不知创建于何年。明代知县陈庭训曾重修过。清朝初年，在社学里驻过兵，于是教学被迫停止。以后驻兵撤走，房山当地的官绅无人过问办学之事，因此此处社学也就废止了。社学是元、明两代封建统治者，靠官府的行政手段推行的一种办学制度。由于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低下，因此很难做到每家每户的儿童都能入学。明“成化元年，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其贫乏不愿者勿强。”(根据《明会典》卷七十八《礼部》)这段诏书就是命令府州县的官员，对民间子弟是否入社学，要听其自愿，不要强迫。同时，这段诏书也暴露出推行社学与老百姓生活贫困之间的矛盾。老百姓整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根本无力送其子女入学。所以到了清代，社学逐渐被废止，随之兴起了义学。

义学是由地方上出钱设立，以贫寒子弟为对象的免费学校。所谓地方上出钱，就是由府州县官出面，募集私人田地为学田，以学田租谷做为束修，去延聘教师，供给学生书本纸笔费用。为了让学生能够巩固，不至于流失，有的义学甚至还要“资粥”，就是免费供学生一顿稠粥吃。清康熙皇帝曾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下旨，督建义学。要求“于穷乡僻野皆立义学，延师教读。”为什么要督建义学呢?康熙皇帝指出，要想提高百姓的素质，没有比读书更重要的了。即“联想移风易俗”莫过于读书，非此无可上进。(选自《东安县王礼村义学碑记》)义学教授的课程，不外是学习识字，读五经四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孝弟谨信、爱众亲仁之行”等。清代的义学，一直延续到废科举，兴学堂，最后才绝迹。房良两地在清代都建有义学。根据，《畿辅通志》记载，良乡有义学四所，一在固节驿，一在东关，一在琉璃河，一在窦店。固节驿就在今天良乡镇的西大街。这四所义学都是在清康熙年间建立的。房山县有义学一所，在学宫旁边，为雍正四年(1726年)所建。学宫就在今天的房山中学院内。房良地区这五所义学，废止于何年已无从查考了。不过，社学和义学，做为封建教育的基础，它为上一级的官学和书院，培育输送了众多人才，它对传输文化、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尚应志之史册，以供后人借鉴。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房山教育 源远流长

——建国前房山普教大事记

刘佩伍

房山教育源远流长。远自秦汉时代就有私人办学，据史书记载，晋代霍原，辞官隐居故里——房山天开，聚徒授业，官府多次延聘出仕不从，至今尚有“六聘天开”之誉；唐代大诗人贾岛，晚年隐居房山周口店地

区,著书授徒。五代时,良乡人窦禹钧号燕山“教五子,名俱扬”元代理学家刘因,亦曾隐居房山教授生徒,死后其弟子赵密、贾壤为传其学于房山西南之抱玉里建“文靖书院”以祀之。如此等等。根据《辽史》、《顺天府志》和《房山县志》、《良乡县志》有关记载及民国时期档案资料,整理出房山历史上普教大事记,以使读者了解房山教育发展的大体脉络,为推动房山现代教育服务。

辽

咸雍十年(1074)进士渤海人大公鼎,任良乡县令期间,于良乡城内东南建孔子庙学,以资教化。(据《辽史·能吏传》)

元

至元元年(1264年),金徽政院弥礼(房山人)于房山城内东南创建房山县学。大德八年(1304年)知县王杰拓殿后隙地建明伦堂。延祐元年(1314年)知县王恕建两庑,規制始备。(据光绪《顺天府志》)元代初年,房山人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于房山西南七十里之抱玉里建“文靖书院”,以容城刘因之学教乡人。(据民国《房山县志》)

明

洪武五年(1372年),在良乡城内东南孔子庙学基础上,重建良乡县学。正统十二年(1447年)修缮。万历五、六年间知县洪一谟又修缮。(据光绪《顺天府志》)万历十八年(1590年)良乡知县余镗创建社学六所:美化(良乡东门里)、厚俗(良乡南关)、燕谷(琉璃河)、旧店(窦店)、交道、官庄。(据《日下旧闻考》)万历二十二年(1582年),副使李养质捐俸置学田二百多亩,以资助县学贫苦学生。(据光绪《顺天府志》)

清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良乡县知县张宏毅先后改建和创建义学四所:固节驿、东关、琉璃河、窦店。(据《畿辅通志》)

雍正四年(1726年)房山学宫旁建义学一所。(据《畿辅通志》)

乾隆十八年(1753年)房山县知县邱锦,将义学改建为云峰书院。嘉庆十二年(1806年)县令黎德符、邑人徐梦臣添建学舍,备学租,制条例。道光十五年(1835年)县令杨巨源、邑人李心莲建讲堂三间,设山长主讲席,设斋长主诸务。(据民国《房山县志》)乾隆年间,在良乡县东门外皇华馆建卓秀书院。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良乡县知县程仁杰移建于城的东街路南。将隆峰寺抄产地租的一半给书院,以为修脯膏火之资。(据民国《良乡县志》)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良乡县石羊村曹大成之母王氏捐学田一百零七亩六分。(据民国《良乡县志》)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学董赵连城、陈智、赵宗瀛等改云峰书院为房山县高等小学堂(现房山城关小学)(据民国《房山县志》)

光绪三十年(1904年),学董见之深等改卓秀书院为良乡高等小学堂(现良乡小学)。是年,良乡县劝学所建立,所址设于高等小学堂内。(据民国《良乡县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赵宗瀛等在房山东街明伦堂旧址创建房山女子小学堂。(据民国《房山县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房山县劝学所建立,所址在城内学房胡同原训导署。赵宗瀛任第一任所长。(据民国《房山县志》)

宣统二年(1910年)在良乡城内罗府街义仓旧址建良乡钟秀女子小学堂。(据民国《良乡县志》)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年),房山、良乡两县的小学堂,改为小学校。初级小学学制4年,高级小学学制3年。同时,改原“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是年,良乡县琉璃河小学建立,吕筱亭任校长。

民国三年(1914年)根据京师学务局规定:小学除授国文、算术、手工、唱歌等课程外,高等小学开设英语课。

民国四年(1915年)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国民小学令》,房、良两县将初级小学改为国民小学,将高级小学改为中心国民小学。

民国七年(1918年)良乡县劝学所,由所长赵焕文,将所址迁至固节驿马神庙,并添筑大门、接待室三间,以为办公之用。

民国九年(1920年),房山县私立长育乙种工业学校建立,校址在城西洪寺村,为常振远捐献。创建人为常振远、萧鼎三、李琴舫。一年后,改为私立长育高等小学校,在房山率先实行男女合校,常振远任校长。

民国十年(1921年),房山县教育会建立,会址在县城东街关帝庙内。教育会为教育科研机构,并对教育的发展起督促作用。第一任会长为常振远,副会长为殷祖英、吕士雄。任期二年,连选连任。

民国十一年(1922年),根据“壬戌学制”,房、良两县小学改“四三制”为“四二制”(初小4年,高小2年),是年,房山县东庄子高级小学建立。

民国十二年(1923年),良乡县劝学所由姜清藩任所长,是年,房山县上万村建立初高两等小学,创建人刘树铭;良乡县在琉璃河、窦店、交道、肖庄建四所女子乙种学校。

民国十四年(1925年),房、良两县劝学所奉令改为教育局。房山县由李兆庚任局长,良乡县由姜清藩任局长。是年,房山县在半壁店行宫建高等小学校。

民国十六年(1927年),房、良两县奉令小学一律改为秋季始业(9月开学),每年放寒假两星期、暑假45天,其他放假日为:重阳、国庆、总理生辰、总理逝世纪念日、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植树节等各放假一天。

民国十八年(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计民生、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主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民国十九年(1930年),良县教育局由苏九如任局长,房山县教育局由孙士杰任督学。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良县教育局由张绍仪任局长,房山县教育局由陈复初任局长。是年,房山县简易师范在城西洪寺村建立,由莘颜湘任校长;良乡县简易师范在良乡高级小学院内建立,教育局局长张绍仪兼任校长,良小校长赵权主持校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房山县教育局举办高小学生观摩会。私立长育学校文场(语算会考)、武场(体育表演),均列全县榜首。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房、良两县简易师范第一期毕业生应聘到各村小学进行毕业实习。这对房、

良两县新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房山简易师范招第二期学生,良乡简易师范停办。是年,房山县教育局由姜时喆任局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市伪社会局训令中小学使用维持会审定的课程。小学改公民课为修身课,体育课改为体操课,童子军课改为国术课,外语课增加日语。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北平市伪社会局转饬沦陷区各校一律使用新编教科书。是年,房、良两县伪政权设立教育科,推行奴化教育。房山县由赵彦谋任教育科长,良乡县由姜清藩任教育科长。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房良联合县抗日政府教育科成立,郝绍尧任科长。八路军冀西先遣支队工作团创建十渡村抗日初级小学,晋察冀边区宛平县第四区教育联合会主任王士甫创建史家营村抗日初级小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房良联合县政府在西庄村创建抗日高级小学,学制一年,县长刘介愚兼任校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抗日高级小学在大峪沟村招收第二期学生,王玉忠任校长。是年,房涿涿联合县抗日政府教育科成立,聂吕任科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沦陷区涿良房三县,从1939年起每年轮流召开一次三县运动会。房山县运动员在萧硕儒的培训和率领下,前三次均获总分第一名。

民国三十年(1941年),伪房山县保安团长孔宪江在长沟镇创办“房山县六、七、八区联立长沟镇完全小学校”,甄仙舫任校长。是年,伪良乡县在良乡小学内增设幼稚班,招收5—6岁幼儿,学制一年。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沦陷区大兴、宛平、涿县、良乡、房山五县联立农业学校建立,校址设在良乡城内饮马井,校长尚子扬。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房山县抗日政府建教育科,朱正任科长。是年,沦陷区房山县在房山城关小学内增设农职班,创建人高鑫。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解放区房山县政府李午亭任教育科长。国统区房山县政府赵继长任教育科长,良乡县政府黄士贤任教育科长。是年,良乡县初级中学建立,校址在良乡城内原学宫旧址,校长魏泽生;房山县将原农职班改建为房山县初级中学,校长高鑫。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国统区良乡县初级中学增设两个师范班,招收学生83人,学制三年。是年,房山城关小学增设幼稚班,招收5—6岁幼儿32人。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国统区房山县初级中学增设师范班,招收50人,学制三年,黄宝涵任校长。是年年底,房、良两县全境解放,房山县人民政府第一任文教科长常健,良乡县人民政府第一任文教科长宇谷。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房山小学教育的诞生与发展

李增祜

房山区的小学教育,始于学堂,尔后更堂为校,历经辛亥革命,军阀统治,日寇入侵,两县解放,几经曲折,方有现在之规模。今以历史阶段为经,史实为纬,对小学教育之发展,加以概括叙述。

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颁布“废科举,兴学堂”的《癸卯学制》。这一年,房山贡生赵宗赢,学董赵连城、陈智,率先将城内东南隅之云峰书院改为房山县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学董见之深等改良乡东街之卓秀书院为良乡县高等小学堂。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房良两县不断有乡村私塾改为学堂,七年间共新建改建小学堂17所。其中著名的有房山东街女子小学堂、良乡罗府街钟秀女子小学堂、河北东庄子小学堂和教会办的普安屯育婴小学堂等。此时,学堂学生总数约有600人,教师近30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良乡、房山两县先后设置劝学所,以协助知县管理两县教育。劝学所下设学区,房山有学区5个,良乡有学区8个。小学堂的学制一般为三至五年,除保留经书课外,还新增国文、算术、珠算、修身、写字、尺牍、体操等课程。

两等小学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通令。规定:1、将清末的学堂改称学校;2、小学学制改为四、三制,即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3、废止读经课,加强实用科学教育。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房、良两县小学教育步入缓慢发展时期。至民国十年(1921年),两县有初等小学校56所,高等小学校7所,其中建在农村并办有特色的有私立长育高等小学校、上万初高两等小学校和河北东庄子高等小学校。此时,两县小学共有学生2500人,教师近百人。根据临时政府教育部的规定,两县初等小学普遍开设国语、算术、常识、手工、唱游等课程,高等小学普遍开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修身、尺牍、图画、写字、劳作、珠算、音乐、体操、童子军等课程。但是,教育部虽有取消读经的通令,而两县高等小学却仍然开设经书课。有的乡村初等小学仍然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如遇劝学所视学员来督导,教师则令学生将国语、算术课本摆在书桌上,以应付检查。民国十年(1921年),房山县建立教育会。教育会是教育科研机构,同时也对教育的发展起督促作用。

完全小学

1、军阀统治时期:

民国十一年(1922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颁行“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1、小学学制改为四、二制,即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2、既有初级又有高级的小学,称完全小学;3、撤销劝学所,设立教育局。据此,房、良两县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九年(1920年),房山县劝学所先后举办4届观摩会,进行团体操比赛和国语、算术会考。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房山县教育局先后举办高小观摩会、初小观摩会和四补观摩会。举办观摩会,开展校际竞赛,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截止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房、良两县已有完全小学13所,初级小学133所,其中新建的高级小学有石楼完全小学、夏村完全小学、王佐完全小学、周口店完全小学和琉璃河完全小学。此时,学生总数约为6000人,教师200余人。

2、抗日战争时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房、良两县首当其冲,学校被迫停课,师生四散逃荒。

长育小学教师邱雪樵携眷南徙，行至河北高碑店，遇日寇阻截，邱雪樵在刺刀下殉难，妻女投河自尽。这是日寇欠下的一笔血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沦陷区学校陆续开学。日伪政府推行奴化教育，饬令小学将公民课改为修身，将童子军改为国术，五、六年级增加日语课。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日伪政府又饬令乡乡建完全小学。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沦陷区连续三年举办涿、良、房三县运动会，房山完小三年蝉联夺冠，体育界一时传为佳话。

在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西先遣支队和冀西挺进支队，开进房山西部山区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这一年，先遣支队工作团在十渡村建起抗日小学。晋察冀边区宛平县第四区教育联合会主任王士甫在史家营村建起抗日小学。之后，蒲洼、霞云岭、史家营、张坊、南尚乐等地，陆续建起抗日小学40余所。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房、良联合县政府在十渡西庄村建立抗日高级小学，招收学生50人，(其中女生10人，为随军家属)，有教师7人，县长刘介愚兼任校长。肖克司令员曾来校观察，对抗高的建立表示支持。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抗日高小第二班在张坊大峪沟村建立，招收学生60人，有教师4人，王玉忠任校长。抗日小学的课程设置有国语、算术、珠算、常识、唱歌等。课本大多是边区政府油印的小册子，部分教材由教师根据中心工作编写。国语教怎样开路条、怎样写慰问信等。算术教怎样计算战利品、怎样计算减租减息、怎样计算农业累进税等。抗日高小学生实行供给制，学习期限为一年，期满后分配到部队或边区政府工作。抗日小学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之外，还要站岗放哨，盘查路条，传递书信，晚上屋顶广播，白天街头宣传。抗日高小学生也要配合政治运动，深入各村写标语，演节目，发表抗日演说，教唱救亡歌曲，配合民主政权建设。

3、解放战争时期：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两县沦陷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根据地成为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在小学重新设置童子军和公民课，取代国术、修身和日语。到民国二十六年(1947年)，两县国民党统治区已有“中心国民学校”(完全小学)20所，123个教学班，学生5951人；“国民学校”(初级小学)193所，212个教学班，学生10278人，教职员总数为612人。1948年底，解放区有高级小学两所，初级小学42所，仅张坊高小(校长陈浩山，教师白磊等)就有学生120多人。

4、新中国建立以后：

1948年12月，房山、良乡两县解放，两县的小学教育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1949年2月，房山县政府在顾册村、良乡县政府在沙窝村分别举办教师训练班，参加学习的除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原有教师外，还有新参加教育工作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由县文教科主持，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都到训练班讲课，做形势报告，组织与会者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他们初步懂得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道理。在训练班即将结束时，县文教科重新调配和任命了各小学的校长、主任和教师，并颁发了聘书。

1949年开始，房、良两县完成了土地改革，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迫切要求送子女上学，以求得文化上的翻身。各校放宽年龄限制，允许超龄生入学。到1949年底，房、良两县的小学发展到403所，849个教学班，在校学生33982人，教职工897人。与解放前夕相比，学校数增加约60%，学生数增加近一倍。但是，当时各校的教学工作极不正规，教室多设在庙宇、祠堂或民宅里，面积大小不一，采光条件很差。没有统一教材，算术沿用国统区的旧教材，国语使用老解放区的课本，每天上几节课，每节课的时间，没有统一规定。1949年6月，华北行政委员会召开华北小学教育会议，制定了《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和《小学教师暂行服务规程》。在华北小学教育会议精神指导下，房、良两县的小学教育，在学制、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时间、教育经费、领导体制、师资提高等方面，很快走上正规。

解放初期，小学师生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写黑板报、搞屋顶广播、演活报剧，从事各种形式的宣传，还

兼任农村识字班的教师，晚上去教文盲识字，还要为群众代写土地证，代写书信，代村政府写汇报。农村识字班晚上在学校上课，村政府要在学校开会，村剧团要在学校排练。学校时常停课，教师也无暇备课。

根据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精神，1952年至1954年，房、良两县分期分批地开展克服学校中的内外混乱现象，建立正常教学秩序的工作。明确提出“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口号，对来自校内外的干扰现象进行了整顿。同时，组织教师学习《凯洛夫教育学》、《普希金专家讲演录》，普遍推行苏联的五个环节教学法和五级记分法。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开始稳步提高。

1949年至1956年，小学毕业生累计36839人。除部分升入中学外，其余绝大多数参加了农业生产，成为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德、智、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据此，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各小学相继停课，参加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参加生产劳动。此后，麦、秋假期间，由教师带领学生从事生产队安排的田间劳动，成为劳动教育的主要形式。

1959年，小学校数发展到416所，教学班1587个，在校学生数是1949年的1.9倍。

1960年2月，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部门压缩编制，精简人员，先后精简教师7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初中毕业生。1963年贯彻《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小学四十条)。组织各校学习北京大红门小学一年级语文、算术达到双百分的教学经验，学习辽宁黑山县北关小学集中识字的经验。

1964年，房山县展开创办耕读小学的活动。县文教局设专人管理全县的耕读小学。县教师进修学校设耕读组，指导耕读小学的教学工作。耕读教师由所在的生产队选派。报酬是由生产队记工分，县文教局按月给以适当补贴。耕读小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形式灵活。一般开设语文、算术两科。上课时间随农事忙闲而变化，农忙时晚间上课，农闲时半日学习。对不能参加集中学习的采用巡回教学的形式，教师亲自到家去教。允许学生带弟弟妹妹来上课。截止到1964年10月，全县共办耕读小学368处，504个班，有耕读教师457人，学生13258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小学停课。1967年3月，小学按照中央的部署“复课闹革命”。但除算术课外，其它课只学《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1968年，小学以学区为单位建立革委会。同年8月，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78年后，教育行政部门着手进行拨乱反正、恢复教育教学秩序的工作。一是落实各项政策。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教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教育工会，承认教师的工人阶级地位；吸收够条件的中老年教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78年至1990年，仅良乡第一小学就有24名教师入党。二是在学校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如重新恢复少年先锋队组织；重新颁布《小学生守则》，恢复课堂常规；重新建立颁发“三好学生奖章”、“先进集体奖状”的制度；重新颁布“小学班主任工作条例”；颁布“师德规范”手册和建立每个教师的教学档案等。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房山县召开县、乡(镇)两级教育工作会议，学习《义务教育法》，并采取了四项贯彻措施。第一，鼓励集体和私人自愿捐资助学，到1990年底，共动员社会捐资281.7万元。第二、严格学籍管理制度，不许随意开除学生，不许任意责令学生停课或退学。学生转学要严格手续。第三、在边远山区设寄宿制学校。第四、在小学设置盲聋哑和弱智班，或者随班就读，为232名残疾儿童解决了学习问题。

1990年，房山区小学的儿童入学率已达99.7%，巩固率为99.8%，毕业班及格率达99.7%。1990年，

全区有完全小学 197 所, 初级小学 166 所, 在校学生 62634 人, 教职工 3485 人, 分别比解放前增长 1.5 倍, 3.9 倍和 5.2 倍。

房山区的小学教育, 从清末开始, 经历 80 余载, 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才得到迅速发展。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无论在办学规模, 校舍建设、教学设施、师资培养、教学质量等方面,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房山区小学教育曲折发展的史实, 充分有力地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科学真理。

(《房山文史资料》第 8 辑)

学宫育学子 春来绽春蕾 ——记房山中学的历史沿革及新生

田树屏

房山城, 始建于金。当时为金主完颜氏修陵墓于大房山麓。墓东南, 筑小城, 以屯兵守陵, 定名“奉先”。至元代, 改县制, 乃更名“房山”。隶范阳郡。

原房山城, 号称“三山不露, 四水不流”, 所谓“三山”, 据说城内地表下有三座山的山头, 但未露出地面。所谓“四水不流”, 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地势都较高, 夏季雨后, 大量雨水不可能从四个城门洞流到城外, 只能汇集到四个城角的大坑里。传说这是房山的“风水”所在。后来, 这“风水”被人有意破坏了。三个山头有两个露出来了, 四个城门, 雨后也大量向城外流水了, 所以, 房山历史上从未出过“状元”。

在房山城里东南角大坑的西北方, 有一个庙宇群, 按由西向东的排列顺序是: 孔庙、文昌宫、忠烈祠、贤孝祠、云峰书院和药王庙。其中云峰书院就是科举时代学宫(县学)之所在。

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所修《房山县志》残本上有《云峰书院记》, 言“在大街之东”。民国十六年(1927 年)修《房山县志》卷四上, 刻《畿辅通志》载:“房山有义学, 在学宫旁, 清雍正四年(1726 年)建, 后改做云峰书院”。据清嘉庆十一年(1806 年), 《云峰书院条例》规定:“设掌院, 主讲席”, 供“诸生请益, 朝夕攻磋”;“设斋长五人轮流执事”“经理一切”。在这里进修的都是. 准备应“乡试”的“廪生”或“秀才”们, 这些人, 平时在家读经或来院请益, 习作“八股”, 交掌院批阅。这时的书院规模很小, 有“上房五间, 东西厢房六间, 大门及照房共七间”。(引《房山县志》卷四, 云峰书院条, 不过是一个有十八间房的四合院。

清“光绪末年, 倡言变法, 改立学堂, 而书院遂无存在之必要矣, 三十一年(1905 年)学董赵连城、陈智、赵宗飨倡议开办学堂, 招坐授课, 因借书院, 改组为房山县高等小学校”(引《房山县志》)后来, “以生徒众多, 无法容纳”。除又增建宿舍六间, 教员室二间外, “复将西邻文昌宫一所圈入学堂”, “大门外隙地二亩余, 亦筑墙圈入, 作为体操场用”。辛亥革命(1911 年)后, 房山县立高等小学校(县高)就在这块地方办下来了。后来文昌宫后的忠烈祠、贤孝祠也改成了教室, 又增建学生宿舍十二间, 伙房三间。自此始至 1945 年, 校院的大小, 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1944 年, 日伪统治末期, 当时是高鑫(品三)任校长。在“房山县立高级小学校”内, 增设“农业职业班”一个班, 招生四十名。开设初中深程, 兼习农事。1945 年, 日本投降后, 国民党县政府任命纪绍文(道

周)为校长。这时,把农职班改为初中,算做初中二年级,又招收初一年级两个班(甲、乙两班)学校开始定名为“房山县立初级中学”。校内小学部、中学部两部,各设主任一人。至此,房山县内开始有了中等学校,这就是房山中学的前身。

这时,学校的规模是:中学部,初二一个班,初一两个班,共三个班,小学部,初小一至四年级,六个班,高小五、六年级,六个班共十二个班。全校中小学共十五个班。由于班次增多,把文昌宫西邻的孔庙中东庙、西庙和大成门,改建为教室。

1946年,校长为黄毓珍(宝涵)中学部主任为绳以伟(纶如)小学部主任为孙震昌(东甫)小学部班数未变,中学部增加一个一班,即原初一两个班合并为一个班,升入初二(至1948年每年如此)又招收初一两个班(甲、乙)全校共十六个班。1947年,校长改任为绳纶如,中学部主任为彭振蒙,小学部主任仍旧。中学和小学的班数都没有变。这一年,初中三年级毕业三十二人。这是房山县历史上第一届初中毕业生。

1948年,校长与小学部主任仍旧,小学部主任易为李凤。(1948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这一年,除招收初中一年级两个班外,又增招初级师范班一个班。至此,全校小学部五个班,小学部十二个班,共十七个班。中学教师又增聘高风台、周彬二人,都是1948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和中文系毕业的。由于学校班次又增多了,又把东邻的药王庙圈入学校,以充教室、宿舍之用。以上、学校的规模,就是1948年底我党接管时的规模。

随着国民党统治的朝不保夕,学校这个“摊子”也烂到没法子的程度。学生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吃饭是窝头、小米饭老咸菜和白菜汤,宿舍是用炉灰填起来的实心土炕,阴暗潮湿,臭虫、跳蚤大把抓,有的学生身上还长了疥疮。1948年来校的师大毕业的三位老师,经常深入学生,关心学生生活,给学生介绍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和解放区的情况,了解了一些情况,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后来,因为校外风言风语,说他们有“共产党嫌疑”。其中,李风同志从1948年十月中,回到北京,再也没有回来。

1948年冬,随平津战役的迅猛展开,我华北人民解放军,解放涿州之次日,与解放良乡的同时,即1948年12月13日夜,华野某部二十旅在刘秉彦同志的指挥下,解放了房山城。至此房山全境宣告全部解放。

12月14日凌晨,房山军管会马教导员来校,宣布接管,并命令:全体教职员工,坚守岗位,从12月14日起,除“公民”课取消外,各班一律按原有课程表,照常上课。从此,“房山县立初级中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迈开了新生的第一步。

1949年,1月,房山县人民政府,在顾册村召开新区教师学习会,房山中学全体中小学教师包括原来的校长和主任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学习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及有关的方针政策。这对于参加会议的全体中小学教师,是一次政治上的启蒙教育。大家茅塞顿开,情绪高涨,以饱满热情,准备着迎接新生后第一个新学期的到来。

1949年,2月,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察哈尔省平西专区谭惠民副专员(原房山县县长)来校视察,了解情况,准备与安排正式接管学校。2月25日专区从北岳区第三中学抽调十一名同志来房山中学。他们是校长杨槐堂,教导主任孙俊卿、教导干事杜生聪、周元希、李柱臣,会计杨万明,管理员于存华和勤杂人员石洪泰、徐德厚、孙泽安、韩怀玉。经过一周准备,在1949年3月3日,由县长杜恩霖同志主持,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正式接管及有关干部任命。计:校长杨槐堂、教导主任孙俊卿,总务主任刘天德(当时正主持新区知识分子训练班工作,于3月中旬到任任职)小学部定为中学附属小学,主任为冯侃。学校正式定名为“平西区房山中学”。会后,原任校长绳纶如,根据上级安排,赴平西专区任职。是年夏,根据杨槐堂校长倡议,定3月3日为房山中学校庆日,到现在整整四十年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作者系原房山县政协副主席、房山中学高级教师

良乡中学的建立与新生

翁向新

我常常以强烈的感情回首往事。在这些回忆中，最可引为骄傲的是对建国初期良乡中学的回忆。这不仅因为我曾经在那里读书和工作过十几年，更因为良乡中学是一个有优良传统，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许多贡献的革命青年的摇篮。

下面，就分三个部分，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良乡县立中学的建立、北岳三中的诞生和良乡中学获得新生的情况做一些介绍。

良乡县立中学的建立

解放前的良乡县立良乡中学，虽设在良乡城内东斜街南口的文庙旧址内，但一开办时它不在那里。据年长的人回忆，由于同盟国向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全面宣战，日寇在华的反动统治也日暮途穷，它们虽然搞了“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但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其必然灭亡的前景。于是，它们改变了手法，想用奴化教育的形式为中国留下后患。就这样，1945年春，它们在良乡筹办了伪良乡中学，并冠以“河北省立”的大号。

第一批学生，是于1945年6月在良乡镇小招考的。7月发榜时，正取120人，备补30人。9月份正式开学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所以，就把校址安排在罗府街路北的原“新民会”旧址内。（见附图）报到时，两班学生不足100人，其中30余名是女生。编为一个男生班，一个男女生混合班。教师和勤杂人员一共10余人。开学典礼时，国民党在良乡的“党政委员”全部出席，县长裴洪远还在会上大放厥词，辱骂共产党，要求学生“继承和发扬三民主义……”当时，学校开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外语、修身等科目。

其后不久，1946年校址就迁到孔庙内，学生们在大成殿和后院操场北边的原看守所上课（见附图二）。之后，又加盖了畔池西边的六间教室和一间传达室。

1947年良乡县县长易人由贾建民出任。良乡中学从此也改名为“良乡县立良乡中学”。为“宏扬政绩，兴教办学”，贾某人大敛民财，在填饱私囊之余，拿出了几个钱又盖了畔池东侧的六间教室，而且还特意为自己树了一块奠基的碑石。这时，学校已发展到初中六个班，并开设了一个师范班，学生300余人。学校内不仅有校长室、教务处，还设了由国民党良乡县党部直接控制的“训育处”。开设的课程也多了。中学班除有数、理、化、语、外等科以外，还有国学（讲论语、孟子等）、党义（讲三民主义等）、童子军训练等为强化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科目。师范班除设文化课以外，还有教育概论、乡村教育和音乐等课程。

校内由国民党、三青团控制，教师的上课受监视（常有“教导干事”在窗外偷听），学生无言论自由（有“违纪”言行，训育处就传询），住校的那些男同学受到管制就更多些。

那时的良乡中学并不象一个正式的学校：祭孔在那里搞，竞选伪国大代表在那里闹，军统0760部队搞宣传在那里喊，连还乡团抬棺列队办“追悼会”都在那里嚎。学生读书无目的，教师教书为挣钱，办学的董事们为捞油水……总之，简直不象个学校。

在战火中诞生的北岳三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前后，在华北大部分山区、农村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正从东北战场推向全国。为了迅速扩大战果，促进农村包围城市，迫使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我党我军急需尽快培养成千上万的年轻军政干部。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第三中学应运而生，她于1947年7月，在宛平一区的李家庄和梁家庄(见附图三)开办了。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战争服务、为地方服务。这里的学生就是有文化的预备干部，可以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需要，随时离校或参军，或到新解放区去补充干部队伍或到地区工厂作骨干。

北岳三中的校长是党组织特意从前线调来的赵亚平同志，教导主任是王磊同志。学校初建时有一个短训班、一个普通班和一个初中班，有学生130人。短训班主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另外两个班设有政治、语文、数学三门功课。由于当时正处在战争年代，特别又是在山区，所以，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都是非常艰苦的。

教师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年发两身灰单衣。一身棉衣，四双单鞋，一双棉鞋。为了支援前线，就是这些东西有时还要少发一部分或由个人捐献一部分给部队。

学生没有固定的教室，没有书桌，只能在老乡主动腾出的房子里搭上门板、条案或棺材板当书桌，蹲着或坐在地上用石板、石笔写字；如果谁能有一个铅笔头、有几张彩色标语纸做作业，那就不简单了。

北岳三中的师生同甘共苦，一起入伙，共同住宿。吃的是窝头、小米饭、山药蛋和老咸菜。缺柴了，师生们就上山去砍；少菜了师生们就爬百花山采野黄花，煮上一锅，汤菜俱全，别有风味。

师生们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学习八路军的三八作风。白天除去上课之外，课余还帮助老乡挑水、砍柴、打扫院子或者种庄稼、收核桃；晚上，一个宿舍的十几名同学围着一盏小油灯认真地进行学习。

老乡们说：“这是咱们自己的游击学校，有我们吃的，就有老师和学生们吃”。校长赵亚平同志满怀信心地说：“为了新中国的解放，我们全体师生、要刻苦学习和工作。只要不畏困难，胜利就要到来！”

由于学校坚持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方针，所以，尽管环境艰苦、经常搬迁校址，可是，师生们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教学相长。学生的学习目的明确，政治觉悟高，生活朴实，劳动观点强，学习进步快，听从党召唤，很多同学在校学习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北岳三中在党的关怀重视下，为部队、解放区培养出了一百多名干部、战士和多条战线的工作人员，不仅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为创造和丰富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的新经验，写下了十分光彩的篇章。

良乡中学的新生

1948年12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良乡城。按照上级的指示，我察哈尔省第十一分区开始了对伪良乡县中的接收工作。北岳三中校长赵亚平同志率领百余名老解放区的师生，冒着大雪，背着行李，经过百余里的行军，于傍晚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走进良乡县中(另一部分北岳三中的师生到房山去接收伪房山县中)。

过了旧历年和灯节，当春风送暖草木萌发的时候，良乡地区的穷人都翻了身，所有的中小学也都一律复课开学了。良中正式定名为北岳三中，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走上了新的历程。

“咱们学校是直属党中央领导的……”

“不对，不对，是属晋察冀边区领导……”

“校长是女的，叫赵亚平。”

“副校长可是个男的，瘦瘦的，叫王磊”。

“教导主任姓高，是全边区的模范教师哪！听说他们打过游击，当过区长，会使双把匣子枪，还会弹斋教堂里的管风琴呢！”

“好家伙，国民党党部大院和伪警察的地盘，还有汉奸刘子权住宅都划归咱们学校了！”（见附图四）

“操场上堆的那些从炮楼里拆下来的大块板材，是给咱们盖学生宿舍、打床板用的……”

听了这一则则“国家大事”，我们简直都乐得闭不上嘴了。同学们人人眉飞色舞，天天唱唱喝喝。那时候，无论校会、班会、团员大会、学生大会，还是课间休息，一句话，除了上课学习之外的所有时间，学校内的欢声总是此伏彼起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和《你是灯塔》等许多歌曲，脍炙人口、同学们百唱不止。

不久，学校建立了党总支部委员会，赵亚平同志任党总支部书记，下边分设教师支部和各年级学生支部，王磊同志任校长，从此，学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加快了学校改造和发展的步伐。

良乡地区处于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犬牙交错的地带，由于共产党、国民党双方多年反复的“拉锯”，一些村镇的共产党地下交通、站和“堡垒户”曾遭受过破坏。所以，良乡解放后就首先在社会上开展了锄奸反特、清查血债的斗争。学校党团组织也通过政治课和各种思想教育渠道，组织了对学生的正面教育。除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外，还安排了关于解放战争战绩的报告会和土地法大纲讲座，并系统地讲授了《人民公敌蒋介石》、《罪恶的四大家族》等材料。当美帝侵朝战争打响和美帝公然出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省的时候，学校又组织学生开展了各抒己见的大辩论。先是由小组讨论，然后进入班内辩论，最后是各班各派观点的代表在全校大会上辩论。经过深入的学习、教育，同学们都认识到，必须克服恐美心理，树立对美帝仇视、鄙视和蔑视的正确观点。与此同时，在师生中反复讲述革命传统，学习、讨论和贯彻毛泽东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并且坚持表扬好人好事和在学生中评选尊师模范、在老师中评选优秀教师，从而逐步建立起了新型的师生关系。新生的良乡中学开学以后，课程设置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取消了内容反动的“公民修身课”和充满封建色彩的“国民课”。删掉了外语教材中崇洋媚外的有关课文；各年级各班都新开了时事政治课和哲学常识讲座，增设了劳动课；同时，还专门为师范班举办了“老解放区教育概况的介绍”的系列报告。其中，对同学们最有吸引力的要属时事政治课了。因为听这门课时，大家就如同从解放前的“只需读书，莫谈国事”的凝固的死气沉沉的黑暗小天地中走了出来，突然一下子视野开阔、大见光明、心地宽广了。“世界是谁创造的”“到底谁养活谁”“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努力学习的目的是什么”等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听课、讨论甚至争辩得到较好的回答。通过学习《社会发展简史》，知道了劳动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本身；人类的进化是从猿到人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通过学习《哲学常识讲义》，知道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同时，经过学习时事政策，再把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初步明白了，原来世界上的贫富不是天生的、命中注定的，这中间是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旧中国之所以腐败无能，人民之所以贫穷受辱，都是历代的剥削阶级反动派造成的；也是“听天由命”、“能忍自安”和“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等许多旧思想束缚的结果……到后来，同学们都逐步明确了，要革命就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而且必须“脱胎换骨”，真正全身心地站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才能做到为革命而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永远做一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

良乡中学从1949年春季新学期开始的时候起，就要求全体学生一律住校过集体生活。要求师生以“抗大”为榜样，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提出了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八字校训。开始时，许多同学不知道这校训的背景和含义，为此，学校举办了好几次专题讲座，然后，组织同学们一字一句地进行研究讨论，结合学校实际进行理解，最后，班、组、个人分别

订立进步规划与学习计划。从此，就掀起了热火朝天的“为革命而学习”的高潮。当时，学校对师生生活的安排是十分紧凑的，从早晨起床至晚上熄灯，完全是集体化、军事化。出操、集合各班各人都有固定的队形与位置。早中晚三餐在各班组值日生打饭盛饭的时候，全校要统一列队唱歌，待伙食管理员或值班长发出哨音，同学们才能按顺序进入事先排定的地点就餐。上下午上课都有严格的课堂常规；课后有丰富多采的活动；晚自习全校灯火辉煌，学生们都口若衔枚、伏案疾书，独立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大家都主动进行帮助，但被帮助的同学却坚持只接受启发提醒，不希望越俎代庖。学校的考试纪律极其严格，学生们也都自觉遵守。学校内的舆论非常健康有力，师生们的思想作风端正，人人以诚相待，事事互相帮助，学习风气特别浓。学校的生活制度也很严密。宿舍虽然都是用旧民房改造的，但是，室内的布置却井然有序，内务同战士的营房差不了多少。室外也处处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房前屋后还分组负责种植了花草树木。学生会和卫生室大夫每天都进行宿舍晨检，班主任熄灯时还要查铺。星期六课后学生离校须事先请假，并且必须在星期日晚自习以前返校。与学生有关的会议制度和奖惩办法也很齐全。每周一次周会，每月一次小组生活会，每学期一次思想学习、生活、社会工作和劳动情况总结评比会，每学年一次评奖表彰会。对各方面或某一方面有成绩或有进步的同学，都分别通过小组、班、年级或全校用不同形式给予表扬或奖励。对有缺点或错误的同学，大家都热情真诚地进行谈心帮助。绝大多数同学，不但在进行自我批评时能积极主动深刻，在接受别人的批评帮助时，也能虚心耐心并认真改进。正因为这样，所以，学校很少使用处分的手段，更没有开除过学生。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学们的政治热情都明显提高，大多都有革命理想和进步要求，学习刻苦努力，劳动主动积极，遵守纪律，热爱集体，团结向上。待人如同一团火，对不良言行敢于抵制或斗争。整个校园呈现一派生龙活虎、热气腾腾的景象。解放前的绝大多数学生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最后读书死。新良中的学习特点则是目的明确，要求具体，课内学习与各项实践活动密切结合。数学教师经常带领学生到大自然中去讲几何知识和进行实地测量，理化生物老师指导学生尽量在劳动、生产、生活中运用已学过的知识；语文老师倡导和帮助学生自己分析课文和评述同学的作文，外语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外语会话；美术老师带领学生到野外写生或到街上去刷写大型美术宣传标语……总之，各个学科都积极创造自己的联系实际、运用知识的新途径。

为了不使新一代重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复辙，并达到自己动手改造环境，改善生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锤炼每个人的革命意志的目的，学校不仅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参加修操场、砌院墙、修甬路、种花木、掏厕所、搞卫生等一系列建校和为生活服务的劳动，还在西门里城隍庙后身开辟了六十亩地的菜园，由学生分班负责种菜。此外，学校还组织学生养猪、磨豆腐，有时还分班轮流由伙食委员带领同学去为伙食团买粮运煤……那时的大多数学生，都锻炼得有组织能力、协作能力、劳动能力和主动克服困难的能力。

他们不争名利，不怕脏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思想上增强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缩小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差距。当他们在自己修建的操场上运动、喝着自己磨制的豆浆，吃着自己生产的蔬菜和肉食，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的幸福感与自豪感，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升腾起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

那时，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去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土地改革、开国大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平签名、节约救灾、宣传婚姻法等，每项大的政治斗争或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活动，学校都出动鼓号队、秧歌队、腰鼓队开路“打场”，演活报剧、或“拉洋片”，并在中间穿插一些口头宣讲。当时，群众公认，良乡中学的师生是最进步的社会力量。

在文体科技活动方面，良乡中学也是十分活跃的。歌咏比赛、口琴比赛、棋类比赛、球类比赛、拔河比赛经常举行；田径队、球队、口琴队、合唱队、曲艺队、演剧队、吹号队、腰鼓队等样样俱全；科技和学科研究小组还深入到了班组之中，有时还公开展览他们制作的各种教具、乐器和学习工具等。另外，春季郊游

与下乡宣传相结合的活动,使不少在城镇住家的同学认识了乡村,分辨了小麦与小葱、韭菜的差别;秋季旅行与参加秋收劳动相结合的活动,又帮助同学们增长了从事农业劳动的才干,锻炼和增强革命意志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尤其是有些班级组织的访问贫下中农、慰问“孤老户”等活动,更加深了同学们热爱劳动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伟大祖国的强烈感情,激励了同学们为革命、为人民而学习的积极性。

良乡中学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密切联系当地群众。刚刚解放时,百废待兴,需要做的群众工作也相当多。良乡中学的全体师生以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有组织有计划地积极参加当地政府各部门和各界各系统兴办的为群众谋福利的各项事业,例如:修桥筑路、植树造林、清扫街巷、慰问烈军属、节日大联欢等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49年春,在翻身农民报名参军的热潮中,良中演出的歌剧《宝山参军》一时成了轰动全地区的“名角儿戏”,十里八村的都携儿带女赶到城里来看演出。又如,为建国一周年庆祝活动赶排的大合唱《东方红》和为发动群众搞好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排演的大型歌剧《王秀鸾》,也都是演了一场又一场。至于随时赶集上街搞小型宣传活动,就更是按照政府的安排和群众的需要“随叫随到”了。以上活动大都是课后排练,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演出,基本上不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所以,当地人都说良乡中学的领导和老师是全才,学生也不仅是学生队,还是宣传队、工作队。

在宣传群众的同时,良乡中学的学生们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例如抗美援朝报名参加军干校的活动,良中就搞得特别深入人心。不仅学生们群情激愤、大写血书,连一部分学生家长也跑到学校来,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向学校领导和当地政府表决心。最后,在新战士入伍那天,全校师生高举红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一直把他们送到距校五里多远的火车站去。

总之,通过良乡中学培养的学生,一般都有较高的政治热情和不断前进的向上精神,他们大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勇于奉献,责任心、事业心强,并乐于不断进行新的追求。他们热爱新中国,对她的美好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所以,经过良乡中学这座革命大熔炉的冶炼和反复锻造,批批优质钢材被送到各条战线上去以后,都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伟大战斗中胜任愉快地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

良乡中学的新生是有意义的。

良乡中学的贡献是不一般的。

良乡中学给我留下的深刻而美好的回忆是永生难忘的。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作者系原北京市教育局干部

民国时期的长育小学

杨亦武

长育小学是民国年间房山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当年，长育以高质量的教育载誉房山，成为房山人材的摇篮，在房山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自1920年(民国9年)创立至1949年为房山县人民政府接管，长育走过了二十八年的历程。观其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初期(1920—1932)。这一时期包括长育小学的创立及其发展建设。盛期(1933—1937)，这一时期，学校完善了完小教育，教育质量跃居全县首位。1933年房山县教育科举办高小观摩会，1936年房山县教育科举办四补观摩会，长育小学囊括所有第一。这是盛期的重大事件。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长育小学关闭，标志着盛期的结束。中期(1938—1945)。这一时期恢复因战乱关闭的学校，并将其继续开办下去。晚期(1946—1948)，这一时期，常耀堂出面收拾残局，肖西珍任代校长主持校务。

长育小学的创立者是常耀堂、肖鼎三、李琴舫。常耀堂，城西洪寺人，天津法政专门毕业，长沟峪窑业联合会会长。肖鼎三、李琴舫，长沟峪乡绅，长沟峪窑业联合会副会长。常、肖、李是房山煤窑业三巨头，长沟峪窑业联合会中大部分窑产为三家所有。

常、肖、李在房山教育史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轻财重教的远见卓识，足为后世宗则。

长育历史纪年

1920年(民国9)农历九月九日，常耀堂、肖鼎三、李琴舫在洪寺村创立长育乙种工业学校。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常耀堂受过高等教育，思想进步，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遂决意兴办学校、振兴实业。他的想法得到了窑业界同仁肖鼎三、李琴舫的赞同，三人便以长沟峪窑业联合会的名义创建了长育乙种工业学校。

常耀堂捐出洪寺村西南留台尖下的10亩煤场作为校址。学校创办之初有校舍15间，课桌(双人用)30张，凳子60只，办公桌5张，椅子10把，书柜4架。

人事情况：校长常耀堂，学监孙执三，教师孙亨庭、边玉圃，校医姚复之(义务职)，文书李殿荣(义务职)。听差李德元、樊林、刘德印。

长育乙种工业学校属初级职业技术学校，拟定学制三年，以宛平芦沟桥甲种工业学校作为毕业生升学去向。

课程设置分文化课和工业课，两类课程各占半日教时。文化课设语文、算术、英文、修身、地理、历史、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工业课设木竹器制作、石膏制作、编织、剪纸等课程。学校备有木工房3间，木工工具30套，几何文具20盒，供工业课教学使用。孙亨庭主教文化课，边玉圃主教工业课兼美术。美术课以学几何画为主，兼学铅笔画、炭画、水彩画。那时，美术课已有写生的内容。

当时，学校有一个教学班，55名学生。主要来自长沟峪、县城、顾册、石楼、坨里、北坊、公主坟、下禅房、大董村等地。长沟峪学生居多，共15人。

学校实行免费教育，不收学费。教育经费主要由常、肖、李三家主持的长沟峪窑业联合会支出，其他小窑主所出无几。据民国17年(1928)本《房山县志》记载，长沟峪窑业联合会每年支付长育小学两千块现洋。

1921年(民国10)春,长育乙种工业学校改名长育高级小学校。变初级职业技术教育为普通高小教育,删去原工业课,采取全日文化课教学。学制仍为三年。学校转向的原因是,宛平芦沟桥甲种工业学校关闭,学生失去升学去向。由于学校性质的改变,孙亨庭、边玉圃离校。清明节前,开始校园建设。甬路两旁栽垂柳,操场矮墙南种榆树。9月,招收第二班学生。另设一个初小女生班,招收40名女生。改原工业课木工房为女生班教室。同月,校园西南角建3间办公室,校门内建竹池,种翠竹。同年,吕希仁、李敬思、李君实、宋郁芝(女)进校任教,宋郁芝任女生班班主任。

1922年(民国11)春,校园东南角增建3间教室,东侧饭厅前种80棵青杨,甬路两旁的垂柳内侧种百余棵榆叶梅,从教室区一直折向校园门口。此后历年,校园内又栽种了桃树、李树。孙执三又在监学之暇养植月季花、美人蕉、玉簪花等花卉点缀校园,长育小学终于形成了清幽丽雅的环境。

冬,邱雪樵进校任教并主持教务。

邱雪樵原为房山县小学校长,谙于教务,博学能文。常耀堂慕其才德,聘其来长育小学,邱雪樵毅然辞去校长职务来长育就任。至此,长育小学教师阵容初告完整,教务体系臻于完善。长育小学的语文教学独具特色,自编教材,选取《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及当代作家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的作品,熔文言文精华与白话文精华为一炉。同时重视作文教学与古诗词教学。所以长育小学的学生语文功底极深。

邱雪樵擅长诗词歌赋,尤擅律诗,教学之余时有吟咏。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长育小学的学生以习诗为乐,自办校刊《长育日报》、《新月》作为习作园地。邱雪樵等教师也时常为校刊撰稿。

配合各科教学,学校成立了古文研究会、算术研究会等学生课外学习小组。课外学习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晚间和其他课余时间组织活动,研究学问;音乐教师组织学生成立民乐队,在校内外演出。民乐队有笙、管、笛、箫等乐器。

孙执三与邱雪樵以严治校。成立学生自治会组织,以加强学生自身的管理与监督,校规校纪由学生自治会自行制定,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长育小学校风严整,教育教学秩序井然。学校花果满园,却没有人伸手动一动,致使前来视察的省督学感慨不已。

1923年(民国12)3月26日,全国各地人民举行反日集会游行,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租借地。长育小学师生到洪寺、县城游行示威,集会讲演。学校教育学生抵制日货,不买“舶来品”。五月庙,在县城内城隍庙戏台与房山县小学联合演出《亡国恨》、《安仲根刺伊藤博文》等反日剧目,向赶庙群众宣传反日爱国思想。

1925年(民国14)洪寺村西老爷庙内初小一年级学生并入长育小学。哈并各年级女生为一个复式班。同年,李琴舫购置鼓号队乐器、服装,长育小学鼓号队成立。

1927年(民国16)确立完小教育,改校名为长育两等小学校(后来改为长育完全小学校)。学制六年:初小四年,高小二年。招收四个初小班,两个高小班,学校教育规模扩大。

1931年(民国20)9月18日,日军夜袭沈阳,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予抵抗。不久,东北全境沦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长育小学师生徒步到十余里外的长沟峪矿区宣传抗日。学生邱迪春、苗培时向矿工讲演,号召抗日救亡,收复失地。

1933年(民国22),此间,长育小学的经济支柱常、肖、李三家已远非昔比。时局动荡,经济萧条。李琴舫家道中落,肖鼎三也每况愈下。数年后,肖家长沟峪大矿崩水,终告破产。唯独常耀堂尚无大碍。

常耀堂视校如家,不吝财物,但是孤木难支,长育小学教育经费失去保障。孙执三奔波于房山城乡筹措经费,房山各地父老解囊相助,长育小学的日常教学免致搁浅。教师的工资却无着落,而工资又是教师们养家糊口的来源,然而教师们以教育为己任,在邱雪樵的倡导下以“穷僧”的精神执教,安于“菜根书味”的清贫。迫于寒馁仍不懈于职,教师们住在学校,直到周末才肯回家。早饭前,晚饭后指导学生自习,中午教

学生写大仿，学古诗。条件虽然艰苦，师生们的情绪却很高。

同年，原长育小学毕业生肖硕儒、常振玉、任亚民等回母校任教，充实了长育小学教师队伍。肖硕儒，长育一班毕业生，回母校后担任体育教师。肖曾受训于石友三的第四方面军军事政治学校，体育上是内行。

长育小学体育教学设备齐全。有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单杠、双杠、标枪、浪木、哑铃等，校园中心辟有操场。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体育教学人材，体育课流于形式，体育教学甚为薄弱。肖硕儒担任体育教师后，完善体育教程，充实教学内容，长育小学的体育教学不但正规化，而且还走在了房山县小学体育教育的前列。

从1920年创立到1933年，长育小学已度过13个春秋。由于长育同仁的惨淡经营，长育小学在房山教育界已崭露头角。

长育小学的发展壮大，与相邻咫尺的公立房山县小学形成了竞争对手。县小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房山教育界是老字号，教育声望颇高。县小校长陈禹初为了保持县小在县内小学教育界的霸主地位，与长育小学在竞争中赢得主动，特请涿州魏颂尧、良乡贾政桥为县小高级教师，决心与长育在教育质量上见个高低。

陈禹初弟陈复初为房山县教育科长。

12月21日，房山县教育科举办高小观摩会。长育小学会同县小(男校，女校)、夏村、王佐、东庄子、周口店等校参加。这便是当时房山县所有的高小。

观摩会考7项内容：高小五年级语文、算术、总平均分，高小六年级语文、算术、总平均分，及校体育团体总分。

考试结果大出陈氏兄弟所料。长育小学囊括7项第一。

高小五年级，长育小学冯金如获语文成绩第一名，赵树诚获算术成绩第一名(总平均分第一失考)。高小六年级，长育小学赵振圃并获语文成绩、总平均分成绩双项第一，邱毅获得算术成绩第一名。长育小学校获得体育团体总分第一名，得锦旗奖。此外，高小五、六年级甲等生除五年级甲等第7名为县小黄效龄获得外，其余全是长育小学学生。高小观摩会的举办，客观上是对房山高小教育的一次检验。其结果表明，长育小学历经十三年的建设，教育质量已是全县小学教育首位，自高小观摩会后，长育小学步入盛期。

高小观摩会结束后，洪寺乡村简师教师姜士泽发表文章，抨击教育科，声援长育小学，姜说：“教育无彼我，学校无公私，应发给长育小学教育经费。”县财政科决定，自1934年始，每月补贴长育小学10元教育经费。

1934年(民国23)春，乡绅杨竹修、王西园捐钱、木料，为长育小学重修校门，增建5间门房。秋，初小毕业生李淑敏、赵如莲、李佩珍、万淑贞、张玉珍、赵小霞、韩佩珍等10名女生并入19班。长育小学首次实行男女合班，此后遂成定制。

1936年(民国25)5月1日，房山县教育科举办四补观摩会。所有第一又被长育小学一校包揽。长育小学19班学生李昌绍一人并获语文、算术、总平均分三项第一。长育小学校再获体育团体总分第一，再得锦旗奖。长育小学的兴起，打破了县小一统天下的局面，长育小学成了房山小学教育的瞩目。远近父老纷纷慕名送子弟来长育小学读书，县小则门庭冷落，一蹶不振。在此后的10余年间，长育小学的名声一直居县小之左。

以房山为中心，长育小学的教育辐射面西至南窖、水峪、安子，北至南、北车营、磁家务、漫水河、陈家台、班各庄、河北、李各庄，东至下禅房，东北至石梯、羊圈头、大灰厂，西南至张坊沟以里的八渡、十渡，东南至县界琉璃河。此外，门头沟、宛平、天津、北京等地，也有人来长育小学求学。长育小学毕业生升入北京四中、北京四存中学、通州师范、房山乡村简师等学校。当年，中学招考竞争激烈，长育毕业生却很少落榜。因此，在北京教育界声誉颇佳。长育小学培养了很多有为之士。苏展(原名于克正)，曾任北京市副市长。邱绍明，现任吉林省统计局局长。苗培时，当代著名作家。

1936年(民国25)11月，爱国将领傅作义在绥远抗击日伪军侵略，收复百灵庙。长育小学倡导绝食，声援抗日将士。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成在西安对蒋介石施以“兵谏”，要求蒋介石接

受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爆发后，长育小学群情激愤，坚决支持张、杨二将军的义举。

1937年(民国26)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8月，战火燃及房山，长育小学被迫关闭。长育小学盛期就此结束。

常耀堂，孙执三去北京客居。邱雪樵南徙，至高碑店南殉难。

9月16日，日军侵占房山县城。

此年后，长育小学毕业生赵然、傅伯英、常振玉、王延龄、王玉忠、王广楼、苗培时、李兴、邱绍明等先后奔赴抗日战场。

1938年(民国27)春，韩孝侯在长育小学招收一个初小班，长育小学暂告复校。韩孝侯与洪寺头面人物不合，既无经费，又得不到本村的支持，至暑假被迫离校。秋，洪寺张进臣、马良臣、刘占元等人聘请房山县小学教导主任肖硕儒回长育小学复校。驻县城伪军二队队长苏士超也出面请肖。肖硕儒遂以县小教导主任身份兼任长育小学教导主任，回长育小学复校。开设高小五年级一个班(即第20班)，和1个初小复式班，并招收第21班新生40名。教师经费由洪寺村负担，苏士超每年贴补几十元。经费短缺，教师们多尽义务，只是偶尔领取少量工资。

1940年(民国29)秋，第二届涿良房三县联合体育运动会在良乡县举行。长育小学与县小组织房山队参赛，房山县获第一名。

1941年(民国30)秋，第三届涿良房三县运动会在房山举行。长育小学再进房山队参赛，房山县又获第一名。

1942年(民国31)房山县日伪政权成立大编乡，“城关镇镇长”王荫庭自任长育小学校长。教导主任肖硕儒到“房山县民政科”任职。名义上仍兼长育小学教导主任，但不再过问长育教学事务。王荫庭聘请邱茂亭来长育小学任教并主持教务。

同时，李茂森、黄宝涵、李志宽、王香岩、潘全耀、范公廉、肖西琳进长育小学任教。

因王荫庭为“城关镇镇长”，长育小学教育经费由镇公所支出，并向社会募捐。主要捐资者有车厂吴化堂、周口店杨竹修、门头沟大峪孙殿华，孙某为坨(里)青(港)高线公司副经理。王荫庭主管经费，财务不公开，长育上下颇有非议。秋，在竹池南仿房山城魁星楼的形式兴建一座八角亭，历时一年落成。

1943年(民国32)肖硕儒辞去教导主任兼职，邱茂亭继任教导主任。同年，国民党政治特派员常玉来长育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学校秘密建立国民党支部，发展邱茂亭、王香岩、纪渐之等加入国民党。数月之后常即离去。

1945年(民国34)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房山县结束了日伪统治。

邱茂亭辞去长育小学教导主任职务，出任国民党“房山县民政科”自治指导员，纪渐之去宛平投常玉，任亚民投“北京行营”，白焕如去房山中学。

1946年(民国35)，王荫庭委托肖光魁在长育小学支撑局面。

1947年(民国36)，李志宽、王香岩、肖西琳、张锡元等又去职离校。

秋，王荫庭自行去校长职务，肖光魁随即离去。长育小学面临着人去楼空的局面。

常耀堂出面收拾残局，再次出任长育小学校长。委托肖西珍任代校长，实际负责。肖西珍，肖鼎三之长子。

自七·七事变，常耀堂家境日衰，对长育小学已是爱莫能助。没有经费，教师无薪可发。洪寺张晋臣、刘占元出面集些粗粮，仅供住宿教师糊口。肖西珍四处告讨，去职前只勉强发给部分教师工资。

由于战乱，学生骤增骤减。高小五年级一个班，学生一度增至50余人，至毕业，只剩下9人。

1948年(民国37)12月，解放军攻克房山县城，房山县全境解放。

1949年春，长育小学为房山县人民政府教育科接管，从此结束了其28年的历史。

长育人物之一

孙执三，房山西街人，名守礼，号执三。1883年(清光绪9年)生。父亲经营“孙麻花铺”。执三自动为伯父承嗣。十几岁读私塾，私塾毕业，进顺天府警察学校就读。毕业后曾在望都县警察局供职。1909年(清·宣统元年)由乡绅公举，出任房山县警察局警务长。1920年(民国9年)重阳节，常、肖、李三家创建长育小学，应聘出任学监。代行校长职权，全权处理长育小学一切事务。

学校开办之初，诸业待举。孙执三与长育同仁着手各项建设，诸如：校舍修建，设备购置，教师聘任，校务管理，及校园绿化、美化等。使学校办学条件日臻完善，教育、教学走入正轨。长育小学是私立学校，不列支于地方财政。因此，学校经济时陷窘境。执三奔波于房山城乡，四处筹措经费，使日常教育教学免于搁浅。教师的工资没有着落，执三想方设法，减缓教师的寒馁之困，大年三十还常常给教师们挨户送钱。而本人监学十七年，所取无几，一家七口靠十几亩薄田度日。论及长育小学的兴盛，多赖执三之惨淡经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长育小学关闭。孙执三客居北京(时称北平)，任北平河北中学图书馆管理员。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房山县县长李仲三聘任其为财政主任。孙执三目睹县府现状，无意官场，适逢当时长育小学校长王荫庭请其回长育小学再任学监，于是辞去财政主任职务。此时，长育小学触目皆非，孙执三感物伤情，痛然离校。从此闭门自安，不问世事。1961年病逝，终年七十八岁。

长育人物之二

邱雪樵，城东饶乐府人，名陵，曾名惠，号雪樵。1893年(清光绪19年)阴历九月初四生。先读私塾，后就读于京兆第四中学。曾与韩东甫、魏恺朋同赴天津投考师范大学，时运不济，名落孙山。回乡后在县警察局充文书，不久即因不满于警界之腐败辞去警职，出任县小校长。1922年冬应常耀堂聘请到长育小学任教并主持教务。当时，长育小学成立不过两年，建校伊始，诸业待举。邱雪樵承学校教务于一身，导教育教学于正轨。此后十五年，竭诚尽力，与孙执三等长育同仁一道，把长育小学办成了房山县一流的小学校。

邱雪樵谙于教务，他成立“学生自治会”，以加强学生的自身管理。并配合各科教学组建“古文研究会”、“算术研究会”等学生课外学习小组。

在语文教学上，独树一帜。重视文言文教学，而又一弃文言晦涩难懂之故弊。他博学能文，尤擅诗词，在其影响下，长育学生习诗成风，并自办校刊《长育日报》、《新月》以为习作园地。邱雪樵以教育为己任，具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安贫乐道的性格。他常说：“得英才而教育之，其乐一也！”年复一年，他身着灰布长衫，含星出户，踏月独归。一妻一女，靠其薄薪度日，而薪水又常无着落。他安于“菜根书味”的清贫，以“穷僧”的精神执教，并以此倡导全校教师。长育小学能在困境中兴起，邱雪樵付出心血尤多。邱雪樵执教以严为先，以爱为本。学生们私下顽笑说：“邱老师在家，鸟儿都不爱叫！”一位严师的形象跃然语端。学生温成瑞夭逝，邱雪樵哀痛之至，并书挽联相悼：“好学生虽埋骨荒郊死而不死，坏孩子纵靦颜人生亦虚生。”一腔心血倾注于孺子。邱雪樵是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背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倒行逆施，深恶痛疾。面对县府官员公然痛斥：“革命未成天有眼，同志努力地无皮”。“江南天未共，华北已成单”。同情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鞭挞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邱雪樵在长育十五年的教学生涯，正值中国多事之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早就伸向我国，“九·一八”事变之后，侵华战火愈演愈烈，而蒋介石又实行不抵抗政策。邱雪樵忧国忧民，抱定以死殉国的决心。修身课上，邱雪樵用手掌拍着额头慨然陈誓：“头可断、血可流、宁死不作亡国奴！”

1937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八月战火燃及房山，邱雪樵携眷南徙，行至高碑店南遇日寇阻截，与妻、女失散。邱雪樵与高玉恒、赵四秃子一同被日兵捕获，高赵二人幸免，邱雪樵在刺刀下殉难。妻子携女儿大华逃至新乐河，闻雪樵死讯，将大华推入河水，而后投河自尽。

附：

雪樵遗作

别

—

得得蹄声杂鸟啼，
阿娘送我板桥西。
他乡负笈因求学，
切望阿娘莫念儿。

二

沙溪方过到山村，
一片桃花带雨痕。
惹得行人无限恨，
频频回首望家门。

记游

天气晴明日，
游山为看花。
红桃迷路径，
绿柳碧人家。
水上飞春燕，
空中噪晚鸦。
骚人度归去，
时已夕阳斜。

夜思

谁是知音者，
余为失意人。
寒窗灯作伴，
冷夜月为邻。
客舍思良友，
他乡念老亲。
绳麻眼不得，
事事忆前尘。

长育人物之三

肖硕儒，名彦琛，号硕儒，城南肖庄子人，原籍长沟峪。1908年，（清光绪34年）1月21日出生于一个自耕农家庭，父肖厚田。六岁读村塾，十二岁进长育小学，成为长育第一班学生。小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四存中学，继入京兆高中文科就读，因家贫中途辍学。1929年考入西北军石友三部“第四方面军军事政治学校”，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石友三部在滹沱河溃散，遂辗转还乡。1933年3月，进母校长育小学任体育教师，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教育生涯。

当年，长育小学由于缺乏正规的体育教师，体育课流于形式，体育教学甚为薄弱。肖硕儒曾受训于石友三部，体育是内行。他任教长育小学体育课后着手完善体育教程，充实体育教学内容，体育课讲授制式训练，体操、球类、田径等内容。并自编击掌操、梅花拳供学生习练。长育小学的体育教学从此走入正轨。1933年冬，房山县教育科举办高小观摩会。1936年春，房山县教育科举办四补观摩会，长育小学皆获体育团体总分第一。

自1934年，肖硕儒兼任十九班班主任。在1936年的四补观摩会上，十九班学生李昌绍一人并获语文、算术、总平均分三项第一。

李昌绍，抗战期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外交部工作，后任山西省旅游局局长。他在给肖硕儒的信中写道：“您为人正直，无私，工作勤奋，安贫乐道……这些高尚的品格，言传身教，都在我青年时期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影响与熏陶”。

肖硕儒是长育小学的后起之秀，又是长育小学盛期的核心人物之一。长育故人肖西珍称孙执三、邱雪樵、肖硕儒为“长育三杰”。

1937年，日寇进犯房山，长育小学关闭。肖硕儒南徙，行至涞水又遇日军，于是北返房山。家中只有三亩地，为维持生计，1938年初经人介绍出任县小教导主任，兼体育教师。

1938年秋，以县小教导主任身份兼任长育小学教导主任，回长育小学复教。肖硕儒兼任长育小学教导主任职至1942年。

“慨自事变，校舍荒芜。复兴我校，肖师硕儒。惜我学子，失学堪虞。斩芟荆草，再建宏图。……循循善诱，加惠顽徒。”（1943年长育小学师生给肖硕儒的赠匾辞）。这段文字是肖硕儒恢复长育的历史记录。

1939年秋，首届涿、良、房三县联合体育运动会在涿州举行，肖硕儒率县小队代表房山单刀赴会。房山县荣获第一名，涿县第二名，良乡为末。

1940年秋，第二届涿、良、房三县联合体育运动会在良乡举行，肖硕儒率由县小、长育小学组成的房山队参加。房山县再获第一名，良乡第二，涿县第三名。

1940年秋，第三届涿、良、房三县联合体育运动会在房山举行。肖硕儒作为东道主参与运动会的筹备与组织，并率房山队参赛，房山队以县小、长育为主力，增加了南关、顾册等校运动员。天时，地利，人和，房山县以悬殊的比分优势第三次获第一名。第二名涿县，第三名良乡。

随着房山县的蝉联夺冠，肖硕儒成了涿良房三县体育界的知名人士，一时有“传奇人物”，“锦标教师”之称。

翻开民国年间房山体育史，势必提到肖硕儒的名字。当年，肖硕儒作为房山体育界的核心人物，对房山体育教育、体育运动产生过积极影响。

肖硕儒的大半生几乎都是在学校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小学教育。现已离休，颐养天年。

人 物 表

校 长 表

姓 名	任 职 年 限	籍 贯
常 耀 堂	1920-1923	洪 寺
肖 鼎 三	1924-1926	长 沟 峪
李 琴 舫	1927-1929	长 沟 峪
常 振 兴	1930-1932	洪 寺
常 耀 堂	1933-1937	洪 寺
王 荫 庭	1942-1946	城 内
常 耀 堂	1947-1948	洪 寺

补充说明

- 1、1938年至1941年间设有校长，教导主任肖硕儒全权处理学校事务。
- 2、1949年至1948年间肖西珍任代校长，代替校长常耀堂行使职权。

学 监 表

姓 名	任 职 年 限	籍 贯
孙 执 三	1920-1937	房 山 西 街

补充说明

任学监代行校长职权，校长属名誉性质，不过问学校具体事务。

教 导 主 任 表

姓 名	任 职 年 限	籍 贯
邱雪樵	1922-1937	饶 乐 府
肖 硕 儒	1938-1942	城 南 肖 庄 子
邱茂亭	1943-1945	饶 乐 府

补充说明

- 1、1920年至1921年间，无教导主任，学监孙执三代行教导主任职权。
- 2、1946年无教导主任，肖光魁实际负责。
- 3、1947年至1948年间，无教导主任，代校长肖西珍代行教导主任职权。

教师表

姓名	任职年限	籍贯
孙亨庭	1920-1921	固安
边玉圃	1920-1921	固安
吕希仁	1921-1934	东庄子
李君实	1921-1923	房山东街
李敬思	1921-1922	房山东街
宋郁芝(女)	1921-1924	房山西街
刘树藩	1922-1930	羊头岗
邱雪樵	1922-1931	饶乐府
赵席儒	1923-1924	房山南关
韩东甫	1924-1937	北庄
马国平	1927-1937	陈家台
蔡学愚	1931-1932	官道
恩成惠	1931	阎村
姜培山	1932-1933	佛子庄
肖硕儒	1933-1942 1945-1946	城南肖庄子
常振玉	1933-1934	周口店
宋愈	1933-1935	黄院
杨鑫	1933	黄土坡
任亚民	1933-1937 1943-1945	下坡子
邱迪春	1936-1937	饶乐府
韩孝侯	1938·上	洪寺
郑金生	1938-1939	房山西街

杨淑芬(女)	1938-1946	洪 寺
姓 名	任 职 年 限	籍 贯
王延龄	1939-1942	南窑水峪
安振远	1940-1945	芦 村
邱茂亭	1942-1945	饶乐府
李茂森	1942	陈家台
黄宝涵	1942-1945	夏 村
李志宽	1942-1946	大苑上
王香岩	1942-1946	顾 册
潘金耀	1942-1948	横流水
肖西琳	1942-1946	长沟峪
范公廉	1942 1946-1948	洪 寺
白焕如	1943-1945	房山南街
纪渐之	1943-1945	房山东街
李隶贞(女)	1943-1944	顾 册
刘淑田(女)	1943-1944	大次洛
常 玉	1943·下	良各庄
张锡元	1944-1946	云峰寺
何素娟(女)	1944	辽宁大连
肖光魁	1945-1946	北 市
赵伟礼	1946-1948	房山南街
殷恩荣	1946-1948	南 河
孙涤新	1946-1947	房山西街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长沟小学开创史

陈 瀛

长沟小学座落在长沟镇大街西段路南，前边是校舍，后边是操场，面积十五亩多，作为中心校，无论教师配备还是办学条件，都初具规模。

学校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回顾它的发展过程，是艰难曲折的。

它创建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学校旧址是原旧庙南庵，座南朝北，前面临街，东西两侧和门前均有小河围绕，后边是一片沼泽地，是由多方捐资，经过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努力，才逐步建立起来的。

原房山县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为河套沟，坨里和城关也相应有所发展。而城南特别是西南乡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是较薄弱的，各村除了仅有一所小小的私塾以外，学生要想继续深造只好到几十里远的县城去读书。

当地乡绅，特别是长沟镇的商业比较发达，如务本堂、高蜡铺、后烧锅，经营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各方面要求兴办学校的呼声很高，岳各庄乡周各庄人孔宪江(字海亭)1939年当了房山县日伪保安团团团长，为日伪政权效力，但在兴办“房山县六、七、八区联立长沟小学”这件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他受当地乡绅和群众的推举，出头承办房山西南地区这所唯一的完全小学。1940年初着手筹建，后半年破土动工，前边是个破庙的小院、后边是一片旧河床杂草丛生的沼泽地，面对着这样一个破烂摊怎样兴建学校呢？没有多方支援，不发动群众是无法办到的。六、七、八区头脑几次开会，动员人力、物力，附近各村出动了大量劳力和大车小辆，还从北京永安汽车行请来了汽车，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填平了旧河床，新校舍拔地而起。大批的款物何处来？当时的日伪政府是无能为力的，完全由捐资的办法支付，长沟镇助校址一处，平房七间，学田八亩，碎石二十万斤；云居寺助学田一百亩，大杨树六株，周口店灰煤公司助石灰六万斤，天开、赵各庄、大韩继各乡公所助大车几十工，捐款遍及全县各地，就连南岗洼、公主坟、云岗、大安山也各助洋五十元，除本县外，邻近涿县几个村也都捐了款。(详见当年田洪波先生书写的《培育英才》的碑文，此石碑现在埋在学校礼堂前地下)。

原有旧房被改建，在学校西南角靠操场边建起了大礼堂，这座礼堂现在看起来算不上什么大建筑，但在当时来说确很不容易，垒地基时需要打木桩，用了大量的豆渣石，底座建好，从南正行宫运来旧石碑做底围墙，乾隆御笔碑文自然被保存下来，六架大柁(用汽车一趟只能拉一根)是从云居寺经过几天才运来的。礼堂、教室建成后，第二届毕业生还捐献了书桌。学校周围树木不多，就由学生从家里自带树秧，师生动手美化绿化学校的环境，几年后就绿柳成荫了。

1941年6月开始招收第一批五年级生，考生范围不仅涉及房山六、七、八区，就连涿县西北乡以及涞水县的王家碾、王家磨一带的学生也慕名而至，当时招收五年级一个班就有58人之多。长沟小学第一任校长是西营乡绅大学毕业的甄仙舫，第一任教导主任是通师毕业又有教学经验的高树声，十几位教师多是师范毕业，教学认真负责。1943年开始首届高小毕业生，学识比较渊博，有一定工作能力，走向社会或升入中学颇受欢迎。当年招收五年级由原来一个班增到3个班，每班都在50人以上。

当时设立的学科有语文、算术、修身、自然、历史、地理、音乐、体育、日语等，课外活动内容也很丰富，如举办诗词社，开办国术班(国家传统武术)、鼓号队等体育方面的各种运动队坚持经常。

当时每年召开一次涿、良、房三县运动会，除第一届由于学校初建未能参加外，以后几届都参加了，房山县每次总成绩都居三县之首，长沟镇小学又占各完小总分之首，学校涌现了一批体育名将，如短跑、跳高运动员冯陆达，外号人称“大洋马”；百米运动员牛书文，；百米女运动员高金华、甄月婵；三铁运动员龚书兰；长跑运动员陈风清等。第二届三县运动会在涿州举行，因我县总成绩在三县中遥遥领先，可把孔宪江高兴坏了，运动会闭幕的归途，本应走涿州至长沟的近路，可却取道琉璃河而返房山，名义教练员孔宪江在“孔饭铺”设宴款待，以资鼓励和庆贺。此后，长沟镇小学各科成绩也都很突出，因此远近闻名。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十渡抗日小学及根据地教育建设

董 华

十渡作为平西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我党领导下，蓄积革命武装力量，坚持抗战斗争，其间威武壮烈的斗争事迹，已如车载斗量，记入史册。但是，关于我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建设，以及当时的教育状况，尚缺乏挖掘整理。追思彼时，反鉴于今，当有发扬革命传统，匡风化俗的现实意义。

为此，笔者访问了隗合生老人。老人今年六十八岁，虽年近古稀，但面色红润，身体精神依然健朗。他执教近五十年，是十渡抗小第一任教师，现以行政十八级干部待遇而离休，谈起往事，老人记忆犹新。唏嘘之中，感慨良多。今依老人所述，整理成文。

十渡抗日小学的建立

由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始，中国开始遭受巨大民族灾难。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国民党中央军望风南逃，土匪顽伪势力应劫然而生，大片国土兵连祸结。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生民百姓心存一念，在于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和八路军。

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十渡地区开进两支八路军部队。番号“冀西”。一支叫“先遣支队”，司令部驻在十渡村，一支叫“挺进支队”，司令部驻在十渡村西三里的西庄。在十渡的这支八路军队伍，还有一个地方工作团，成员大多是投身革命队伍的青年学生，团长名字叫王拔。这些热血青年为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到处书写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到各村成立抗日救国动员会，建立救亡室，组织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荒僻的山村，到处可以看到抗日情绪的增长。在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以后，工作团办起第一所抗日小学校。校址设在十渡隗和田东屋（后被鬼子扫荡烧毁）。开始时，仅十几个学生，工作团成员自任教师。学生来源于贫雇农家庭，所用课桌是八仙桌和炕桌，课本是八路军油印的麻纸课本。

此时，在“房山县高”读过小学五年级的隗合生，正因事变滞留家中。他受到抗日感召，深感不打走日本，国家没有前途，因此，怀着为抗日救国出力量的愿望，经十渡村抗日救国动员会主任晋尚贵介绍，担任了“十渡抗日小学”第一任正式教师。这个时间是1938年10月，他十九岁。

抗战时期，十渡属平西十一分区。无论从对革命造成有利条件的区域环境去看，还是从时间上推断，“十

渡抗日小学”，或许就是我区第一所抗日学校，甚或北京地区较早的抗日学校。

抗日民主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尽管在战争年代，我党对教育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组织机构健全。从专区到乡村，教育是政府工作中民、财、实、教四大部门之一。县有教育科，区有教育助理，村有教育委员会，各校之间又有中心片教师。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除专职干部外，其它部门干部下乡，也都要到学校过问教育工作。一方面帮助学校解决问题，帮不识乐谱的教师教唱新的抗日歌曲，一方面要求学校做好该部门任务的宣传。这样，学校就成为农村抗日宣传阵地，师生成为中心工作的开路先锋。

党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还体现在领导过程。1939年春，西庄村的龙王庙建立了“平西抗日大学分校”。同年秋，房良联合县政府由堂上村迁移到十渡，又在十渡建起“抗日高小”，县长刘介愚兼任校长和政治教员。这种领导程式的作用，使得县区干部下乡回机关汇报工作时，都要把教育工作列为汇报内容。对待教育工作，各部门既有分工，又能合作。1943年至1949年间，隗合生任十渡片中心教师，他每星期都要集中全片教师，辅导教师进修，传达上级文件，又布置检查各校工作。

抗日师资的培养与提高

据隗合生老人回忆，抗日民主政府把对抗日师资的培养，当做贯彻抗日救国战线的重要方面。老人回忆，自他1938年任教，到建国前，十一年中，他每年至少一次，多则三次，参加由专区或县政府举办的集训班，集训时间短则三星期，长则一个月。他清楚记得，1939年春，他在涑水县悟空寺参加房涑涿联合办事处举办的“青壮年知识分子训练班”，集训三个星期。办事处主任王巍(即县长)亲自给学员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指导理论学习。部队首长给上军事课。同年冬，在十渡的马安村举办的师训班，提出对学生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倡导教学民主。

这种集训，使隗合生印象深刻的是在1942年。平西根据地经过40年和41年日寇两次残酷扫荡之后，敌人又在山外挖下封锁沟，修筑炮楼，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根据地军民。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平西专署又在宛平县的黄塔村举办了由全专区教师参加的秋季“反法西斯整风大会”。房山二区(张坊片上以里各村)参加者有隗介三、白璧、汤继武、张来新等十余人。他们都是自带被褥和干粮，由十渡集中，爬山越岭，通过宝水村的最高山硝灰岭，直走十二个小时，才到宛平的黄塔村。会议期间，一天两顿玉米渣粥，不能吃饱(按人数下粮，吃完为止)。伙房烧柴靠学员下课上山去砍，吃菜到数里之外去背。会议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二十四字为中心内容，通过个人检查，小组讨论，典型发言，大会辩论等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整风。大会还请来“挺进剧社”的作曲家夏何等几位同志，给学员讲授乐理和怎样编剧、如何导演等文艺知识。为期一个月的大会，使参加者无不感到：生活虽然艰苦，学习十分紧张，但通过整风及时挽救了一部分动摇分子，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也提高了学员的业务能力。抗日民主政府对抗日师资的培养，推动了革命进程。

教育方针、教育原则及教学方式

抗日战争时期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抗日”。1939年邓华司令员率队驻扎十渡，曾将这十八个大字书写在十渡龙山，直至文革动乱，才被“造反派”毁掉。那时根据地人民不分男

女老幼，只要能为抗日做一点事的，都尽力去做。抗小师生，更是如此。教育工作要求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学习文化与学习抗日本领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做合一。为适应战争需要，不论初小还是高小师生，都遵循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教师对学生是要求培养小主人，不要小奴隶，提倡教学民主，官兵一致，官教兵，兵教官，教学相长。以班为单位，建立队委会，设大队长一人，负责班级全面工作，下设学习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社会服务委员。小干部由教师提名，同学举手通过。

课程设置：语文、算术(包括珠算)、军体、文艺。不论什么课，都是抗日内容。如小学第一册语文的第一课：“人”；第二课“我是中国人”；第三课“中国人打日本”，第四课“打日本救中国”。三、四年级的语文以应用文为主，如怎样开“通行证”，怎样写慰问信等。算术课初年级是计算战利品，高年级珠算学习算减租减息，征收公粮，计算统一累进税等。学生没有正规课文，靠抄老师的样本。教师和高年级同学帮助低年级抄。大部分教材是由教师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内容编写，或从报刊上选摘(当时有《教育阵地》月刊、《挺进日报》、《察哈尔日报》等)，还有教师自己编写的顺口溜、快板、小歌剧、旧曲调填新词等，既是文化课本，又是宣传材料。学生爱学爱唱，群众爱听，就起到学习文化教育群众的双重作用。1939年在根据地开展普及文化运动，为了解放妇女，号召青壮年妇女剪发、放足、上识字班，女孩子上学，学校就编写这方面教材。针对个别妇女家长认为女孩上学没有用，不肯让女孩上学，还偷偷给女孩缠足的顽固现象，隗合生就用民歌“二十四糊涂”的曲调，编写新词教唱：1、人家的女儿走路快又稳哪，我走起路来真痛苦哇！妈妈娘儿好糊涂，哎哎哟，我也要放大足呀！2、人家的女儿能写又会算呀，我的两眼黑大糊！妈妈娘儿好糊涂哇，哎哎哟，我也要去念书呀！……

为达到普及文化的目的，学生有整日班、半日班，随到随教，还允许带小弟弟妹妹上学。小先生送字到家，巡回教学，形式多样，学生放学后，还利用中午、晚上、星期日时间，去做大量宣传和社会服务工作，组成秧歌队、歌咏队，霸王鞭队、街头活报剧组。此外，轮流义务传送书信和文件，(当时没有邮政，一般文件和公私信件，封面上写“沿村转送”，特急的插上鸡毛，就能接续送到收件人手中。)站岗放哨查路条。还譬如在1942年，日寇经过连续两年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以后，改用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改造懒汉二流子，小学生组成“调头队”，早晨起床号响起，他们就到各户去检查，发现有睡懒觉的人，就托他的头，催他起床去生产。不听规劝的，就用黑板报、山头广播去批评，对推动大生产运动起到一定作用。

教师工作及生活待遇

抗日民主政府大力开展工作，根据地建设不断巩固发展。跟随根据地建设，教育工作也稳定向前发展。但是，在战争时期，教师的工作是极其艰苦的，生活待遇也十分菲薄。他们由旧知识分子很快实现知识分子的转变，其中原因除有爱国的民族气节，也包含对党忠诚的信念。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避艰苦，服从调动，是根据地教师的特征。

隗合生这样回忆：1940年暑假后，政府调他去六渡建校，当时他才刚二十岁，缺乏独立生活经验，自己不会做饭，夜里不敢一人睡觉，但接到调令，还是愉快地服从了。不会做饭求大一些的女同学帮忙，夜里害怕就用桌凳堵住屋门，趁睡不着觉就备课，编写宣传材料。这样，终于克服了困难。

1945年日本投降，根据地人民更加看到希望，十渡学校的学生也猛增到八十多名。学生多，教员少，四个年级分占两部教室，每天六课时，全是直接讲授时间。因学生搭垒的泥台木板桌凳挤满教室，就根本没有教师座位。口渴了喝凉水。政府忙于解放战争，支援前线，不能增派教师，这四个年级就由隗和声跑教。白天教八十余名学生，晚上还到村剧团去当导演，编剧，给演员抄写台词，每天都工作到深夜。除去教学和

社会工作，他还要在星期日召集本片教师开会，会后还给四名老教师（卧龙史凤鸣、马安刘显斌、西河杨万禄，六渡蔡永明）讲算术课、判作业，留作业，给本片其他教师判大楷（要求每人每星期六篇大楷作业）。这种工作状况，隗和声独立支撑了很长时间。

从1938年至1945年，隗合生先后在十渡、西庄、前后石门、平峪、八渡、九渡、六渡、西关上等九个村任教。他的学生大的，只比他小四、五岁。战争时期的学生大部分都参军参政和在村里当干部，有的随军南下，至今在外。如十渡村的齐彦广，现以十二级干部待遇离休，住济南高干疗养院，他85年探家看望隗合生时说，“我的工作受您的影响，走到革命路上来的。上学时您让我当歌咏队长，教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参军后我就一直搞文艺工作。”为革命队伍输送人才，是根据地教师的最大慰藉。

从1939年十渡建立革命政权到建国之前，教师的生活待遇是每月三十七斤半小米，做为教师的生活包干费。战争年代最困难时期，教师根本见不到肉和油，甚至连食盐都买不到。三十七斤半小米，食量大的根本不够吃，隗合生老人讲到一个靳金章，他是部队精简人员，1942年在东村教书，1949年当房山二区教育助理员，到区报到时，区公所做了三斤米的饭（为全体干部做的），他一顿就给吃光；还有个张来新，在宝儿水村任教，实在吃不饱饭，就向学生要死老鼠，用火烧着吃，42年黄塔整风，还批评他不顾群众影响，让他写检查。可见那时没有人喊苦叫累，更谈不上闹待遇问题。根据地教师，追随革命脚步，与我们党协力同心，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作者系《房山报》社干部

日伪时期的良乡中心校

郭云祥

“良乡中心小学”是1938年初日本侵华时期由河北省政府创办的日化教育的示范学校。该校之所以建在良乡，有多种因素。一是良乡县被日寇称为“模范县”，二是和日伪县长有直接关系。伪县长陈忠和，是一个日本母亲、中国父亲的混血儿，在日本小有名气。据说，其父在日本还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当时的教育科长姓姜，是官道乡刘丈村人。

该校校址即现在良乡镇东大街税务二所的全址。整个院落分为三层，临街五间，一间是门道，一间是男教师宿舍，三间是校办公室，东西房各一间是女教师宿舍。靠中门东西各有一棵海棠树，中院北房是五间教室，西头两间为甲班教室。东头三间为乙班教室。房屋东侧有南北两米宽的一个甬道。前、中院都有一个角门，靠前院甬道南端一间伙房，供教师做饭和烧开水用，自中院角门可通后院。后院西侧为男、女厕所，北侧有一间库房，后院是不足三百平方米为操场。这就是学生的活动场所。另外，东墙有一个角门通后街，为运送东西之用。

当时的良乡中心小学直属省政府教育厅领导。其特点：

一、在教师配备上，很“讲究”。所聘教师都有专业文凭，不同于一般乡村小学。全校教师共6人。校

长叫马凤荪，东北人，大学文化，主管全校校务工作，有时也代课。甲班班主任名叫胡钦室，女，湖北省沙市人，师范毕业；乙班班主任姓田，女，北京人，师范毕业；钟琪，男，天津人，教语文，高中毕业，下一手好棋，曾获天津市象棋比赛第三名，业余时间还常研究棋谱。一名原日本翻译官，男，朝鲜人，姓韩，教日语。一个学期后，田老师和钟琪调走，又调一个叫程玥，一个叫陈润的女教师，都是通州师范毕业。第二学期，胡钦室调走，调来张玉田，丰台区王村人，高中毕业。张玉田为甲班班主任，程为乙班班主任，陈润教音乐、体育、图画，手工，还有一名工友张老头，管打铃、烧开水。后调走，换赵文承担这一工作。以上教职工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下，是一个精干的教职工集体。

二、在招收学生方面，打破当时男女分校的惯例，男女兼收。在招收学生时都要经过面试和测试，要求很严，在人数上也控制较紧，定额招满决不再增。

三、在课程方面，所学课程较全。包括数学、国文、美术，劳工(手工)、大字，日语、音乐、珠算、体育等。

四、学生实行规范化。服装统一化，男生一律是灰制服，黄球鞋、不准留头。女生是白内衣浅兰色外衣、白袜黑鞋，下身黑裙，留短发。

五、聘请外国人任教，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课堂上完全采用日本军体化的教学方式，任意打骂学生，几乎每天都有发生。这种方法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上留下很深的创伤，因而，对日本帝国的精神侵略也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作者系原北京中兽药厂厂长

房良“抗高”二三事

白璧

1938年春季，我党开辟了平西抗日根据地。这一地区人民生活特别贫困，除部分村庄有所私塾外，没有一所正规学校，95%以上的人是文盲。同年五月，房良联合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宣传组织群众抗日、建立基层人民政权、肃清土匪等工作的基础上，采用“民办公助”的方法，帮助各村建起了初级小学校。1939年春，驻在十渡村的县政府，又在距政府一公里的西庄村办起了房良抗日高级小学校(简称“抗高”)。这是当时房良联合县的最高学府，县长刘介愚兼任校长并亲自为我们讲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县委书记赵然(当时党不公开，县委对外称教育处)为我们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宣言》等政治课，我们第一期五十多名同学，大体上一半时间学文化，一半时间学政治和从事宣传工作。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学们抗日热情很高，能较好地完成学习和宣传任务。1939年秋，“抗高”随县政府迁到马安村，有些重大活动至今记忆犹新。

聆听李公朴教授演讲

“战呀战呀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我们是青救会员，国共两党领导我们向前，前去恢复万里江山，建立

三民主义乐园……”(注)在嘹亮的抗日救亡歌声中,全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七君之一的李公朴教授在县、校领导陪同下,健步来到我校发表了演说。他首先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工作很出色,是模范抗日根据地之一。他说,到晋察冀边区所见所闻,是中国共产党真诚地与国民党合作,受到广大群众拥护,而国民党内则有一些顽固分子,专搞磨擦,破坏抗战。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抗战进行到底。接着讲到我们学校。他说,在战争年代,房良联合县领导克服各种困难,办起自己的“抗大”,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是很有政治远见的,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以担当抗战和建国的大任。李教授的演讲,受到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

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

1939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这天我校全体师生举行了庆祝活动。首先唱《十月的旗帜》的歌曲,其歌词是:“十月的高空太阳光里飘耀着鲜明的旗帜,十月的风暴,传播着时代的真理。疯狂了的敌人在张牙,在舞爪,在向全世界人类凶恶地咆哮。光复了的土地,在欢笑,在欣喜,在用快乐的歌声,歌唱伟大的创造。猛烈的斗争,正在开展,鲜血泛滥成狂涛,旧世界就要毁灭,新世界就要来到。”接着学校领导讲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后指出,现在苏联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工农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领导下,建设起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全人类都过上最美满、最幸福的生活……。当前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抗战,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我们也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次庆祝活动,使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对我们的成长和走上革命道路,是一次重要的启蒙教育。庆祝活动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举行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拿起我们的刀枪,举起我们的锄头,我们再也不能等候。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来奋斗。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扬一二·九运动光荣传统,把抗战进行到底!”……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是1939年12月9日晚上,房良“抗高”全体师生和县委机关、人民团体、武工队的全体同志举行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四周年的大游行。数百人的游行队伍,手举自己用红绿色纸做的三角形彩旗,在崎岖的山路上,从马安村向十渡、西庄举行了长达二十多华里的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这是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大游行。沿途群众特别是偏僻山沟居住的老年人也拄着拐杖前来观看,许多青少年、儿童也自动的挥舞着拳头和我们一起高呼口号,情绪十分高昂,从而使我们学生和当地群众都受到了一次深刻抗日救国教育。

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三民主义和我党的最低纲领基本相同。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作者系原房山县人大副主任

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

郑有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辟抗日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坚持抗日斗争，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

1938年，我八路军在十渡、蒲洼、霞云岭、史家营等地，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其间教育事业也得以蓬勃发展，根据地各村相继开办了抗日小学。

抗日初级小学

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十渡地区开进两支八路军部队。一支是“冀西先遣支队”，司令部设在十渡村。一支是“冀西挺进支队”，司令部设在十渡的西庄村。先遣支队有一个地方工作团，成员大多是投身革命队伍的青年学生，王拔任团长。为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他们到处书写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到各村成立“抗日救国会”，建立“救亡室”、组织“妇救会”和“青年救国会”等。在荒僻的山村，民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但因该地区文化落后（1935年前十渡地区只有平峪，十渡两个私塾，后有三所公办小学），抗日宣传工作受到一定限制。为使抗日宣传工作深入持久地坚持下去，1938年9月，工作团在十渡村办起了一所抗日小学，招收学生十几名，工作团成员自任教师。1938年10月交十渡村抗日政府管理，由本村村民隗合生（县高小学生）任教。当时，从根据地的区域环境和时间上推断，“十渡抗日小学”是我区第一所抗日学校。同年秋，晋察冀边区宛平县第四区教育联合会主任王士甫在史家营村东古庙又开办了一所抗日小学。之后，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十渡、蒲洼、霞云岭、史家营、张坊、南尚乐等地又陆续建起40余所抗日小学。日寇投降后，这些抗日小学遂转为地方小学。

抗日高级小学

1939年秋，房、良联合县政府由霞云岭堂上村迁到十渡西庄，在西庄建起一所抗日高级小学。由附近各村推荐，招收第一期学员50余人（其中女生十余人是随军家属）。县长刘介愚兼任校长和政治教员。教师有常健、侯国刚、王玉忠、常子何、常守礼等。学生实行供给制，发军装，学习一年后分配工作（一部分分配到部队，一部分分配到地方政府）。

1940年农历七月，县政府在张坊南白岱村通过考试招收第二期抗高学员，共录取60余人（男女兼有）。农历七月十五日，在张坊大峪沟正式开学。校长王玉忠，教师有王新、侯国华、陈平、周瑞等。学生一个班，分大中小队，李照兴为中队长，袁德奎、宿廷印任小队长。由于形势变化和日寇进山扫荡等原因，学校先后迁至西关上、马安、富合、东村、蓬头（现属涞水县）等村，历时三个多月，在庄户村（现属河北省涞水县）解散。学生一部分随部队西进，一部分回家。

领导体制和学制

抗日小学虽是抗战时期的产物，但党对教育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教育是抗日政府“民、财、实、教”四大部门工作之一。县政府设教育科、区政府设教育助理，村设教育委员会，各片设中心学校。除专职干部外，其它部门干部下乡，要求都要到学校过问教育工作，使学校真正成为抗日宣传阵地。抗日初级小学学制一般为四年，但也允许插班，随到随教。

抗日高级小学由县政府直接领导，根据形势的变化，校址随县政府不定期转移。

教育方针与教学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抗日”。当时，根据地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争相为抗日做出贡献。学校则是在普及文化的前提下主要搞好抗日宣传工作。要求教育工作坚持学习与学习抗日本领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遵循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倡导“教学民主、教学相长”，严禁对学生体罚和变相体罚，培养学生“争做小主人、不做小奴隶”等。根据形势需要，协助地方工作，搞好抗日宣传活动，把教育工作与抗战紧密地结合起来。

师资培养与提高

平西抗日民主政府把师资的培养列入抗日救国工作的重要议程。专区和县政府定期组织教师集训，举办训练班、讲习会、座谈会等，每年少则一次，多则二三次，集训时间短则三个星期、长则一个月，以提高教师的思想觉悟及业务水平。如1939年春，房、涞、涿联合办事处举办的“青壮年知识分子训练班”，集训三个星期，县长王巍亲自给学员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论持久战》等，指导理论学习，请部队首长讲军事课，请文化教员讲业务课等。1942年，平西专署在宛平县黄塔村举办全专区教师参加的秋季“反法西斯整风大会”，历时一个月。会议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二十四字为中心内容进行整风。还请“挺进报社”作曲家夏何等老同志讲乐理、编剧和导演等文艺知识。

1943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令各专区、县举办暑假现任教师训练班。巩固区教师以学习业务为主；游击区教师以提高政治觉悟为主。训练内容有：补习国语、算术、常识、“论国民教育改造”、“目前政治形势”、“反蚕食斗争的意义”、“边区参议会的成就”、“怎样选举县议员，县议员与选民的关系”、“小学教师怎样整风”等。当时，除提高现有师资质量外，还开办短师班，培养新师资。条件有三：第一、必须是青年积极分子；第二、地方化；第三、多培养女教师。

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根据地教师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师资水平普遍提高，并推动了普及文化和抗日工作的开展。

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

抗日小学的课程设置有国语、算术(包括珠算)、常识、唱歌等。不论什么课，都有抗日内容。如第一册语文第一课“人”，第二课“我是中国人”，第三课“中国人打日本”，第四课“打日本救中国”。高一点年级语文则是“怎样开通行证、写慰问信”等。算术课是计算战利品、算减租减息、征收公粮、算农业累进税等。

无正式课本，大多是边区政府油印的小册子、还有部分教材由教师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编写。如顺口溜、快板、小歌剧等，既当课本，又是宣传材料。学生有整日班、半日班、教师集中授教。还有小学生送字到家，巡回教学等多种形式。抗日高小的课程设置有国文、数学、自然、史地、政治、唱歌、军体等。多是抗日政府油印课本，内容均以抗日为主。抗高采取集中授课方式，各科均有专任教师。

历史功绩

在抗战时期，我区平西抗日根据地内，教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抗日宣传搞得轰轰烈烈。抗日小学学生是当时一支宠大的宣传队伍。他们除学习文化知识和抗日本领外，放学后，利用中午、晚上及星期日在教师带领下，组成秧歌队、歌咏队、霸王鞭队、街头活报剧组、屋顶广播等，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和社会服务工作。另外，还站岗、放哨、查路条、义务传送书信和文件等。

抗日高小的学生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宣传抗日，配合当时的政治活动、民主建设等。成立小剧团、秧歌队等深入各村演抗日节目、贴标语等，宣传鼓动群众。当时他们经常演唱一首救亡曲，大概内容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间、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和着脚步，臂膀靠着臂膀，我们的队伍英勇又强壮。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救亡……”。

由此可见，抗日小学的宣传鼓动工作对唤起民众、增强广大民众抗战热情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外，抗日小学为革命队伍输送了大批人材，为地方培养扩大批干部，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此文根据隗合生、赵国珍、段太清、宿有田、袁世聪、袁德奎、常守道等回忆及《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编写。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作者系《房山区普通教育志》编写组成员

解放初期的房山中学

田树屏

1948年12月14日，随着房山县城的解放，房山中学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9年3月3日，房山县人民政府召开房山中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由县长杜恩霖同志宣布，任命杨槐堂同志为“平西区房山中学”校长，孙俊卿同志为教导主任，刘天德同志为总务主任。从此，房山中学走上新生的锦绣征程。

学校接管之初，工作千头万绪，事业百废待举。以杨槐堂同志为首的房中党支部（当时党组织尚未公开）全体同志，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明确分工，深入到教师和学生之中，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和依靠全体教师，整顿并开展学校工作。干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发扬老解放区的办学传统，建立必要的规

章制度,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使学校工作逐步导入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轨道,为以后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同时,也为国家各条战线输送了一批合格人才。

解放初期,在教师中普遍存在着“走着瞧”的想法,认为:“一旦人家(指共产党)有了人,咱还不是一口唾沫的买卖”,“国民党还给教员发聘书呢,现在怎么不发呢?”针对这一情况,杨槐堂同志在请示县委之后,于1949年3月下旬,向每个教师颁发了经校长签名盖章的聘书,同时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教师是稳定的职业,终身的职业”。“这一点,可以在将来的岁月里,用事实说明它。恰恰相反,国民党虽然发聘书,但教师却常常失业。”这一点措施,起到了稳定教师队伍的作用,也使“留用”下来的教师受到了教育。接着,又建立了教师代表制度,由全体教师投票选举教师代表,参加校务会议,参予学校管理,反映教师意见。到学校建立工会组织之前,彭振蒙和马汝良先后被选为教师代表。

学生中的情况是:少数人知道或了解一些解放区的情况,情绪稳定,精神振奋;多数学生还是处于“谁来了念谁的书”的思想状态。还有极少数人,有程度不同的抵触情绪,还曾出现过破坏公物和“拒绝教导干事随班听课”的事件。针对这些情况,学校决定在1949年4月建立学生会组织,由全体学生民主选举产生,当时的初三学生王宝田和刘文才先后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并列席校务会议。与此同时,教导干事杜生聪在几次会上,向全体学生讲解了学生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并着重指出学生会与国民党的“学生自治会”有本质上的区别。通过以上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尽管如此,在华北大学和革命大学招生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教师和学生离开了房山中学。

随着政治思想工作的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进一步深入,从而使学校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1950年冬房山中学党组织向群众公开,支部书记为杨槐堂同志。此后,支部成员几经变动,直至1952年12月党支部书记一直没有变动。党组织尚未公开之前,在新区学生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已经开始。当时,师范班一班学生王守刚等三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入党的。这件事在师生中震动较大,此后,在学生中积极要求进步,靠近组织,争取入党的逐渐增多了。

房山中学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是在1949年5月4日正式宣告建立的。当时的团支部书记为杜生聪。后来团支部改为团总支,到1952年12月,历任团总支书记为:杜生聪,张林泉(1950—1952)李柱臣(1952年以后,直至建立团委,任团委书记。)

房山中学的工会组织是1950年4月4日建立的,工会委员会成员先为七人,后为九人。工会主席是彭振蒙(1950—1951)、祖兆增(1951—1952),自1952年12月13日以后为田树屏。随着建国后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学校的规模也有相应的发展。计:1949年3月至1949年7月,中学部有初中4个班,师范班1个班,共5个班,1949年9月至1950年7月初中班4个班,师范二年级1个班,再加上1949年10月—1950年5月老区小学教师轮训班1个班,共6个班。师训班班主任先后为王喆(自宛平灵水高小调来)和马汝良(自房山河北高小调来)1950年2月又招收师范一年级(春季始业)1个班。这样,从1950年9月至1951年7月有初中3个班(这一年只收初一1个班)师范班两个班共5个班。又加上一个初中预备班(1951年2月入学)合计共6个班。1951年9月至1952年7月有初中4年班(预备班转为初一,又招1个初一)师范班两个班共6个班。1952年9月以后,长沟完小附设中学班1个班(初二)连同三名教师并入房山中学,两个师范班搬到顾册,成立房山初级师范学校,同时于9月房中招收初一新生4个班,至此,全校共有中学班八个班。

解放后,由于学生班次和住宿生数增多,经请示县政府转请通县专员公署批复,把药王庙东邻民房五间、厂棚五间、过道大门三间、菜地二亩及场院四亩都划归学校,以供教室、学生宿舍及种菜之需,1951年又把县城东南角的大坑圈入学校,同时征购药王庙街路东刘姓、赵姓及路姓三处民宅计房屋29间作为修建学生宿舍及扩展操场之用。至此,房山中学才有了一个200米环形跑道含100米直道的操场,校址完全占有了房山县城的东南角。合计约67亩。从1952年春季开始至10月竣工,按省教育厅规定图纸,新建学生宿舍

16间。学生宿舍中的土炕，也开始完全换成了木板床。

在此期间，随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房山初级师范学校的建立，房山中学的学校领导干部也随之发生变化。1950年底，教导主任孙俊卿调往平(谷)三(河)联师任校长，由王喆同志任主任。1952年9月王喆同志升调为房山初级师范学校校长、教导主任易为祖兆增。1952年11月杨槐堂同志调回通县专署任教育科长，王喆同志又调回房山中学任校长，房中总务主任刘天德调往房山师范任校长，房中总务处管理员于存华同志提任总务主任。这期间，教师队伍的变动也很大，一部分人离职、改行或升学，一部分流入城区任教。师资队伍主要靠华大、革大毕业生分配、专区调剂和本县小学领导干部来补充。(先后有本县小学校长、主任五人调入任教)1950年和1951年周淑玉和孙桂香老师由通州女师毕业后来房山中学，她们是房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女教师，在此之前，房中没有女教职工。

1949年3月始，把政治课正式列入课表，结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及重大节日活动，在师生中经常开展文娱宣传活动。这是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成功途径。这一阶段，师生共排演了京剧“九件衣”、“河伯娶妇”、“打鱼杀家”，还自编自演了一批小歌剧、话剧、相声、快板、拉洋片和活报剧，每逢节日，或集日到街头宣传，及时地配合了土改、抗美援朝和镇反运动等，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在正常教学秩序走入正轨之后，学校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教学常规，如计划、总结、备课和观摩教学等制度，设立文科、理科两个“教学办公室”，实现宿、办分开。这样，使备课、教研、批改作业和试卷分析等活动有了保证，克服了过去的“自由教学”、提高了教学质量。

为了提高全体教师政治素质，1950年在教师中开展的“忠诚老实”运动，初步端正了知识分子对党、对党的事业的态度；1951年全体教师在通县潞河中学参加了历时三周的“暑期中学教师学习会”使人们了解了什么是“延安整风精神”并学会了用这种精神指导自己的学习和工作；1952年6月底在保定举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历时80天，肃清了知识分子中残存的“三大敌人”思想。加上平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等经常的政治学习与社会实践，基本解决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方向问题，使教师的政治觉悟得到普遍提高。

通过这些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1949、1950和1951届初中毕业生中有3名学生，后来赴苏留学深造。1951年届初中、师范毕业生，除少数参军、参干之外，大部份留在本县各党、政机关工作和当了小学教师，现多在本区各局、部、委、办任职，还有14名同学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其中常柏同志现仍在北京军区工作。24名同学去通县专区参干，分配到通县专署和通专各县工作，全部表现优秀，其中王宝森同志现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房山中学的传统校风是艰苦奋斗，勤俭办学。这个传统的形成，应归功于来自老解放区的几位领导的好作风并身体力行。也是全体师生从理论到实践结合的丰硕成果。在解放后新划入学校的园田上，师生亲自动手积肥、浇水、种菜，劳动所得自给有余。城东南角大坑，由李介臣老师组织师生利用课余时间，靠肩抬、手端拆房渣土，一筐、一箕地，长期坚持，硬是垫成了平地，约土石方近万方，从而保证了得以修出一条百米直道。所有这一切，使师生们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决不是一句空话。1951年至1952年初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学习，既从理论上提高了全体教职员工的认识，又结合揭发出的问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949年3月，学校获得新生，到1952年12月底，杨槐堂同志升调，整整三年时间，由于党组织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为房山中学的发展，在政治上、组织上、办学方向上、教育、教学和作风建设诸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节选自《房山中学学校简史》)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记忆中的孔庙

赵玉文

我在九岁那年，怀着欢欣，带着好奇，进入了房山中学的前身——房山县立高级小学，如今忆起所见之一切，自然都是朦朦胧胧。欣逢盛世，有机会能把旧忆陈出，幸甚。

今日之房中，是由原“书院”和“三庙”组成。“云峰书院”大约始建于清代康、雍之年；“三庙”即孔庙、文昌宫和药王庙，始建年月，颇不同步，单就孔庙来说，这可由遍布于孔庙前后院的供鉴赏、供墨拓、供追忆和考证的几十通元、明、清及民国的碑刻证明：孔庙始建于元。

孔庙亦称文庙，是一所中轴对称的三层进深的庙堂建筑，称得上是我县古建筑之瑰宝，也是房山人民之骄傲，历经战乱沧桑及“乱砸”的年代，这一历史文物，今已片瓦无存，只有现在见到的两座“明碑”。孔庙的旧址，大致是今天学校西部的操场。

当年只要一进县立高小的院门，往北一望，便见四个高一米三四的石狮，分别蹲踞在两座并排的高十二、三米的木结构大门前面，东边是文昌宫门，西边的便是孔庙大门。

孔庙大门，是一座重檐、三路牌楼式木结构建筑，不用一钉，而是由无数雕花木榫托结而成。在上、下两檐之间，正、反两面各嵌有一块横放的约一米五长八十公分宽的月白兰色的匾额，在正面向南的匾额上，以苍劲的颜体大字写着“大德曰生”四个大字，背面则为“泮池鱼化”四个大字，门内东西墙丈余处，还有两个东、西向的旁门，为单间过道鱼鳃门，各有匾额，东为“德配天地”，西为“道冠古今。”

进孔庙大门，有长十三、四米，各路宽为五、六米的三路汉白玉石桥一座，雕工甚细，造型凝重，每路之间，有高约一米一的石栏杆八根，二栏杆之间，嵌有雕花的石栏板。就是这些栏板，上面可坐、可躺还可站，是学生们喜欢去的纳凉、谈心的好地方。桥下为“泮池”，呈半月形，中有一单孔涵洞，左右相通，池内竹丛、芦荟葱茏直上，夏、秋之际，蛙鸣其中，饶有南国韵味。池之四角，原有四株两、三人始能合围的古柏，其中一株，到1987年才死去。

在大桥正北面，放置有一刻有莲托图案的石圆桌，四周有四个石凳，使人一顾，便欲一坐，或背诗书榷文稿，或争文笔抒为国攻读求索之志，……。我就是在这里听了解放后第一位老校长杨槐堂讲《矛盾论》的。听诲后，顿感茅塞大开，耳目一新。

紧靠石桌北面便是一个三米见方的用花岗条石镶边的荷塘，六月，一鉴方池，泛着浮萍，铺满荷叶，间隙中钻出个个粉红的荷包和朵朵怒放的荷花，给孔庙添了浓郁的馨香和无穷的情趣。这些石桌、石凳、荷塘都是1905年把孔庙圈入学校之后添置的。

此外，院中还有郁李、红杏、海棠、枫栎，又有草地、斜经，异彩纷呈。这就是当年孔庙的前院一美不胜收的“校园”。

“校园”的最北面，有一座高大的山字形三门四柱的大牌楼，叫棂星门，进牌楼便是面积较小的中院。正面是大成门，因这时大成门已改成教室，故在左侧另僻一角门，以通后院。后院是孔庙的主建筑部分，南有前文提及的大成门，东西两侧在高高的底盘之上，各建有五间大殿，叫做东庑和西庑，是为供奉儒家先哲、先贤及乡里入祀名人牌位之用的。正北面则是一个大戏台式的高台，高台北侧有一座面南背北的前廊后厦的大殿堂，这就是孔庙的大殿“大成殿”了。

大成殿，五间六柱，殿宇高耸，灰瓦起脊，左右有鸱吻，朱椽画栋，古朴典雅，其形制高于附近各州、府之孔庙，所以，在万历三年重修孔庙碑记上有“我县文庙为八郡之最”之说。殿内左右是孔子三千弟子中七十二贤人的牌位。正面高大供台之上，端坐孔子雕象，造型淳朴，纹络清晰，如常人大小。像前左右有四配：颜(回)、曾(参)、(子)思、孟(轲)立像，坐像、立像均为金丝楠木雕成，可算是“稀世之珍”了。

当年，每值春、秋两季，孔子诞辰和祭日之时，官吏、乡绅、儒生、学子都来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此项活动，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大殿前面高台两边，东有桧柏，西为古槐皆近两围。而今这古槐仍俯视学宫之沧桑巨变。当年台下两侧，参差错落地排设着元、明、清和民国的碑刻二十余座。

还有一点应说明的是我县孔庙大成殿前，月台正面没台阶，只在东、西两侧建有台阶以通殿内。之所以如此，据说是因为房山从来没有考出过状元。

随着时代之推移，孔庙遗址已成为学校的一部份，不管是旧日的学堂，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学校——房山中学，都曾为祖国培育出成千上万的济济人才。

(转载于《房山中学校友通讯》，本会略作增删。)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作者系原房山中学高级教师

女教师赵文琴碑记略

张克耕

民国初年房山士绅为第一位从事女子教育的赵文琴女士举行公葬，树碑。去今已七十余载。赵静荣，字文琴，房山城内人。其父、赵宗赢，字淑坛。清光绪三十年(1905)赴日调查自治学务，归任房山劝学所所长(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局长)。宣统元年(1875)任京兆师范校长。致力于提倡新学，于我县首创男女小学校。并令其女文琴率先入女校以为倡导，邑人始有令其女入学校者。文琴七岁入国民学校，十一入高等小学校，勤读邃学，成绩优异。十五岁报考直隶女子师范学校，褒然名居榜首，免入予科。入学后，矢志求学，以他日致力女教而自励。当时，名门闺秀虽有娴于诗文者，而多以翰墨自娱；亦有驰骛虚名为争时尚而入学者；亦有以此道谋求抬高身价者。然文琴则与之迥异。自幼受其父熏陶，矢志教育，卓尔不群。十几岁，在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修业期满。毕业后回故里，任房山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校教员。翌年，任昌平县立两等女校教员，殚心教授，勤于管理，与校长闪女士佑璞撰“天足歌”。始唱于学校，渐及社会，流传甚广。女子“缠足”，在我国源远流长，自五代及宋渐次流行。北方甚于南方，京畿山区又甚于京城。太平天国虽曾明令禁止缠足，但于京畿一带，影响甚微。因此，缠足恶俗仍潜行不止。民国初期，许多进学校的女学生也多有受过缠足之苦的。所以当时的“天足歌”确有唤起全社会与缠足恶俗斗争的伟力。因此，昌平女学勃兴，风俗益以改善。文琴终因昼夜辛劳，精力日瘁，积劳成疾，殉身教职。于是，房、昌两县士绅开会追悼，一时以文字挽者至

六百余，道路传述，莫不咨嗟而叹息！房、昌官绅咸感女师之致身教育，功业卓著；将其功绩报之于京兆尹，京兆尹颁令表扬。于是，房山士绅复择地公葬，于墓旁植花木，请人勒石建碑，以示表彰。

此墓，在房山城东南隅，距城二里许。立有墓碑、墓表各一。石墓旁植柏树及枫树，洋槐杨柳等，内有孤冢及坟山。此墓今已湮灭无存，但青史所载历历。今人，后人读之，将无不低徊企慕女师之风范，世风之旌美扬善、与为师之道也！

文琴已去七十余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一生未之奋斗的事业，有的已经告成，有的仍在继续。但她那种光耀青史：刻苦自励，矢志教育，而为之殉身的精神；勇于求新，面向世界，开拓前进的精神；不屈不挠除恶务尽的精神，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之今日仍应弘扬、引以为师。

附：

房山赵文琴女师墓碑

白月恒

女师名静荣字文琴京兆房山人也年十九毕业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翌岁为昌平县立两等女校教员殚心教授勤于管理与校长闪女士佑璞撰天足歌劝学文俭朴论劝导邑人而昌平女学勃兴风俗益以改善女师昼夜况瘁精神日耗卒成痼疾殉身教职于是房昌两邑士绅皆为开会追悼一时以文字挽者至六百余道路传述莫不咨嗟叹息也房邑踞西山之麓虽附畿甸风气朴塞自女师之父淑坛先生首创男女小学校令文琴先入女校以为倡邑人始有令其女入学校者余尝闻淑坛先生云文琴五六岁时即从父识字喜听讲论故事七岁入国民学校十一入高等小学校勤读邃学每试辄冠曾偶十五岁投考直隶女师范学校褒然居榜首免入予科盖房邑女子之入县立女小学校及省立女师范者俱自文琴始肄业时矢志求学从他日尽瘁女教自励率践其志嗚呼伤已房邑学风既创自淑坛生而女子求学又肇于文琴父女相继为教育先导吾知数十百年后房邑父老追怀往绩必有低徊企慕歌颂流连于不置者矣民国二年夏余始讲学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正文琴入校时也尝思吾国自三代以降女教不修修矣虽名门闺秀偶娴诗文而翰墨自娱初无关于女教及于今世女子渐知向学然驰骛虚声争尚缘筛欲求一刻苦自励者殆不可得即矣或出于争名而务博若夫尽瘁女教宁生而不悔者千百中乃不一见余之教文琴迺回载知之最悉其为人也温和有礼朴素无华休沐日他生皆辍学独文琴坐一室检课程自修一日余过阅报室见其伏案阅教育杂志遽起问字并论中国女子沉沦非教育无以拯其厄若抱无穷感慨矣然不意损折若是其速也斯岂仅为两邑女学惜哉房山昌平官绅感女师之致身教育也闻诸京兆颁褒额以旌之而房邑士绅复择地公葬于墓旁植花木建丰碑表彰女师之威德以余与女师有学教之雅属为之铭铭曰踞晋而趋燕兮山脉口太行拱卫京师兮耸云表之苍茫历千百年而郁积菁华兮山岳岳而名房女师崛起于其间兮期女教之蕃昌胡天其才而复多嫉兮弗毕展其所长徒令人吊巍巍孤家兮怅秋草之斜阳此墓距房山县城东南隅二里许立有墓碑墓表各一石墓旁植柏树及枫树洋槐杨柳等各种树内有孤冢及靠山以为后世之标记也。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房山县教育史上的“四君子”

杨建中

我父亲杨星阁在世的时候，几次提起过一件引以为荣的往事。现在回忆起来，做为房山县教育史上的一件轶闻，也许会有一点价值吧！

1936年春，我父亲在房山县县立完全小学任庶务兼图画教员。那时全县的小学经费奇缺，且又拖欠一年有余，学校无法支撑局面。一次，他又到县教育科去申领经费，被告之政府仍未拨款。我父亲怀着满腔气愤径直闯入县政府找县长去论理，县长回答说，已拨出小学教育专款大洋伍佰元整，请我父亲回科里查问。这样几经周折，终于真相大白，原来这笔专款被当职的教育科长陈学礼（人称陈大麻子）鲸吞。此事传出，全县教育界大哗，120余名小学教员联名上书县政府状告陈的不法行为，时隔多日，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众人不服，推举杨星阁（羊头岗村人）、高养廉（房山田各庄人）、徐泽生（房山西街人）、赵新如（吉羊村人）等四人为代表向北京初等法院上诉，由于陈某上下打点，初审宣判其无罪。消息传回房山，众人如火上加油，继续向北京高等法院上告，杨、高、徐、赵四人每次都是骑自行车往返，自带干粮，住骡马店，四人在法庭上和陈的律师辩论，慷慨陈词毫无惧色。陈曾向杨、高、徐、赵四人家中送礼说情，都被拒之门外。最后北京高等法院宣判陈学礼退赔赃款伍佰元，并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一年。

此事一时轰动涿、良、房三县，誉杨、高、徐、赵四人为“四君子”。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作者系原羊头岗学校校长

解放初期房良地区的业余教育

唐占忠

解放初期，各级政府在努力医治战争创伤，加紧恢复经济建设的同时，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办好业余教育也放在了重要地位。房山、良乡两县分别隶属河北省通县专区。人民政府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业余教育指示精神，分别在政府中设立了教育行政机构——文教科（后改教育科），领导本县中小学教育和业余教育。当时隶属教育科的业余教育单位有：扫盲办公室；干部学校；县总工会学校（由工会主管）；县手工业联社业余学校（由联社主管）。1949到1957年间，房、良两县的业余教育有三条主线，干部文化业余教育；职

工业余教育；农民业余教育，同时并进。业余教育开展得轰轰烈烈，形势喜人，成绩显著，为以后房山成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干部文化业余教育

1950年前后，房、良两县分别在全区、县两级设立了文化教员，县由一至二人组成，设在教育科内。区配备文化教员一人，全面负责业余教育工作。1952年“三反”结束后，两县又分别建立了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简称县干校)，有校址，购置了简单教学设备。组织未达到初中程度的干部学文化。当时县干校先由县委宣传部主管，后由政府教育科主管，校长均由县主管文教副县长兼任，学校设专职副校长或教导主任各一人，专职教师四至五名及部分兼职教师。由于学校刚起步，规模都比较小，因陋就简，内部机构尚未完善，所以，有的教师还兼管财务、后勤等日常工作，以保证学校正常工作的开展。

县干校学员主要是县直机关及部分区干部，后来扩大到企业干部。到1957年，县干校吸收基层供销社业务员参加学习。各机关单位设立学习股长一至二人，具体抓干部学习。学校每学期召开股长联席会一至二次，解决办学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学校主要开设扫盲班、高小班和初中班三种类型。扫盲班以识字为主；高小班主要学习语文、算术；初中班主要学习语文、数学，有条件的还开设了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课。学习方式是业余的，时间安排在早晨、晚上各一个半小时。

县干校学习制度很严格。县直机关干部每逢下乡，必须先到干校找老师带课，回县后到干校再补课。房山县1956年有下乡干部13人，分布在山区14个乡，平原16个乡，县干校为解决下乡干部学习困难问题，在山区设立6个学习站，每15天学习一次。平原设9个学习站，每10天学习一次，均由县干校派教师进行巡回教学。当时由于交通不便，教师徒步往返一次平原约160里，山区约250里，克服种种困难，保证下乡干部文化学习。

1952年，根据上级指示：采取脱产和业余办法尽快扫除干部中的文盲、半文盲。通县专区举办三期扫盲班，房山有86人，良乡有73人，参加了扫盲脱产班学习。经过两个多月突击识字，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使绝大多数人达到识字标准，扫盲结了业。少数有困难去不了的也在县里组织了扫盲学习。1953年，房山县级干部组织奖评，县干校参加评奖学金有481人，其中文化班416人，选出学习模范20人，积极分子31人。

1954年以后，县干校逐渐走向正规。1955年，房、良两县根据上级“整理巩固、提高质量、积累经验、稳步前进”的方针，努力改进干部文化教育，加强速成联系实际的管理，县干校小学、初中采取六年一贯制，乡干部学习采取四年制，扫盲班暂定一年。两县干校分别建立了校务会、教务会、班务会，学习股长会等一系列机构；在学员管理方面也实行了考勤、考核，请假、升级、补课等制度；在财务制度上，学校的财务，以学费为主，自收自支，银行采取“托收无承付”的办法，到期从各单位帐户中给干校拨。总之，房、良两县干校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解放初期干部文化业余教育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职工业余教育

解放初期，房、良两县分别成立了职工教育委员会。它的任务是：

- ①讨论决定本县职工业余教育具体方针、计划及实施办法；
- ②讨论并决定本县职工业余教育的经费调剂开支标准及教师待遇培养训练工作；
- ③讨论并决定各种奖励以及工作报告等。

在此基础上两县于1950年5月分别建立了职工业余文化学校，由县总工会主管。由于当时房、良两县内产业工人较少，所以，学员以小煤矿工人、搬运工人和店员为主。教员的问题由各单位有计划在工人、职工中选拔文化较高的担任，业校的领导和教师参加厂矿文教委员会。房山、良乡县两所手工业联合社职工学校，由手工业联合社领导，一般设在联合社内，每校有专职教师二至三人，一人负责，没有明确职务，学员主要是县铁业社、木业社，服装社等手工业社社员。开班类型多为扫盲班和高小班。据1950至1951年统计，房山县职工人数是1500人，参加学习的人数是475人；良乡有产业工人241人，搬运工人175人，其他工人245人参加了学习。

解放初，房、良两县职工业余教育，由于贯彻了职工教育委员会精神，建立了领导机构，制定了管理制度，安排了职工学习时间，发动并组织了职工进行业余学习。职工业余教育很快发展起来了。据1953年统计职工速成扫盲情况：房山开展学校有两个，开展班有两个，参加学习30余人；良乡县开展学校有6个，开展班有8个，参加学习247人。1955年，根据通县专区下达的“职工业余教育主要任务：即在服务生产、群众自愿的原则下，以产业工人为重点，以干部积极分子为主要对象，有计划地扫除职工中的文盲，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高小班，重点举办初中班”指示精神，向有关单位和各基层工会组织提出明确要求。

由于房、良两县政府高度重视，加上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与各级工会组织密切配合以及职工思想觉悟的提高，学习文化热情的高涨，据1957年通县专区职工复学情况表明：房山县扫盲班达73个，高小班达93个，初中班达32个；良乡县扫盲班达261个，高小班达123个，初中班达40个。从此，职工业余教育扎扎实实地发展起来。

农民业余教育

解放初期，良乡县有187个村是新解放区。房山县200多个村子中有一部分村是新区。新解放区的主要任务是：抓好抗灾生产自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1950年教育部下达“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总方针是：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以文化学习为主，以识字教学为首要，同时结合时事政策教育与生产卫生教育，应先普及而后提高，使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起来，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稳步前进，在发展中注意巩固，在巩固基础上求发展。”房、良两县为让广大农民在土改同时也来一个文化翻身，决定开展冬学运动。要求区公所、村政府，学校都要做好冬季运动的人力、物力准备。以政府教育科为主建立冬学委员会，对冬学教员、校址、经费、对象都做出了安排。区、村两级也建立了相应机构。两县教育科仅用七天时间训练了一大批冬学民师。房山县培训民师约400人，良乡县约300人。县政府并下拨业余教育经费良乡198个村经费是150480斤小米，房山208个村经费是158080斤小米。

冬学对象首先是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逐渐推广到18至45岁的青壮年男女。

冬学时间主要是利用冬闲时进行。

办学形式，以冬学为主，常年学习与季节性学习灵活运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学习内容，一般以识字学文化为主，配合时事政策和生产卫生教育。

教材是农民识字课本，冬学政治课本。

教学方法，识字教学必须贯彻“速成和联系实际”方针，达到“三会”会认、会写、会讲。政治教学，以讲授为主，结合学员必要讨论，掌握中心(集中讲一个题目)，简明易懂，深入浅出，联系实际，贯彻“以民教民”的精神。

据1950年统计：房山有188个冬学村入学人数52357人，463个班，冬师有406人，转入民校的有51个村；良乡有72个冬学村入学人数39849人，335个班，冬师有363人，转入民校的有20个村。1952年，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出现,为文盲、半文盲打开了识字大门。房、良两县也开展了速成识字实验班,房山开展村106个,班数182个,人数6660人;良乡开展村90个,班数206个,人数7031人。

为了加强冬学扫盲的领导力量,壮大教师队伍,1953年,两县分别配备了扫盲学校,房山6名,良乡4名,其任务是经常帮助冬学教师提高政治业务水平,做好重点工作,研究或改进教学方法,有计划地分片组织参观、座谈,提高教学质量,保证农民业余教育顺利发展。主任教师房山6名,良乡4名;专职教师房山38名,良乡32名;兼职教师房山410名,良乡360名。同时,对教师工作地位和待遇做出明确规定:要求教师服务期间应免除勤务,提倡尊师爱生,劳动与知识互助,实行包教包学,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对成绩优良而家庭困难者予以补助。因此,1953年,房、良农民速成识字及文化学习有了进一步发展,房山速成扫盲开展村有67个,班数167个,学员5716人;文化政治学习开展村121个,班数423个;初小班学员38490人,良乡速成扫盲开展村66个,205个班,八个组,学员有6748人,文化政治学习开展村18个,243个班;初小班人数9011人。

1955年,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随之也掀起了农村扫盲热潮。房、良两县伴随农业合作互助运动深入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也全面铺开,成绩显著,如良乡县年初就有170个社办起了学校,参加扫盲学员有7348人,其中坚持常年民校学习有4309人,比1954年增加500余人,经过一年的学习有649人达到非文盲标准,领到了文化证书;典型事迹不断涌现,河北省通县专署1955年6月签发了《关于四马台(房山),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为什么能够坚持常学习》的通报。

1956年2月,房、良两县分别召开了区、乡、村干部大会,传达河北省扫盲协会精神,与此同时又分别建立了县扫盲协会筹委会,房山县由县委副书记吕永珍兼主任,副县长王奎玉兼副主任;良乡县由副县长许庆山兼主任,宣传部长谢德元兼副主任。扫盲协会的组织机构有常委,下设组织宣传股,教学研究股,事务联络股,三股分别负责扫盲协会各项工作。1956年房山已发展扫盲协会会员8293人,1957年初,良乡县全县21个乡镇有12个乡镇建立了协会,七个乡建立了筹委会,发展会员由1956年的1120人增加到2188人。少数民族(回族)黑古台乡76人,豆店乡75人;满族黑古台乡56人,水碾屯乡98人,青壮年文盲也发展成会员。

房山、良乡两县的广大农村社员,在党的关怀教育下,由过去受三座大山压迫的睁眼瞎,经过业余教育变成了有文化、有觉悟新中国的主人。在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工农联盟的生力军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解放初期的良乡中学

刘振祥

良乡中学是一所有着五十多年历史,在房良地区享有盛名的学校。

1948年底,良乡解放。不久察哈尔省北岳区第三中学(简称北岳三中),迁到良乡城,与1945年成立的良乡中学合并,被命名为北岳三中。后来察哈尔省的北岳区被划归河北省管辖。从此,北岳三中又改名为河

北省省立良乡中学，简称良中。

由于北岳三中生活工作在老解放区，所以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教学经验。党团员骨干力量多，政治力量强。早期参加革命，又有多年办学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很多，而原来的良乡中学的教师文化知识基础较强。两校新成立的良乡中学成为解放初期，房良地区教育界的佼佼者，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祖国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经笔者与老同志、老同学共同回忆，现将有关情况略记如下：

校长赵亚平(女)，是位早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解放前曾任平西专署教育科长、北岳三中校长。学校划归河北省后，省委调赵亚平去作省妇联的领导工作，并代表河北省到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妇女和平代表大会。回校后她精神振奋，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讲述了大会的盛况并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后由于赵校长爱人高振德(原平西专署专员)调任京西矿务局书记兼局长，经彭真同志的关怀，赵亚平校长调往北京女子职业干部学校任党委书记兼负责教务工作，该校校长刘清扬是全国党外的知名人士，她们在工作上配合的很好。赵亚平校长在女子职业干部学校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一干就是十多年，为培养妇女干部作出了贡献。

潞河中学是美国教会主办的全通县专区的重点教育阵地。当时该校政治思想混乱，形势很不稳定，教学工作不能正常进行，急需加强党的领导。对此，经省委研究决定，良中副校长王磊(由于校长经常在外开会，校内日常工作实际由王磊副校长主持)、教导主任杨海天去潞河，同时五一届毕业班徐淑贞、袁淑华、刘承光、陈万金、何维敏、武冠贤等12名学生党、团员、骨干、同到潞河高一甲班学习，担任学生会的干部。经过一系列的思想组织工作，终于使学校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

杨槐堂，原中四班班主任。解放后，他被调任房山县中学第一任校长，他把革命老区三中的好传统带到了房山中学。为房中思想上、学习上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五十年代开始房中一直是全县全区的重点学校，为建设事业培育了大量的人才。

高明允，原任良中教导主任，为了加强原良乡县琉璃河中学的领导，出任琉璃河中学校长，从而使该校进一步走上正轨，提高了办学的水平，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谭九皋，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继杨槐堂之后的中四班班主任，由于工作急需调任房山师范任校长，解决了房山师范缺校长问题。

李金铭，良中教师，后调出，创办交道中学。在较短时间把交道中学迅速建起来，受到县领导的肯定。

魏耀睿，良中班主任教师，调任魏各庄中学任校长(原属良乡县二区，现属丰台区)。

梁万庆，良中青年团干部，调怀柔县后任红螺寺师范学校校长。

还有几名干部、教师调到外地学校，担任领导或教学工作，具体情况已记不清了，总之，当时解决了或缓解了教育事业的急需，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补充生力军的作用。

良中在全国解放初期的又一个突出的表现是：1949-1951年三个师范班的绝大部分同学，三个中学生班的部分同学，约二百人都走上了教师的岗位。这些同学克服了生活等方面困难无条件服从分配，走上了人民教师的光荣岗位。大多分布在原通县专区的十多个县，其中良乡、房山、门头沟、大兴、涿县多一些。后来到承德、兴隆、保定、石家庄、邯郸、太原等地任教或担任学校领导的也不少。所以，当年的良中，有着“教师之家”、“教师摇篮”的美称。

从全国解放初期，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了，良乡中学也走过了五十多年历程，当年年青的园丁们，艰苦地创业，刻苦地耕耘，一批批国家的栋梁之材由良中遍及各地。我相信，良中今后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前不久良乡镇退休老干部杨文祥(他是1950届良中中二班的毕业生，当时由组织分配到学校从事教学工作)1953年至1956年，他在南窖中心学校任教务主任兼校团总支部书记。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邀请到京参加一次聚会，原来，这是五十年代毕业于南窖中心学校目前在京工作的同学聚会，聚会由北京市河湖管理处处

长李尚文负责组织，地点就在管理处召开，到会的有十多位同学，这些学生均已到或即将到了退休的年龄，参加聚会的有：孟凡会：中国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院党委书记，高级工程师(副部级)；孟凡玉：商学院副院长，兼新元法律事务所主任；孔淑华：全国最高法院工作；王慧兰：清华大学毕业留校生，电子出版社负责人；罗玉熙 618 厂铸造研究的所长；朱树宽：房山成教局学校书记、校长；蒲红远：六十九中(河南中学)校长；陈媛英：良乡医院牙科大夫。

如今，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已成历史。师生又相聚一起，真是无比亲切激动，百感交加。大家的心中不由地涌起对良乡中学的感激之情：是良乡中学培育了我们，我们永远热爱着她。

(《房山文史资料》第 16 辑)

六十年代的良乡中学

佟林华

良乡中学始建于 1945 年，分南北两院，占地面积五千多平方米。六十年代，良乡的城墙还没有拆，城西、南两门还保存完好。学校在城东南角，南院的南墙、东墙就是城墙，后来拓宽京保公路，割去了一部分，院墙改成了普通的砖墙。北院也因为拱辰大街的两次拓展而临街了。

当初，初中教室在南院，高中教室在北院。北院，原本是一座孔庙，一片古建筑群。房屋布局错落有致，青砖秀瓦，朱柱玉阶，格外讲究，充满着艺术美。

院中心有一座庄严、雄伟的大殿，坐北朝南，原名为“大成殿”，是过去参拜孔子的地方，据说原有孔子的塑像和壁画，后来成了学校的阅览室。那时候学校订了二、三十种报刊，都放在这里的报架和书架上，学校老师、同学一有时间就到这里来阅读。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后，总有许多师生坐在这里，凝神静读。厅两边各有一套间，是借书室，屋里存放着上万本图书，全校师生都在这里借书，每星期定时有学生负责借阅。

大成殿的前面是一片开阔地，用水泥铺抹而成，平展如砥。远处有花坛，紫丁飘香，姹紫嫣红。旁边有古树，浓荫匝地。

由此再向前，穿过两座平房，是一个荷花池。荷花池正对着校门口，一进校门，首先映人眼帘的就是它。荷花池小巧玲珑，约有六七平方丈，近椭圆形，一人多深，四壁用砖砌成。中间有一砖拱小桥，长两丈许，宽二尺余，人可小心通过。池旁有灌木丛，与池花相映成趣。人来到这里，赏心悦目，给人轻松超脱之感。

大成殿的左面是一个小四合院，是学校领导办公的地方，幽静典雅。院中有一海棠树，冒出房顶，春华秋实，另有一番韵味。四合院向南是四排教室。教室高敞明亮。四合院向北是两排宿舍，过了宿舍最北端的是厕所。

大成殿的后面是两排高一教室，过了教室就到了最北端，是浴池。亦可算当时上等“消费”。师生共用，原本免费，学校靠各村来掏糞付一些钱来支持。后来村里不给钱了，就每洗浴一次交费五分。

大成殿的右面是宿舍和库房。

实验课、体育课、吃饭、开大会在南院。南院紧靠北院，两门口隔一小街。南院分东西两部分，西高东低，位差一丈有余。西部分与北院平，靠北一片排子房，初中教室和学校实验室；靠南是礼堂、伙房和宿舍。

东部分是操场和生物园地。操场很大，有八个篮球场，两排，均东西向。操场东边是生物园地。

良乡中学的排班，别具一格。一是男女分班，高中每个年级是两个男生班，一个混合班，一个女生班。二是班级名称按自然数列一直排下去，年级增长但班名不变，享有“姓名权”。基本上高中每届四个班，初中每届八个班。不管在哪里，只要说出是良乡高中或初中多少班的，就可以论出师兄师弟来。但这一方法最后也随着“文革”破旧而破除了。高中排到第36班，初中排到104班。

学校在教育教学上很有特色。

校长阎爱众，是河北省保定人，早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在白洋淀英勇抗击日寇，曾受到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吕正操的嘉奖。他当校长很重视革命传统教育。

良乡中学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学校。1945年，建在城内罗府街，1946年迁于现址，当时只有两个班。1948年底良乡解放。翌年初，老解放区察哈尔省北岳三中迁来此处与之合并，初定名为北岳三中，半年后改名为良乡中学。老解放区的好传统好作风对学校产生了巨大影响。学校当即建立了党、团组织，以抗大精神办学，师生亲自动手，共同整建校园。学校增设了政治课，设置了时事宣传栏。学生排队、集会大唱革命歌曲，课余时间走上街头，宣传革命道理。学校师生还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军参干。这些对当时党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每逢重大集会，学校都要讲良乡中学革命的历史，勉励学生继承革命传统。

学校还时常请老红军、老八路、老劳模来校作报告。六十年代，曾请全国劳动模范、崇各庄公社岗上村的党支部书记吴春山来校做报告。老人家当时已六十有三，但说出话来底气很足，声音洪亮。他不识字，讲话却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一讲就是半天儿。说的都是实话、实情、实事、实理儿，感人肺腑。他给地主扛了半辈子长活，他说的“小做活儿的事儿多，喂猪打狗挡鸡窝，端完尿盆子算完活”，以及讲话时的表情，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校还组织学生步行十几里，到长阳农场听农场党委沙书记讲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沙书记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据说是红军抢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他一生立过不少战功，负过不少次伤。他讲话的声音虽不大，但也引人入胜，如细雨润田，使人受到感染。

学校学习文化知识很重视联系实际，注意学以致用。学了文科知识，鼓励学生给报刊投稿；学了理科知识，鼓励学生到生物园地或实验室试验；学了外语，鼓励学生与外国学生通信。报刊上时常看到学校师生写的文章。学校的生物园地颇有名气。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和苏联专家曾帮助在这里建立生物试验园地，学校设有气象组、米丘林小组等，学生进行各种试验，如玉米授粉、果树剪枝、土豆和西红柿嫁接等成果都曾在全国教育成果展览会上展出。1963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七家报刊，都报导了这里的经验。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也曾到这里指导工作。学校学的是俄语，当时中苏友好，很多学生主动给苏联学生写信。找朋友，交朋友，成了当时学生课外活动的一大热门。但是到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论战硝烟弥漫，阶级斗争提起，这一活动也就慢慢停止了。

学校还很重视文体活动。每年校庆、元旦都要组织文艺会演。

4月1日是良乡中学校庆日。这天，很多离去的老师、校友都来。中午要吃会餐，随便吃，一年里唯一的一次，吃的也非常好。几百人欢聚一堂，同学们争着抢老师到自己桌上来，开怀共餐。有一种面食，叫“肉龙”，长长的，有两个馒头长，里面有一层葱花肉丁馅儿，吃起来格外香。晚上演出文艺节目，有独唱、合唱、表演唱；有相声、快板、小歌剧。特别是史常富和柳毅同学的相声往往是晚会的高潮。当时还没有电视，收音机也寥寥无几，他们往往是把当时电台播放的相声段子最精彩部分集在一起，再穿插进去一些自己生活中的资料，加上生动的表演，令人大笑不禁，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学校体育也很红火。除课间操、体育课外，几乎每天下午放学后，在大操场上，都有球赛。学校及各班都有球队。有同年级的比赛，也有不同年级的，还有师生的，与外校的。学校每年要举行一次运动会，全县

运动会也大多在这里举行。学校在运动成绩上，破全县纪录的大有人在。当时程德华同学一次就破了长跑、短跑、三级跳三项县纪录。学校还有三十名同学课余参加良乡机场的滑翔训练，都取得了好成绩。

良好的教育教学，优美的学习环境，孕育了一代人才。知识青年侯隽是最突出的例子。侯隽，良中十二班的学生，1962年高中毕业，品学兼优，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响应党的号召，到河北省宝坻县窦家桥村安家落户，和农民一起战天斗地，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做出了突出贡献。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曾发表关于她的长篇通讯，称之为“北京来的特别姑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六次接见，一度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

光阴似箭，几十年过去了。而今的良乡中学，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来的平房，除北院的“大成殿”外，都已换成了楼房，教育教学也有了新的进展。抚今思昔，谨成此文，以示良乡中学教育之发展。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解放初期几次重要的教师会议

李增祜

1948年底，房山县全境解放。此前，国民党的残酷统治，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抢粮抓丁，造成乡村生产凋敝，民不聊生，各村小学纷纷停办。在这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县人民政府一手抓生产的恢复，一手抓教育的重建。一方面积极组织各村小学复课，另一方面还通过解放初期几次重要的教师会议，进行教师队伍的培养与建设。

1949年的顾册会议

1949年1月，房山县人民政府在顾册村举办解放后第一次全县教师会议，名称是房山县小学教师训练班。参加学习的除原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教师外，还有新参加教育工作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共有200余人。因为刚刚解放，物质条件极差，这些教师只能背着背包，带着小米，从四面八方徒步来训练班报到，先将自带的小米做为伙食费交到训练班的总务处，然后按照安排，住进顾册村各农产家里。训练班由县文教科主持，当时的科长是常健。县委书记崔洛春、县长杜恩霖、县公安局局长杨清波都到训练班讲课，做形势报告，组织与会教师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使教师们初步懂得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道理。训练班的会期是15天，会场设在顾册村一个李姓大地主的仓房里，在屋内的黄土地面上，横放着一根根檩木当座位，参加学习的教师们都坐在檩木上听讲，记笔记。时值北平尚未解放，解放军正在围城，形势有些紧张，但教师们学习情绪非常好。认真听讲，热烈讨论。这次会议使大家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想很好地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就必须转变立场，把立脚点移到工农劳苦大众这方面来。在训练班即将结束时，县文教科重新调配和任命了各小学的校长、主任和教师，并颁发了聘书。这次会议，标志着房山县教育事业迈出了恢复与发展的第一步。

1949 年的长沟会议

1949 年 9 月，在长沟镇召开了全县教师会议，这是继顾册会议之后召开的第二次教师会议。长沟镇位于县城西南，距县城 35 华里。参加会议的 200 多名教师分住在各农户家中。因为刚解放不久，新区和老区的教师需要有一磨合的过程。老区教师认为自己有政治优势而轻视新区的教师，新区的教师又以自己有知识业务优势而对老区教师不服气。所以，增进新老区教师的团结，恢复和发展全县的教育事业，就成为这次教师会议的主题。会议仍由县文教科主持，县委宣传部长宋广宽也从始至终参加了大会。大会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队》、《纪念白求恩》和《反对自由主义》三篇文章，还由宋广宽作了时事政治报告，然后再分组讨论。全体教师听报告时就在长沟镇北边的太和庄大教堂集中，在各家农户住地分散进行讨论。会议共进行 7 天，最后一天是在太和庄大教堂组织了大会发言。不管是新区的教师还是老区的教师，大家都纷纷表示：散会回校以后，一定要全心全意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把农村的小学教育搞好。新区教师肖硕儒的一番话，给人们的印象最为深刻。他说，“为人民服务”，说着容易，那要看实际的。我们要像木匠那样“挂线儿瞧活”，比试比试。通过教师们的发言，可以看出教师们的工作热情。这次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

1950 年的二站会议

解放初期，房山县还没建大礼堂，所以，每次召开全县的教师会议，就得选交通方便的大村作为开会的地点。1950 年 6 月，房山县召开了第三次教师会议。这次会址选在二站村，因为村里有一个大的教堂。二站村位于县城南面，距县城 10 余里，交通也很方便。这次会议从 6 月 1 日开始，共开 4 天，议题是“评模范，树样板”，参加会议的教师约有 400 人，仍由县文教科主持，当时的文教科长是陈浩山。第一天在二站大教堂集中，由县领导做评选模范教师的动员报告，接着按区分组推荐候选人。当时，房山县共有 6 个行政区：城关片为一区，张坊、十渡、蒲洼片为二区，南尚乐、长沟片为三区，赵各庄、石楼片为四区，河北、史家营片为五区，霞云岭片为六区。各区推荐出候选人以后，第二天和第三天进行大会发言，由各区候选人介绍教学工作成绩。最后一天是集体投票选举。这天上午，全体教师仍在大教堂集中，每人先写选票，然后在会场前面的大黑板上统计选票，根据得票数，最后选出 10 个人为县级模范教师。这 10 个人是：洪寺小学的孙涤新、石楼小学的李欣儒、片上小学的白璧、双孝小学的关文博、东庄子小学的张宗羲、朱各庄小学的王凤梧、大草岭小学的隗永禄、坨里小学的吕桂荣(女)、西营小学张茂生、张坊小学白磊。会议最后一项是总结发奖，奖给每位模范教师一套教学参考书和一枚奖章。奖章为圆形，直径 3.2 公分，白地，中心是一颗红五星，周围是齿轮和麦穗，外围是红色仿宋体字，写着“模范教师”四个字，下边是“房山县人民政府奖”八个字，最外围是一圈红边。两天以后在县城照了合影。合影照片的最前排是新当选的房山县首批模范教师，由左至右的顺序是：吕桂荣(女)、隗永禄、王凤梧、张宗羲、关文博、白璧、李欣儒、孙涤新。遗憾的是，照合影时白磊和张茂生没有赶上，所以合影中的模范教师只有 8 个人。这次会议对全县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个有力的推动。全县刚解放不到两年，党和政府就在教师中评选模范，表彰先进，这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急切发展教育事业的做法，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52 年的顾册会议

1952 年 9 月，在顾册村召开“思想改造”会议，思想改造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审查教师的历史问题，

二是废除体罚和变相体罚。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他们有的参加过各种反动组织。这些人的头脑中存有浓厚的旧思想、旧意识,在工作中习惯于使用旧的教学方法,最突出的就是体罚学生。每当学生不服管理或成绩不如意时,他们就让学生罚站、罚跪、打手心、打屁股,有的甚至不让学生回家吃饭,实行“饿治”,还有的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挖苦学生,污辱学生的人格等等。这样一来,学生家长意见很大,学生中途退学的事不断发生。所以,要从根本上废除体罚和变相体罚,就必须改造旧思想,使这些人脱胎换骨,成为新人。这是改革旧的教育教学方法的需要,是人民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参加会议的教师将近500人,县里主要领导来大会做了动员报告,要求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向党和政府坦白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要求犯有体罚和变相体罚错误的人,深挖思想根源,坚决纠正。听了报告以后,以学区、学校为单位分组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帮助有历史问题的人,放下思想包袱,彻底交待问题。同时还揭摆自己学校内部存在的体罚现象,挖根源,谈危害。然后由各学区校长归纳整理,向大会秘书处汇报。最后一天由县文教科科长陈浩山做总结讲话。他首先宣布对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以及犯有严重体罚错误的人的处理决定:一是大多数调离原学校;二是个别不宜再当教师的,坚决予以辞退;三是混入青年团组织内的,一律开除出团组织。他最后要求全县教师要不断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要坚决废除体罚和变相体罚,改革旧的教育教学方法,建立民主、文明的教学新秩序,推动全县教育事业健康的发展。这次大会取得两项成果:一是基本摸清了全县教师队伍的政治状况,为1956年的肃反运动做了准备;二是基本上制止了各校的体罚和变相体罚。可以说,这次大会是旧的封建式的教育向新的民主式的教育过渡的转折点,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1955年的房山会议

1955年7月,县文教科在城关小学召开房山县小学优秀教师会议。当年的城关小学在城内东大街路北,即现在房山宾馆所在地。参加会议的优秀教师共21人,都是由各学区评选出来的。评选的过程是,先由各学区的基层小学推荐候选人,然后在学区会上,由候选人向全学区教师介绍自己的教学成绩。在县文教科干部的监督下进行评议选举,最后选出出席县的优秀教师。这次由县文教科主持召开的优秀教师会议,共开两天。第一天是大会发言,交流经验。发言的主要内容是:有的介绍自己参加业余进修,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自学方法,既提高了文化水平,又改进了教学;有的介绍在山区工作,每天爬山涉水接送学生,巩固了山区儿童的入学率;有的介绍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的经验;有的介绍在自然教学中自制教具,突出直观性原则的经验等等。大家的发言,对每个参加会的人都有很大帮助和启发。会议第二天,先是选举出席省的优秀教师,大家一致同意选举王珍代表房山县出席河北省优秀教师会议。接着就是发奖,县文教科奖给每位优秀教师一个精装笔记本和一支小金星钢笔。最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合影包括21名优秀教师和县文教科的干部,共站成5排,第一排左起第3至4,是李增祜、刘玉书。第二排左起第1至4,是王风云(女)、李玉林、杨奉先、穆秀琪;左起第6至9,是王珍、潘西林、杨思彬、秦汉生。第三排左起第1至8,是孙竹新(女)、姚玉兰(女)、葛恒、许士泽、赵树标、冯天禄、纪少轩、陈文芳。第四排左起第5至6,是安济泽、吴耀和。第五排左起第1是谷中秀。(照片上面的人,凡是没列出姓名的,都是当时县文教科的干部。)这次会议时间虽然短,但质量较高,影响面也较广,是一次比较理想的会议。

从1949年至1955年的七年间,全县比较重要的教师会议开过5次。每次会议,主题都很鲜明,目的也很明确。经全县教师的团结协作,每次会议都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收到理想的效果。综合几次会议的内容和进程,不难看出,解放初期,在政通人和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是在扎扎实实地抓教育,是在根据当时教师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师队伍的培养与建设。以史为鉴可能知兴替。由此看来,房山县解放初期的这段教育史,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原房山县“五七”大学简记

罗玉源

原房山县“五七”大学，是在1975年5月成立，在原房山县“五七”干校的位置组建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五七”干校已经解散。通过落实政策，大部分干部均已安排了工作。随后，“五七”大学在大石河农业实验农场(后改原种场)的基础之上组建起来。

1975年9月，“五七”大学党委正式成立。由原县委副书记罗玉源兼任校党委书记；由王德元、隗永祥、柴振江任副书记；党委委员有赵文瑞、程瑞林、郝志东、杨春如。党委下设七个支部。“五七”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本县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学校下设农学、水利、畜牧、林果四个专业和农业、果树、畜牧、基建四个队。

“五七”大学行政领导和机构设置是：党委书记兼校长罗玉源；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德元，主管学校的全面工作；副书记兼副校长隗永祥主管教学工作；副书记兼副校长柴振江主管农场和畜牧队。其他校

1978年11月，北京市房山县“五七”大学农技第二届毕业生合影

(罗玉源 提供)

领导是郝志东任办公室主任，生产组组长赵文瑞，副组长高继祥，政治组长杨春如，后勤组长刘元，教育组长穆瑞林。

1975年10月16日，房山县“五七”大学正式宣布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学员开学典礼。招生工作由县委组织部门向各公社分配指标，主要是培训在职干部和后备干部。这样一来，目的明确，社来社去，不存在分配问题，对在职干部和后备干部的成长和进步都十分有益。

在1975年至1981年的六年时间里，“五七”大学为全县农业战线培养了农业、畜牧、水产、财务会计等专业人才共计530余人。为全县农业建设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六年的教学实践看“五七”大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时间短，见效快。六年时间除两期一年制外，其余均是短期班。干什么学什么，用什么教什么。一方面在课堂上学专业知

计工作。这样边学习边实践，学员毕业后，学以致用，适应了形势需要，效果很好，受到社队领导的好评。

按需分配，学员有保证。学校学员的来源都是社队的在职干部和后备干部，还有的是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哪里来还回哪里去。开始县里往社队分配学员名额时，有的还讨价还价，不愿多参加学习。后来社队领导通过几期学员的实践，都愿多培养些农业专用人才，所以后来社、队都要求多安排一些人参加。

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学校作为事业单位，组成人员大多是财政开支，有的临时人员仍在原单位开支。学员来自社、队，只交少量学杂费，生活非常俭朴。当时学习条件很差，学校办学初期只有30间平房，还是原来的水果库房。没有桌椅，就使用水泥台，坐小马扎。为解决学员吃、住、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1976年由教职工组成了建筑队，自己动手新建教室30间，之后又建成了170平方米的饭厅，修缮了教室宿舍80余间，还建了180平方米的实验室，购置了急需的实验设备，改善了学习条件。学员到附近参加实习，都是自带工具、饭菜饮水，到远处社队，都是和群众同吃同劳动，从不搞任何特殊。

1981年7月1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撤销了“五七”大学的建制，改为房山县农民科学技术学校，至今为区成教局所属农业中专，开始了她新的使命。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我当乡村教师的回忆

毛锡恩

1949年8月下旬，我从中学校门出来不久，就来到了原河北省良乡县第八区(后改为四区)马厂村当小学教师。半年之后，我又先后被调到本区稻田村、辛立庄村任教。两年多的乡村教育工作、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每当回想这段往事都感慨万千。

—

当时良乡县第八区位于今房山区永定河畔，东邻大兴县，南与涿州市接壤。从南到北约六十多华里，是个狭长、偏僻地带。大部分土地是盐碱沙荒，成片的芦苇草，只有村子周围能种一些稻米。虽然有“金高岭(马厂)，银稻田”的说法，但是群众的生活很困难。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春熬硝，夏打草，秋天往外跑(打工)，冬天穿着破棉袄，一年到头吃不饱”的歌谣。这是群众生活的写照。

我工作过的三所小学，一所在“老爷庙”，两所在地主的宅院。教室黑暗透风，桌椅板凳高低不齐。后来才知道是学生从自己家带来的。严寒的冬天，学生冻得在课堂上跺脚，握一会儿笔就得捂捂手。当时由于县财力不足，煤火费不够，一部分是靠学校的厕所粪便换钱买煤。可是学校的厕所是在外边用玉米秸夹的围墙，一不注意就被野狗吃光了。1950年初冬，我到县教育科请求解决一点煤火费。当时小清河水已经冻了一层冰，我脱了鞋袜提起裤腿就趟过去了。当我上岸时，两腿“扎”的生疼。我在沙滩上乱蹦乱跳了一阵子，穿上鞋袜，又继续上路了。到了县教育科，科员刘孝先同志接待了我，给了我圆满的答复，并很快得到了解决。在回来的路上我边走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二

这里的群众尽管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但是对教育还是很重视的。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上学，平日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攒起来换钱供学生念书。每当家长送子女上学时，见到老师总是千叮咛万嘱咐：“您千万费点心，狠狠地给我管，打坏了俺们也不埋怨，咱们就是让他(她)将来有点出息。”每逢我听到这些话，心里都非常感动。我理解家长们的心，暗暗的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教育好，不辜负这些苦心的家长们。

提起教书，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想要给孩子一碗水，就得先准备一桶水。只有一面教书育人，一面不断提高自己。那时都是初小，而且是复式班。一个教室两个年级的学生(一、二年级，二、四年级)，课时要掌握好，两个年级的学生才互不干扰，又都能专心学习、听讲，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我为达到这一目标，虚心向老教师请教，认真备课。学区领导组织观摩教学，我主动要求他们帮助我，提出改进意见。每逢搞一次观摩教学，我都觉得有很大提高。我记得1950年春，开学不久我担任了一、三年级的观摩教学，由于认真钻研，多方面做好准备，下课后，受到了全学区同行们的好评。说我讲的生动、活泼，有条有理，明明白白。外校参加听课的学生也感到满意。

三

那时乡村教师与群众的关系密切极了。日常生活，大事小情谁也离不开谁。他们遇到一些难处或模糊不解的事儿，要到学校找教员。我当时刚满十六岁，说起来还是个孩子。可是他们却称我是“秀才”、“先生”，对我非常尊重。那时农村封建迷信盛行，旧的风俗习惯挺多。村里死了人要挂块帐子，帮他们写挽联，甚至什么时候出殡，小孩子死了埋在什么方向，都要问问老师才放心。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他(她)们的心愿，我只好根据当地的环境、条件，再翻翻旧“皇历”，说说我的想法，以使他们悲伤的心情得到一点安慰。

村里的学生家长都比较了解我，对我非常关心。开始学校两位老师，后来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提起做饭，我连熬粥都不会，那些大妈、大婶，就手把手的教我；学生已经上早自习了，我还没吃上饭，她们就给我送去点好吃的；晚上我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大庙里，他们怕我害怕，就让儿子跟我做伴。1951年初夏，我突然病倒了。一位安大娘知道后，把我接到她家，并请来郭大妈给我看病，说我得了“翻气”，给我扎了针，临走时，还给了我一万元(旧币，合后来的一元)叫我买一点好吃的。我当时浑身无力，只想躺在炕上休息。安大娘说我是“发药子”(疟疾)，一躲就好了。每到中午发烧时，她领着我到学校去跑圈，可我一步也迈不动啊！后来实在坚持不了，安大娘让她二儿子赶上大车把我送到长辛店火车站。临走时，乡亲们嘱咐我“好好养病，早点回来，孩子们离不开你，我们也想你！”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我说，你们放心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谁知道，一病就是两个多月。病好后，我又被调到辛立庄村工作了。遗憾的是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每当我想起这件事，都感到内疚。

四

教师的生活是清苦的。每月一百二十斤小米(工资)。每月发工资时，村干部派人，拿着我的手章，带上口袋，拉着毛驴或赶上一辆小车到指定的地点去领。领回来小米，留下四、五十斤给家里食用。还要抽时间带上一位年纪大点的男同学，用毛驴驮到长辛店集上出售，卖了钱再买回一些玉米面、高粱米和油盐酱醋。这，就是一个月的伙食。有时还花上两、三块钱买一条“海昌兰”的裤子。那时很少吃肉，顶多和我的学生

到饭铺吃一顿肉丁炸酱面就很满足了。就是这样也感到生活充实，精神饱满，干起工作来有滋有味，什么苦啊，累呀，全都忘掉了。

五

学校经常配合区里开展多种多样的政治宣传活动。1950年抗美援朝，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动员群众交售爱国粮等，都积极配合宣传有关的方针、政策，村头、村中的黑板报，由学校不断的更换内容。每期黑板报都有不少老乡围着去看。到了晚上，学校搞屋顶广播宣传，每隔一段房上都站着一个学生，教师蹲在学校的墙角，没有电，用手电筒照着稿子，老师念一句，学生传一句。比如“老乡们！注意了！现在开始广播了……”乡亲们坐在自家的炕头上，静静地听着。在抗美援朝时，我们组织活报剧、大秧歌、霸王鞭，去街头演唱。既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又使群众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组织学生参加审判会、诉苦会、斗争会，使学生从小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那时很少休星期天、节假日，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学生、村干部一起排演节目。1951年春节，正月初一下午我就回到了学校。第二天村上搭个台子，我们就演唱《白毛女》歌剧。女学生不愿意扮演喜儿，我只好男扮女装，登台演出，使群众欢欢喜喜过了个年。

这段教师生活已经过去四十八年了，至今想起来心情仍非常激动。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作者系原区政协一、二届副主席

回忆我在良中“三反”运动中

刘振祥

1952年初河北省立良乡中学(以下简称良中)，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在全校迅速展开。

县领导大会动员以后，良中总务处主任、科员、会计、出纳、管理员，五个干部均系中共党员，有四名被解职隔离审查、账目被封、枪支上缴。我这个出纳会计被暂时留下。并抽出语文教员高少峰为总务处领导，让我俩一起坚持总务处的工作。

运动开始后，接受审查的4名同志被动员，逼迫他们交待贪污罪行，而这些都离不开我这个管钱管物的出纳会计，有些线索都想通过我，找到“突破口”。他们一找我，我确实一无所知，一个个都被我拒绝了，不到一周我也被关起来和其他四人同等待遇了。

交待贪污?这简直是笑话，是无中生有，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污辱，但说也奇怪，左一个证明，又一个检举接连而来，我认真的想一下，给志愿军寄慰问信，送慰问品，用的是良中的公用信封。再就是开始筹建供销社时入过两万元的股(即二元)，搞运动的人说，这是烟幕弹，这不是贪污?运动一天天深入，良中被打

击的贪污款数，竟超过了几年来的总收入，不管你承认与否，我们五人，均被打成“老虎”（贪污分子），我当时才 20 岁，对老虎一词非常反感，我们被关期间昼夜有多名学生看守，晚上睡觉时把衣服收走，睡在地下，早晨再发给衣服，吃饭有人去领，名曰给“老虎”开饭，一般白天坚持上课，晚上搞运动，教员动手打我们，学生只管看着和唱歌。一次我在交待贪污时写了：“污，是钱，是物，不是字码一二三四五，刘振祥有没有，早晚会清楚……”这又招来更严重的毒打，打到身体没有感觉时也就无所谓了。领导运动的良中高明允老师没人时问我：“你到底有没有贪污呀”？我流泪告诉他：“如查出我有一文钱贪污，枪毙我也无话可说……”高明允握着我的手低声说：“那你可冤枉啊！”这被别人看见，说高明允右倾、温情，而被取消了领导运动的资格。对被整对象丑化、污辱、毒打，良中干得比较突出。

“三反”运动中用歌曲教育斥责动员被整人员，这是良中比其他单位别具一格的地方，歌声雄壮有力，我虽在被整队伍且，但也边学边唱，当时的音乐教师翁相新，是我下班留校生，没人时他从我身边过，我向他索要了歌片，越唱越有劲，不觉唱出了声，结果被人发现，把歌片没收了。时隔 40 多年，我仍记得一些。现将歌词写在下面：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你走那边？一条活路，一条绝路，一条是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你看走向那一条，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一定要严办！

丢掉你的鬼算盘

丢掉你的鬼算盘，你的阴谋早揭穿，你别妄想那攻守同盟当靠山！群众的眼睛看得准，群众的力量排山倒海！共产党头前来领导，四面八方齐动员，你攻什么？攻的是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你守什么？守的是大海里头没底的船！丢掉你的鬼算盘；你的阴谋早揭穿！只要你彻底坦白，彻底悔过，立功赎罪。人民的裁判可以宽大，丢掉你的鬼算盘，你的阴谋早揭穿，假若你狡猾奸诈耍手段，想逃出人民的法网难上难！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打退资产阶级进攻！
打退资产阶级进攻！
资产阶级的无耻勾当人民已经不能再容忍！
快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
坚持打退资产阶级进攻，
坚持打退资产阶级进攻，
工人阶级的政权不许你抢夺！
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容你改变！
快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
坚持打退资产阶级进攻！

良中的“三反”，进一步深入后，所有管钱管物的人都涉及到了，负责收党、团费的、医务室司药、伙房

炊事人员等，都被审查，当时的口号就是“大胆怀疑，望风捕影”。女同志被称作母老虎。教职员的小伙房，李连山老师傅做饭、炒菜、采买、记账、四、五十人吃饭只他一人，工作量非常大，但他干劲足，思想好，手艺也不错，平时受尊敬、受表扬，三反运动中，苦了老人家，指责他们以这样干是别有用心，叫他交待贪污多少钱，他个子高又站到桌子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晚上挨斗，白天还得做饭，把老头子整得痛哭流涕。

良中的三反运动从1952年初直到7月上旬达半年之久，在这期间我们被整的几个主要人员，6、7个月没洗过澡，没理过发，没交党费，没过组织生活，更没有回过家，连书报也没有看过。6月底7月初，县委、公安局的领导到关我的屋子来，向我问寒问暖，找来人给我理了发，鼓励我这年青人要振作起来，搞好身体，换好衣报(炎热的七月，我仍穿着露着屁股的棉裤)以便将来更好为党干工作。果然，7月9日前后我们被分别谈话，被宣布没有问题，不给处分，家也没回，就随全校教职员赴河北省会保定市参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即全河北省的中等学校教职员)。通县地委副书记彭洪同志带队负责全专区的领导，我们这些刚刚被整的对象又变成了思想改造运动的骨干，我还参加了核心组，开始了新的历程。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房良地区流传的扫盲民谣

唐占忠

解放初期，全国业余扫盲运动风起云涌，产生了许许多多群众口头创作的扫盲民谣，势犹如鲜花烂漫，今采摘几首：

一

党中央，发号召，
扫盲运动掀高潮。
全国人民齐响应，
翻身摘了文盲帽。
有了文化心里亮，
思想觉悟大提高。
革命建设都发展，
社会主义早来到。

二

祁建华，识字法，
传遍海角和天涯。
速成识字金钥匙，
文盲心里乐开花。

三

地头边，柳荫下，
识字黑板树身挂。
社员放下锄和镐，
围坐一起学文化。
老师念，社员读，
书声朗朗满田涯。

四

油灯下，炕头上，
带孩子妇女识字忙。
放下针活捧书本，
专心听着老师讲，
课文一遍一遍读。
生字难字记心上。
小孩一旁拍手笑，
妈妈不再是文盲。

五

张二宝，李爱莲，
自由结婚发誓言：
夜里双双学文化，
白天下地同种田。
识了字，觉悟高，
同心同德齐向前。
二宝参军去朝鲜，
抗美援朝保家园。
爱莲在村当社长，
互助合作闹生产。
两人书信常来往，
互相鼓励心里甜。
你要杀敌当英雄，
千万别丢中国脸。
我在家乡搞建设，
尊老爱幼争模范。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房山区医药卫生发展简史

袁景荣

解放初期，房山、良乡两县属河北省通县专区所辖。1958年5月，房山、良乡两县划归北京市，将良乡县二区一部分村庄划归丰台区。两县合并后定名周口店区，1960年2月又改称房山县。198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消原燕山区、原房山县，建立房山区，是北京市远郊区县之一。

1948年12月房山、良乡两县同时解放，迄今已四十年。

为使人们对解放前后房山区院药卫生事业发展有所了解，走访了卫生界一些老领导、老同志、老同行，根据他们的回忆和有关资料，写了这份医药卫生发展简史。因年深日久，材料不全，免有遗漏和谬误，请有关同志和知情者加以补充。

全民所有制卫生、医疗机构发展概况

1944年在房山县政府所在地——十渡，由齐凤仙组建了医药合作社、各村群众集资入股年终分红。1948年随政府迁至张坊。

1945年，在老解放区龙门台，筹建房山一区医药合作社(以下简称药社)。也由各村群众集资，年终分红。1948年，药社迁至霞云岭。当时药社工作人员只有四人，即主任隗永增、副主任刘增春，兼管业务，中医郑玉山，会计梁巨来。

解放后，两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原两县卫生院，改名为房山县人民诊疗所、良乡县人民诊疗所。设备简陋，均无病床，无检验设备。接管时，除逃亡者外，被接管人员：房山有朱肇国、冯松年、冯广川，马文友、赵利民，苏××等八名人员，良乡有李和升、李昭英、张森、金大夫、严仲文五名人员。两县共有人员13名，其中只有西医大夫两名。两个药社，两个人民诊疗所，奠定了房山区医药卫生发展基础。

1950年10月，房山县卫生科与房山县人民诊疗所合并，改名为房山县卫生院，设有简易病床八张，共有职工16名，其中行政人员3名、医生3名、其它医务人员10名。陈润琪任院长。同年通县专区调到良乡十余名医务人员，改良乡县人民诊疗所为良乡县卫生院。当时共有职工15名，其中行政人员3名，医生3名，其它医务人员九名。设有内科、妇科、外科、门诊。两县卫生院，均设医疗股和卫生防疫股。高殿新任良乡县卫生院院长。兼医疗股长。王洪星、王国范，分别任卫生院卫生防疫股股长。1949年至1951年良乡县政府未设卫生科、房山县卫生科于1950年成立后不久，即与人民诊疗所合并，因此，卫生院暂时代行卫生行政领导职能，负责卫生机构建设，预防接种、卫生宣传、妇幼卫生、个体开业医管理等全部工作。1949年、在张坊、霞云岭药社的基础上，建立两处供销合作社、代售百货等人民生活日用品。1950年药社从供销社分出，单独经营。归卫生院领导，掌握全县药价，药品质量和供应工作。1950年良乡县成立医药联合社，门诊代批发药材，归县供销社领导。负责人为胡延龄。1951年，在张坊药社基础上，改建卫生所，齐凤仙任所长，工作人员有西医张玉铎，司药冯广川，会计赵贤。同年房山县政府拨小米五千斤，建起了十渡卫生所，冯松年任所长，工作人员有付洪全、陈志森。1952年，房山县在南尚乐建起了卫生所，韩臣子任所长、兼看病，职工有西医李志恩、司药陈祥、护士张世荣，中医郑玉海。同年建起了霞云岭卫生所、李萌

川任所长，职工有西医赵金生、护士杨兴。1953年房山在赵各庄建立了卫生所，王二福任所长，职工有西医邱树华、护士仇瑞云，司药王培生。同年八月十五日，良乡县在琉璃河五一联合诊所基础上，建立了琉璃河卫生所，西医肖荣祥任所长，兼看病，工作人员有郭志常(西医)、陈振江、边宗和。1955年，良乡县在四区葫芦堡，吸收当地联合诊所部分医、务人员，建立了葫芦堡卫生所，刘秉坤任所长，还有职工四人。其中医生三人。1956年7月1日在房山、良乡两县卫生院、卫生防疫股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王世杰任房山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贾淑贤任房山县妇幼保健站站长。王国范为良乡县卫生防疫站负责人，李昭英为良乡县妇幼保健站负责人。两站分负两县人民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工作。随之两县卫生院分别改名为房山县医院、良乡县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医院只负责医疗工作，不再负责其它工作。1955年下半年，房山、良乡分别在县医院外，建立起中医门诊部。门诊部设中医科和针灸科。良乡县中医门诊部有中医崔景瑞、张霁云、孟俊川、袁景荣，针灸医生王崇禧、司药白玉琴、挂号员代收费李淑敏。房山中医门诊部有王兆琪、高玉泉、郑玉海、杨天通、王金生、化文景、唐玉兴等。1956年，两个中医门诊部，分别搬入各自县医院，成为医院中医科、针灸科。同时，县供销社所属医药联合社，实行医药分开，分别成立了房山、良乡两县药材批发部，医务人员合并到县医院。1956年，房山县抽调张坊卫生所两名医务人员，又吸收南尚乐联合诊所部分医务人员与南尚乐卫生所合并，组建南尚乐地段医院，委任冯振龙为副院长。医务人员有西医张玉铎、岳瑞鹏、李志恩、中医侯宝书，郑玉海，司药赵义亭、吕士元，护士丁永来、张世荣、丁国忠。会计赵贤，挂号员唐宗尧。地段医院设病床5张、1957年又增设：病床7张、共12张。至此，县乡两级公立卫生医疗机构初步形成。

县乡两级公立卫生医疗机构，领导全区个体开业医、联合诊所，大规模地开展了卫生宣传、预防接种、疾病普查(黑热病、妇女病、疟疾、甲状腺肿等等)、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讲卫生等等工作。卫生防病知识在群众中得到普及，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卫生面貌有所改善。1958年5月1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指示决定，房山、良乡两县合并改名周口店区，1960年2月又改称房山县。原两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合并，先后称周口店区、房山县卫生防疫站；周口店、房山县妇幼保健站，宋进财为防疫站站长，李昭英为妇幼保健站副站长。两站与政府卫生科合属办公共有四十人，成为当时区直机关第一大办公室。为了方便人民群众看病和住院，良乡县医院原址未动，改名为周口店区良乡医院。(1987年改为房山区第二医院)。同年原属京西矿区的河北、金鸡台、周口店三个门诊部和上述三处妇幼保健站划归房山。三个门诊部都设有防疫组。当时人员组成是：周口店门诊部主任段永康(中西医大夫)，西医史学哲、司药刘明章、护士张云瑜、刘吉龄；防疫组连维全、史延星、宋立云，还有厨师一名共九人。周口店妇幼保健站站长王云孚，人员有高淑芝、高淑敏、宋云香、王富荣等共五名。河北门诊部主任石秀斌、西医焦克珍、王觉春、护士董桂芬、司药关文绪、防疫组员付志平，还有厨师名共七人。河北妇幼保健站站长王秀荫，人员还有邹德荣，王凤英、高竹茹、张秀玲、靳爱莲共6名。金鸡台门诊部主任石儒，西医董建章、王树伟，防疫员赵燕桥、殷宗孝，会计任成业，护士付长远、司医曹殿龙等。金鸡台妇幼保健站有廖仁甫、韩晓兰、李玉兰、朱凤琴、崔玉梅等人。合并后不久，即撤销了金鸡台门诊部和妇幼保健站，廖仁甫、李玉兰调到区妇幼保健站，石儒等人调到河北门诊部。原河北、周口店两处保健站，分别并入河北、周口店门诊部，改称妇保组。

为了适应人民大公社发展需要，1958年底，河北医院，琉璃河卫生所，十渡卫生所，霞云岭卫生所夕周口店医院，各自吸收当地联合诊所部分医务人员，扩建成公社卫生院。改名称为河北卫生院，琉璃河卫生院，马安卫生院，霞云岭卫生院。石秀斌任河北卫生院院长，韩福全任琉璃河卫生院付院长，王俊为马安卫生院负责人，刘勋任霞云岭卫生院院长。五个卫生院共设有简易病床55张。

1958年10月，政府把南尚乐地段医院、赵各庄卫生所、长沟大众联合诊所合并，建立起长沟卫生院，地址在坟庄。设有简易病床40张。门诊设内科、外科、妇科、中医科、化验室、注射室。该院还设有防保科，负

责张坊、南尚乐、长沟、岳各庄、赵各庄五个管理区(大公社时下属为管理区)的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医疗指导等工作。医院下设两个门诊部,即张坊卫生所,改为长沟地区医院张坊门诊部;长沟大众联合诊所,改为长沟门诊部。宋进财为第一任院长。1963年在东长沟建起了新址,医院从坟庄迁至长沟,长沟门诊部随即撤销。

上述六个卫生院,除周口店卫生院外,1963年均改称地区卫生院。

1958年5月,在良乡镇建立起周口店区良乡卫生学校一所,条件十分简陋。建校初期,从市友谊医院、天坛医院、妇产医院,借用人体的模型、挂图等等教具;房山医院支援旧显微镜一台。从良乡医院、良乡中学等单位借用旧桌椅等等。聘请友谊医院、天坛医院、护校的医师兼教师(没有专职教师),其中包括友谊医院的翁心植、王朋、张双全、王祖文等著名医师。校长由副区长王新华兼任,李荫川任教导主任。办公室人员有姜允涛、贾淑贤、张秀玲。第一期招生75名,分医士、助产士两个班,学制2年,毕业后的学生分配到全区各医疗机构,至今已成为各级医疗机构的骨干。

1958年8月,房山医院在房山城内新华书店旧址,设立了机关门诊部,服务对象主要是享受公费医疗的机关工作人员。门诊部医生为胡延龄,司药杨雄。1962至1964两年,区防疫站中医袁景荣每周星期一、四在机关门诊部应诊两天,日汀诊量30—70人次。

1962年,为加强山区卫生工作建设;解决山区缺医少药问题,增设了大安山、史家营两个卫生所。大安山卫生所第一任所长殷宗孝。医生有中医高景永、张清珍、西医董建章、妇科邹德荣、司药于振义。平广安任史家营卫生所第一任所长。职工有中医王洛印、刘巨会、袁明鉴、西医有彭黎彬、司药任成业。同时河北卫生院在南窖门诊部负责人为付志平,职工有西医士李淑珍、李素云、张淑芳,司药张宝昌,中医罗方。同年9月,房山县建立急救站,地点在城关的营房胡同,拥有急救车二辆。杨庆奎任站长。

1963年,房山县全民所有制医疗机构,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房山县医院、房山县良乡医院、长沟地区卫生院、琉璃河地区卫生院,河北地区卫生院、马安地区卫生院、霞云岭地区卫生院、葫芦堡卫生所、大安山卫生所、史家营卫生所、县急救站。1966年河北地区卫生院南窖门诊部改为南窖卫生院,付志平任院长,人员增加了李让(中医)、李秉楨,司药孔凡藩。同年蒲洼建立了蒲洼卫生院,朱法喜任院长,职工有妇科医生王凤英、护士刘惠敏、医生魏天元。

区级全民所有制医院人员设备增长概况

解放40年来,卫生事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和加强,卫生医疗机构和人员,从少到多,设备从无到有,并日趋完善;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一、房山区第一医院,发展过程是由1949年的人民诊疗所→房山县卫生院→房山县医院→周口店区医院→房山县第一医院→房山区第一医院。

1. 人员:1949年共有职工10人,其中医生2名,一般医务人员7名、行政人员1名,1953年,增加到20人,其中医生4人,一般医务人员9人,行政人员7人。1957年增加到31人,其中医生8人,一般医务人员15人,行政人员8人。1964年增加到116人,其中医生37人,护士29人,其它医务人员27人,行政人员23人。1978年增到323人,其中中医医师8人,西医主治医师57人,医士41人。护士61人,主管药(技)师11人,药士6人。其它卫生技术人员55人,行政人员90人。1988年,职工总数已发展到531人,其中主任医师3人,副主任医师6人,主治医师48人,医师89人,医士2人,主管药师2人,药师17人,药士13人,主管护师8人,护师37人,护士135人。主管技师2人。技师17人,技士18人。共计有各类医务人员394名。

2. 病床:1949年为零,1950年设简易病床8张,1953年设正规床9张,1957年增加到15张,1964

年增加至 80 张，1978 年增至 185 张，1988 年增至 390 张。

3. 科室，1949 年不分科室，1956 年开设了中医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和化验室，1958 年增设了放射科和理疗科。以后门诊科室不断增设，到 1988 年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中医科、传染科、五官科、急诊室 8 个临床科室，还有检验科、放射科、物理检查科、药剂科四个医技科室，以及门诊办公室和住院处；行政机构有院长办公室、医务科、护理部、人保科、财务科、总务科；党群机构有党总支办公室、共青团和工会。

4. 设备：1958 年，装备了 X 光机，医用冰箱，万能手术床。1964 年至 1987 年，添置万元以上大型仪器 9 件，其中 200—500 毫安 X 光机器 4 台。还有 B 型超声诊断仪、血气分析仪、自动生化分析仪、六道生理记录仪、美国鸟牌呼吸器。

5. 技术水平。外科，1950 年，只能做阑尾手术，1988 年能做胸腔手术和开颅手术。妇科能解决各种难产和子宫切除术。眼科能做青光眼、白内障手术。内科能抢救危急病人，包括脑出血、心肌梗死、肺心病急性发作等等心脑血管疾病。

二、房山区第二医院发展过程：良乡县人民诊疗所—→良乡县卫生院—→良乡县人民医院—→周口店区良乡医院—→房山县良乡医院—→房山县第二医院—→房山区第二医院。

1. 人员：1950 年共有职工 15 人，其中医生 3 人，一般医务人员 9 人，行政人员 3 人。1953 年增至 19 人，其中医生 6 人，一般医务人员 8 人，行政人员 5 人。1957 年增至 39 人，其中医生 11 人，一般医务人员 18 人，行政 10 人。1964 年增至 94 人，其中医生 28 人，其它医务人员 22 人，护士 17 人，雇用医务人员 9 人，行政勤杂人员 20 人。1978 年增到 201 人，其中中医医师 10 人，西医医师 32 人，医士 38 人，护士 24 人，药(技)师 3 人，其它卫生技术人员 50 人，行政人员 6 人，工勤人员 38 人。1988 年职工总数已发展到 367 人，其中主任医师 1 人，副主任医师 3 人，主治医师 37 人，医师 63 人，医士 11 人。主管药师 3 人，药师 15 人，药士 11 人，主管护师 1 人，护师 26 人，护士 79 人；主管技师 2 人，技师 9 人，技士 20 人，共有各类医务人员 281 人。

2. 病床：1955 年以前为零，1955 年，设病床 12 张，1957 年增至 23 张。1964 年增至 50 张，1988 年增至 221 张。

3. 科室：1949 年，不分科室，1950 年门诊设内科、外科、妇科。1956 年增设中医科、针灸科、化验室、注射室。1988 年，增设儿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放射科、检验科、功能科、理疗科、胃镜室、换药室等临床医技科室。行政机构有：院长办公室、医务科、门诊办公室、统计室、财务科、住院处、收费处、总务科。党群机构有党总支办公室、共青团和工会。

4. 设备：1956 以前，该院无任何客观检查设备。1956 年才建起化验室。只有一台显微镜。以后逐年添置了一些小型仪器。1964 年，该院购置万元以上大型仪器三件。即：胃肠透视机、日本产 B 型超声诊断仪、脑电图机。到 1988 年底，该院拥有 400—500 毫安 X 光机两台、B 型超声诊断仪、超声心动图、电子血球计数器、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氦氛激光治疗机各一台，万能手术床三台等大型仪器。

5. 技术水平：该院于 1986 年 6 月 1 日与北京市儿童医院横向联合，成为北京市儿童医院良乡分院，设儿科病床 40 张，提高了儿科疑难重症的诊断治疗水平。现在能做小儿马蹄内翻足矫正术、髌白加盖成形术等 20 余种儿科手术。外科能做腹部手术(肝、胆、胃、脾等切除术)；骨科能做腰椎骨显脱出、腰椎结核病灶清除、人工股骨头植换等手术。眼科能做青光眼、白内障、上颌炎根治、鼓膜修补等手术。妇科能做剖腹产、子宫次全切等手术。泌尿科能做肾上腺囊肿切除、肾盂结石切开取石术等手术。内科能抢救危急重病人，包括脑出血、脑血栓、心肌梗死，肺心病急性发作等抢救与治疗。

(《房山文史资料》第 2 辑)

房山区医药卫生发展简史 (续)

袁景荣

区级全民所有制卫生预防机构发展概况

一、卫生防疫站

1950年10月,房山县政府卫生科与人民诊疗所合并为房山县卫生院。同时,良乡县人民诊疗所,改为良乡县卫生院。两院均设医疗股和卫生防疫股。房山县卫生院卫生防疫股有王洪星、李金符、冯松年、穆秀敏、王生兰等五人,王洪星任股长。

1952年股内增加了赵义亭,1954年又增加了苏凤明、刘克洪。1955年初王洪星调到张坊卫生所后,由刘克洪任股长。良乡县卫生院,院址在良乡城内东街路南、第一个四合院内,东房三间为卫生防疫股办公室。人员有王国范、李昭英、王树三人。王国范任股长。1952年10月袁景荣脱产参加工作,任良乡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专职秘书,在防疫股内办公,1953年3月正式转入卫生防疫股工作。同年从通县专区和外县、本县调来了高福忠、赵城玉,刘秉坤、李时敏、庞奎等五人为卫生防疫股成员。1955年1月又从通县专区调来苑宝鑫到良乡卫生院卫生防疫股工作。同年王树还乡。这个时期卫生防疫股的主要任务是:全民性的预防接种、传染病管理;爱国卫生运动;培养接生员、宣传,推动新法接生等工作。具体任务靠组织、发动医药联合会(1952年改为卫生工作者协会)会员去完成。

1956年,房山、良乡两县,根据河北省通县专区指示,分别在县卫生院卫生防疫股的基础上筹建卫生防疫站。房山县卫生防疫站于同年七月一月正式成立,属政府卫生科领导。地址在房山县城内北街路西,有平房六间。政府拨款七千元修缮了房屋,增添了两张办公桌、十把椅子。全站共六人。王世杰任副站长。1957年任命宋进财为站长。1956年5月良乡县卫生防疫站也宣告成立。地址在良乡县镇内东街中心路南一个四合院内,与政府卫生科合署办公,属卫生科领导。院内南房三大间,为政府卫生科办公室,北房三大间,为卫生防疫站办公室,西房三小间是良乡县妇幼保健站办公室,东房三小间为库房。良乡卫生防疫站人员有:王国范、赵城五、苑宝鑫、司文印、谢雪雄、肖荣祥、阎作桢、何义、高福忠等九人。王国范为防疫站负责人。1957年,司文印、谢雪雄、何义相继调出,袁景荣从医院中医科调到防疫站。同年徐凤祥从通县卫校毕业,分配到良乡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卫生防疫站的建立大大加强了除四害、讲卫生工作,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持续开展,人民卫生知识和健康水平逐步提高。到1957年底,良乡县已消灭了流行多年的黑热病和疟疾。

1958年,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后,归属北京市称周口店区。两县卫生防疫站也随之合并,称周口店区卫生防疫站。全站十五人;有宋进财、王洪星、李春兰、张殿权、李金符、陈祥、袁景荣、肖荣祥、赵城五、苑宝鑫、阎作桢、王国范、高佩海、徐凤祥、高福忠等十五人。宋进财为站长。卫生防疫站(以下简称防疫站)与人民委员会(即政府,以下简称人委)卫生科合署办公。地址在房山城内西街路北,人委前院和中院之间的过道门两侧,东侧两间平房为人委卫生科办公室,西侧两间平房为防疫站办公室。宿舍在人委中院西侧平房内,1958年第四季度,宋进财去长沟筹建坟庄卫生院,因此防疫站长空缺。

1959年,遵照北京市统一布署,在北京市友谊医院大夫指导下,人委卫生科责成袁景荣负责组织治疗,高福忠负责检验,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性病和砂眼病普查普治。全区各医疗单位,抽出医护人员、组成若

干小分队，挨村逐户进行了查治，工作量之大，前所未有。同年冬季至60年春，本区麻疹大流行，共发病13240人，死亡193名。人委卫生科及时成立了防病办公室，组织了50名医务人员，分赴各公社疫区进行防治。防疫站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由于工作成绩显著，1959年底，防疫站被评为先进集体，徐凤祥被评为区级先进工作者，袁景荣被评为区、市级先进工作者，出席区、市60年2—3月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表彰。同年7月，北京卫校中专毕业生马玉凤分配到防疫站工作。

1960年后半年，人委卫生科、防疫站又一起迁至人委前院、东侧第一排新建平房内，共占房六间，仍是科、站合署办公。当时防疫站除办公桌和自行车外，没有任何设备。此年由于我国遭受自然灾害，加上偿还外债，国民经济出现了困难。全区人民响应中央和市委号召实行口粮低指标、瓜菜代。同时政府各部门，精简人员，紧缩开支。防疫站只留下八个人，其余人员分别调到房山、良乡医院和基层卫生院。年底全区部分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浮肿病人。

1961年1月12日，人委卫生科成立了防治浮肿病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付士华兼任，副主任由刘庆凯兼任，成员有徐凤祥、袁景荣、高福忠、陈祥、刘利民、李昭英、廖仁甫、梁月英，张文欣。防疫人员又全力投入防治浮肿病工作。

1962年，防疫站建立了化验室，在人委传达室背面两间平房内，设备只有普通显微镜一台、温箱、烤箱各一个和必要的玻璃器皿。检验人员有高福忠和从工业局调来的工业化验员许秀婷。初建的化验室，只能做冷饮（冰棍、汽水、酸梅汤）抽样和定期检验；饮食行业、机关食堂的食具细菌污染程度测定等简单工作，其它监测均不能做。

从1958年第四季度至1962年，防疫站一直没有站长。其工作安排布胃、检查、汇报均由人委卫生科直接领导。1963年调河北地区卫生院院长石秀斌任防疫站长，调良乡医院副院长史书珍任副站长。但人委卫生科与防疫站合署办公仍未改变。从建立防疫站至1964年，防疫人员既做防疫工作，又做卫生行政工作，既是防疫干部，又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员，叫做“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还有时被抽到下乡工作组，做与卫生防疫无关的工作，如“三夏”“三秋”等中心工作。

1965年4月，房山县委决定，防疫站从人委大院迁至城内西街马家胡同，原县医院旧址四合院内，院内有平房十六间，其中东房五间为化验室，政府拨款七千多元，修建了化验室上下水道、电路、建立起无菌操作室，添置了分析天秤、紫外线灯、恒温箱、电冰箱等检验设备，还添置了一台打字机，大门口挂出了房山县卫生防疫站的牌子。从此成为政府领导下的独立业务单位，但财务尚未独立，仍归政府卫生科管理。此时防疫站共有十二人，正副站长仍由石秀斌、史书珍担任。站内设两组两室，即卫生组、防疫组、办公室、化验室。人员开始有了明确分工。卫生组人员有袁景荣、王洪星、连维全、陈祥，主要任务是抓爱国卫生运动、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和劳动卫生。防疫组人员有李春兰、姚英伦、瑞士云、郑学芝，主要任务是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和予防接种工作。办公室刘殿龙上报下达、管理文书材料。化验室许秀婷负责冷饮检验和食物中毒分析，郑学芝兼管打字。

1966年，防疫站买了一辆三轮汽车，1967年用三轮汽车换了一辆美式吉普车，由司机陈林长驾驶，此车用于领取疫苗、下乡采样（井水冷饮食物中毒）等，并非领导专用。1967年，中专毕业生白松梅、刘艳华、吴殿军分到防疫站工作。

在文革“斗批改”高潮中，防疫站于1969年4月被撤消，其工作由房山县革命委员会“文卫组”代管。防疫站人员去向为：郑学芝留在“县革委会文卫组”，许秀婷调到房山医院化验室，白松梅调到长沟地区卫生院，吴殿军调到河北地区卫生院，刘艳华调到良乡医院，李春兰随其夫调回山东，陈林长带车调县革命委员会，刘殿龙、宋振文两人去“五七干校”，石秀斌、史书珍、袁景荣、连维全、王洪星、陈祥、瑞士云下

放到农村劳动。

1969年,根据县革命委员会(69)132号文件精神,将全县卫生防病等业务工作移交房山医院管理,建立了卫生防疫小组,卫生防疫小组由六人组成,于1969年12月1日正式办公,属房山县医院革命委员会领导,地址仍在原防疫站所在地。卫生防疫组由吕彦樽负责。1970年从下放人员中调回连维全、袁景荣两人到卫生防疫组工作。1971年又抽回两人,并从外单位调进几位同志,充实卫生防疫小组。此时仍有一辆旧吉普车。

1972年夏,又恢复县防疫站(当时称革命领导小组),并建立了党支部。吕彦樽任支部书记兼防疫站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郑志伟、宿显盛任副组长。防疫站又是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吕彦樽兼任。同年王砚英、李军、穆宗元、郑德强、牛天芳五人分配到防疫站工作,大大加强了防疫站的技术力量,防疫站设二室、四组。即办公室、化验室、卫生组、防疫组、工业卫生组、气管炎防治组。办公室两人,刘仲奎管文书材料,上报下达,孙宪章做政治思想工作。卫生组五人,连维全任组长。防疫组6人,瑞士元任组长。气管炎防治组3人,由李阴川负责。工业卫生组、化验室、司机各两人,共25人。同年调拨212后开门吉普车一辆,作为业务用车,原旧吉普车被淘汰。同时政府拨款1400元购买后院西房五间,做职工宿舍。

1974年,刘德芬调到防疫站任会计,防疫站正式立户建帐,从此防疫站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业务单位。

1976年10月,蔡廷余调到防疫站任党支部书记兼站长,郑志伟,宿显盛仍为副站长。同年分配到防疫站大专生两名,中专生三名。1977、1978两年相继分配到站中专生七名。

1978年,北京市拨款十五万元,兴建防疫站办公楼,地址在房山县城关镇南关保健路四号。办公楼为三层白砖楼。建筑面积1278平方米,楼房五十四间。1978年6月8日,防疫站由马家胡同迁入新址。为迎接外宾的需要,防疫站将原来的组改为科,设三科一组,即流行病科、卫生科、检验科、农村水改组。王砚英任流行病科科长,李军任副科长。连维全任卫生科科长,郑德强、穆宗元任副科长,丁树生任检验科科长,许秀婷任副科长。农村水改组由宿显盛直接负责。同年张玉碧调任副站长,并成立地方病办公室,属县委领导,张玉碧兼任地方病办公室主任。本年底从知识青年中招消毒员6人,经房山卫校培训半年后上岗。

1979年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防疫站分出,单独设立机构,属政府直接领导。同年11月10日,县卫生局党委,正式任命王砚英为流行病科科长,李军为副科长,郑德强任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劳动卫生),穆宗元任卫生科副科长(主管食品卫生),付华任卫生科副科长(主管消毒)。同年增设了办公室。

1980年,蔡廷余离休。郑志伟提任防疫站党支部书记兼站长,王永芬、李军任副站长。县卫生局任命穆宗元为卫生科科长,丁树生任检验科科长,刘国志为检验科副科长,强志华为地方病科副科长。

1982年,防疫站设五科一室,即流行病科、食品卫生科、卫生科、地方病科、检验科和一个办公室,任命刘文宽为卫生科科长,王奎强为食品卫生科副科长。

1983年,郑志伟调任县卫生局副局长后,王永芬接任防疫站党支部书记,李军任站长,王砚英任副站长。同年新设环境一卫生科和宣传科,撤销检验科和消毒科,检验人员及其工作按分工归有关科室管辖。

1984年1月,卫生科改为环境卫生科。任命果春香为环境卫生科副科长,罗月英为地方病科副科长,孙绍银为流行病科副科长,付华转为宣传科副科长。

1985年,恢复理化检验科,丁树生任科长。增设计划免疫科,张士清任科长。果春香、孙绍银、罗月英三人由副科长提为科长。任命许淑君为办公室主任。至此,防疫站共设有八科一室,即流行病科、环境卫生科、食品卫生科、劳动卫生科、计划免疫科、地方病科、宣传科、理化检验科、办公室,全站共有人员五十三人。

1988年,防疫站又增设总务科室一个,由燕泽江负责,至此,区防疫站共设有九科一室,人员发展到六十三人。

解放四十年来,房山区防疫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发展过程概括为:

1. 机构:由房山、良乡两县卫生院卫生防疫股→两县卫生防疫站→周口店区卫生防疫站→房山县卫生防

疫站→房山县医院卫生防疫小组→房山县卫生防疫站→房山区卫生防疫站。

2. 人员：1956年，房山县防疫站共有人员六人；良乡县卫生防疫站共有九人，两县合计十五人。1957年，两县防疫站共有人员十六人（房良各八人），1958年，两县合并后的防疫站共十五人。1960年减少到八人，1965年又回增至十二人，1972年增至二十五人，1978年增至四十四人，1988年增至六十三人。1988年比1956年增长了3.2倍。

3. 技术力量：六十年代以前，防疫人员均为初级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医士）。1978年经县卫生局统考后，防疫站共有卫生技术人员四十一人，占全站总人数的92.69%，其中医士（检验士）十九人，医师（检验师）七人，主管医师一人，防疫员八人，其它卫生技术人员六人。其中中级卫生技术人员（主管医师）占2.4%，初级（士师）占48.8%，没有高级卫生技术人员。1988年，全站共有卫生技术人员三十九人，占全站总人数的61.94%，其中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一人（为高级），占卫生技术人员的2.56%，主管（主治）医师九人（中级）占25.64%，医〈技〉师十六人，医〈技〉士二十三人（均为初级），占58.97%。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大中专毕业生逐年增加，卫生防疫人员的素质在不断提高，技术力量明显加强。

4. 设备：1962年，检验设备，仅有显微镜一台，温、烤箱各一个。1965年，增添了分析天秤一台，电冰箱一台。1978年已有1/10000分析天平一台，日本高倍显微镜一台，72一分光度计一台，气象色谱一台，电冰箱五台等大型仪器设备。1988年底价值千元以上仪器设备就有：①监测采样仪器：大气采样器四台，粉尘采样器两台，热球仪一台，CO₂测定仪一台，辐射强度仪一台，声级器一台。②分析仪器及检验设备：倒置显微镜一台，日本进口光学显微镜一台，毖林巴斯（带相机）显微镜一台，荧光显微镜一台，72一分光度计一台，72—1光度计一台，75一分光度计一台，酶标光度计一台，酸标光度计一台，数学离子器一台，原子吸收器一台，测汞仪一台，气象色谱一台，300毫安X光机一台，心电图机一台，扭力天平一台，1/10000分析天平一台、高速离心机两台，8.5立方米冷库一座，冰箱150立升四台、170立升八台、185立升两台，421立升一台，低温冰箱120立升一台，274立升一台，268立升六台。办公设备有IBM微机一台，四通打印机一台，1971年无价调拨防疫用车—212后开门吉普车一辆，1984年，北京市装备食品监督车——北京面包车一辆，1986年，用34665.28元，购进乃兹车一辆。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国家对预防接种工作极为重视，中央卫生部对冷链系统，有计划的进行装备。1983年，房山县政府，拨款一万元给防疫站装备了北京产8.5立方米冷库一座。1984年，北京市拨给防疫站香雪海170立升电冰箱37台，防疫站留用2台，其余35台，装备了三十一个乡卫生院防保组、一个县医院和三个厂矿医院保健科。同年市拨给日本产低温冰箱（268立升）八台，其中两台装备了房山、良乡两个县医院。同时市又拨给冷藏包470个，每个生产大队装备一个。1985年，市拨给防疫站国产营口组装343型双开门冰箱一台。1986年，市拨给2850型日本三洋牌低温冰箱2台，装备给琉璃河、十渡两个中心卫生院各一台。同年市又拨给165立升，本日立牌双开门冰箱两台，雪花冰箱2台，后两台，装备给长沟峪办事处和金鸡台办事处各一台。

5. 技术水平：随着检验设备的增加，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1962年防疫站只能做冰棍、汽水细菌污染程度测定和食具细菌污染程度检测。1965年能做沙门氏菌属培养、分离等工作；能鉴别食物中毒性质（细菌、化学物质）；能给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食物中毒定性。1978年检验水平达到：

- 一、糕点、冷饮、冰棍等食品卫生指标检验。
- 二、食物中毒致病菌的分离鉴定。
- 三、食品中铅、铜、砷、过氧化值水分等七个理化指标的测定。
- 四、水中酚、氰、芳烃、铅、铬等毒物和十二项污染指标检验。
- 五、空气中铅、四氯化碳、粉尘浓度、尿铅浓度测定。

六、肝功测定、乙型肝炎表面及 E 抗原、抗体系统检测,“流脑”抗体水平测定,伤寒肥达氏反应,痢疾杆菌分离培养,肝吸虫诊断试验,外环境 CO₂ 监测,流感病毒的分离鉴定,血便培养,药物过敏试验,菌种保存试验。

1988 年,防疫站除完成了大量的日常监督、监测和技术指导工作外,其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向着高、难、深度发展,到年底,完成了如下工作

一、完成全区十二种人体寄生虫、带虫率调查。

二、在十九个乡(镇)开展了计划免疫保偿制。

三、应用计算机完成生命统计分析。

四、完成了区科委立项的《六渡肝癌高发区病因调查》、《叶面喷硒提高水果含硒量的研究》、《加硒饲料对鸡蛋硒含量的研究》和《冠心病患者血清微量元素含量动态观察》四项课题。

五、协助其它单位完成了“七五”攻关课题:《心血管病流行动态监测》《菜粉蝶颗粒病毒工厂化生产及安全性试验》的研究工作。

六、已完成的《神经管畸形 1:2 配对病例研究》和《房山区军团病的发现和早期诊断》两项均获房山区科技进步奖。

七、完成了生活饮用水源十九个常规指标的监测及十二个污染指标检测。

八、开展了各种食品十五个理化指标及污水、外环境、食物中毒致病菌、肠道传染病致病菌的分离、培养、鉴定。

九、完成了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免疫后,血清抗体水平测定。

十、在全市率先开展了风疹、军团病、麻疹的血清学诊断。

十一、进行了血中微量元素,鸡旦、水果中硒含量测定。

6. 业务工作

一、传染病流行及防治:

(1) 传染病流行情况:五十年代末期,我区麻疹、百日咳流行猖獗,对儿童危害极大。1958—1959 年,百日咳大流行时,有 3326 人发病,22 人死亡,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1959 年,我区麻疹大流行,有 13240 人发病,193 人死亡。发病率为 3151 / 10 万,死亡率为 495 / 10 万,病死率为 1.5%。是建国以来房山区发病的最高峰。六十年代初期,房山区疟疾、脊髓灰质炎发病较多,1963—1964 年、疟疾发病 722 人,脊髓灰质炎发病 223 人,死亡 3 人。六十年代中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在房山区暴发流行,发病最多年分为 1964—1966 三年。1964 年,全区发病 464 人,发病率为 94.9 / 10 万,。死亡 65 人,死亡率为 13.3 / 10 万,病死率为 14%。1965 年,发病 1912 人,发病率 382.1 / 10 万,死亡 126 人,死亡率为 25.2 / 10 万,病死率为 6.6%。1966 年发病 2520 人,发病率为 491.4 / 10 万,死亡 117 人,死亡率为 22.8 / 10 万,病死率为 4.6%。1964—1966 年,这三年“流脑”在房山区可称之为特大流行。发病百人以上的公社有城关、周口店、石楼、赵各庄、琉璃河、长阳、紫草坞、班各庄、河北、长沟。其中长沟公社发病最多,仅 1966 年就发病 296 例,居全区之首。1965 年,房山区乙型脑炎(俗称大脑炎)暴发流行,全区共发病 313 例,发病率为 62.6 / 10 万,死亡 26 例,死亡率为 5.2 / 10 万,病死率为 8.31%。七十年代初、房山区流行性感冒大流行。经北京市防疫站鉴定为亚洲甲型病毒所致。这次流行来势凶猛,波及面广,传染迅速。凡人口居住稠密、而人口流动较多地区、发病较多,传播迅速。仅半个月时间,房山、良乡、琉璃河、长沟、周口店、良乡修造厂、四〇一所、首都水泥厂、长沟峪煤矿,相继告急。仅 1970 年一年,全区就有 65000 多人发病。这次流行、一直延续到 1972 年才基本平息下来。七十年代中期,痢疾、伤寒在全区流行,而且有暴发。1974 和 1975 两年,痢疾发病分别为 14143 和 12811 名。两年共死亡痢疾病人 108 人。主要暴发点有娄子水、南

正、塔照、瓦井、黄山店等村。均属水型暴发。1976年，李庄、长操暴发了伤寒。1978年，南白岱、南河、祖村等村暴发了伤寒。大多为饮水污染所致。

八十年代初，房山区肝炎流行、达到历史最高峰。1980年发病1424人，死亡30人，1981年发病2495人，死亡35人，1982年发病1605人，死亡23人，是历年肝炎发病最多的三年。暴发点(40例以上)有娄子水、四〇一所、沙窝、芦村、崇义、梨村、下中院，均为甲型肝炎。

八十年代中期，斑疹伤寒发病较多。1982—1985年，发病分别为170、127、203例，是防疫站建站以来，斑疹伤寒发病最多的三年。经分析与鼠的密度有关。发病最多的地区有房山城关、良乡、官道、琉璃河、窦店、石楼等平原乡镇。

(2) 传染病防治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身体健康，建国初期就制定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原则。解放后不久，房山、良乡两县就把个体开业医、坐堂医组织起来，成立了医药联合会。随即发动会员，进行了牛痘、白喉、百日咳、霍乱、伤寒等疫苗全民性预防接种工作，并把预防接种工作列为会员义务之一。预防接种工作，一直是卫生战线上一项主要工作，每年都要进行几次。五十年代还发动了全民开展灭犬运动。从六十年代开始，儿童普遍定期服用小儿麻痹疫苗(开始为液体、后改为糖丸)。牛痘苗的接种，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改为定期和普种两种方法进行。定期即是1、6、12、18岁四个年龄组，到时接种，普种是60岁以下的人每六年普种一次。种牛痘工作，一直延续到1982年、中央卫生部通告停止种痘后才停下来。六十年代还使用抗疟疾药物进行抗复发治疗。七十年代开展了麻疹、乙型脑炎等等疫苗接种。

通过除四害、讲卫生、爱国卫生运动的持续开展和广泛的卫生知识宣传；预防接种工作的深入；加强对患者及家属的隔离、消毒、管理等有效防治措施，使全区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大幅度下降。如麻疹、白喉、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乙型脑炎、脊髓灰质炎六种传染病，以五十年代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为100，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发病率分别为42.1、8.5和7.1；死亡率分别为19.9、6.1和4。八十年代比五十年代发病率下降了92.9%；死亡率下降了96%。解放四十年来房山区没有发生过霍乱、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波状热、疟疾、黑热病、炭疽等传染病已在全区消灭。

二、地方病防治：

房山区主要地方病是甲状腺肿(俗称大脖子病)。1958年下半年，防疫站派出两个小组到霞云岭、六渡、十渡和蒲洼等乡进行了地方性甲状腺肿(以下简称地甲病)普查。1979年至1980年又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全民性大普查，普查率达到82.66%。共查出“地甲病”人25365人，患病率为6.43%。全区三十一个乡镇，有二十五个乡镇有“地甲病”人。患病最高的是长操乡，高达26%，最低的有四个乡镇，均在10%以下。从1964年开始，坨里供销社，周口店盐库在食盐中加碘，供应山区人民食用，预防“地甲病”。1980年，防疫站用碘化钾片和针剂对现有病人进行了治疗，治愈9045人，好转11185人，总有效率达79.76%。1981年至1982两年，又用碘油治疗8000例，总有效率达90%以上。1984年6月经北京市地方病办公室验收，房山县“地甲病”已达到控制指标。

1987年7月正式成立“中共房山县委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地办室”。历任领导小组组长顺序是：孟长友、高海量、李庆余、张中兴。办公室主任张玉碧。“地办室”成立后，除对“地甲病”普查普治外，还对全区氟中毒进行了普查，全区共查出氟班牙24936人。在良乡镇东关发现井水含氟量较高。经查该村患有轻型氟骨症16人。1980年由国家、集体和各户三部分资金，从良乡城内自来水塔接通自来水到户后，该病已被控制。此外，在长阳乡进行了肝吸虫病查治。

三、劳动卫生：

房山区煤、石灰资源丰富；石料加工业较为发达，加上区内中央、市属厂矿较多，是北京市有毒有害作业企业较多的区县之一，尤以粉尘为著。1956年，国务院发布(56)国议周字第40号文件《关于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决议。适时，防疫站对工矿并无任何监测设备，只好按规程进行检查指导。主要以防尘、降尘和防暑降温为主。多是会同工会、劳动局，以安全检查的形式进行。1963年，县防疫站明确高福忠兼管劳动卫生工作。同年初，对县内六个粉尘作业厂矿的155名工人进行了调查和体检，并协同北京市防疫站进行了粉尘浓度测定。初步掌握了粉尘对作业工人健康危害情况。1972年，县防疫站由徐会珍、郑德强二人专职从事劳动卫生工作，并先后购置了部分小型监测仪器。从此粉尘作业环境监测，防暑降温，逐步开展起来。同年在房山医院、良乡医院、河北卫生院的协助下，对全县四十六个县属及部分社队厂矿的2782名粉尘作业工人进行了矽肺的普查。共查出I—III期矽肺病人103名，患病率为2.73%。初步掌握了本县粉尘作业工人的健康状况。从此，粉尘作业环境的监测、监督及矽肺病人的复查、管理便成为防疫站一项主要工作。

1978年，由县防疫站负责组织体检，朝阳医院负责照片，对全县的五十一个粉尘作业厂矿的3334名作业工人进行了第三次体检。1984年，县防疫站购进了300毫安X光机一台，同时调入一名专职放射人员，从此县防疫站已完全能承担本县粉尘作业的监督监测工作。中央卫生部安排北京市在1979年4月至1981年4月两年期间内，对铅、苯、汞、有机磷、三硝基甲苯：五种有害物质进行普查。县防疫站于1980年初，对八十五个中央、市属、县属和社队厂矿企业进行了上述五种职业病的普查。普查结果未发现本县境内汞、有机磷、三硝基甲苯生产和大量使用的单位。十四个有铅作业的厂矿，其作业环境均不超过国家标准，未发现铅中毒病人。二十三个有汞的厂矿有四个社办厂矿超过国家标准的20—36倍。体检发现有十七名汞中毒病人，患病率为6.69%。1984年，全国七省市开展了乡镇五小工业的调查。房山县代表北京市参加了以粉尘作业为主的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同年参加了卫生部召开的调查总结会。房山县的调查资料得到了好评。

1982年，受市防疫站委托，县防疫站承担起四〇一所放射免疫盒的邮件监测。1984至1985年，相继开展了乡镇卫生院、厂矿、当地驻军等单位X光机的调查及放射人员的监督监测工作。目前区防疫站劳动卫生科已能做到粉尘环境的监测、作业工人的体检、急性中毒的处理、射线的防护等工作。

1985年底，县防疫站已整理出有关传染病方面比较完整的一套资料，计有：

①自建站以来全县历年各种传染病的发病数和发病率、死亡数和死亡率、病死率，并附有各病每年发病曲线图共十五册。

②按发病月份、年龄、性别、职业、地区分类与综合统计共十册。

③自建站以来各传染病顺位和构成图各一册。

④历年暴发或多发病情图、按呼吸道、肠道、虫媒分为三册。

⑤历年人口资料、气象资料等三册。

7. 区卫生防疫站不仅是卫生防疫业务单位而且是执法和监督机关：

随着我国的法律、法令、条例的日益完善，区防疫站已成为执法和监督机关。到1988年底，防疫站执行的有：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1982年11月19日公布，1983年7月1日试行）。

②《消毒管理办法》（1986年10月国务院发布）。

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1987年4月1日国务院发布即日起施行）。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1987年12月3日国务院发布即日起施行）。

⑤《乡镇企业劳动卫生管理办法》卫生部1987年7月9日颁发农牧渔业部1987年10月1日起试行）。

⑥《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卫生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1987年11月5日颁布，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年1月1日起施行）。

⑦《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工矿企业有毒有害作业卫生监督管理的暂行规定》（1986年2月1日起施行）。

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的暂行规定》（1986年9月1日起施行）。

⑨《北京卞实行消毒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1988年8月1日起施行）。

8. 荣誉

集体荣誉：区防疫站 1959 年曾获周口店区先进集体，1980 年至 1985 年连续六年获房山县卫生先进单位，1981 年至 1985 年，连续五年获北京市卫生先进单位，1982 年至 1985 年，连续四年获县文明单位，1984 年获县先进集体，1987 年获区科技工作先进集体，1988 年获区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区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同年获北京市优秀防疫站、市食品卫生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区防疫站党支部 1983、1984 连续两年获得先进党支部荣誉称号。防疫站团支部，1981 年获县先进团支部荣誉称号，1987 和 1988 两年获房山区先进团支部荣誉称号。1985 年防疫站工会获县先进工会称号。

个人荣誉：

袁景荣 1959 年曾获北京市和周口店区先进工作者称号。

徐凤祥 1959 年曾获周口店区先进工作者称号。

王砚英 1977 年获房山县先进工作者称号，1983 年获全国和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被评为房山县劳动模范。1984 年获市、县劳动模范称号，1985 年获房山县先进工作者称号，1987 年获房山区劳动模范称号。同年获北京市儿童少年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1988 年获市、区劳动模范称号，并获得首都“五一”劳动奖章一枚。

王奎强 1980 年获房山县先进工作者、1982 年获房山县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1983 年获房山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强志华 1980 年和 1981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县级优秀共产党员。

连维全 1981 年获县级先进工作者、1983 年获房山县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工作者称号。

穆宗元 1982 年获县级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6 年至 1988 年连续三年获房山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7 年获北京市优秀监督员、1988 年获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先进个人称号。

燕泽江 1982 年获房山县先进工作者称号。

许书军 1984 年获县级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隋立新 1985 年获地方病防治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罗月英 1985 年获地方病防治房山县先进工作者称号。

白大忠 1985 年和 1986 年，连续两年获北京市文明执法先进个人称号。

王家明 1987 年获区科技进步、先进个人、同年获北京市计划免疫先进个人称号。

张 辉 1987 年获房山区灭鼠先进个人，1988 年获北京市卫生防疫先进个人称号。

张玉碧 1987 年获房山区工会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刘德芬 1987 年获房山区工会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刘克福 1987 年获北京市优秀监督员称号。

张士清 1987 年获北京市计划免疫先进个人，1988 年获北京市卫生防疫先进个人称号。

史登山 1988 年获房山区先进工作者称号。

蔡培生 1988 年获北京市卫生防疫先进个人称号。

果春香 1988 年获北京市卫生防疫先进个人称号。

（《房山文史资料》第 3 辑）

作者系房山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房山碘缺乏病防治

张琼 许淑君 隋立新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许多医学概念被更新。碘缺乏病已不仅仅指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等显性疾病,而被世界公认为导致儿童智力体格发育障碍,影响民族素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碘缺乏病属于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列属于卫生防疫站地方性疾病防治管理范畴。1964年前后地方性甲状腺(以下简称地甲病)防治工作以统一布置、集中行动、人群普查为主;1973年在流行病科中设专人分管地甲病防治工作,并开始治疗病人;1977年增至2人;1978年张玉碧调任防疫站副站长兼房山县委地方病办公室主任,成立地方病科。

早在五、六十年代,碘缺乏病严重威胁我区人民健康。地甲病患病率高达11.5%,儿童甲状腺肿大率高达20.8%,地方性克汀病患病率为0.02%。病区主要分布在霞云岭、长操、坨里、蒲洼、十渡等山区公社。霞云岭乡王家台村郑氏四兄妹,只有大哥是正常人,其二弟身高仅122cm,上炕要蹬板凳,老三是哑巴,小妹是半语子,仅长操乡贾峪口一村就有克汀病8例。当时我区地甲病区有这样两首顺口溜:“一代甲、二代傻,三代四代断根芽”;“得了大粗脖,不能干重活,身强力不壮,参军不合格;影响下一代,聋哑呆傻矬”。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碘缺乏病的状况和病区人民的沉痛心情。1958年县卫生防疫站派出2个小组到霞云岭、六渡、十渡、蒲洼等乡进行地甲病首次普查。1964年和1970年分别在坨里和周口店建立盐库,供应我区西部16个山区、半山区乡镇碘盐,以期纠正碘缺乏状态。当时,由卫生部门提供碘剂,盐业部门负责碘盐的加工、贮存供应。采用人工湿式加碘法,用喷雾器将碘液喷在盐上,人工搅拌,含碘量十分不均匀。而且是大袋散装,碘挥发较多,有的社员根本不认识不买加碘盐,致使预防效果不理想。

从1970年到1983年防疫站对全区地甲病患者情况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普查或整群抽样调查,累计普查达1865951人次,最高的调查患者病率达11.50%,最低为1.42%。见下表:

年 度	普查乡数	普查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1970	27	420585	25077	5.98
1973	31	461594	10644	2.30
1976	16	143555	16555	11.50
1978	19	182170	9119	4.04
1979	31	356993	25365	7.10
1983	20	301054	4282	1.42

1974年为了摸清地质因素与地甲病的关系,防疫站对30个乡镇39个生活饮用水源进行了水碘含量测定,结果显示:西部及北部18个山区、丘陵乡镇水碘平均值仅为 $2.11\mu\text{g}/\text{l}$,为严重缺碘地区,东部和南部水碘平均值为 $25.26\mu\text{g}/\text{l}$,但不稳定,为轻度缺碘地区;小清河、永定河两岸6个乡(葫芦堡、交道、官道、长阳、窑上、南召)水碘平均值为 $46.08\mu\text{g}/\text{l}$,为相对缺碘地区。1983年再一次对26个乡镇317个生活饮用水含碘量监测,进一步验证了上述检验报告,表明我区生活饮用水含碘量与地甲病发病率呈反比关系(即含碘高的地区发病率低,含碘低的地区发病率高),从而确定了我区20个地甲病重病乡。

在抓普查水质检测的同时,从1974年上半年在十渡乡十渡村和西河村进行碘化注射液治疗甲肿试验,共治疗患者45名,剂量为3%碘化钾液2ml,臀部肌肉注射,隔天注射一次,15次为一疗程,持续2—3个疗程,治愈率为44.3%,好转率55.6%,总有效率99.9%。74年下半年至75年对十渡、六渡、蒲洼乡的319名甲状腺肿大患者继续试验,治愈率39%,好转率47%,总有效率86%。

由于3%碘化甸水溶液注射局部疼痛较重,1981年我区采用上海信谊制药厂生产的碘化核桃油肌肉注射2690例,治愈率20.3%,有效率为22.2%,总有效率44.5%,至1982年共有碘化油注射治疗7188例,总有效率达75.5%。1978年上半年在南尚乐乡试用口服碘化甸片治疗甲肿258例,方法:每天碘化钾片100mg(1片),连服10天,间隔7天,连续进行3个疗程,治愈率53.5%,总有效率85.7%。78年下半年在坨里12个大队一所中学进一步试验并对服药方法进行了改进。1980年在全区31个乡镇中开始普治,采用口服碘化钾片30—120mg(1—4片)连服20天,停药10天,复查后进行第二疗程。共治疗25365例甲肿患者,治愈9045人,有效11185人,无效5135人,总有效率79.8%。从1974~1982年累计免费治疗甲肿病人32562例(其中手术9例,服药25365,注射碘化油7188例),总有效率(25666/32562)78.82%。

1978年7月11日房山县下发房发(78)027号文件,批转《卫生局防治地方病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的通知,宣布成立“房山县委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组长孟长友、副组长陈德义、刘占武、刘庆凯;成员许亮、商淑兰、付庚、李春峰、郑志伟;办公室设在房山县卫生防疫站地方病科,卫生局局长刘庆凯兼办公室主任,防疫站站长郑志伟兼办公室副主任。

1982年3月,房办发(1982)009号通知,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进行调整,组长陈芬圃,副组长刘庆凯,成员有徐荣池、张振、徐耕职、宋湘池、王振华,办公室仍设在防疫站地方病科,郑志伟兼办公室主任。标志着地方病防治工作进入了政府行为、部门配合的新阶段。

1980年为了加强我区人民的碘盐供应,区政府决定在闫村建立第三座盐库,至此我区已具备了自供碘盐的能力,但由于加碘方式落后,效果仍不理想。

自1983年全国统一由产盐地直接加碘,我区三个盐库将碘盐分装为0.5和1公斤的小包装销售,禁止大盐和散盐上市,同时于1982年开始对盐库、批发店、零售店等不同层次食盐含碘量进行实验室定量监测和现场定性监测。

由于大规模的防治病人,全民食用加碘盐使地甲病的患病率大幅度下降。1983年对全区20个地甲病重病乡普查301054人,仅存患者4284人,患病率为1.42%,7—14岁中小小学生甲状腺平均生理肿大率为8.07%(最高蒲洼乡20.75%,最低周口店乡1.65%),1984年6月市地办室验收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我区地甲病已达到国家控制标准。

从1984年开始,地甲肿改为人群定点监测,分为轻重病乡(分别为石楼、长操乡)中小小学生甲肿患病情况监测和轻、中、重病村(分别为城关瓜市村、岳各庄乡西周各庄村、长操贾峪口村),在册人口每年普查、采血、采尿,学龄前儿童智力测验,食用盐含碘监测两种方法进行综合评价。

1990年碘盐监测以实验室定量监测和现场半定量监测为主,每月监测量为盐库、批发店50件,零售店25件,社员户25件,其合格标准分别为>40mg, >30mg, >20mg,但经过监测,合格率低,不稳定。

碘缺乏从1990年开始被世界公认为引起人类智力损伤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做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被各国关注。1990年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执行九十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世界宣言行动计划》,提出2000年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上述两文件上签字承诺。1990年国务院第51号令发布《盐业管理条件》,1994年3月国务院第163号令发布《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并批准发布《中国2000年消除碘缺乏病规划纲要》,标志着碘缺乏病防治和碘盐供应管理进入了法制管理阶段。根据卫地病发(1994)第11号文件,在我区聘任3名食品卫生碘盐

监督员, 45 名食品卫生碘盐检查员, 负责食盐加碘方面的卫生监督检查。

根据卫生部等六单位联合发的〔1993〕98 号文件要求, 1994 年在我区 0—2 岁, 新婚妇女、孕妇中开始服用碘化油胶丸做为强化补碘的抢救性措施, 分别投服了 2900 人, 7240 人, 1400 人。1995 年仍以上述三个人群为重点进行强化补服碘丸, 分别投服 7160 人, 2754 人, 131 人。同时将监测甲肿的方法改为概率抽样法, 取消定点监测。投服取 8—10 岁小学生进行 B 超法检测甲状腺体积, 同时做尿碘和食用盐碘含量测量。1995 年我区抽取黄辛庄、刘李店、陈家台、韩村河 4 所小学 321 名学生进行调查(其中智力测验 160 名, 甲状腺 B 超 161 名), 结果显示, 我区 8—10 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 6.2%, 甲状腺体积中位数 3.661cm, 尿碘中位数 199.4 $\mu\text{g}/\text{l}$, 相关儿童食用盐含碘量为 16.2PPm, 各项指标未达到国家控制标准, 仍属于严重缺碘地区。

针对我区 8—10 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高, 碘盐合格率低的状况, 1995 年 10 月以来加大了宣传力度, 连续在报刊办专版, 电视出专辑, 受到领导群众参与和关注, 仅三个月完成了中小學生碘化油胶丸投服 41475 人。1996 年房山区文教卫生委员会联合下发了文件, 把中小學生碘化油胶丸的投服做为每年的常规工作固定下来, 为纠正我区中小學生碘缺乏状态奠定了基础。

回顾 30 多年来地甲病防治取得了巨大社会效益。地甲患病率从 11.5% 下降到 1.42%, 免费治疗病人 32562 例, 治疗成功率达 78.8%。完成了北京房山地甲病区人群 T4, TSH 监测分析。北京市 8—10 岁儿童碘营养状况调查等多项研究工作, 其防治成果得到政府、社会各界和学术界的肯定。1978 年隋立新同志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在辽宁本溪召开的“碘酊局部注射治疗地甲病经验交流会”; 1985 年防疫站地方病科被评为“北京市地方病防治工作先进集体”和“房山县 1985 年先进集体”, 隋立新、罗月英分别被评为全国和北京市地方病防治工作先进个人。

地方病防治工作从手摸眼看到 B 超, 原子吸收、生物材料测定; 从普查到普治; 从卫生防病机构单方专业化到群众参与部门配合的社会化; 从地区目标到李鹏总理向世界承诺; 从行政干预到法制管理, 都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和飞跃。地甲病防治的成果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关怀,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房山文史资料》第 10 辑)

作者均系原区卫生防疫站干部

房山药铺杂记

王凤梧

南大街的“信托商店”(今房山人民商场自行车专卖店)大约五十年前, 是“北永合祥”药铺的位置。坎坑不平的两级台阶上, 罩以前出四五尺的前廊。廊檐和椽头已成朽木, 檐瓦摇摇欲坠, 不摇亦欲坠。再加上太低, 进铺的人上台阶前就得先低头, 两间门脸儿, 不镶玻璃只糊窗纸……

矩尺形柜台长约五六尺, 宽约二尺。台上放着高约六寸、宽约一寸多的木质立方柱。这立方柱用上等木材做成, 桔黄色, 除两端断面空白, 那高的四面全工笔写着常用的“汤头”(处方), 这样的立方柱柜台上多

至三、四条，用它镇压抓药人的处方。

外柜两间屋靠墙一面满是药橱。橱置的药匣(抽屉)与今天的无异。学买卖的按主“抓”药，放于小戥(deng)盘上，觑起眼看戥杆上的铜星(称星)，丝毫不确……药称好，戥不放，另一只手从拦柜里取一方白纸铺好，再取一粉色小方纸置于白纸之上——这小粉色纸印有这味药的形状、性质、功能、制法、产地……叫做“内票”。每味一包，大小不等。个处方到十几味(包)，取印有“本店”标记的更大的一方白纸铺平，然后把十几包小包分层迭起，用大纸包好后，把原来的处方摆好按于包顶而后系之以细麻经……它大体是小顶、大屁股形的立方，来人付钱后，卖药的提包相递，面色诚挚，自信：“这一服，(病人的病)就好了!”一句话只六个字，有对患者的祝愿，也有对“处方者”，尤其是“自家”老店货品的肯定和褒扬!

药铺的里间“里柜”，坐着掌柜和“主方”先生(掌柜和先生常是一人兼任)。病人亲自就诊者被接待进里柜，土炕上置一小炕桌。先生与病人坐分左右。望、问、闻之后，病人将手腕放于油腻光亮已不见原来蓝色的小布枕上，先生就双眼似睁似合、忽睁忽合地“切”脉了。切脉之后已胸有成竹，而后白纸墨等，或振笔疾书或皱起眉头一笔一画地开方……有些“先生”能开方治药，自家却不设药铺。开好方子告诉病家：“到××药铺去抓!这叫“卖”方子。”其酬劳费用不必病家支付，或年或节由卖药的药铺累计付与开方人——他们互守信用，常常毕生相交……

和北永合祥相对的还有南关路西的南永合祥。这两个“永合祥”皆为南关陈氏开设。南永合祥的大门过道亦是陈宅的过道，门悬一匾，文曰：“岐黄仁术”。幼时不解其文，及长有所揣测：《黄帝内经》全以黄帝问、岐伯答的形式写成，对人类的“广施仁术”即在其中了。

北永合祥的郭先生那时已五十多岁，终年穿一灰色长袍，大个儿，大方脸膛，红光满面有短须……医术高超，济困扶危……在方里亦得传为美德。

如永合祥之规模的药铺，还有北街的恒隆泰、裕升泰(绰号小药铺)，更以后又有了南街路东大生堂。

除上述县城和几个“重镇”的药铺之外，平原乡村的“药铺”即使有，亦寥若晨星了，山区就更不在话下……

“七七”事变后，房山县城沦陷，县城东街路南(今房山中学西北角)的“新民会”前院，设了一个“新民诊疗所”。主持它的是“金先生”(后来是保安队总队部的军医)。说是西医诊所，两间屋内也只摆了些消炎膏、伊比膏、红药水之类……虽然简陋，也算是最早、最大规模的“洋医”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原良乡县的畜牧兽医事业

郭云祥

解放前良乡地区兽医事业很不景气，原良乡县108村正式开设专业兽医诊所的只有郭福广1人，叫做福顺兽医诊所，郭原籍为河北省饶阳县邹村人，是兽医世家、当地名医。其余的多为自学的农村兽医和个体剽骗人员。

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兽医事业的发展，于1950年良乡县成立卫生协会，吸收全县人医和兽医从

业人员入会，并派我任协会副主任分管兽医工作，1952年又成立了兽医联合会，由我任主任，姚福胜为秘书长，陈苍为二区主任，王警芝为三区主任，会员有李克臣、郭世昌、郝继斋等14人。实际是以四大家为主，配种员有赵德明、李眠等4人，种役兼用。

兽医联合会的成立，把所有兽医人员不论是专业或半医半农的都组织到了一起，使单独行医的人员有了自己的组织。并制定了会章和证章，明确了权限和任务，组织领导全县兽医人员担负起全县防疫工作以及技术的研讨和发展等事宜。

畜、禽防疫为西医的工作，只有一般中兽医知识的农村兽医人员当时对注射器的结构和使用还都是新鲜事物。由于我向解放军兽医部门学习过西医知识和一般器械的使用，自然成了这些人员的教师，并逐步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畜禽防疫工作，使当时畜禽疾病流行猖獗死亡严重的问题得到了逐步控制。为畜牧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得到了人民政府奖励的锦旗一面，同时，良乡县被评为通县专区防疫先进县。

合作化时期，1954年良乡县成立了第一个联合诊所，即良乡县联合诊所。我任副主任。1956年随着合作化的深入发展，政府又把全县兽医人员全组织起来，做了统一调动安排，成立三个联合诊所，良乡县联合诊所，由我任主任，成员有李克臣，杜凤山，贾恒锦，张俊学，赵秀忍，郝瑞林，张德昌，郑秀英。二区魏各庄联合诊所，由陈苍任主任，成员有陈德明、吴凤章、李学英、王克良。三区交道联合诊所，由郝信任主任，王警芝为副主任，成员有王文太，郝瑞丰，王淑贤。此后，1957年成立了良乡县兽医站，由杜铎任站长，成员有刘惠文，李同春，杜兴述，孙作珍，并建立了门诊部。同时兽医联合会也宣告结束，全县联合诊所也做了很大的调整，良乡联合诊所撤销，在大紫草坞成立了联合诊所，由郝瑞林负责。还成立了交道联合诊所，琉璃河联合诊所，魏各庄联合诊所，葫芦堡联合诊所等共四个诊所。初步形成了分区联络网，分管各区疫病防治工作，长阳农场其场内兽医人员完全由农垦局指派。

1958年房、良合并后又有较大的变动，有一批兽医大专毕业生充实到县站和基层站，这就使全县兽医队伍的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技术、用药上普遍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在疫苗控制和重点传染病防疫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当时畜禽疫病流行的种类有：炭疽破伤风、马毕疽、马传贫、马腺疫、手饰病、猪瘟、猪丹毒、猪肺疫、仔猪付、伤寒、猪气喘病、仔猪红白痢、猪流感、鸡瘟、鸡霍乱、马立克、鸡球虫病、鸡白痢和鸡痘等。其中炭疽病有些村很严重，如南梨园村连续三年死亡骡马10余头。琉璃河马车队1952年发生炭疽，110余头阳性马，死亡6头，因人吃死畜肉感染3人，死亡10人。交道乡六股道村于1950年因一头患炭疽驴死亡，在井台洗肉其污水流入井内导致数10人吃了井水后受到感染，有10人死亡，全村哭声连天，惨状目不忍睹。

其余零散发病村还有，大苑村，炒米店等近20个村。

马毕疽村村都有零散发生，但以炒米店村最为严重，曾结合北京市兽医站作为重点防治村，观察治疗达一月有余。

其余畜禽疫病可以说遍布全县每个村，尤其是猪痘、猪丹毒、猪肺疾、猪气喘病、鸡瘟、鸡白痢、猪红白痢等病，每年都有大量发生死亡严重，给养殖业造成损失，但在政府的指导与重视之下通过全体兽医员的努力，终于在五十年代中基本消灭。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五侯业余剧团建团始末

赵润东

京剧是清末才兴起的舞台艺术。清末，京剧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在舞台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京剧艺术的发展对民间艺人的说唱艺术也是一个促进。随着京剧这一剧种的兴起、发展以及艺术的日臻完善，郊区群众文化活动也不断丰富起来。在房山区域内，起初乡村群众文化活动主要以庙会走会为主，到了民国年间业余剧团纷纷建立。每当庙会和春节之际，各村剧团都要组织演出。这期间，商贾云集，贩摊林立。而民间贸易，文化娱乐的往来交流自然有了极好场所。自民国年间至建国后，房山区内的各种剧团组织分布较广，幅射面宽，现就建团较早，影响较大的乡村剧团——五侯村业余剧团的组建，发展、兴盛以至解散几个阶段之情况作一简要概述。

五侯村位于房山城西南二十五华里处。它地处平原，西面是古老的佛门圣地天开寺与苦修禅院上方寺(即在上方山)，村南即与涿州辖属北务村相邻接壤。由于地理环境及人口众多等诸多原因，自然形成周围村落文化交流、事务往来之中心。这给五侯剧团的产生创造了优厚的条件。

五侯业余剧团初建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主要以演唱京剧为主，同时兼演梆子，而村中戏剧艺人表演献艺远非始于民国年间。清代以前已难查考，但之后情形代代相传，有口皆碑。据戏剧曲艺资料记载，京剧素有“国剧”之称，至今已有近二百年历史。早在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皇帝作八十大寿时，就曾诏令安徽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著名徽班进京献艺。徽调为二黄腔，唱词通俗易懂。于是很快就在京城赢得了观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徽班又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他们相互影响，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还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至清末，便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的表演体系。根据五侯村的具体情况来看，组建剧团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它不仅村庄较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而且工匠艺人样样俱全，且各在外奔走谋生。清末村中的铜锣会、杠箱会、吵子会、炮会等，赶上庙会便赶场表演。此外另有一班吹打人员(吹鼓手)，十里八乡遇上红白喜事，便邀请这班人员前去庆贺或治丧。事上，吹打拉弹，有时带唱，鼓乐喧天，声势浩大，引得村老妇孺蜂拥而至。这帮吹打演奏人员边奏乐边演唱(座腔)，根据不同嗓音，演唱不同的曲调。这给以后剧团演员的唱腔，角色等表演奠定了基础。这支队伍直至民国年间仍十分活跃。为了丰富村中群众的娱乐生活，村中长老金满堂(1893年—1948年)挑头组建剧团(当时称戏班子)。李四爷被邀请为老板(教练)。李老板，名华春，(清末—建国前)本村人。排行第四。因打鼓闻名，人送艺名“快鼓李四”。其父早年唱戏，他九岁开始学戏，同时随父练习文武场(演奏乐器)。民国年间，李四爷走南闯北，常赶场帮戏于北京、天津、涿州等地。冬季农闲时，便到北京广德楼戏园给武生杨小楼等打鼓，同时还在涿州、琉璃河、窦店等地传授技艺。当时，方圆几百里内提起“快鼓李四”无人不晓。李四爷为人朴实忠厚，待人和善亲切。起初教座腔。练座腔即围着桌子沏上茶坐在板凳上演唱。四爷耐心细致，循循善诱。演员很快对戏剧产生兴趣且刻苦练习。待座腔练得基本成熟，再排练舞台做派。李四爷教戏多年，为五侯剧团及附近友邻剧团倾注了不少心血。建国前，李四爷已逾古稀之年。由于

一生奔波，积劳成疾，后即辞世。李四爷的去逝无疑是五侯剧团的一大损失。全体演员们都痛心不已。现在，五侯村年长些的老人提起“快鼓李四”仍赞不绝口。

五侯业余剧团初建时一无所有。金满堂四处走访化缘。他曾先后到尤家坟东高家(地主)、周口村杨茂家(地主)等处捐钱，说服本村有钱及喜好戏剧的户主，出钱购买乐器，置办道具服装，提供排练场所和照明所用灯油器具等。如郭广瑞好戏，自愿出钱买了家伙(乐器)，宋堃花了四千块钱买了服装。为了让儿子学戏，还专给儿子买了一身靠，而自家生活拮据，精打细算，没有灯油就摸黑。这样的人家很多，都自发捐钱献物，提供排练场地，积极支持剧团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村中有郭克桩、宋祥、宋振兴、王彦、王桐、王立文、胡林、胡老先生、郭五爷、李斌、贺有贵、郭敬亭、金印成、赵子祥等几十户捐款资助剧团。后来被村中百姓称为箱头。(负责剧团组织、费用支出等各项事物)。在众人的积极支持下，五侯剧团很快诞生了。剧团建立后，凡参加排练的人员，每人每晚交剧团三个小镜(铜钱)灯油费。最早参加排练的演员有：王青、王润堂、杨寿山、赵银、贺广祥、王甫、郭俊臣、郭文采、邢福兴、杨景富、马玉海、王浩、王全、林春、赵忠、邓全、孙氏泰、王见等三十余人。经过老板(导演)教练和演员共同努力，五侯剧团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八月初一正式在本村戏楼演出第一出戏。该剧名为《盗御马》。参加演出的主要演员有：王青工黑头饰窦尔敦，丸子红工武生饰黄天霸(此人系琉璃河人，当时北京戏班子演员大都比不上他的表演艺术，因其家中做丸子生意，故称丸子红)，杜中义(琉璃河人)也饰黄天霸。他们的唱腔，做派深受良师传教。天赐佳喉、声音宏亮。听他们演唱，如饮清醇之甘泉，令人赏心悦目。看他们的身段和武功，似流星赶月，气宇轩昂声腔激越。文武场由李四爷、李庆春、王浩、王八爷等人操持，锣鼓喧天，动魄惊心，琴箫乐曲，别具一格。该戏连唱四天，而每日台下爆满。此年正遇发大水闹灾荒，许多避难逃荒之人汇聚台下，看了演出均惊叹不已，那真是观众台下掌声迭起叫好声连成一片。

戏剧演出需勾画脸谱。而脸谱又是我国传统戏曲中的一种独特化妆程式。根据剧情人物的身份、职业、个性，年龄等不同情况，形成了一系列固定的花纹，眼神，色块等程式。从而既切合了人物表演的需要，又进行了符合剧情的艺术夸张。脸谱的色彩分为红、黄、蓝、白、黑、绿、粉、紫、肉色、金色和银色等多种。其中红表示“忠”，白表示“奸”，黑表示“刚正”，绿表示“草莽”，黄表示“残暴”，蓝表示“侠义”，金银色表示“神妖”。五侯剧团初建时自己勾脸还有一定困难。请来的化妆师系新城人，绰号“花脸柱儿”。此人擅长演花脸，表演技艺很高，而且精通各种脸谱。后来，剧团又从南章村请来胡画匠，人称胡老板。此入主要以画李逵、华子芳脸见长。每当演出，他们都不辞辛苦，前来为演员勾脸。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和对戏剧艺术的理解，演员们逐渐掌握了勾画脸谱的一般规律。后来，勾脸一般由丑角演员郭文采或其他演员自己完成。

剧团经过五、六年时间的练习，演员大多掌握了戏剧常识且能登台表演。以后队伍逐渐扩大。参加剧团的人员由起初的三十余人发展到后来的百人有余。这些人员绝大多数为本村贫苦农民，他们把排练戏剧作为日常生活中特别是文化娱乐生活的一大趣事。农忙时躬耕垄亩，闲暇时登台演唱。吃了不少苦，练得一身功夫。当年，南甘池刘月洲、西甘池张子华等来五侯看戏，边看边闲聊。张后来说起想到北京戏园子请戏尽兴。刘月洲道：“上哪儿请去?你看这戏多好哇!”之后决定邀请五侯剧团去甘池唱戏。同年，五侯剧团应邀去南甘池村献艺，以此“贺桥”(即为甘池桥落成庆贺)。此次演出为五侯剧团第一次外出演戏。一场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四方村民的赞赏，博得了满场观众的欢迎。之后，四甘池慷慨解囊特为剧团赠送了较为贵重的门帘排帐，以作酬谢。此后，五侯剧团名声大作，士气高昂，为后来剧团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建国前，社会动荡不安，加上连年灾害，百姓四处逃难求生，民间艺人流落他乡。李四爷去世后，五侯

剧团仍坚持排演。

1946年，经本村艺人李四爷次子李路介绍，张老板应邀来到五侯落户传艺。此后，该团发展壮大，表演艺术进一步提高，从而达到高潮。

张老板，名德甫，艺名“金骡子”。河北省新城县七里铺人，青年时代主工河北梆子，因倒呛（换嗓子）改说大鼓书。此人学艺刻苦，坚持不懈。一年有余，竟奇迹般地喊出嗓子。之后不唱梆子改唱京剧。张老板嗓音宽厚宏亮，做工火炽细腻，舒展大方。舞台表演，有神有色，声情并茂。对人物、剧情等研究透彻，达到炉火纯青之地步。张老板集表、导演于一身，不仅具有精湛的表演艺术，而且对文武场的设计也掌握得十分娴熟。因而深得广大群众和弟子们的钦佩与敬重。为使张老板长期留下来，土改时，五侯村给张老板分了房屋和土地，在生活等方面也照顾得较为周到。

张老板戏德高尚，执教严谨。为五侯剧团培养了不少的优秀青年演员。继剧团初建时年长演员之后，又涌现出的一大批青年演员他们是：金印田、宋哲茂、惠连、惠旺、惠福、郭贵、郭宗仪、郭宝成、李振民、李庆江、李庆红、林永贵、林广月、赵广富、魏连、沈鸿喜、罗振兴、来志明、邢财、张俭、王旭、肖哲、金印臣等。

戏剧中，人物分生、旦、净、末、丑等行当。在五侯剧团中，各种角色具备，且表演较为出色。他们为：工青衣的是赵银、贺广祥、林春、孙长泰、惠连等；唱花旦的是郭宗仪、来志明、罗振兴等；学彩旦的是王润堂；练须生的是马玉海、王甫、李振民等；老旦是杨景富；老生是王书文、邢财、邢福兴等；武生是宋振生、林广月、王见、赵广富、李庆江等；丑角是郭文采、沈鸿喜、张俭等；大小花脸是王青、王旭、王志强、林永贵、金印臣、郭宝成、李庆红等。

文武场的情况为，文场有李路操琴，执堂鼓（该人为李四爷次子，以拉大弦而闻名。解放前在天津河北梆子剧团。解放后，该团改为天津小百花剧团。李为著名青衣刘湘玉、胡二生高明利琴师。五十年代病逝）。郭俊臣（解放前曾在北京卖票演《顶灯》独一个）、王全等吹笙笛、唢呐。武场由张德荷（老板）执鼓，王浩打大鼓，王甫打钹，李凤春、马财等（文武场均内行）随时替补。

五侯剧团演出时间一般于庙会、春节时进行。庙会时间为：三月初八五侯庙，三月十五兰家营庙，四月初八周围村镇琉璃河庙，四月十五石窝庙，四月十八天开庙，四月二十房山药王庙，四月二十八西营庙，五月初一长沟庙，房山城隍庙，五月初五仙坡庙，五月十三码头庙。根据各村镇及庙会邀请，剧团便打点行装前去献艺演出。据不完全统计，该剧团先后演出的地点有附近的天开、四甘池、三岔、长沟、南、北尚乐、七贤、西营、崇义、曹章、吉羊、大次洛、娄子水、顾册等；较远的为坨里、东矿、丁家洼、怪村、轱台、良乡、窦店、交道、涿州、蓝家营、房山等。

剧团排练演出的戏剧主要为京剧，同时兼演梆子。其大小剧目达一百三十余出。计为：《牧虎关》、《艳阳楼》、《摇钱树》、《白马坡》、《战长沙》、《白水滩》、《百草山》、《顶灯》、《进长安》、《五鼠闹东京》、《莲花湖》、《九江口》、《华容道》、《斩马谲》、《盗钩》、《连环套》、《金雁桥》、《夜战》、《武家坡》、《野猪林》、《捉放曹》、《失空斩》、《黄金台》、《通天荡》、《巴家寨》、《四进士》、《刀劈三关》、《独木关》、《举鼎观画》、《青锋山》、《梁山泊》、《逼上梁山》、《战坡口》、《狮子楼》、《淮都关》、《落马湖》、《青凤寨》、《郑州庙》、《溪皇庄》、《杀庙》、《战马超》、《坐宫》、《两狼山》、《秦香莲》、《三岔口》、《银空山》、《李逵探母》、《盗御马》、《四劝》、《空城计》、《钓金龟》、《赤桑镇》、《文昭关》、《法门寺》、《宝莲灯》、《杀驿》、《战冀州》、《盗仙草》、《卖绒花》、《打灶王》、《双吊孝》、《对银杯》、《铁弓缘》、《血手印》、《杀狗》、《汾河湾》、《打渔杀家》、《大上吊》、《大登殿》、《双官诰》、《忠孝牌》、《教子》、《钉大缸》、《喜荣归》、《杀子报》、《五雷阵》、《盘道》、《望乡》、《桑园会》、《三疑记》、《烧骨记》、《南天门》、《闯山》、《砸京堂》、《拜山》、《断后》、《古城会》、《凤鸣关》、《清官册》、《悦来店》、《伐子都》、《大葬山》、《伍子胥逃国》、《柜中缘》、《五梅驹》、《铡美案》、《牧羊圈》、《辕门斩子》、

《四郎探母》、《玉堂春》、《逼宫》、《碰碑》、《鞭打芦花》、《挂画》、《背娃入府》、《二进宫》、《铜锣报》、《女起解》、《男起解》、《三堂会审》、《秦琼发配》、《卧龙吊孝》、《红逼宫》、《草船借箭》、《盗仙草》、《姑子出家》、《罗汉钱》、《算粮登殿》、《农民泪》、《小上坟》、《小二黑结婚》等。解放后，五侯剧团又积极配合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传，促使各村土改运动加速进行。如当时吉羊、曹章等村土改有困难，上级组织便派五侯剧团前去演现代戏《农民泪》。台上表演形象逼真，台下观众痛哭流涕。广大群众由此受到深刻教育和启发，从而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剥削产生憎恶之情。事后，村中土改工作顺利完成。张德甫老先生建国前来五侯村，解放后被北京某剧团请走。1952年正式携家眷迁往北京。据记，北京河北梆子剧团、青年剧团，娃娃科三个团，张老先生均任过团长。他去世后，其子张喜增任北京青年河北梆子剧团司鼓至今。

三

五侯业余剧团经过组建、发展、高潮阶段之后，虽然也红火一阵子，但逐渐萧条走上下坡路。张德甫老先生走后，剧团又请来了郭老板。张老先生以文戏见长，而这位郭老板以武戏著称。这正弥补了剧团中武功表演之不足。后来，对五侯剧团倾注了满腔心血并怀有深厚感情的张老先生，又曾几次回来与郭老板通力合作，教授技艺。这给剧团演员的文唱武打表演艺术作了精辟指点，从而使之更加完善。郭老板，名信永，新城县郭家村人。以教授戏艺落户于涿州市蓝家营村。该人系保定府信顺合戏班坐科，与著名京剧大师周信芳为同窗师兄弟。当年，郭信永先生主工武生造诣颇深。来五侯后，传授技艺多年。他执教严格一丝不苟，手把手教授并纠正表演动作。经他耐心辅导教练，又培养出一批朝气蓬勃的少年演员。这样，五侯剧团形成一支富有生机的老中青俱全的表演队伍。此时期，五侯剧团队伍精干，阵容整齐，表演艺术闻名远近。

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掀起高潮。初级社、高级社成立后，主要发展集体农业生产。广大群众均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些身为青壮劳力的演员，再如先前那样整日在剧团里排练节目就有了一定困难。再以后，剧团的开支演员的报酬等一系列问题也相继产生。但是，尽管如此，剧团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特别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推陈出新，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中仍起了重大作用。当时的演出，每年一般在春节时演唱三天。配合征兵，为欢送新兵入伍也要演出。开始时，演出前三个月开始排练。后来，改为前一月排练。排练一般占晚上时间。演出后由集体为演员记些工分作为补助和报酬。这样的组织形式持续到1964年大“四清”，剧团无法继续，宣告解散。

五侯剧团从组建、发展到高潮，乃至解散，近三十年间置办了一大批较为贵重的服装道具，根据舞台表演需要，文官袍，武官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珠宝服饰以及平民百姓的披风、便服，样样齐全。这些财产，一部分来自本村箱头捐钱添置，其余大部分为邀请单位所赠送。当年，涿州市蓝家营剧团与五侯剧团均为郭信永先生执导。两家不分彼此。行头道具谁用谁拿。建国后，蓝家营剧团又持续多年。因而五侯剧团的道具、行头等被对方借去很多。剧团到解散前又遗失较多损失较大。既使如此，在六十年代，剧团里仍有四蟒六靠，蓝红官衣团龙马褂，老公巾，大小把巾各数套，彩裤数十条，彩鞋、朝靴数十双，盔头几十顶，大小帐子多顶，幕五道，大汽灯五盏，刀枪把子、围桌椅垫及台帘台毯等装满三个大戏箱，五个大圆箩，饰头三十二件，龙钗凤戟四箱……。

到了文革时，清点戏箱，服装道具仍有二百八十二件。破四旧和两派武斗时，几十件彩裤被东拿西扯，所剩无几。至此为上，二十几家箱头和剧团人员苦心经营近三十年的剧团所积攒下来的价值四、五万元的家当亦随之毁灭。

漫话取材于房山的戏剧

赵润东

戏剧为我国的艺术奇苑，而京剧又被称为“国粹”。那么，传统的艺术表演形式有多少取材于房山的历史呢？

最早的应算戏剧《昊天塔孟良盗骨》。这部戏取材于北宋时期杨业的事迹，根据南宋时说话人说话材料“铁骑儿”中的“杨令公”等名目编写，至元代形成戏剧，原名为《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杨业传》）。杂剧中演述杨业死的经过。他与番兵交战，困在两狼山虎口交牙峪，（又一说法：当年宋辽大战于金沙难，杨二郎替死北宋主，杨二郎替死八贤王，三郎马踏如泥土，四郎、八郎失落于辽邦，五郎出家五台山，七郎回朝搬救兵，被元帅潘仁美绑在花椒树上，攒箭射死。）宋军里无粮草外无救军，杨业撞李陵碑身亡。番兵将杨业尸首焚烧，把骨殖吊在幽州昊天塔尖上，每日轮一百个小军，每人射三箭，名曰百箭会。这骨殖日间挂在塔尖上，到晚间取将下来，装在小匣，收藏于方丈室，以防贼盗窃。孟良与杨景夜间潜入将骨殖偷回。辽将韩延寿追杨景至五台山，被杨五郎打死，泉下韩延寿首级，在其父骨殖前祭献。剧中塑造了杨业保卫国家收复失地的爱国形象，同时也表达了人民热爱杨业的心声。无论宋元评话还是戏曲，无论从山西代州还是到河北幽州，均谈到良乡昊天塔孟良盗骨之事。这虽属艺术创作，但毕竟给古地良乡带来了神秘的色彩。

戏剧《五梅驹》又叫《杀寺》、《挂画》，该戏演的是明朝嘉靖年间，将军杨继盛戍边吃紧，令女儿杨金花去西凉国搬兵，路过金鸽坡寄宿玉皇庙遇和尚强行买马的故事。长沟镇北郑村西原有上寺“千佛寺”，人称玉皇庙。该庙修在金鸽坡上，二层殿宇。一层正殿有玉皇大帝及十八罗汉像，东西设僧侣禅堂。

二层称崇福寺。当年庙产 200 亩地，僧人几十位。戏中杨金花所骑宝马五梅驹，即肚皮下、两屁股蛋上、两前腿根脖子下呈五块白毛，似梅花状，故称五梅驹。是夜，寺中和尚看中宝马，便拨开房门，给马又是梳洗，又是加草添料，自语道：“马是好马，到不了帅家之手也是枉然。”于是非买马不可，如不应许，便有“麻绳一条、钢刀一把。”杨金花无奈，想起临行前爹爹交给的画轴，展开挂在墙上。原来是继盛爹爹画像，她和老管家跪拜画像。和尚一看，也跪地磕头，并且说：“恩官到了，恩官到了。”问清原由，和尚述说被奸贼严嵩所害和被杨继盛将军救出的经过，并热情款待杨金花，送其赶路搬兵。该戏于 1939 年由五侯剧团排演，在北郑村等地演出。北郑村上下寺已不存在，玉皇庙毁于咸丰年间，由地痞花脸王五放火焚烧，而寺中大钟现在保存完好。上年纪的村民经常谈起《五梅驹》的故事。

戏剧《屠夫状元》演述的是明朝年间的故事，据《上方山游览》介绍，该戏发生在上方山一带。戏中塑造的人物胡山是个淳朴可爱、见义勇为、嫉恶如仇、不畏权势的屠夫，在去古刹上方寺的路上，忠臣之后党金龙金榜题名后，为保官保命，竟然认贼作父，投靠奸臣杨猎。党金龙在去上方山兜率寺还愿路上遇到胡山，不但不念胡山救命之恩、慷慨解囊相助之德，反而将胡山乱鞭赶走。党母朱氏前来相认，也被诬为“乡野疯婆”，一脚踢落桥下。朱氏被胡山所救，见其善良朴实，即将女儿许与胡山为妻。后来，胡山揭榜献珠，被封为西台御史（职权专主纠察，明清两代仅存监察御史，分道行使纠察），将残害忠良之贼杨猎和为作虎伥之徒党金龙处以死刑。该戏在各地演出后，曾引起从众游客对上方山的兴趣。在古戏中除上述外，据说还有《金平银平告状》、《白马告状》、《丁香割肉》等，它们分别取材于良乡、霞云岭、南章等地，并公演于房山境内。

古戏中房山的忠烈故事固然充满激情和正义，令观众赞叹不已，而反映房山人民现实斗争生活的剧目则

更鼓舞人心,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房山具有鲜明时代感及代表性的人和事也曾被搬上银幕或舞台,并引起轰动。

电影《红色背篓》创作公演于1965年,根据六十年代的房山“背篓商店”改编。“背篓商店”是当时周口店供销社的一个分销店,也是黄山店公社范围内唯一的一家分销店。黄山店地处群山环抱之中,沟谷纵横,全公社540余户2800余人,分散在山腰五十多个居民点。分销店六名职工,在王砚香的带领下,几年中背六七十斤重的篓子,爬山越岭,送货上山。又收购,又卖货,这种收售结合的办法被当地农民誉为“背篓商店”。1965年,北京市委发出《关于号召学习“背篓商店”的通知》,同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华北局转发了北京市委的通知。6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充满革命精神的“背篓商店”》,详细报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8月,北京出版社将这篇通讯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同时改编成电影《红色背篓》。

电影《红色邮路》于1965年拍摄上演。影片记述的是当时县劳模、北京市劳模任成水的事迹,任成水是解放后房山第一代投递员。1951年至1953年,他分管房山、周口店、蒲洼等西部山区40多个村庄的邮件工作,往返6天需翻越80个山头。1953年7月起又担起由房山、丁家洼、坨里至南窖、英水的邮件工作,4天往返一趟,1956年调到河北镇邮电支局工作,一干就是17年,每天步行百余里山路,一年达4万余里。他不管风吹雨淋,及时把信件投递到用户手中,以优质服务的态度赢得了人们的信赖,被誉为“铁脚板”。1961年《人民邮电报》报道了他不为名利埋头苦干的先进事迹,并配发《做一个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的社论。1965年7月1日《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山区铁脚板——任成水》的文章,同时发表《随时随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社论。当年5月,他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红色邮路》公演于全国。它和《红色背篓》的原形事迹分别成为六十年代房山著名的十二面红旗之一。

现代评剧《血沃红花》,由剧作家刘敏庚执笔创作,1992年中国评剧院一团排练演出。其剧情反映抗日战争中平西抗日根据地房山老区一带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剧中表现了民兵队长于耀宽的妻子宁可饿死新生幼儿也要救活八路军伤员的崇高精神和形象。这一艺术形象的原型即革命老区霞云岭乡上石堡著名战斗英雄于振边、隗合宽。这部戏还记述了抗日军民采取一切办法,削弱瓦解日军,如插樱花于日军驻地以引发日本士兵思乡之情。该戏在北京房山等地演出后,引起京郊人民特别是老区人民的回忆与共鸣,激发了热情和斗志,教育了青少年一代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反映现代题材的电视剧《犟种》也是发生在房山的事情。导演白唐即本区芦村人,原名刘文田。他于1959年考入电影学院导演系,曾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冲击。落实政策后恢复工作,经原周口店老教师张永昌举荐从事导演工作。《犟种》是他恢复工作后导演的第一部电视剧,该剧围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所发生的变化来写,记述了农民在理解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后,认准方向不怕曲折和坎坷,最终走上致富道路的经过。该片以房山城关镇马各庄村种菜专业户为原型材料,1987年正式上演,曾引起广大观众强烈反响。

除上述剧目外,还有反映房山古文化、旅游开发区等一系列的电影、电视专题片。这对弘扬房山文化发展房山经济都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房山古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它激励着房山人民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解放初期的葫芦垩区孛生评剧团

唐占忠

解放后，随着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对文化生活也有了普遍要求，文化馆、电影放映队、剧团等文化事业机构在各地以不同形式、不同规模创建和发展起来。当年良乡县第四区葫芦垩南十八村里有两个评剧团一同问世，脱颖而出。那就是窑上村和官庄村评剧团。因为它们创建和发展是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同一领导，同一剧种，关系密切，所以得名孛生评剧团。那么，它们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呢？

1948年底，第四野战军从东北入关休整。当时驻扎平南窑上一带的部队，每天早晨上操后，战士们有的扭大秧歌、打霸王鞭，有的练唱歌，热闹非凡。村里群众围着看，青年人跃跃欲试。窑上村教师邵化民、官庄村教师卢绍武分别和部队联系，请文艺骨干在白天教学生扭秧歌和吹号，晚上教识字班的青年唱歌。一个军教民、民学军的文艺热潮很快开展起来。部队南下后，学生们在学校老师扶植和村干部的支持下，两棵文艺之花茁壮成长起来。每当村里或区里有什么活动，两个村的鼓乐队、秧歌队便及时到场助兴，逐渐形成了两支极有生气的文艺团体。

当时，良乡县已建立了文化馆，规模虽不大，人手又少，但在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引导群众开展文艺宣传方面却起了很大作用。一些文艺团体如窠店、琉璃河、交道村河北梆子剧团很快发展起来，对窑上和官庄影响很大。当时四区区委书记顾宪图下乡经常住在这两村，对它们办剧团大力支持并亲自抓活动。他首先取得县文化馆的支持，从那里找来各种宣传材料，请文化馆人员作业务指导。在组建秧歌队、鼓乐队的基础上，选拔有歌唱表演能力的青年排练歌舞剧如《白毛女》、《兄妹开荒》等。这时，以窑上村支部书记邵书培、小学校长邵化民和官庄村支部书记潘林、小学教师卢绍武等为主要成员，分别成立评剧团领导班子。采取“村办民助”办法，即村里办剧团，广大村民筹集物资。孛生评剧团创建后，先后排练剧目有《小二黑结婚》、《小女婿》、《刘巧儿》、《新事新办》、《艺海深仇》、《罗汉钱》等。

由于区政府重视，村干部支持，文艺爱好者积极参加，广大群众热爱，领导对办好剧团信心百倍。为了提高演员的艺术水平，他们采取了派出去请进来的措施，派演员自费去北京天桥评剧院以看戏形式模拟学习演员的表演技能，以提高自己；邀请大兴县定福庄评剧团、涿县长安城评剧团到本村授艺演出交流经验。另外，每当“三八”、“五一”、“七一”、“十一”节日，区里有什么大型活动，孛生评剧团一马当先去葫芦垩演戏。逢年过节，本区或附近村只要打招呼，孛生评剧团就去轮流义演。每年三月二十八涿县南定庙会，四月十五涿县北蔡庙会，五月十三涿县码头庙会，孛生评剧团总要到会与兄弟剧团同台或对台演戏，进行艺术交流活动。由于孛生评剧团思想作风硬，组织纪律严，演技较高，可跟一些专业剧团媲美，因此，很受全区和周围乡里百姓的喜爱和欢迎。

1956年以后，由于一些企事业单位招工，有些演员参加了工作，还有的演员被外县国家剧团招走等原因，孛生评剧团不久散伙了。然而，在解放初期葫芦垩区孛生评剧团在活跃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今葫芦垩地区人民提到孛生评剧团时还引以自豪。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解放初期的饶乐府村评剧团

张广文

1948年12月房山县解放了。经过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全县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到1951年下半年，抗美援朝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解放以后的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生产热情高涨，生活明显改善，文化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距房山县城东二里多地的饶乐府村，从开始组织小型文艺宣传活动到正式成立剧团，评剧《刘巧儿》、《小女婿》两出戏红红火火，在当时曾轰动一时，现在回忆起来还令人激动不已。

剧团成立之前

解放以后，从老解放区带过来的欢乐活泼气氛很快感染了刚刚过上好日子的饶乐府村人。他们在晚上经常听宣传国家大事的“屋顶”广播，听工作队的干部讲话，听过往部队和学生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看从县城来的宣传队扭秧歌、打霸王鞭。看来听去，觉得心动。一些爱好文艺的上高小的学生和原来只是在农闲时候自娱自乐的村民，就有了自己登台演出的念头。村支部书记刘树聪和村长刘树勋支持村民这种想法，开始组织群众排练。

1951年秋天九月庙时，在村南娘娘庙前搭了席棚戏台，进行了第一次登台演出。记得当时有邱迎春、刘士敏、郭淑琴等学生演出的短剧《喜鹊登枝》；刘焕文、邱永春的数来宝《大实话》；村民张振忠、郭恩的西河大鼓《万人坑》、《董存瑞》；村民马竹彬等人的二簧清唱等节目。

第一次演出成功鼓舞了人心。1951年冬天，更多喜好吹拉弹唱的村民聚集起来，趁农闲开始一起活动。那时村公所设在村中央的老爷庙里，白天小学生上课，晚上就在那里排练节目。人多了，需要统一管理，演出也要象个样，于是在村干部组织下酝酿正式成立剧团。

剧团成立之初

成立剧团一是组织，二是资金，三是剧目，缺一不可。村干部把成立剧团当做宣传党的政策、改变村风村貌的大事，村民们尤其是有些戏曲演出根底的积极分子更是热情关心。

其实，成立剧团最主要的是人们的心气，心气顺，心气高，什么都好办。首先，推选出村小学校长邱凯任团长；推举刘树礼、贾玉昌两个既见过世面又有戏剧功底的人当导演。文武场的主要成员有刘树礼(板胡)、胡信(二胡)、刘树仁(瓮子)、胡忠(笛子、鼓)、王春华(鼓板)、魏汝信(锣)、胡义(钹、兼口技表演)。道具布景制作有张振忠、邱迪春等。前后场的搭台、拉幕、捡场等副务负责人是马希显，具体工作人员有武义、白瑞、魏守仁、魏守伯等人。服装与化装有李兰因、邱云霞等四位妇女，主要为女主角服务。其他演员一般是自己化装，多数人不化装。那时的舞台灯光就是点几盏烧煤油的汽灯，台口一边一盏，由邱金行负责。

筹集剧团资金也没费多大劲，老百姓都支持，有钱的出点钱，有物的捐点物。剧团的桌子、椅子以及做道具的木头、服装、乐器都有捐的。经营油房生意的村民李保善全力支持剧团，除了大家捐钱，不够的部分他给“包葫芦头”——缺多少他拿多少。

剧目的选择关系剧团的前途，经过反复议论，选定了评剧《刘巧儿》、《小女婿》为主戏。这两出戏一是导演熟悉，二是有唱片可学，三是群众喜闻乐见，四是可以配合宣传 1950 年开始贯彻的新婚姻法，可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除了主戏，还因人而异陆续选择了一些小节目准备穿插演出。

选演员时，男演员好选一些，选女演员时费了不少力。那时刚解放，群众的封建意识还相当严重，十七、八的大姑娘抛头露面登台演出，自己愿意，可家中老人却想不开。于是村干部和许多热心人就去做工作。这两出戏是以女主角唱念为主的戏，女主角的扮相要美，嗓子要好，还得有演戏的悟性。邱迎春当时十八岁，在县城上高小，扮演刘巧儿。她白天上学，晚上排练，她有文化悟性也好，除了导演贾玉昌的教练，还把新风霞的唱片拿回家反复听。终于学成了纯正的新派唱腔，尤其“采桑叶”的一大段唱腔令人叫绝。马淑珍长得文静善良，稍有点沙嗓，很适合剧中人物香草，她虽然文化水平低，看不懂剧本，但很有悟性，记忆力又好，导演刘树礼一段一段地教，她刻苦地学，把香草演得活灵活现。尤其是一大段“鸟入林”的反调，每次都唱得令观众心动。

到 1951 年底，饶乐府村评剧团终于亮相了。当全村的老百姓(有不少家还请来住在外村的亲戚)在小学校新搭的戏台上，在明亮的大汽灯照耀下，看着一道道鲜艳的幕布，听着咚咚锵锵的锣鼓点时，无不喜笑颜开。前几次演出，还有一些小节目穿插演出，像刘焕文、胡士平的歌剧《兄妹开荒》；邱迎春、魏建华的京剧《小放牛》；张广文、李兰因、张茂等人的小话剧《破除迷信》等。但村民们最喜欢的还是那两出“大戏”。还夸奖说跟“话匣子”(收音机)没什么两样。从此，饶乐府村的刘巧儿、杨香草名声传进县城，也传遍了城东的十里八村。虽然剧团以后陆续排演过一些其他剧目，比如魏建华、刘守志、邱迎春主演的《柳树井》、《罗汉钱》；马淑珍、胡珍、马希显等人演的《孔雀东南飞》等，终不如《刘巧儿》、《小女婿》精彩，演出几场后就停演了。

红火一时的《刘巧儿》、《小女婿》

《刘巧儿》演的是解放区女青年刘巧儿对父亲刘彦贵给自己订的娃娃亲不满意，要争取婚姻自由，让刘彦贵退了亲。刘媒婆受地主王寿昌之托趁机向刘彦贵家提亲，刘彦贵贪图彩礼背着巧儿答应了婚事。原来巧儿在一次劳模会上看中了青年劳模赵振华，暗自爱慕，要自由恋爱。当从李大婶那里知道赵振华就是自己的娃娃亲赵柱儿时，后悔不已，决心复婚。政府的石裁判员认为退了亲就不能复婚。大家只好去找马专员讲理。为了阻止刘彦贵把巧儿嫁给王寿昌，赵金财带儿子振柱儿和乡亲们趁夜色把巧儿从家里接走并打了刘彦贵。马专员经过调查并亲自到桑园听巧儿说明心思，在群众大会上纠正了石裁判员的错误，惩罚了参与买卖婚姻的王寿昌、刘媒婆、刘彦贵等人，也批评了非法打人的赵金财，宣布刘巧儿和赵柱儿复婚合法。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剧团演出此剧时的主要演员有：邱迎春(刘巧儿)、邱淑莲(女、赵柱儿)、马彬彬(刘彦贵)、邱书春(赵金财)、吴凤侠(李大婶)、贾玉昌(王寿昌)、邱适春(刘媒婆)、刘树义(马专员)、刘福全(石裁判员)；群众演员有刘焕文、张广文、徐承义、赵立志、胡士平、魏建华等。

《小女婿》演的是解放后的农村，女青年杨香草与男青年田喜儿在劳动中建立了感情，情投意合，准备订下终身。被好吃懒做的陈快腿看见。陈快腿不满意老实巴交的丈夫陈二，而喜欢田喜儿。于是到杨家为香草提亲欲拆散二人。香草优柔寡断，心中爱着田喜儿，又不想让父母为难，终于嫁到他乡。被陈快腿吹得天花乱坠的新女婿原来是罗寡妇一个 11 岁的小孩子，结婚洞房花烛夜还尿了炕，香草非常痛苦。三天回门那天，香菊(香草妹)等人设法把小女婿带走玩耍并取笑他，让田喜儿和香草会面。田喜儿违心地祝贺香草找到一个好男人，香草泪流满面诉说真情，得到田喜儿原谅。香草爹妈看见自己 19 岁大闺女嫁给一个 11 岁的毛孩子也很后悔，对陈快腿非常不满。小女婿看到田喜儿和香草很般配也提出离婚。气得罗寡妇没有办法，就

向杨家讨还彩礼愤愤而去。在村干部主持下，陈快腿受到严厉批评，香草和田喜儿终于走到一起，结为百年之好。剧团演出此剧的主要演员有：马淑珍(杨香草)、刘守志(田喜儿)、赵桂珍(陈快腿)、刘秀珍(女)、胡振全(小女婿)、邱适春(香菊)、刘福堂(男、田喜妈)、吴臣(男、罗寡妇)、马竹彬(香草爹)、魏建华(香草妈)；其他演员：胡珍、杨德林、胡士平等。

这两出戏从演出以来，越演越精，深得老百姓喜爱，也受到县里有关部门赞赏和重视，当时的《河北日报》曾经专门报导过。两剧曾参加了1952年12月房山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调演，还多次参加在城隍庙大戏楼的各种庆祝活动(当时县城里开大会的广场)。除了在本村的演出，还被请到芦村、北市、辛庄、北庄等村巡回演出和慰问驻军。从1952年到1954年三年间就演出几十场。不但生动形象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也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的文化活动。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与邱迎春、刘焕文座谈核对了有关人和事。)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北甘池村的小评剧团

傅洪珍

1948年底，房山县解放了。第二年春，甘池地区进驻了县区土改工作队，进行了土地改革。从此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像芝麻开花儿一样节节高起来。在房山县第三区(长沟是房山县第三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利用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北甘池村由付瑞、王万元、王希路、付旺、刘聪等人牵头，组织起小型文艺宣传队。起初只有十来个演员，表演一些宣传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小节目，如《兄妹开荒》、《小两口挑战》、《夫妻识字》等。还有自编的快板、数来宝、相声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小放牛》、《正月十五逛花灯》等节目。这些节目，一方面积极地推动了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满足了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后，夏村有位叫黄效贤的老师被调到北甘池村任教。黄老师是个文艺爱好者，在他的提议下，经过政府同意后，正式把小型文艺宣传队改名为“房山县第三区北甘池村评剧团”，准备学演评剧剧目。

成立剧团，首先需要掌鼓的、拉琴的、打锣钹的、吹唢呐的等等，各种乐器都不是三朝两夕就能学会的。北甘池村在这方面有优越条件，不用到外村去请人。本村有五六个当过吹鼓手的。如赵文佩掌鼓、徐德才吹唢呐，莘万连、刘启拉琴，肖振山等打锣钹。小评剧团很快就建立了起来。

由于人们生活的改变，不再为吃穿而愁眉苦脸，旧貌换了新颜。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大大的改变了。尤其是那些苦大仇深的农民，总觉得无法报答共产党的恩情，所以剧团一成立报名参加演员的青壮年就有二十多人，而且不要报酬，都是义务的。

为了在农村大力宣传“婚姻法”，黄效贤老师提议，要把第一出《小女婿》演好。要跟一些包办婚姻和讲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棒槌抱着走”等封建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提

倡婚姻大事要自己做主，自由恋爱，自选对象。

由于演员们都是农家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怎么演戏。不懂得什么叫板儿，什么叫眼儿，什么叫过门儿，对流水板、慢板、哭板和起腔落腔等等更不清楚。所以由黄效贤老师带队，叫全体演员到涿州戏院去看戏、偷艺。在走之前，给演员们开了会，叫谁扮演哪个角色，谁专门注意观察哪个角色的念、唱、走、做等。

当时我扮演剧中的田喜儿，在戏院里就专门注意田喜儿的念唱动作等。刘成扮演杨香草，就专门注意杨香草的念唱动作等。

1951年，经过一冬的排练，《小女婿》终于在正月初二与乡亲们见面了。演出后得到了甘池群众的好评和区政府的表扬。第二天上演别的节目，群众在台下高喊：“我们还瞧小女婿！”这说明群众对演员的表演和颁布婚姻法是欢迎的。剧团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又重演了一次《小女婿》。演着演着，天空下起了大雪。剧团负责人在台上跟群众宣布：“乡亲们，先回家吧，天太冷，等雪停了再来瞧吧，我们暂时停演了……。”台下一片喊声：“我们不怕冷，你们别停演！”最后演员们冒着大雪从始至终演完了这场剧目。

《小女婿》上演不久，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波动。尤其那些包办的婚姻和常给儿媳气受的婆婆们，都程度不同的改变了作风。特别在一些青年男女中，自由恋爱，自找对象，也十分普遍。有一部分老年人看不惯，说什么：“挺老大的闺女己个儿找对象，真不怕寒碜！”然而，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们无法阻挡，也就只好顺应新社会的潮流了。

与此同时，剧团还排演了《小二黑结婚》、《罗汉钱》、《柳树井》、《收租院》、《改造二流子》等剧目。也排练演出了几出古装戏，如《白蛇传》、《麻疯女》和《白素贞》、《夜宿花亭》等。这些剧目，在当时的农村都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当时剧团一个正月都闲不住，不是这村请，就是那村聘，所以就到各村轮流演出。如长沟、良各庄、孤山口、三座庵、六间房等村都演过。后来还到东方红炼油厂演出过。

由于北甘池村率先成立了小评剧团，并很受群众欢迎，接二连三的西甘池和南甘池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但是他们都得从外头花钱雇教师，就是雇来教师，学掌鼓、拉胡琴、打锣鼓，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因为他们没有北甘池的优越条件，也只能演些小快板儿、小双簧和小相声。

当时只要北甘池一演，西、南、东三甘池的群众都跑到北甘池来瞧，谁也不瞧自己村的节目。所以西甘池的村干部很生气。后来，他们派民兵把各街口都站上岗，不许群众出村，群众仍然是偷偷地跑到北甘池去看戏。

由于如此，有的人就给编出几句顺口溜：“北甘池剧团一打通，南甘池群众往前蹭，东甘池群众不要命，西甘池干部把眼瞪。”

西甘池村大，按户数人数都是东、南、北三甘池相加之和。村干部听了群众的顺口溜，就请来了五侯村京剧团，高搭戏台，唱起了大戏。此时已是春分节气，春耕大忙即将开始。西甘池要唱五天大戏，意在跟北甘池赌赌这口气。

大戏正唱到第三天的时候，被区政府知道了，三区区长吕镒带着两个区干部来到了西甘池。找到了西甘池村支部书记询问情况说：“年也过了，节也过了，正要春耕大忙，你们为什么唱起了大戏？”支部书记无言以对。有的群众跟吕区长说明了原因。吕区长听后，当时要求西甘池把大戏停演。并召开西甘池村全体干部会议，会上，吕区长对西甘池的干部进行批评说：“人家北甘池宣传的是婚姻法，你们唱些什么戏，还把街口站上岗，不叫群众出村，跟北甘池闹对立，伤害了两村之间的和气。为了解决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去两个人到北甘池把北甘池的干部请来，到一块儿说说，我在这儿等着。”西甘池干部在吕区长的要求下，把北甘池的干部请到了西甘池村政府。吕区长给进行了调和，解决了两村长时间的矛盾。

1952年，已是解放后的第四个年头，全国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但国家正缺乏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有文化的人很少。于是，多少有一点文化的主要演员，陆续都脱产参加了革命工作。有去供销社的，有去区政府工作的，也有去县里工作的，还有的到工农干部学校深造的等等。因为没有新演员接替，所以使

红火仅两年的北甘池小评剧团,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光阴住苒,不觉五十年过去了,但我还时时想往那演戏时天真烂漫的青年生活,常常做梦都回到那个时代去……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作者系原房山县商业局干部

韩营村的座腔戏

唐占忠

所谓座腔戏,即演员围着桌子沏上茶坐在板凳上边奏乐边演唱的戏。它不要求人数多少,不要求场地和舞台,不要求戏装和勾画脸谱,不要求有表演动作,只有唱和奏,简而易行,是我国各种戏剧发展最原始的种子戏。

我区韩营村的座腔戏,起源于1939年。这年夏季永定河泛滥,西岸南蔡(今涿州市)段决堤,经当地村民冒死抢救,用半月时间把决口堵上,避免了更大灾祸。直隶省政府为给民众庆功,在金门闸搭戏台,邀来天津、保定两个梆子剧团,唱了六天戏,声势浩大,引得周围村民前采观看。韩营村座落在金门闸附近,男女老少更是不分昼夜蜂拥而至。穷人第一次看戏感到新鲜,演员在台上唱,他们台下小声学,着实入了迷。事后,一些青壮年哪怕在农忙时,嘴里也还不时地哼着戏腔,穷人想唱戏之势真如烈火烧干柴。

1940年冬的一天,韩营村地方(村长)唐怀找到经常在外奔走谋生(卖酸枣甜杏干)的武顺说:“你在外做买卖留点心,见到有能教戏的请到咱村来,我要带头办戏班,让村里人开开心。”武顺高兴地接受了委托。不久,他去张坊沟买山货,回来路过五侯村碰上一家办喜事,门前围坐着一班吹打弹唱的人,他放下货担,边卖货边留心看戏,发现其中有一人是教师。于是,他借戏间休息走近那个人恳求道:“我看您的戏艺真高,我们村打算建戏班,想请您去传授戏艺,您若是能帮忙我们村是绝对欢迎的。”那个人看武顺朴实忠厚,毫没犹豫就爽快的回答:“完了这场喜事,明天我就跟你去。”武顺在五侯村等了一天,期间他得知此人姓李名华春,排行老四,因打鼓闻名,人送艺名“快鼓李四”。

第二天,李华春就跟武顺到了韩营,开始了教戏生活。他根据韩营村情况决定开座腔戏,教唱河北梆子。从此,韩营村座腔戏班创建了。唐怀任总管,武顺任箱头(掌握财务和物器),李华春任教师。参练的演员有唐怀、武顺、孟贵、唐云、许登林、唐连、唐君、唐祥、孙永平、孙永伦、车兴桂、任万良、张喜、张珍、孙永海等,他们既当角色又操乐器。村民自发捐钱献物,白手起家,学戏热情非常高涨。

戏班建起后,李华春规定每天晚上以堂鼓为号,头通鼓召集,二通鼓集合,三通鼓开始排练。在教练过程中,李华春教乐器是手把手,教唱腔是口递口,耐心细致,反复导演。经过一冬的苦心经营,韩营村座腔戏的第一出戏《三疑记》瓜熟蒂落,于大年三十晚上与乡亲们见面了。街当中挂起两盏汽灯,演员坐在桌子四周,鼓乐喧天,声腔激越,乡亲们聚在外围观看,赏心悦耳,惊叹不已,叫好声时起时落,喜气洋洋。

经过李华春两、三年的刻苦教练,演员均能掌握戏剧常识,演艺普遍提高。后来,李华春受涿州码头村

剧团之请离开了韩营座腔戏班，临走前把在北京广德楼戏园的师弟许文章邀来，继续向韩营村座腔戏班传艺。许文章更是技艺精绝，教练娴熟，韩营村座腔戏如虎添翼，演唱的戏目达到三十余出，如《杀子报》、《双官诰》、《汾河湾》、《大登殿》、《柜中缘》、《辕门斩子》、《四郎探母》、《铁弓缘》、《挂画》、《桑园会》等。为丰富村民文化娱乐生活，每年正月十五前都义演献唱。平时，村里有红、白喜事，只要事主打招呼，都不讲代价演出。从此，韩营村座腔戏的声誉名扬乡里。在韩营村戏班的影响下，交道村、务滋村的戏团，涿州的北蔡村、长安城、任村、佟村、白庄等村的戏团也相继发展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河北梆子这一艺术曲种起到了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作用。

然而，韩营村座腔戏的活力未能永葆，到1949年仅十年时间就停止了活动。其原因是，解放后穷人翻了身，土地还了家，人们一心扑在自己分得的田地里。随之，初级社、高级社。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生产建设掀起高潮，广大农民都全力参与。所以，演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排练节目，只好散班了。如今五十来年过去，每当想起韩营村座腔戏真叫人赞叹而又惋惜。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解放前石楼村的“上四调”

侯国智

地方戏剧“上四调”在我区石楼村兴起，算起来得有百年历史了。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石楼村从河北衡祁来了位打工的，闲下来就唱老家的衡祁调小戏。石楼村王坤是个戏迷，由他发起组织了个土戏班，请那位打工的当师傅教戏。当时村里年轻人如大黄四、小黄四、大鞭王六、王产业等人，就成了小戏班的名角儿。在村北街“大王八碑”对面搭了个戏台，每逢农闲或年节，就唱起大戏。由于师傅只传了简单调式，里边有“上四上四一上四”，这样，“衡祁调”就讹传成为“上四调”了。

这土戏班儿虽“土”，戏码儿还不少。现在我还记得有什么《乌盆记》、《水淹泗舟城》、《王二姐思夫》、《刘高手探病》、《马寡妇开店》、《纪晓堂捉妖》、《小老妈进京》、《乡下妈妈瞧亲家》等等。每逢唱大戏时候，石楼村接闺女、唤女婿、约亲朋、请好友来看戏，搞得十分红火。那时候在石楼村土道上、田野里，都能听到白胡子老头、光脊梁的汉子、俊俏的小伙吼上几嗓子“上四调”，在村子那树凉儿底下，也能听搓麻绳的大妈、纳鞋底的媳妇、绣花的大姑娘，哼哼叽叽地唱几句。

据老人们说，有位过路的小伙子走到十字街井台上，看见个俊姑娘在打水，小伙儿想讨口凉水喝，问了三遍姑娘也不理，后来灵机一动，按上四调的谱子编句新词，对姑娘唱了起来。

“叫一声大姐，你是听啊！赏一口凉水，中不中啊？”

姑娘一听会唱上四调，于是眉开眼笑地也唱了起来：

“远来的大哥呀，你走得紧呐，喝口我的井水，败火提神啊！”

这“井台奇遇”，促成了这对青年男女的美好姻缘，上四调是系在他们脚上的红绳。于是外村人说，石楼人唱上四调把姑娘唱跑了，真不害臊，落下了话把儿是“石楼人不害臊，张嘴就是上四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房山被日寇占领。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再加上以抗日名义兴起的“十路军”的骚扰,老百姓哪儿还有唱戏的心气儿?红红火火的“上四调”,也跟着黄了摊儿。

1950年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做到了耕者有其田,都安居乐业了。1952年,石楼的老人们又想起了上四调,这次由程文和王瑞组织起剧团,李德泉、黄国芸、黄青、刘春英、王恒、王刚、焦德水、焦德山等又成了“名星”。老戏只唱《逼上梁山》、《李逵探母》等戏目。

石楼人对唱戏情有独钟,行头、道具都由参加剧团的成员自愿出钱置办。我三大伯家大哥入剧团,交了两石麦子,分配他演李逵之母。他天生是“瘪骨嘴儿”,扮起来真象七、八十岁的老太太,特别叫好儿。我六叔家大哥交三斗麦子,分配他演《乡下妈妈瞧亲家》的驴,让演妈妈的李振东骑着,一句台词也没有。我六叔在饭桌上说:“有出息,三斗麦子换个驴当。”我这位大哥听了爹的挖苦,心里十分不服气,憋了半天说了一句:“哼!比一千斤白薯换只兔子强!”原来解放前吉羊有个放鹰的,那鹰追兔子追到六叔园子的篱笆边,我六叔用粪叉叉兔子,不小心叉了鹰,叫放鹰的讹走了一千斤白薯!

当时村里的年轻人以王树精、贺文山、刘凤鸣、李振生牵头儿,又在东街组织了个演新戏的剧团,跟西街的老剧团叫上了劲。他们演过《兄妹开荒》、评剧《小女婿》、京剧《打渔杀家》、《翠屏山》、《乌龙院》、《和睦家庭》等新剧目。最出名的角儿就数王树精、杨振福、刘瑞、张志富、宋成江、李振东等人。再以后又排过河北梆子戏,那头牌就得数马大翠和王林了,那都是十里八村都闻名的人物。

如今电影、电视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演戏的也少了,而今将那红火的“上四调”以及石楼曾有过两个剧团的事絮叨絮叨,让年轻人知道知道也是一件好事。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引进《跑驴》

段汝连

《跑驴》原是流行于冀东昌黎、唐山一带的民间舞蹈。1955年由通县专署群众文化干部学习班引进我县(区),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

五十年代初,著名的民间舞蹈艺人周国宝(昌黎人)在冀东地区秧歌《跑驴》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创造成为适合在舞台演出的小型民间舞蹈节目。舞蹈《跑驴》是表现一位青年农民,在春天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赶着小毛驴送妻子回娘家,边走边与妻子怀抱的小宝宝逗嬉。在过一条小河时,小驴不慎陷在泥里,急坏了青年夫妇。在一位热心农民的帮助下,小毛驴走出泥塘。青年夫妇特别感谢这位热心的农民兄弟,道谢后,挥手告别,继续上路。表演时间是七分半钟。舞蹈运用了丰富生动的冀东民间舞蹈语汇和哑剧表现手法,诙谐幽默,活泼风趣。1954年周国宝等人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专场汇报演出,并拍摄成纪录片。同年又参加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国际青年联欢节演出,获银制奖章。

1955年冬天,河北省通县专署文化科在通州市举办群众文化干部学习班,学习《跑驴》、《双条鼓》、《王三姐赶集》、《扑蝶》、《荷花灯》等一组民间舞蹈节目。参加学习的有通专地区13县1市的文化馆干部30多人。舞蹈教练由房山馆的冯汉云、怀柔馆的周静莲和通县、蓟县馆的小贾、小崔担任。其实他们也不是专

业舞蹈干部，只是在此之前到河北艺校舞蹈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属于现趸现卖。当时各县的文化馆干部多数是由教师改行到文化馆工作的。业务水平不高。举办这样的学习班，对于提高干部业务水平，十分必要。大家都十分重视这次学习机会。开班时专署文化科张科长作了动员，学员们劲头很足。

学习班的条件十分艰苦。住在通州鼓楼西侧的电影机修配站的一个小院里。三间大屋临时搭起了大通铺，很是拥挤。屋里虽然生起了煤球炉，还是很冷，洗脸盆的水夜间都冻了冰。女同志住在旅馆，条件稍好些。吃饭是在新华大街合作饭店包的饭。没有排练场地，排练就在地委机关大院燃灯塔下的院里。遇到下雪天气就临时搬到西海子电影院里。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五个民间舞蹈大家都学会了，结业时还作了汇报演出。专署文化科领导要求：各馆的同志回去以后，要通过办班和下乡辅导等方式，做好普及工作，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房山县文化馆去学习的只有我一个人，加上当教练的冯汉云一共两个人。良乡馆是李荣光、朱清溪两位同志。12月份两县文化馆都分别举办了农村文艺骨干民间舞蹈学习班。房山县文化馆办的班，参加学习的有芦村、韩村河、坟庄、惠南庄、岳各庄、石楼等村的文艺骨干50多人。当时农村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各村普遍建立了俱乐部。参加学习的学员多是刚回村参加农业劳动的初高中毕业生，素质比较好。房山县办班的条件还算可以。这一年县里已经建起了大礼堂，礼堂后面新建起了一排北房作为县里开会时的“招待所”。学员自己带被褥，就住在这个招待所里。每屋住七、八个人，有火炉，比较暖和。吃饭在北大街合作饭庄。排练就在招待所院里，天气不好时就在大礼堂里进行，比起专署班条件好多了。学习班结业时在大礼堂进行了汇报演出，请县里领导和各单位干部职工观看。一千个座位的大礼堂坐的满满的。那时房山城还没有通电，舞台上点了三个大汽灯照明。乐队由文化馆干部李增森、晋怀儒、郭文瑞、李士昌等同志组成。县人委人事科的刘成同志会吹唢呐，也参加了乐队。在整个演出中，《跑驴》、《荷花灯》最受欢迎，掌声不断。现在看来，这场汇报演出水平并不高，但这是房山群众看到的第一场民间舞蹈专场演出，普遍有一种新鲜感，在县城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轰动。合作饭店的服务员石广海每次见到我都说：“咱们什么时候再演跑驴舞呀”。学习班结束后县文化馆干部又下乡进行了跟踪辅导。这一年春节农村文化活动中，《跑驴》成了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在普及《跑驴》活动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要表演《跑驴》必须有道具“驴”。北京珠市口有一家剧装社，制作一头“驴”八十元，这一年买一头真的小毛驴也就五、六十元。通专的《前进报》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头小毛驴驮着一头道具驴，小毛驴说：“我为什么驮你？”道具驴说：“我比你值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普及《跑驴》活动中各县农村确实花了一批钱置买道具，因而引起社会舆论关注。

《跑驴》从1955年引进到房山，40多年问经久不衰。这中间马风岩在县评剧团工作时曾辅导剧团演出过《跑驴》。周桂琴、赵凤屏曾辅导房山师范学生排练过百余名学生参加的“集体跑驴”，参加全国第一届农民体育运动会开幕式演出。在当前兴起的秧歌热中，《跑驴》又融进了各种形式的秧歌表演之中。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作者系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房山文坛往事

赵日升

我是1973年8月从琉璃河中学正式调到文化馆工作的,1980年10月离开调入北京,总计是七年零三个月。这是我生活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现在回顾起来,有许多事情仍然感到亲切,因此不妨记述下来,一则为着是梳理一下这多半辈子所做的一点事情,以慰心志,二则为给故乡的文学事业总结些经验和教训,以益于她今后的健康发展。

一个展览和两篇报告文学

在这篇文章进入实质内容记述之前,我不能不先要声明,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有的认识以及用语只得在当时实际去写,这才符合写“史”的原则,才会因不失真而更具有认识的作用。

1971年房山县革命委员会举办“岗上大队两条路线斗争展览”,这个工作由房山宣传站具体实施。我是当年4月由琉璃河中学借调来担任解说词的撰写任务的。担任美术工作的是良乡中学的何君华老师和长沟中学的焦士英老师,马福是总的负责人。我和宣传站以前没有什么往来,不知何以会调我来?来到之后,何君华说是他推荐了我,因为他从他良中的同事(也是我的同学)那里知道我“文革”前就写些东西,而且他似乎还读过一些,便向马福提起。马福的爱人与我爱人是同学,他虽没见过我的面,但这个关系却是知道的,便也很同意。他们领导班子研究时,段汝连因在“文革”前见过我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写蒲洼公社富合大队的纪实散文,也投了赞成票。这样,我就有了契机,与房山的文化事业发生了接触和介入。

我来到之后,展览已搞得初具规模,美术部分基本完成了,解说词也有了个草稿,只是整个结构还须要调整,内容也须进一步丰富,我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加工润色,做到既简练而又生动。于是我便到岗上大队去了,在那里断断续续住了一些日子。8月写了最后的一稿,经县革委领导审定后又回到了琉中。俟后不久,北京市革委又委托北京人民出版社给县里下达了写“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的报告文学的任务,我县两篇。一篇写岗上大队的全国劳动模范吴春山,一篇写龙门口大队李儒生。县里对此很重视,组成了以安法鲁为组长、范永权为副组长的领导班子,从下放干部以及我县干部中抽调了一些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下放干部有《北京日报》的季英正,北京市文联的李志,另一位是某高校教师,名字我已忘记了,他们编为一组,写吴春山。写李儒生这组的有刘永成,南梨园中学的赵幼仪和我,刘永成是组长。我是什么时候报到的,现在已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那一年很忙,在龙门口大队住了很长时间,材料搜集得差不多后,便集中到良乡图书馆那里去写。下放干部中的成员因为陆陆续续要回北京,最后只好由刘永成,赵幼仪和我三个人收拾“残局”。编写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我记得刘永成几次从市里参加研究讨论会回来带来的消息都不是令人高兴的。市里认为我们写的“有报告无文学”,所以我们三个人便几次翻工。大概是到年底才告一段落。这本报告文学于1973年8月出版,书名为《坚定的脚步》,内收我县的《吴春山的新故事》、《龙门口新歌》两篇。

1973年开学,我又回到琉中任教。在我写报告文学时,我与宣传站的许多同志都很熟悉了,他们对我印象不错。领导有意正式调我,可能是通过刘永成探我的口气,我自然是很乐意的。我向琉中领导提出这个问题,琉中领导不愿放我,于是又费了半年的周折,终于在我把1973年上半年的课教完后,才算实现了我

这次人生的转折。

我很理解宣传站领导执意要我和疏中的领导坚持留我，都是对我的看重。一个人的发展，自然主要是靠自身的素质，还有国家时局大环境下的不期而临的机遇，但是没有具体的别人的助力，同样是不行的，王建中、吴洪春、段汝连、马福、刘永成和何君华，都在我这次工作调动中给了我各自不同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我是永志不忘的。当时疏中的校长高忠政，从大局出发，为我放开发展的大门，也同是我由衷感激的。不忘别人给自己的好处，我认为这是做人的根本。

发展创作首先要发展创作队伍

我调到宣传站后，编入创作组。我记得当时创作组只是刘永成和我两个人。有个名叫张梦瑞的，是北京戏校毕业的，他负责文艺宣传队的创作，与我们住同屋，但是否为创作组正式成员，现在回忆不准确了。我明白县里调我来并不是让我搞专业创作的，而是抓文学创作的，所以我非常自觉地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上面。

发展创作没有一支创作队伍是不行，所以发展创作的第一步便是抓发展队伍。文化馆(宣传站)历来是市文化局的下属单位，而文学创作则是市文联的业务范畴，所以，过去一直没设置负责文学创作的专门机构，现在设置了，我认为这是当时宣传站的创举。

“文革”前我县搞文学创作的多是单干户(或用现在的话说叫“个体户”)，处于自发状态。我记得那时在报刊上发过作品的只有夏村的那一中、团县委的刘金绶、洪寺的孟庆山、瓦井的孙玉枝、双孝的张淑兰以及写了不少通讯报导的苏宝敦等人。经过“文革”动荡，他们的情况如何也不清楚。我首先关注到的就是这一部分人，便主动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比如苏宝敦，我主动到大峪沟去拜访他，得知他曾因给邓拓写过信而受株连，从公社干部被贬放回家的遭遇。我也曾几次到洪寺大队找孟庆山，鼓励他重新拿起笔来。这些人除孟庆山不热衷此道外，后来都成了房山文学创作第一批中坚力量。

从报刊上发现新人也是发展队伍的重要方面。当时报刊寥寥，《北京文艺》于1972年刚刚复刊，北京范围的只有《北京少年》和《北京日报》的副刊。这几家报刊是我重点注视的。比如我在《北京少年》上见到署有长沟中学王竟的散文，文字颇不错，便给他写了信说明欲建立联系云云，没几天创作组便进来一个四方脸型黑红脸庞的男子汉，他说，他叫曹岫森，王竟是他的爱人，而文章是他写的，以她的名字发的。从此他便成了我县创作的骨干，并为我县文学创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再如赵幼仪，在我未调入宣传站之前，组建报告文学写作小组时，我先期报到后，见到过《北京日报》曾发表过他的小说，便介绍了他。

我调宣传站不久，《北京文艺》要编一期诗专刊，借我去有两个月。我在阅读来稿时，便留心房山作者的投稿。有一位叫赵捷的，写的民歌体诗歌颇得法度，还有坨里大队一个叫董华的，也是有文彩的。回来后，我不顾路远骑车到南召公社石村大队去拜访赵捷，得知他是北京知青。那天他恰好不在，后来他曾来过几次宣传站，并写了不少有水平的民歌。我们曾征得领导同意打算要调他到创作组，他也表示同意，但不久知青成批返城，也就没能实现。董华也是我们主动找上门去的，从此开始了他与房山文学事业的不解之缘。

总之，我们是以各种方式来发展壮大文学创作队伍的。颜景河当时是支左的军队干部，他喜爱写诗，经范永泉介绍与我后，我们就成了难得的文友和朋友。可惜他工作繁重又忠于职责，创作数量不多。还有游来柱，还在他读师范时，就已写得很有水平了，写的诗作颇似李瑛的《枣林村集》的韵致，可惜他后来终了此途，不然我料他会在这方面有所成就的。不过人各有志，世界五彩缤纷，各行各业都是应该有人去献身的，并非文学才是唯一最佳的选择。

总之，在我们创作组共同努力下，房山业余文学创作队伍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到我1980年离开时，已发展到百人左右。这其中包括在职干部；中小学教师、社员、工人、医生、售货员等。据我绝对不完

全的统计,在公开报刊和出版社的结集中发表作品的就有:孙玉枝、佟林华、陈宽、李桂玲、杨美茹、顾梦红、王怀旺、苏宝敦、肖勇、齐良儒、段汝连、刘永成、曹岫森、许谋清、游来柱、张永顺、邢一中、赵幼仪等多人。这样的成绩,当然无法与今天房山的文学现状比,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百业凋零的特定时期,已是不易的了。

未写完便“流产”的长篇小说

那时候文学创作多是“为政治服务”的。刊物、报纸大多是下来出题组稿,出版社也多是出题组织写书。197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要我县组织写一部以农业学大寨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张守仁是该书的组织者和责任编辑。

宣传站组成了有马连山、曹岫森和我共三人的写作小组。马连山当时是南街大队的主要干部,一因他基层生活丰富充实,二因他对文学也极有兴趣。他曾在“文革”前读过北大中文系,后因故而中途辍学,知识面宽阔。我们也把他“借来”。

第一步是先搜集素材,我县的先进大队我们采访了不少,还外出到河北遵化县王国藩的“穷棒子”社采访过。素材搜集得差不多时,便集中到云居寺写初稿。大约是从1975年秋开始,写到1976年初,写了约十七、八万字。

这个阶段自然是辛苦的,但不过是讨论素材,编排故事、铺陈文字罢了。开始时商定是由一个人以共同讨论的提纲执笔,这样便出现了一个人忙两个人闲的情况,况且写出来的也不能尽使其他二人满意。于是又改变办法,三个人均按一个提纲写。三个初稿写成后,再择其优者为基础,吸收别稿之长做最后定稿。这样三个人都紧张得有事可干愉快得有才可施了。

不料,令国人哀痛欲绝的事发生了,周总理于1月8日突然(其实不突然,身为百姓的我们虽已影影绰绰地得知总理病重的消息,但听到之后,还是惊愕不已的)逝世,我们都沉浸在失魂落魄之中难得再有的心绪。张守仁也抓得松了,似感出版社也顾及不过来了,这样,工作便松懈下来。再后几个月后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相继逝世,紧接着“四人帮”被粉碎,写长篇的事也就此不了了之了。

《房山文艺》的方方面面

发展创作没有队伍是不行的,有了队伍没有发表阵地更是不行的。我们创作组组织的作品,开始是向报刊推荐,但那时报刊远不似现在这样多,况且有一大批初学写作的人的作品还一时达不到报刊发表的水平,因此创办一份自己的刊物是相当必要的。

于是《房山文艺》便应运而生了。

前三期《房山文艺》是16开铅印本。第1期出刊于1974年,共88页。这一期主要内容有上述提到的两篇报告文学,小说四篇,其中曹岫森的《海棠花开》后被北京人民出版社收入小说集。有诗多首,值得单提一下的是有一辑“房山民歌”七十首,堪为壮观,其中多首为报刊转载,此外游来柱、颜景和、张永顺等人的诗歌也具相当的水平。此册我曾寄给过陈建功,他看后给我写信说,与当时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比毫不逊色,与某某刊物比质量还高。这话难免有夸大的成份,但总也有很大的参照价值,若一无是处他是不可能这样说的。第2期是1975年6月出刊的,共72页。第3期是1976年出刊还是1977年出刊的,因我手头没了这期刊物,已说不准确。这三期16开本的《房山文艺》几乎囊括了那几年我县最有代表性的创作,每期都有若干被转载刊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与政治、思想领域发生本质性的巨大转变一样，文学创作也必然要发生根本的转变。我县创作度过1977年的沉寂，到1978年上半年就出现了转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便决定恢复《房山文艺》。为了使作品能及时得到发表，为了工作灵便，也为着经济上方便开支，便由原来的16开本改为四开报纸形式出刊，1978年6月续编出4期。以后每月一期，除有一期延误过出刊日期外，其余是按月出刊的。甚至在《诗刊》借调我参加编辑建国三十年诗选的四、五个月（1978.8—12）期间内，我也是因有董华跑路照样把报编出。直到1980年6月（第27期）因经济不支而停刊，两年零一个月共编出24期，累积期次为27期。这二年间，刘永成已调入办公室工作，董华由坨里大队以临时工方式正式调来，此外还有编务晋亚梅。

改版后的《房山文艺》，第1版刊载有关文学文艺方面的消息、与形势关连紧密的作品、杂文等；第2、3版为文学创作版；第4版刊载讽刺小品、知识性小品、杂文、地方风物志、漫画等，体现了以文学创作为主又兼容其它的特点。

以前我们是组织创作于前，待积累了一定数量后再编辑成册。《房山文艺》改版为报纸型以后，就把这个程序颠倒过来了，有一期又一期的“报纸”，就源源吸引了过去我们组织不到发现不了的新作者。投稿者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作者可分以下几大类型：

老干部。胡振常当属典型一例。他在参加革命前就对文学感兴趣，也曾发过一些作品。参加革命后因种工作没有机缘再操笔重挥，但却一直“文缘”未了。他于琉璃河中学任支部书记时，我了解了这些情况。《房山文艺》复刊，他得知后主动送我几篇小说，我一看果然是不失文学气质，于是连续发表了《支援》、《队长和他的老伴》，以后还发过一篇《奶奶》。姚庆瑞也发过几篇回忆录。这是老干部的两个例子。

中小学教师。这是业余创作的主力，他们一是文化素养较高，二是他们较有时间。陈宽、谢春生、顾梦红、游来柱、何君华、韩子善、赵天琪、肖青、王风梧、方峡雨、张东升、曹岫森、侯国智、张永顺、王清堂、张文敏、钱兆和、刘文江、黄元浦、赵润东是发稿数量最多的。

县、公社两级干部，政治敏感，生活开阔，也是一支主力；计有如下这些人：邢一中、张玉、傅守卫、戴家斌、颜景河、孙玉枝、常绍儒、毕凤祥、康英、苏宝敦、段汝连、孔祥禄、郑殿兴、马连山等。

我县是以农业为主的县，农民人数多，其中也就不乏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房山文艺》上发过作品的数目亦很可观，按先后在刊物上出现的名字主要有：张珊、董华、隗秀琴、张贺旺、王振高、武文明、李桂玲、李春荣、赵平、莘德良、常祥、李淑英、陈玉泉、佟林华、卢宝存等。

这些以外，还有工人赵书华、李春方、李见果、医生白荣德，商店职工张社宁，以及大学生张文玺和中小学生。还有一些作者是在县外看了《房山文艺》后主动给我们投稿的。这部分我选择得很严格，为的是不使我们这块阵地被“外人”攻占，但是，为了扩大影响，也是为了交流，还是选发了一些。我翻了资料主要的有这些：李发模、张洪波、王满夷、珠丰、顾绍康、李瑞明、曹宇翔、张孚等人的诗，樊发稼的小小说，高进贤、池茂花、白润生、齐建昌、武冀平、章西孔的随笔杂文以及马振予、止敬、李蔚芝的知识小品。这些人的大部分名字在今天的报刊杂志上许多是我们熟悉的。

我也主动约一些文章，其中分两类。一类是我县人，当时未在我县工作，为了使他们关怀支持故乡的文学事业。如当时在部队工作，后曾升任《人民武警报》副社长的王志祥，是大次洛人，我约他写了散文《干枝梅》；现在在北京电视剧创作中心任编导的白唐（刘文田）是芦村人，我转载了他写的《芦村三间英雄屋》，这是回忆解放前的房山区委书记陈英才在芦村与敌浴血奋战而牺牲的事迹的。还有当时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的张孝忠，他为我写了《良乡塔漫山坡》歌谣体诗。另一类是与我县文化工作有直接关系或来过我们房山吟咏我们房山的，如张守仁为我们写过两篇散文，邵燕祥为我们写了重重的组诗，其它还有谭谊的散文《云水洞游记》，刘章的《过贾岛村》，晓晴的《良乡城怀古》，并转载过黎先耀的散文《龙骨山探胜》。

这种以内为主，以外为辅的布稿原则，实践证明是有益的，便于内外交流，促进本县的创作。

我可以再详举一期以说明它的质量。以1979年10月出刊第19期为例，因有庆祝国庆之意，故第1版发表的均是诗歌，有陈宽的《我的祖国啊，前进》，有我写的《白洋淀抒怀》，有曹宇翔的《公社诗情》，有王凤梧的古体诗《感新二首》，有李怡春的《爱脸红的姑娘》，另外配有张武长画的国画《举国欢庆》。第2版是乐红(胡振常)的小说《奶奶》。第3版是张守仁写的散文《我在孙犁家里做客》，佟林华写的新民间故事《卖兔子》，方峡雨的散文体小小说《大老崔》。第4版，有凌三思的讽刺诗《我们的队长》，孔凡晶的讽刺诗《如此任人唯贤》，曾雨的《也聊天》，知识小品有马振予的《深秋话柿》和止敬的《姓名趣谈(二)》。小小的四版报纸，有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知识小品、国画，林林总总容纳了15个人的作品。

因有写孙犁的作品，我便把这期《房山文艺》给孙犁寄去一份，并约他为我们写稿，他11月9日就给我回了信，录于后：

日升同志：

寄来的信和报纸收到了。并拜读了张守仁同志的散文和你写的诗，我以为都是很好的。刊物印刷和编辑也很好，其中一些杂文，读起来是使人感到兴味的。我如写出文章，一定寄呈你们请教。

拒马河，抗日时我曾往返过多次，只记得水急石滑，山风凛冽，水也很凉。

匆此，祝好。

孙 犁
11月9日

孙犁是很实在的人。信中所以提到拒马河，是因我请他写稿语中提到过。从这封信可以看到《房山文艺》质量的一斑。这两年“小报”发表的作品有一些在1980年后又得以“正式”发表。

我的调出与王凤梧的调入

文章开头就写了，我是1980年10月调离文化馆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我为什么干得好好的，还要调工作呢？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我国文学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蓬勃兴旺的局面已呈端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它强烈地吸引着我，诱惑着我，要去闯一闯，要去试一试身手。

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件事很伤了我的心。1977年第一次调工资，“调资办”明确指定给宣传站五个大专生一个调资名额。这五人中，一人是1964年武汉大学毕业的，一名是1965年天津美专毕业的，一名是因“文革”未读到毕业却以毕业计的北大历史系的，一名是从小学毕业开始进校读书，1966年读满八年以大专计的北京戏校毕业的。再有就是1962年大学本科毕业的我。仅从毕业年限上看，我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当时我自忖这是非我莫属的。孰料，投票结果，五个人却没有一个得到绝对多数票。当时宣传站由文化馆、电影院和文艺宣传队三个小单位构成，各在各地，彼此不了解，再加之各有“向灯向火”之人，投票不集中也非奇怪。当时领导只要站出来说一句话把这一名额给我，我想是不会有麻烦的。但是，领导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这一名额归给另外的档次中去了。我为此产生出许许多多想法，下了调走的决心。于是便悄悄联系单位。

注意读我这篇文章的读者应该看到，我主办改版后的《房山文艺》小报的两年，正是1977年调资以后的1978至1980的两年。我并不想以撂挑子闹情绪来结束我的工作，而恰恰相反，越离开越要把工作干好，好得无可挑剔。我不愿给我曾经共过事的同事们留下不好的声名，以至我走后念着我的名字撇嘴或唾唾沫。这才是我的性格，从琉璃河中学调出时，也是这样做的。效果证明是好的。1978年底我联系到一个去处，向领导正式提出调动要求。公平说，领导对我是器重的，不愿放我走。我苦苦要求，最后无奈才答应下来。

可是那个要我的单位有了变故，未调成，我又继续联系别的单位，终于办成了调动。这期间的《房山文艺》并未因此影响丝毫，她的停刊是经济的而非人事的原因。按我当时的想法是毫不间断地把她移交给接替我的人的，可惜未能如愿。

这一段内容我本没打算写。只是写到这里时才觉得不该略去的。我不是向一向对我器重且宽厚和蔼的领导泄怨愤；而是为着从中使人得到一点借鉴。坦白地说当时若是领导摸准要走的症结，把话谈透，使我的心理得到平衡，我是可以留下来的。

领导答应我的调动以后，只提出一个条件，要我推荐一个可以接替我工作的人。我毫不犹豫地举荐了王凤梧。为什么我要举荐王凤梧而且是胸有成竹的呢？这还得把话说远一点。1957年以前我读《河北文艺》，在一篇文章末所注的“于顾册”三个字中，知道他就是房山人，以同样方式得知房山还有个张信。我记得王凤梧那时发表过杂文和评论，张信发表过小说。我从我的同村一个小学教师那里得知他们二位也是教师，且王还是校长。以后我便常常打听他们的情况。1958年“反右”扫尾，王凤梧倒运，我很是为之可惜的。他从此沉寂了，但我却始终未忘记房山这位文学的先行者。粉碎“四人帮”后，万象更新，许多被颠倒的是非又被重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许多文艺界的名流“右派”如艾青者也似“文物出土”，带着一身肝胆照人的光焰重又辉煌于文坛。这时我便想到王凤梧。我向段汝连打听，得知他已回到教育战线。我于是兴冲冲骑车跑到他的住所前朱各庄。见面后这个前辈给我印象是直言快语，性格豪爽，我们谈得很投契。我邀他给《房山文艺》写东西，他爽直应下，不久便给了我几首古体诗，我选四首发在1979年5月第14期的《房山文艺》上，其中一首《送给故人》，题后有小序为：“中发十一号文件传达后，在政治上又获新生。目光一新，景色全变：春日即兴成歌。”然后是正诗：“原是春风送新雨，/疑为故友叩柴门。/柳丝拂柳心波荡，/桃花红映日光新。/小诗初成待锤炼，/短歌方就尚沉吟。/招手白云且停步，/载我新诗送故人。”其诗洋溢重获新生的喜悦之情。我是很喜欢这首真挚之作的。紧接着下一期又发表了他的小说《“聋二爷”转移》，以后又陆续发表了他的旧体诗。我以为这时候他的小说是远不及他的诗功夫来得深的。

但是他毕竟是有功底有阅历的房山文坛宿将。当时并不再无人可以推荐，起码有两三个人是完全可以胜任此职的。但我认为干这一行非是对文学迷恋入境心无二志的人才最合适，王凤梧无疑是最具这种条件的。就这样，我前脚走出文化馆的大门，他便后脚进了文化馆的大门。

心系房山

我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后分到《小说季刊》当编辑。

我虽然人不在房山，但我的心我的情感却总也离不开她。我国有几个“作家县”、“诗人县”，如北京的通县、山东的临朐、吉林的舒兰、黑龙江的海伦等，作家、诗人集团式地涌出，且绵延不绝。我真希望我的故乡通过我们现有的“本人正式工作关系”与不在房山的志同道合者励精图治，逐渐造成这种局面。文学创作当然是软指标，它不顶饿不顶暖，但它却可造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对提高全县文化素养都是绝对大有益的。而创造这种局面，骨干和“头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视王凤梧就是可以为“头人”的人。

当时，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局面已经到来，而且已见波澜壮阔之势。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黄金时期，正是繁荣文学创作的良好契机。我与王凤梧书来信往，星期日也常到他家去（那时我家还在房山，星期日多回来）。我对他说，应重点提高你的小说发展你的小说，你的诗词固然写得可以，做为咏志抒怀“玩”一“玩”未尝不可，但真正出息人的还在写小说。他那样做了。那一段时间写了一批，其中我最喜欢《露珠》和《截》两篇。《露珠》写得精致、奇而不特，非涉世浅淡的青年人所能“编”出。此作我仅建议让苗儿这个人去投八路，其它不需大修就可刊出，一经刊出就可造成影响，这是我的判断。《截》我认为人物写得生动，尤其绣花的情景

写得细腻感人,但有不足需修改。他按我的意见改了一两稿,我认为可以之后,就把这两篇作品一并提送主编审阅。恰其时《小说季刊》已决定改刊为《青年文学》,由选它刊佳作转载改为发表新作。主编看了之后,也认为《露珠》好于《截》,但当时我刊初创,十分强调现实题材,便不拟采用它,《截》倒是现实题材,但又嫌它简单浅显了一些,基本还未脱好人好事的窠臼,尚在犹豫之中。我力陈此作的语言功夫,主编才同意了,可问及作者年龄时他又不想用了(《青年文学》宗旨之一是“青年写”,即发表青年作者之作,故年龄一般限在40岁以内,此宗旨十年如一地坚持着)。我又说明作者的经历及遭遇。“文革”十年贻误了许多人才;故社会有“减去十年”之说,我于是对主编讲:对这个作者应特殊看待,不仅要减去十年,恐怕应减去二十年,这样算起来,他还正是青年小伙子呢!你就高抬贵手吧!”这样《截》终于发表于《青年文学》1982年的创刊号上。我知道他很敬佩刘绍棠,于是我约刘绍棠给这篇作品写了“小析”,同期刊在《截》后。

我去刘绍棠家约他写《截》的“小析”时,同时把《露珠》也带给他,并说明我对此作的看法及我刊未发的原委,希望他予以推荐。我去取“小析”时,刘绍棠也称赞《露珠》写得好,并告诉我已将它推荐给《天津日报》的《文艺》月刊主编邹明。我把这喜讯写信告诉给王凤梧。不久《露珠》发表,我又把它推荐给《小说选刊》副主编肖德生,不久也转载出来。我为他初试身手就显现不凡的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当时想,有王凤梧盟主房山,有我在北京八方联络,房山文学的长足发展是指日可待的了。为此我邀他到北京来。面晤了刘绍棠、《北京日报》的王保春、《北京文学》的赵金九、傅用霖以及《十月》的张守仁等。以后王凤梧还给我看过一些小说,记得最清楚的有《夏雨儿》、《桃花溪岸柳青青》等,后一篇我做了个别字句的改动后遵嘱寄给了邹明。

对王凤梧是这个态度,对房山的别人也大抵如此。十年来我看过房山不少人寄给我的稿件,虽不可能件件发表出来,但我都尽其可能地提出意见。我还为有些同志寄过刊物,如《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三月》等。到我写这篇文字止,在《青年文学》上发表的有史长义的散文四篇、董华的散文两次三篇、张文玺的计两次五首和人物速写一篇、刘泽林的小说两篇。其中有的已见大家手笔的端倪,有的已趋近成熟。孤立看数量不能算多,但在郊区县里算是最多的了。要说“偏心”也总有点,不过这也是作品达到我刊的水平即是作者努力的结果。去年李春荣寄我两册《房山文学作品选》,这是近些年房山文学创作的集大成的成果,比之我在时,文学作品质量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提高。前些天我又得到史长义、张振乾二人合写的报告文学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和张玉泉写的计划生育题材的故事集《太阳在心底燃烧》,得知苏宝敦的中篇小说在《北京日报·郊区版》连载。这些都使我看到房山的文学朋友们的新收获。我由衷地祝贺他们。文学的天地是极为广阔的,她需要我们马不停蹄地去闯去冲去开拓。在房山占山为王安营扎寨是短见的表现,只有“杀”出房山去,“杀”向全国去才是大略雄才。这不是指个把篇作品的发表,而是指因作品而造成的作者影响达到广大读者熟知和认同的程度。这个意思我向不少人屡屡说起过,在给有的同志的信里也写过。言语文字间可能有激烈之处,那也是为着前进而有意的“激将”。如有对此耿耿者,还望得到理解和宽谅。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作者系原《青年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五十年代房山群众文化工作概述

段汝连

1948年底，房山县城解放，人民政府接收了国民党县政府办的民众教育馆，创建了房山人民文化馆。馆址设在房山南大街路东庆和春茶庄旧址（现在的新华书店西院），临街有五间房屋作为图书阅览室，从街上看很象个商店。院内有南北两排房子共十间，分别做为办公室，馆长室、美工室、宿舍和库房，后院还是一家洗染店。全馆设备十分简陋，图书阅览室有图书五百余册，大部分是从民众教育馆接收过来的，书皮上还印有民众教育馆的图章，订有十几种报刊。阅览桌是从上方山搬下来的长条供案，两个对在一起铺上桌布就是阅览桌，还有二十几把式样各不相同的椅子。美工室有三个宣传画牌子，象大方格窗子，糊上几层废报纸，就在上面画宣传画，还有一些画笔，广告颜料之类的绘画工具。宣传工具更不多，有一个木壳收音机，以甲乙组合干电池为电源，有两个幻灯机以汽灯作光源。有几块布幕，搞展览时用来代替展墙。全馆当时只有八个人（我于1955年初到县文化馆工作）。1953年至55年先后在长沟、霞云岭建立了文化站作为文化馆的派出机构。当时的业务活动有四项，即：时事宣传，识字教育，群众文化活动和普及科学知识。日常的具体活动是：图书阅览室每天开放。中午和晚上城关的居民、机关干部、中小学生，看报借书的人很多，屋子里挤得满满的；图片展览和放映幻灯配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其中有一套图片叫《杨·阿德一家》介绍苏联集体农庄庄员，扬阿德一家的生活。还绘制了介绍惠南庄、坟庄等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的组画，用这些生动的材料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美好前景；每年春节都组织民间花会和业余剧团汇演，在城隍庙前的戏台进行，很是热闹，十渡业余剧团的《妇女代表》、北街业余剧团的《小二黑结婚》、吉羊、坨头的高跷会，都是很受观众欢迎的节目。

1958年房山、良乡和京西矿区的一部分合并建立周口店区，划归北京市领导。文化馆站也随之合并，县文化馆改名为周口店区文化馆，原良乡县文化馆、周口店文化馆改为文化站建制。合并以后全区有区文化馆一处，有文化站五处（良乡、周口店、河北、长沟、霞云岭）文化馆站干部总计15人。规模和机构都扩大了许多。这年秋天，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的兴起，掀起了文化革命的高潮，先后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北方昆曲剧院、北京曲艺团、北京电影公司、中国评剧院、北京画院、北京幻灯制片厂等八个文艺团体三百多名文艺工作者到房山来，深入到当时的八个人民公社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普遍开展诗画满墙和大唱革命歌曲活动。在房山、长沟、河北建立了三个公社文工团。长沟人民公社文工团的节目在西单剧场作过汇报演出。芦村的农民画在北海公园展览过。还办起了以刊登农民诗歌为主的《周口店文艺》。一时间，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十分红火。1959年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来了，人民公社进行了调整，热闹一时的群众文化活动高潮也就随之消失了。1960年文化馆站进行精简，撤消了河北、长沟、霞云岭三个文化馆，保留了县文化馆和良乡、周口店两个文化站，干部总数缩编到7人。

五十年的群众文化工作，除去1958年至1959年搞了些脱离实际的活动以外，有许多活动都是很有成效的。如：1955年、1956年派出业务干部，参加通州专署举办的民间舞蹈学习班，“引进”了唐山民间舞蹈《跑驴》，山东民间舞蹈《单鼓舞》，并通过学习班把这些节目普及到农村，至今这些节目仍在基层业余文化活动中经常演出，经过加工整理，参加了全国首届农民运动会的开幕式演出。1959年对天开村的太平鼓进行发掘整理，组织一百人参加了天安门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游行，在长安街上演出很受欢迎，不少观众呼喊：

“扇舞(太平鼓很象扇子)再来一个”;大次洛村的表演唱《大次洛要超南韩继》、东南吕的小评剧《养猪姑娘》(张淑兰编剧)参加了华北局举办的群众文艺汇报演出,在长安大戏院演出后受到市有关领导的肯定;立教村俱乐部开展业余文化活动,团结教育青年,被评为先进单位,俱乐部主任李淑云代表立教俱乐部出席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文化先进单位表彰大会。五十年代的群众文化工作,从无到有,为房山的群众文化事业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培养了一支群众文化工作干部,和基层文艺骨干,那时候文化干部长年深入基层,和基层文艺骨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种不怕吃苦,克服困难,联系群众的工作精神,在今天仍可供借鉴。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房良地区历史上的地震及其它

赵思敬

房山、良乡地区的地质情况与地震有着密切的联系。大房山中的碎屑岩飞风景秀丽的百花山,被称作“江南小桂林”的十渡山水,还有自金代就开始采掘的煤层……这些都是地震造成的“杰作”与“财富”。当然,自人类社会形成之后,地震也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和痛苦。

在房山区境内,有明确地震记载的当属现存于云居寺内的《大唐云居寺石经堂记》,碑文中说“……自大海沸腾,群山振烈……□□□,□□春□日,迂于石室,克巩克固,是局是室,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寂然兮不动,法力兮所凭。”此碑建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文中所说“大海沸腾,群山振烈”;“严高岸为谷,深谷为嫁”。即指地震现象。但所指庸开元十四年前的那一次地震目前尚无资料证明。此后的四百多年里,北京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几十次地震,但因文字资料欠缺,房、良地区的震情不得而知。只能根据震中、震级进行推算。如元代脱脱等人撰写的《辽史·圣宗本纪》中,就有“南京地震”的记载,辽之南京即今北京市旧城西南,属析津府,良乡亦在辖区之内。又据其它方面资料推算,此次地震为4.5级,良乡距京城只有60里,人们没有震感是不可能的。当忽必烈的铁骑横扫了辽、宋,元代定都于北京,北京便被称作“大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北京地陷,人民震惊。”(《元史·张立道传》),又据《元史·越孟顺传》:“是岁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河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此次地震震中虽在今内蒙古宁城县,但因震级达到六级以上,波及昌平、北京、良乡、清苑、任丘等地。由于此次地震破坏程度较大,元世祖忽必烈以为是天神降罪,因而大赦了天下。有意思的是,促成“大赦”的动机,竟是忽必烈与大臣梁德圭的谈话。梁德圭,良乡人。元人袁桷所著《清容居士集》卷三二《推城保德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傅上柱国追封蓟国公谥忠哲梁公行状》:“公讳德圭,字伯温,姓梁氏,大兴良乡人……。至元十六年,升中书左司员外郎。二十三年,迁右司郎中。逾年复左司。二十六年,进太中大夫,总管大都等路打捕府,仍领左司;是岁复右司。……戊子岁(此应为己丑岁,史家皆疑为笔误,固与前文不合),地震北京,世祖问今岁刑部所报囚徒何须多,公对曰:‘囚非犯刑罪,特以征索罗识无所从纳,故悉为囚在狱中。’上大感悟,乃悉赦天下。”由此可知,因为地震,才使得大批无辜的百姓逃出囚笼。亦可见元人对北京地区的统治相当残暴。

朱元璋借农民起义之势,推翻了元朝的黑暗统治。北京,仍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地震灾害也时有发生。据清李庆祖修、张璩纂的《良乡县志》载:明武宗“正德六年(1151)春地

震。”是年十一月戊午，《正德实录》卷八一载：“京师地震，……良乡、房山……等县……皆有声如雷，动摇居民房屋。……至庚申，凡十九次震，居民震惧如之。”三日之内，竟有十九次地震的骚扰，人心惶惶可以想见。如果说，这次地震造成的只是心理上的恐惧。那么，到了明世宗嘉靖三年四月的一次地震，就使人不知所措了。请看：“丙申，顺天府王轨报：房山县地震，因言数月以来，震于诸藩，于南都。乃今于畿内寝近城阙陵寝，灾莫大焉……”（《嘉靖实录》卷三八）过了一个月后，明人徐学聚撰《国朝典汇》卷一一四中又写道：“房山地震，顺天府尹王辄言。数月以来震于诸藩于南都，乃今于畿内侵近城阙，灾莫大焉。”震前连续数月不断小震，人已麻痹，突然大震，使人防不胜防，措手不及。时隔一年，即嘉靖四年，《明书》卷八五又载：“房山地震”。明毅宗崇祯五年（1632），七月丙辰“是日，昌平、遵化、通州、霸州、文安、良乡、固安诸处同时地震。”（《崇祯长编》卷六十一）房、良地区地震频繁，可窥一斑。

清代于1644年建都北京后，地震更加激烈。康熙十二年钞本《良乡县志》（以下简称“钞本”）载：康熙四年地震。这次地震，使许多房屋遭到破坏，清人赵吉士著《万青阁自订全集》中说，地震发生前，“余与邵子峻奕，子峻怖走树下，余徐徐敛子起，子峻急呼余出，一楹正坠奕所。余心不为之动。”如行动不快，这位下棋的赵吉士就可能死于非命了。钞本县志又载：“康熙七年（良乡）大水、地震，水入西门，至县治，街内外深数尺，南关阁房冲坏过半。“从这条记载可知，良乡城的这次地震和水灾是同时而来的。县城内民房冲毁过半，且水深数尺，人们连逃命都顾不过来，谁还有能力去保护县治中存放的档案呢？难怪良乡的方志材料有许多年是断档的。

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据天文科该直五官灵台郎贾善等呈报：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时，地动有声，从东北良力起。”（《钦天监治理历法南怀仁等题本》）。清人董含《三冈识略》卷八载：“七月二十八日巳时初刻，京师地震。自西北起，飞沙扬尘，黑气瘴空，不见天日。人如生波浪中，莫不倾跌。未几，四野声如霹雳，鸟兽惊窜。是夜连震三次，平地拆开数丈……涿州、良乡等处街道震裂，黑水涌出，高三、四尺。”又据今人李善邦著《中国地震目录》载：此次地震“良乡：倾塌瓦房十余间，土房四十余间，损伤土房、瓦房百间、街道震裂、水涌高达三、四尺。”《故宫档案》也记载了房山在这次地震中的损失：“房山四官庄，共瓦房一百七十间，圮二十一间，坏七十八间；共土房九十四间，圮三十七间，坏二十五间。”此次地震，举国震惊。这是京师地区文字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这次地震，使北京的许多衙署、民房、宫殿、寺庙、会馆均遭到惨重的破坏。计倾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三间，坏房一万八千零二十八间，压死人四百八十五名。据考证，这次震级为8级。

时逾一月，地震再次降临京师。内务府大臣嘎鲁于八月十六日向康熙奏称：此日地震，有“房山庄头二人”及“琉璃河庄头一人”等共计二十八人，禀称：“地震之时，圮瓦房一百二十八间，土房九十二间，楼五间。房墙倒塌者，瓦房五百六十七间，土房七十三间，楼十六间。村死妇女二人，女孩一人，重伤妇女一人。死驴二头，猪七口。毁马槽二百零五个。煮料锅十六口。”房、良两地区的损失，亦包含在内。

此后，地震又蹂躏了良乡县，事见“内务府奏销档”记载：“索额图属良乡长定各庄头刘奉春共瓦房五十二间，其中圮三间，残二十四间；土房七十间，圮九间，残六间。”这条记载，不但使我们了解了地震破坏的程度，也意外地知道了康熙朝权倾一时的太子太傅索额图，在良乡还有一个五十一间瓦房，七十间土房的“庄园”。连索额图的房子都损坏得这么严重，那平民百姓的损失就可想而知了。

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十六日，地震在夜幕的掩护下，突袭了良乡和房山。直隶河道总督文斌在给乾隆的奏摺中说：“……臣于（六月）十二日早自京师起身，过芦沟桥四十里永定河南岸头工地方住宿，初更时，地微动，众人多有惊觉。”按推算，过芦沟桥四十里，当在今天的葫芦堡一带。对于这次地震，直隶总督那苏图（逝后葬于今燕山地区北庄村东，墓及碑于1964年时毁）于同年六月十一日的奏摺中也曾提及“十二日戌刻地中觉微动，自西北而来，在城民庐舍宇并无摇感，间有土墙坍塌之处，民间并无惊恐，各皆安帖”等

情。又据通州、良乡……等处禀报情形相同。可见，久经地震的人们对一般性的摇动已经不以为然了。十天之后，那苏图又上了一道奏摺，报称他查访的经过：“六月十二日戌刻地觉微动……城乡人民亦未及知觉者，并无摇撼民居损坏墙垣之事……房山、涿州、怀柔、密云等州县禀报相同。”十天之内，作为直隶总督的那苏图，亲自到州县去考察灾情，这种责任心也算难能可贵。难怪在他死后，乾隆帝赐给他的谥号为“恪勤”。

综上所述，从唐开元十四年(726)至清高宗十六年(1751)，1025年间，仅京师房、良地区就发生了那么多次毁灭性的地震。由此亦可知，防震抗震工作的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作者系区文联干部

房山地区的地震和测报工作

李国栋

地震是一种极普通的自然现象，是由于地球内部应力引起构造变动而发生的，并以地震波的形式向四周传播，使地面发生震动。

我国地处环太平洋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山地震带的交界位置上，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我国自本世纪以来的八十年内就发生破坏性的地震2600余次，其中6级以上地震500余次，8级以上地震9次。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就是我国1556年发生的陕西华县大地震，死亡人数约达83万余人。1976年我国发生的唐山大地震，震级7.8级，死亡人数约24.2万。地震是危害人类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

房山区地处房山—怀柔地震亚带上，区内有山区、平原及其过渡地带。中山、丘陵、平原等地形，地貌类型齐全，地质条件复杂。因此，尽管区内历史上没有发生过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但是震级在4.5级以下的小震则频繁发生。

据《北京郊区地震目录汇编》记载，仅从1959年至1986年，房山区内有明确记录的小震就有293次。从时间上看基本上每年都有数次地震发生，以1967年为最，多达38次；从震中分布上看，多在西部山区周口店至北京一线；震源深度多在5—15公里，属浅源地震。其中2.0—4.5级地震共发生33次，区内最大的4.5级地震共发生过4次，地震时虽震中震感强烈，但均未造成地表破坏和人员伤亡，具体震况如下：

表1. 1959—1986年震级次数

震级	<1.0	1.0-1.4	1.5-2.4	>2.4	合计
次数	81	88	112	12	293

表 2. 1959—1986 年区内大于 2.4 级的地震

时 间	震级	经 纬 度	地 点
1496.3.8	4.5	39° 7' 、116° 0'	北京涑水（房山马各庄）
1525.3.8	4.0	39° 5' 、116° 0'	房山（涿县东）
1548.8.8	4.5	39° 6' 、116° 2'	周口店附近
1959.3.25	2.5	39° 45' 、115° 52'	房山西北
1961.2.2	2.5	39° 36' 、115° 45'	周口店西南
1961.7.9	3.0	39° 42' 、115° 48'	周 口 店
1963.10.23	3.1	39° 38' 、115° 46'	周口店西南
1963.12.15	3.1	39° 31' 、115° 45'	涑水东北
1964.3.4	3.5	39° 43' 、116° 0'	房山良乡
1964.3.30	4.5	39° 45' 、115° 54'	房山饶乐府
1966.1.19	3.17	39° 48' 、115° 54'	房 山
1966.3.20	4.5	39° 36' 、115° 06'	涿县北（东西南吕）

房山区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周围地区破坏性地震的袭击。地震在房山区造成的灾害性影响迄今共有五次，其地震发生时的震级均在 6 级以上，影响到房山的烈度也都在 6 度以上。详见下表：

次	时 间	地 点	震级	距房山 (km)	影响烈度
一	1057.3.24	北京大兴县附近	6.5 (九)	20-30	7°
二	1658.2.3	河北涑水	8 (十一)	90	7°
三	1679.9.2	河北三河一平谷	6 (八)	40	6°
四	1730.9.30	北京西郊海淀	6.5 (八)	40	6°
五	1976.7.28	河北唐山	7.8 (十一)	170-230	7°

据《中国地震目录》〈第二集分县地震目录〉记载，1679 年 9 月 2 日，河北三河一平谷发生地震时，房山四官庄瓦房共 170 间，毁 21 间，坏 78 间。土房共 94 间，毁 37 间，坏 25 间，烈度为 7。良乡各官庄共有瓦房 162 间，倒 21 间，圯 87 间。土房 121 间，圯 47 间，圯 9 间。据区地震办调查资料记载，1976 年唐山地震发生时，房山区共损坏房屋约 22602 间，其中严重破坏的达 4930 间，损坏率为 42%，死亡 2 人，伤 75 人。东西长沟村、沿村、五侯等地受灾严重，唐山地震发生时沿村有喷水冒砂等现象。东西长沟村共有房屋 2133 间，损坏 2025 间，其中倒塌 1367 间，损坏率为 94.9%，倒塌率为 64.1%。五侯村共有房屋 2134 间，倒塌 541 间，损坏 970 间。

1965 年河北邢台地震之后，房山区开始设置监管地震预测的人员，并在豆店、琉璃河设水位观测点，在官道设置土地电观测点，崇各庄水库、长沟小学等地设置水位、土地电综合观测点。到 1974 年 10 月，区

里委派专人管理地震工作，业务归市地震办公室，隶属房山科委办公室。到1975年在各观测点都配备了3—5人进行有关的记录、通讯，业余观测的人员多达170余人。到12月底又新增地磁、应力等观测点，这年，综合观测点多达23个。唐山地震之后，区委更加重视对地震工作的研究，1976至1979年，先后增派地质、物探、气象、地震等专业技术人员各一名，充实房山地震办公室的技术力量。

目前，区财政局在原每年5000元地震办经费的基础上，每年为其拨款近5万元。另外区地震办在市地震办的帮助下又安装了100多万元的新设备，对地震的预测采用了先进的美国地下体应变自动传输装置，及地上电磁波试验装置，对资料的记载、分析，全部由计算机完成，对水位的观测也采用了先进的水位自记仪。

地震对人类的危害很大，但它是可以预报和预防的。

注：根据房山区地震办公室提供资料整理。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经过

曹火星 口述 段汝连 整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表达中华民族心声的歌，已经传唱了半个世纪，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妇孺皆知，家喻户晓，这首不朽的歌，最初是从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传唱出来的。

今年8月15日下午6时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作者，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曹火星同志偕夫人毛乐静同志，在天津市文联、音协及房山区委宣传部，霞云岭乡有关领导陪同下驱车来到地处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堂上村，重话这个当年战斗过的山村。8月16日上午，在房山宾馆三楼会议室，我们请曹老介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创作情况：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六个年头，也是最困难的时期，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我们针锋相对，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晋察冀边区抗联委派群众剧社（40余人）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平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坚持抗战。我当时19岁，小分队一共4人，有赵艺平、赵克、张学明。群众剧社小分队9月初从晋察冀边区总部驻地阜平出发，下旬来到堂上村，具体活动是书写抗日标语，组织村剧团创作演出文艺节目。当时“霸王鞭”在平西很流行，就决定用民歌曲调填新词，用“霸王鞭”的表演形式进行宣传。小分队用了几天时间，填写了四首歌，其中有两首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另外两首是批判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最后又考虑还要创作一首能概括前四首歌内容的歌，这样就完整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有一句话：“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针对这句话，我就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作了歌的标题，既有力地批判了蒋介石，又符合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事实，还有凝聚力和号召力。当时，我这个青年人满怀抗日救国激情，经过四、五天的构思。这首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歌曲在堂上村写出来了。小分队先教小学生唱，村剧团唱，很快学会了，演出了，歌曲在堂上村一带流传开来，十月底群众剧社回到了专区，正值专区办县级干部学习班，涞水县的一位干部听说我写出了这首歌，就要去了词曲，第一次油印成“歌片子”，在县里传唱，这年冬季边区在易县举办千名干部学习班时我又教唱

了这首歌。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这首歌也唱遍了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一句中，加进了一个“新”字，这首歌曲就从那时唱到现在。

附：

毛主席给加的“新”字

延 燕

晚报1994年10月13日第11版刊登张玉泉同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一文，详尽介绍了此歌由来。这使我想起到一件难忘的往事。

四十五年前，我们这些经过战争洗礼的孩子告别硝烟弥漫的战场，随部队进入北平。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儿童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录制解放区的歌曲。华北军区八一小学小合唱队准备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注：曹火星同志原歌中没有“新”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儿童好比一支花》等歌曲，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要在麦克风前把歌声传遍全国，大家既兴奋又紧张，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练唱，我当然也不例外，走到那儿唱到那儿，就连星期六回家的路上也蹦蹦跳跳地练着歌。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小燕子，你唱的什么歌呀？再唱一遍给我听听好不好？”我顺着声音找去，原来是毛泽东同志，我赶紧说：“毛伯伯，您好！我唱得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您想听我唱这支歌？”毛泽东同志微笑着点点头。我把书包放在地上，放开喉咙唱了一遍。毛主席听后说：“你唱得挺好，就是有个地方唱得不太对。”我想了想说：“没错呀，老师就这样教我们的，大家也都这么唱，我都背了好多遍啦。”毛泽东同志问我：“小燕子，你说中国共产党是哪年成立的？”我说：“1921年。”掰着手指算了算补充了一句：“快三十年啦。”毛泽东同志又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年成立的？”我立刻回答：“这谁不知道，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接着再问：“中国有多长的历史？”这可把我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考住了，我想了一会儿，小声说：“大概有几千年吧？”毛泽东同志耐心地教导我：“你好好想一想，中国已有五千年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才几十年，先有中国还是先有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哟？”我无言相对，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同志背着手沉思了一会儿，笑着对我说：“别发愁了，小鬼，我帮你加一个字就没问题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呀？”我听后高兴得拍起手来，连声说：“对，对，太对了。”

回学校后，我向老师汇报了毛主席改歌词的事。在庆祝新中国少年儿童的节日时，我们放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很快这首歌唱中国共产党缔造新中国之歌就唱遍了全中国。

最近我在读逢先知同志所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得知，毛泽东同志将此歌词的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对原歌词做了修正。难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整个中国，成为人人爱唱的歌曲。

（原载《北京晚报》1994年11月16日11版）

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

张玉泉

国庆节前夕,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组织艺术工作者赴革命老区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深入生活,进行慰问演出及参加曹火星同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创作地纪念铭碑揭幕活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支歌曲,就诞生在霞云岭乡堂上村。

1943年10月,我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19岁的曹火星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房涞涿联合县堂上村,宣传抗日,开展扶贫。曹火星与张冀平等四人就住在村南的古庙里。他们的任务是宣传反法西斯、反国民党独裁,坚持抗战到底。针对当时国民党散布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反动口号,进行针锋相对的宣传。曹火星坐在大庙里利用一周时间编写词曲,编完后又坐在东屋炕沿上试唱,然后教当村十多岁的孩子唱着这支歌,打霸王鞭,边唱边跳。现在村里六七十岁的老人李福会、李万深、李增生等人当时只有十四五岁,他们都是那时学会这首歌的。

当年冬晋察冀边区在涞水办各区县干部训练班,第一次油印歌片、教唱,后来在易县又办训练班还是教唱这首歌;1944年8月军区印了铅印本;张家口解放后曹火星到电台教唱。解放东北时歌声带到了东北;南下后歌声又飞到了江南。解放后周扬和康濯到阜平石侯村见到曹火星说:“你干了件很好的事,写了个很好的歌,你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从此,这首歌在全国更广泛地传唱开来。

(原载《北京晚报》1994年10月13日副刊)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的诞生

王洪钟

京郊西部的房山区霞云岭乡是老革命根据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许多老区人民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动人事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词曲的最早词曲就创作在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村西中堂庙。

1924年10月出生,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词曲作家曹火星同志,原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今年六十八岁,现已离休。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根据曹老的回忆,市委宣传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及天津市文化局的同志先后到堂上村进行考察,并确证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遗址。

在革命回忆录《燕山儿女》中,陈靖同志的文章《百花山上一枝花》记述了在抗日战争中战斗在华北最前线的挺进剧社的成长与发展的情况。当时,陈靖同志任挺进剧社社长,曹火星同志是剧社成员。

挺进剧社是八路军一二〇师挺进支队(宋时轮支队)中的一支抗日救国宣传队伍,宋时轮支队的政治部

主任是伍晋南同志，剧社就是由他一手创建的。剧社从1939年2月开始筹建，5月1日正式成立，在政治部召开的会议上由伍晋南同志正式定名为挺进剧社，剧社由三十四人组成，陈靖同志为社长，建社地点在京西百花山下山坡西的庄头村，即现在河北省涑水县境内著名的旅游胜地——野山坡（也称野三坡）。剧社编有戏剧、歌舞两队，还成立一个总务组。戏剧队长陈靖兼任，歌舞队长为袁琴谱，总务组长为吉盘磨。当剧社正准备迎接“五一节”时，伍晋南同志接到上级指示，要尽快做好迎接“七七”的准备，即在卢沟桥事变两周年时，准备在卢沟桥至南口这片地区展开一系列庆祝抗日战争两周年活动，要求剧社同志立即出发，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5月2日晚剧社到了霞云岭境内的堂上村，社长陈靖同志宣布就地宿营，他们选准了堂上村村西的中堂庙做为宿营地。

这座中堂庙位于堂上村西端的一个小山脚下，庙的两侧有两条清澈的小溪，正面为一个大殿，非常宽大，庙的正中有尊泥佛像，看上去金壁辉煌，佛像前还摆着香炉。庙的东面有三间配房，房里有几尊小泥佛像，配房后面对着村里，上面写着：“团结紧张、朴实虚心、勇敢活泼、向前迈进”十六个大字，墨笔黑字，至今清晰可见，这也是曹老最熟悉的。这座庙的正门向东，靠门外的一棵柏树上挂着一口用青铜铸成的大钟，高一点五米，钟口直径大约零点六米，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运到蒲洼兵工厂造了炸弹。庙的周围遍布苍松翠柏，显得十分庄严肃穆，宿营在这个地方一是便于集中，二是便于烧水做饭和队员们洗漱。当晚，剧社的男同志住在正庙，女同志住在侧庙。曹火星同志和战友们一起住在正庙，他们在地上把背包一打，睡在地铺上。就在战友们熟睡的时候，曹火星同志点亮了马蹄灯，开始构思创作，经过一夜的思考、写作和修改，第二天拂晓终于写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歌的最早词曲。当时的歌词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一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抗战胜利后，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增加了一个“新”字。“他坚持了抗战一年多”改成了“他坚持抗战八年多”。而曲调没有变。

据堂上村老党员李福会回忆说：“挺进剧社来堂上村那一年，是1939年5月，当时我只有十八岁，我们听说挺进剧社从野山坡过来了，我和村里的安兆兰、史甫亭几位小伙伴到中堂庙去看热闹，我看到他们有的穿着黄色的衣服，有的穿着灰色的衣服，他们带的乐器儿也叫不出名，觉得很新鲜。他们之中大多数和我们年龄差不多，我们很快就交上了朋友，他们教我们唱歌、说快板、扭秧歌，至今我们记得还很清楚，特别是扭秧歌，边扭、边唱、边敲锣打鼓，非常有意思。可第二天他们就走了，我们很舍不得他们呢？”李福会老人还回忆说：“挺进剧社走后大约一个月，又回来了两名成员，来到我们堂上村，男的姓张、女的姓刘。他们回堂上村是为了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文艺宣传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他们到村里以后很快把村里二十多名男女青年组织起来，在中堂庙教我们排练节目。当时我也参加了文艺宣传队，我们学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支歌，还学会了《大刀进行曲》、《大后方》，学会了《锄头舞》、《镰刀舞》、《团结舞》等，还学会了许多快板书。我们排练的话剧《血泪仇》在抗日边区的群众中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那时候，堂上村有七十多户，二百多口人，每天晚上都有人来看我们排练节目。我们宣传队成员也教他们唱歌，大家最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村里显得十分热闹。”李福会老人还回忆说：“当时我还表演了一个节目叫《乞丐抗日》、我上身穿着一件破羊皮袄，腰间扎着破麻绳，手里拿着两根骨头，边说边表演，其中有几句是：‘别看我花儿巧，讨饭也得仁义在。拥护八路军打日本，把我的老命卖一卖’。”

剧社的二位同志来了半个多月就要回去，临走那天，全村人把他们送到村外。

曹火星同志创作词曲的中堂庙，也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抗日战争时期，这座庙被日本鬼子先后烧了三次。曾做过堂上村村公所。解放初期为堂上村小学，后来小学迁址又做为大队办公室，办公室迁址后又

做为粮库，“文革”时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农村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解体，没有了粮库，这几间破庙卖给了堂上村村民李增青。1984年，他把正庙翻盖了三间新房，但东面的配房仍保留着原来的样子。

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保护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遗址，霞云岭乡党委和堂上村党支部在建党七十周年之际做出决定，保护和修缮这一重要遗址，做为今后对党员、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

今年九月份，霞云岭乡党委在中堂庙院中建了纪念碑，碑的后面是这首歌最早的歌词，正面刻的是碑文，碑文是这样写的：

公元一九三九年五月八路军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抗日救国宣传队挺进剧社在社长陈靖向志带领下从河北省涞水县山南村出发到卢沟桥至南口地区进行抗日战争两周年宣传剧社一行经过长途跋涉至堂上村当晚宿营在中堂庙就在这天深夜剧社成员曹火星同志在正庙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歌的最早词曲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及这一词曲创作地的重要发现特此立碑以示纪念

1991年6月27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琳同志专门采访了堂上村老党员李福会、李增生、李万荣等七位老党员，并考证了这首歌的创作地，在6月30日的建党七十周年“康乐宫”专题节目中，进行了详细报道。之后天津文化局的同志也到堂上村进行了考察。去年10月2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祖国各地”节目中进行了录音报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苏京平同志在北京广播报上以《不要忘记这块热土》为题也进行了报道。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作者系原区政府副区长

知识分子训练班概况

王硕儒

1948年12月，晋察冀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速。察哈尔省第三专区（平西）的涞水县、涿县、房山县、良乡县四座县城和广大地区，都已全部解放。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地方干部严重不足。为了快速培养大量干部，察哈尔省第三专员公署举办了知识分子训练班。

1948年12月中旬，察哈尔省第三专员公署知识分子训练班在房山县南白岱开学。参加学习的学员来自涞水县、涿县、房山县、良乡县四个县的知识青年，共二百余名。这些青年大部分是初中学生或高小毕业生，年龄最小的十五岁，都是由各县、区选送的。训练班设总部，由专署李午亭、陈啸二人负责。总部下设涞涿、房良两个大队。房良大队由房山县教育科长康健负责房山县学员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大队以下按居住地点设中队，每个中队一般十至十五人。训练班的学员，完全坚持自愿的原则，对不愿学习的学员不强留，因而不

少人不辞而别。如房山县有个村，开始选送十二名学员，几天后，不辞而别的就有九名，最后只剩下三名。

二

训练班学习的内容是：形势和政策、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突出讲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我国历史上历次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之快，必然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土地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敌伪人员的政策；中国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等内容。

训练班的学习，主要采取讲大课的方式进行。把学员集中在一个大院内，由李午亭或陈啸同志主讲，然后以中队为单位组织讨论，重点是领会精神，加深认识，不懂的地方可以提问。讨论情况，由中队长定期向大队汇报，对学员提问的问题，下次讲课时予以解答。

训练班的大队，设有墙报，要求学员结合个人实际，写出学习心得，向大队投稿，大队在墙报上予以发表。如在学习党的政策过程中，曾号召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反动会道门等)的学员，要放下包袱，在自愿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向大队登记。当时，有历史问题的学员，大部分都进行了登记，并有的在墙报上公开发表。

三

这个知识分子训练班，属于抗大式学校，无固定校址，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曾两次迁址。第一次迁址是1949年2月，由房山县南白岱村迁往洪寺村；不到一个月，又由洪寺村迁往良乡县城北大街。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学员在陆续安排工作，到3月份已全部结业。结业时，房山县除少数学员因年龄太小未分配工作外，有三十八名被安排适当工作。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原良乡县文化馆的初建与发展

张本荣

原良乡县文化馆于1949年8月正式建立。(开始叫“民教馆，后改名文化馆。)县领导对建馆很重视，从政府教育科调我负责这项工作。县委书记霍梁同志亲自找我谈建馆的意义、任务和要求。我听他讲建馆不给开办费，不配一个帮手，甚至连馆址设在哪儿也让自己去想办法，感到心里没底，困难很大。但由于领导非常重视，也坚定了我接受这一任务的决心。

首先选定馆址。为了方便群众，把馆址设在城内中心为宜。我在四条大街上反复察寻：终于在城内中心地段的东北角发现有五间临街的大北房。地势高，房间大，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可是房子属于二街一户

私人住宅。或买或租都得用钱，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向上伸手要钱，是不可能的。还是要眼睛向下，依靠群众解决困难。我便去动员二街的干部，请他们予以支持、帮助。经过他们的努力，当年把房子暂时借过来了，馆址的问题解决了。但设备一无所有。如开办书报阅览室。再简陋也得有放书报的地方，读者来了得有个座位。花钱买或是新做一套，都不可能。这时我想到去找二街干部，在二街政府发现有不少桌椅板凳，在一间空屋子里扔着。据说这是土改时分剩下的胜利果实。这对我来说，就算是贵重物品了。经二街干部的同意，从中挑选了一部分桌凳、大茶几等，作为借用。因陋就简，总算把一个书报阅览室装备起来了。正式开馆后，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因为良乡县刚刚解放，城内闲居待业人员不少，特别一些有知识的人，他们都很想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政策。认为政府给提供这样一个学习场所，深得人心。中小学生，也常利用课余时间来找一些课外读物等。一些中老年人，多数都在晚上来翻阅报刊。有的外地人来良乡，也来馆浏览一番。根据群众的需要，我把阅览时间规定为早八点到晚九点。每晚馆内灯火通明，因为有些人很习惯晚上来馆读报，认为晚饭后有个闲逸轻松地方，还供给报刊阅读，是一种精神享受。总之这个场所颇受群众欢迎。

随着形势的发展，文化馆又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首先在城内建起了一个五街剧团，行政领导由五个街的干部选任。文化馆负责业务指导。提供剧本，组织排练等。城内年轻人很多，都积极要求参加。这个剧团虽然是五个街的，但剧团若发生了矛盾，都找文化馆来协调解决。文化馆长兼任良乡县群众文艺联合会主任职务。他们都承认文化馆是剧团的领导者。

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和党的推陈出新文艺工作方针，一方面积极发展新文艺；另一方面还要大力改革旧文艺。良乡县的文艺团体如窦店、琉璃河、交道等河北梆子剧团，尤其是窦店话剧团，在方圆左右，都是很有名气的。对这些文艺团体，必须按着党的政策，既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又要对他们进行团结改造。每年在县里召开一二次文艺工作座谈会，请县里的主要领导出席，并请一些主要演员参加。互通情况，交流思想。大家热情都很高，一致拥护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当时县里的机构还不健全，并没有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每项具体工作都是由文化馆承担。

良乡县原属河北省通县专区领导，河北省于1949年召开成立省文联大会。每一个专区选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大会。我代表通县专区县一级代表出席省文联成立大会。这是解放后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省委领导非常重视。省委书记林铁、省主席杨秀峰、省委宣传部长金城等同志，都自始至终，亲临大会并讲了话。大会开得隆重热烈，与会者深受教育，深受鼓舞。还让我参加了由杨秀峰主席亲自召开的座谈会。

文化馆归属教育科领导，但主要工作都由县委宣传部长亲自抓，把文化馆工作列为宣传工作一个方面。文化馆并没有多少力量，筹建时只我一人，开馆后给我配备一个良中毕业的中学生(王书田，已故)，两年后配到5个人。

在社会宣传上，在文化馆门前墙壁上，涂一块大黑板，在五街政府门前墙壁上，也同样各涂一块黑板。各街都出人定期更换刷新黑板报内容开展宣传工作。

由于县委领导重视，文化馆后来又买了扩大器，在城内四条大街上都安装了高音喇叭。

在文化馆内建起了广播站，搞有线广播，配备专人，定时播放本县新闻和自编节目。

土改后，农村的土地房屋等问题纠纷不少，涉及到一些政策问题，群众都不明确，文化馆出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消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在文化馆的门前，挂上了“问事处”的牌子。开展政策咨询服务。牌子挂出后，前来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当时是只有我一人接待。一天到晚下不了班，吃不上饭，而且一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非常复杂，群众虽然满意，认为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地方，实际文化馆难能承担这个任务，因此“问事处”的牌子没挂多久就摘掉了。

当时我还兼任“中苏友好协会”的秘书以及负责会员登记，颁发证章等一些具体工作。这份外工作，是上级指定要做的。发证章收会费也避免不了一定财务手续，有一定工作量。

文化馆建立后，不仅开辟了书报阅览室，而且也搞了大量文化活动和宣传工作。由于当时县里一些组织机构还不健全，文化馆兼管过县的文化行政领导工作，又属县委宣传机构。在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教育群众开展文化宣传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解放初期房山几个文化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段汝连

五十年代，是我区文化事业的创建阶段，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对文化生活有了普遍的要求。为适应这种形势，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陆续建立了文化馆、站、电影放映队、评剧团等文化事业机构，形成了我区文化事业的雏形。

长沟文化站

长沟文化站是房山县第一个文化站，建于53年，属于县文化馆的派出机构。站址在东长沟的一所小三合院内。

院内北房三间是乒乓球室，有一台球案。东房两间，是图书室，有两书架图书和书报阅览桌。西房两间是办公室。宣传器材有：一个干电池的五管收音机，有输出插孔可以接一支小高音喇叭，有一架以汽灯做光源的幻灯机。有几块宣传画牌子和图书报刊等。主要业务活动是：收音工作，每天早晚各一次用收音机播放新闻节目，有时也用自行车带着收音机到临近的农村去组织农民收听。美术宣传是以宣传画和大字报加插图的方式进行时事政策宣传。开展图书报刊借阅、乒乓球活动和对群众文化活动进行辅导。逢节日或有中心工作，县文化馆也到长沟文化站搞展览。1955年春天县文化馆的晋怀儒、县防疫站的李金符和我们曾到长沟文化站去搞文物和妇幼保健展览，适逢集日，参观的人很多，内外都很拥挤。

长沟文化站虽然设备简陋，但在配合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农业合作化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文化站干部冯汉云很能干，又联系群众。利用业余文艺骨干作为开展各项活动的助手，解决了事情多人员少的困难，把文化站搞得十分红火，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1955年被河北省文化厅评为先进文化站。

房山评剧团

房山评剧团，原名群众评剧团，是一个民间职业剧团。1958年以前隶属于河北省通县专员公署文化科，称河北省通县专区评剧团。1958年房山、良乡合并为北京市周口店区。通县专区评剧团划归周口店区，改称周口店区评剧团，1960年区改县，评剧团也改称房山评剧团。

房山评剧团的主要演员有鲜灵芝、金玉霞、孙文元，后来又有青年主演王秀英。上演的主要剧目有《秦香莲》、《三看御妹》、《刘云打母》等，后来又向中国评剧院学习了《夺印》、《金沙江畔》等现代剧目。团址

就设在现在的建委的里院。演出的剧场就是现在的房山宾馆礼堂。团长是孙文元，指导员是蒋化民。1964年以后是安法鲁。剧团除在剧场演出外每年都下乡巡回演出，很受群众欢迎，几位主演房山的观众都很熟悉，在房山地区其知名度就如现在的歌星一般，口碑很好。剧团也常到河北、内蒙等地演出，营业情况有时好，有时差。业务好的时候还用营业收入添置了服装、活动舞台设备。业务差的时候连回来的路费都不够。流动演出生活十分艰苦，在城镇演出住小旅馆，有时还住在后台或舞台上。到农村演出自带行李，住老乡家吃派饭。剧团内党、团组织健全，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演职员有克服困难，不怕吃苦，联系群众的好作风。

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中央文革出了一个“文艺十二条”文件。其中有一条规定：“不能为本地服务，营业收入又不能自给的剧团要转业到农村插队或到城市插厂”。当时很多剧目都被禁演，剧团没戏可演，当然也就没有收入，经济当然不能自给，剧团的出路只有在插队、插厂二者中选择，权衡结果，还是插厂比插队好。通过曾在北京东郊构件厂演出时建立的联系，该厂同意接收剧团集体插厂转为该厂工人。工种、工资都根据工厂情况重新确定，一般青年演职员收入变化不大，主要演员一下子从300多元收入变成了五、六十元，收入减少了许多。

1977年，原房山评剧团的一部分演职员，曾向市文化局反映要求恢复剧团。我跟着当时的文化科长王建忠到市文化局落实政策办公室和剧团的几位代表开过两次座谈会，会议是由市文化局的曾平主持的。最后是因为演职员在十年之中家庭、子女、居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回房山工作生活、居住、子女入学都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一致同意，不再恢复剧团了。1987年鲜灵芝、金玉霞、王秀英等几位演员到区文化文物局，要求落实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资政策，经请示市委宣传部，同意参照崇文区的作法，一次性补偿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插厂而减少的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由市财政拨款解决。为此，我与张桂霞又到东郊构件厂工资科调查原评剧团插厂人员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工资变化情况，逐年查阅工资表、抄录每个人十年间工资变化数字，然后汇总计算。前后用了半年时间，在调查计算的基础上经区财政局，向市财政申请拨款65万元，解决了这一问题，补发工资后，大家都很满意地回厂了。

房山电影放映队

1956年房山县第一个电影放映队建立。归县人委文化科领导。电影队一共四个人，队长见庭柱，放映员王道桐，发电员邵宪文，财务马宗尧。后来见庭柱调走郑全武任队长，马宗尧调走又来了张瑞云，还是四个人。电影放映队有一台德国“蔡司”16毫米放映机，一台汽油发电机，还有一辆马车，这就是电影放映队的全部家当。队址在县人委大门外东侧的三间平房内。那时房山城没有电，靠一台与放映机配套的发电机供电。放映场地在房山中学操场。由于放映队人少、放映好片时县文化科都组织文化馆的干部去协助收票和维持秩序。当时房山城人口不多，人们也守秩序，每次放映都很成功。但是有一次放映《白毛女》出了点小事故。正放映到插曲“半间草屋做新房”时，突然发电机出了故障，随即灯光渐暗，音乐节奏、音调也低下来，最后是全场一片黑。经过一番修理，灯亮了又继续放映。

电影队经常下乡演出，由马车拉着放映器材、人员、行李巡回放映，丰富农民文化生活。1958年房、良合并时良乡县电影放映队的宁伶、柳贵、程玉、刘维宪和京西矿区的张士昌都合过来了。宁伶任队长、郑全武任副队长，人员增多了，业务内容也丰富了，这时又增加了影片发行、放映设备修理，基层电影放映员培训等多项业务，在电影队以外又建立了房山电影发行站，电影队和发行站部搬到了南大街文化馆院内。人民公社化以后，全区六个大公社都建立了电影放映队，县工人俱乐部和一部分区直厂矿、中央市属厂矿纷纷建队。1960年以后公社规模变小，原来的管理区改为公社建制时又建立起一批电影队。这时期是房山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巅峰时期。全县130多个放映队形成了一定可观的放映队伍，把电影普及到农村、工厂一

度成为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主流。电影放映队开展学习乌兰牧骑和三姐妹放映队活动，通过幻灯快板等形式配合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活动，十分活跃。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为建纪念堂开采汉白玉的经过

隗瑞艳

1976年11月中旬，房山县委接到上级指示：中央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需用京西房山汉白玉石料约1200立方米，主要用于纪念堂建筑的360套栏板、720根柱子、毛主席坐像、地伏、甬路等方面，时间要求是1977年3月底前完成。当时，这属于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县委立即成立了总指挥部。副书记梁钧华任总指挥，县农机局局长郑玉山、南尚乐公社书记宿廷增任副总指挥。

房山汉白玉产地为南尚乐公社石窝、高庄等村。其特点是细腻、柔软、透明、坚而不脆、白而不骄、耐风化，是用于雕刻的上等石料。宿廷增从县里领到任务后，回去马上召开各村书记会，传达上级指示，讨论制定实施计划。考虑到这么大的工作量按以往的速度需一年多才能完成，而现在却要求5个月，大家认真商议后决定除4个村不具备单独开采能力外，其余的10多个村各负责一个采石塘口，齐头并进完成任务。

各村非常重视采石料任务，成立了村指挥部，都表示要把对毛泽东主席的深厚感情落实到行动上。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几天后，有二、三千人奔赴各自的采石现场。在东西约8里、南北约2里的工地上，黑夜灯火通明，人员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

开采工作进行一个多月后，由于技术力量不足、地质条件差等原因，大部分村未开出石料。这时公社指挥部决定调整施工方案，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突破，集中力量挖掘石窝村、高庄村、南尚乐村，辛庄村负责的“大坑”。这四个村中，任务量最重的当属石窝村，计划完成全部任务量的60%。

石窝村因石雕刻艺术历史悠久，技艺精湛而闻名，汇聚了大量石艺人。这次为建毛主席纪念堂开采汉白玉石料，主要技术力量来自该村。所以他们所负责的塘口为头号大坑。

石窝村书记徐福存向村干部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后，成立了以他为总指挥、李振、梅田芳、张贵生、丁永利、丁桂英为副指挥的指挥部。随后他们带着村石料开采组组长贾明志等技术骨干到所负责的“东大坑”现场勘察。发现这个从1955年起就停止采石的塘口积满了10多米深的水，而且破烂不堪，很明显，完成分配的采石任务，困难相当大。

他们首先用6台抽水泵抽掉塘口的水，这项工作进行了20多天。与此同时，村里调集石匠150人，其他人员200人组成的采石队伍，在塘口的北面由东向西采用阶梯式挖掘。村指挥部领导每两人轮流值班，吃住在现场，指挥施工。

采石任务中，挖取雕刻甬道和毛主席坐像的石料是两个难点，不但采集技术要求高，而且不易找到。所需石料只有在三层汉白玉的上二层采出。第二层既将挖完，正感到无希望时，出人意料地显现出长3米、宽2米、厚30公分的大块汉白玉板料，而且无杂质，大家兴奋不已，都松了一口气。

第一个难点解决后，市、县、乡、村各级指挥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采掘坐像石料上。石料要求体积大、质量高，决不能有疵点。这样的石料在这著名的汉白玉开采区也难寻觅。从前只开出过一块7立方米的石料，也是为东北某学院雕毛主席像，而这次要求却是11立方米。

1977年2月初的一天，天气特别的冷，夜里气温达到零下22℃。可是令石窝村民心热的是开采到第三层，采出了一块6米长、2米宽的“三尺厚”的汉白玉，质量上乘，洁白无瑕，这正是理想的作主席坐像的汉白玉石料。紧接着又采出了3块比这大块略小一些同质量的汉白玉石料。人们高兴之余，暗暗称奇。于是当地百姓说：“毛主席有福，历史上这里出的两大块汉白玉都是为毛主席预备的。”

由于石窝村的技术力量雄厚，组织得力，到了4月中旬完工时，实际完成栏板300多根，柱子500多根，占总任务量的80%。

其余的3个重点村中，高庄村完成了20%，南尚乐村、辛庄村基本上没采出什么石料。

在开采房山汉白玉过程中，由于开采量大，当时的技术、设备等不能及时跟上，靠人工的力量困难很多，曾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李瑞环带着北京市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单昭祥等有关人员来到房山县采石指挥部协调工作。在采石料的整整5个月中，整个工地最多时人数达1万2千多人。军队、机关、厂矿、学校等一齐上阵，大年三十和初一，不但主采区的骨干人员不休息，工农商学兵的援助队伍也利用休假赶来支援，由于组织有序，没有发生一起工伤治安事故，保证了采石工作的完成。3月底，现场召开了庆功会。石窝村党支部书记李振代表石窝村发了言。

4月5日至27日，石窝村李振还带领42名石匠，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建筑工地，负责纪念堂东面98套栏板的安装工作。

1977年5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用于纪念堂的房山汉白玉主要有：门口题写毛主席纪念堂的牌匾、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纪念堂四周的栏杆、甬路及南大厅题字《满江红·和郭沫若》诗词的石面。

注：本文由宿廷增等人提供材料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作者系《中国文化报》副刊编辑

五十年代初的一组摄影作品

张广明

1953年，《人民日报》第四版以整版篇幅发表过该报著名记者高粱拍摄的，反映翻身农民喜气洋洋欢度春节的一组照片。通栏标题是《春节在双柳树》。这是解放后，也是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反映房山人民生活的一组摄影作品。

1953年，人民日报记者高粱到房山采访，准备拍摄一组农民欢度春节的照片，经县委宣传部商定，选择在双柳树村深入生活。当时的双柳树村，在“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开展爱国丰产运动”的方针指导下，农民生

产热情极高，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备耕，选种，打井，修整土地、植树、盖房，家家户户，喜气洋洋，杀猪宰羊，准备过春节，呈现出一片当家做主绘新图的景象。高粱到双柳树后，深入田间地头和村民家里访问座谈，被农民们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的高涨热情所感染，拍下大量照片，选择了十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高粱在双柳树采访一周，临走时给双柳树村留下四个字的评语：爱、憎、俭、耻。爱：就是双柳树人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自己的家乡；憎：就是憎恨国民党，憎恨剥削阶级，憎恨旧制度；俭：就是双柳树农民勤俭持家，劳动致富；耻：就是民风古朴，讲道德，知羞耻。他还讲过，这个村男女老少互敬互爱，特别是男女之间，相互帮助团结友好，一块劳动生活，打成一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一位文化站干部的足迹

段汝连

1981年12月24日至1982年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文艺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周口后文化站干部王少斌，作为全国501名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代表）之一参加大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农村文化工作盛会。各省市向大会推荐先进典型材料160份，文化部选编56份印发全国。王少斌的事迹材料就是其中之一。

王少斌生于1927年，1951年在崇文区文化馆参加工作。1953年他服从组织分配，调到了新建立的京西矿区周口店文化馆工作（1958年4月划归北京市周口店区，后改称房山县）。1960年，周口店文化馆改为文化站建制，人员由原来的七人精简到1人，留在文化站工作的就是王少斌，由此一直干到1988年退休。36个年头他用辛勤的汗水服务于周口店地区的文化工作，创下了工作的辉煌。

当时，周口店文化站的条件很差。全部家当是：8间房子，一万多册图书和一些宣传、办公用品。主要任务是下乡作文化普及工作。整天背着书、幻灯机，走乡串村。白天为农民借书。晚上放映幻灯，排练文艺节目，一搞就是半宿。社员亲切地对他说：“少斌，你为咱宣传的‘总路线’、‘一化三改’，让咱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好光景”。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文化站下放到公社。王少斌想：“现在是苦了点，既然领导让我在这干，就是工作需要，一个人也要把文化站办好。”就下决心坚持了下来，还和一位能歌善舞的农村姑娘——王立文结了婚，成了家。1962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坚定了干一辈子文化站工作的信心。

王少斌同志搞群众文化活动，认准了一条，凡是群众需要的咱就搞。周口店地区，篮球、乒乓球爱好者多，需要有人出面组织。少斌觉得，这是关系人民身体健康的好事，应该管，便把球类活动列入计划。每年都组织30多场比赛。当时，常有书法爱好者到站里来，谈经验，相互切磋技艺。每逢春节，他便约这些书法“家”到站里来执笔挥毫写春联。先是书写春联比赛、再搞春联展览，然后组织学生敲锣打鼓去给军烈属贴春联，一举三得，达到三满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少斌感到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文化站有许多工作需要做。针对有些小青年不懂法纪、打架斗殴的现象，他决定搞法制教育展览；手头没材料，他先后跑了五次县公安局、法院抄写典型案例。回来后改写成展览文学脚本，配上画，在县文化馆的同志帮助之下，紧张地工作了两周，

展览搞成了。展出了半个月，接待了三十六个单位的7000多名观众。青少年们看了很受教育，有的还在留言本上写下感想。

王少斌很重视“信息”的收集开发利用。1981年的6月，他听说公社团委要召开“学雷锋，树新风”先进事迹表彰会。这条信息使少斌的脑子里开始了又一个展览的策划。他找到公社团委，找来6份先进典型材料，自己动手改编脚本，绘画插图，紧张地忙活了四天，赶制出了一个“周口店公社青年学习雷锋事迹展览”，正好在大会召开期间展出，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要舍得搭辛苦，卖力气，首要一条就是得有领导支持。有时有的领导不支持怎么办？就得主动争取，反复向领导作宣传，直到把他说活了心，表态支持为止，有一股死求活磨的劲儿。每个阶段，甭管搞什么活动，他都有请示，有汇报，事后有总结。有的活动还请领导参加，一看效果不错，再办事就好说话了。搞活动还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就靠腿勤，嘴勤，去宣传，去做工作。要搞一场电影晚会，得到公社定机子，到电影公司定片子，到部队借车子，到大队定场子，哪一样都要事先亲自安排好。1980年暑假，组织儿童爬山军事游戏。为了确保安全，他同老师一起，往返七次爬山探路，确定了活动路线，心里才算踏实了。为了组织好小学生暑期活动，他不顾天热，到北京城里跑了大小十三个商店，选购了十四种棋具。当他看到孩子们兴致勃勃地玩这些棋时，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多年来，节假日他没休息过，星期天多半是在他组织的活动中度过的。人们说他一身忙不闲，可他就怕呆着没事干。这里有一组数字：1979至1981年三年之中，周口店文化站举办电影晚会105场，文艺演出20场，各种球赛138场，大型游艺活动7次，展览16次，参加活动的群众四万人次。

多年来少斌以站为家，他珍惜“家”里的一切。“文革”动乱期间，打砸抢风行。为了保护站里财产，他把电视机、广播器、手风琴，都秘密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图书破了自己动手修补。站里的十八把椅子哪个坏了就自己动手修哪个，已经用了三十多年还是那十八把椅子。房子糊顶棚，门窗刷油漆……都是自己动手干。

少斌的妻子把操持家务的事全部担当起来，以支持少斌全身心地工作。少斌的工作成绩中也有这位普通的女共产党员的功劳。

“一切从实际出发”，王少斌大量的日常工作活动所以能取得成就，是因为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实际和可能出发，发挥主观能动性，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办一件成一件。他说要办的事，不管吃多大苦，受多大累，遭多大难，都要办好。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记录房山生产跃进的第一部电影

张广明

1958年，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房山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召开一系列动员会、誓师会、比武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展开比学赶帮争上游，纷纷制定全面发展农业生产规划和具体措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生产跃进高潮。为了反映房山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干劲，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会同农业部在房山拍摄了一部片名叫《跃进中的房山》的纪实影片。

这是解放后反映房山人民生产跃进的第一部电影。

《跃进中的房山》真实地纪录了当年房山广大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打井修渠，深翻土地，修水库，垒梯田，“全党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工农商学兵齐参战”的场面。电影拍成后，于当年9月首先在房山放映。放映的地点在原房山职工俱乐部的大院内。职工俱乐部是解放后由一座仓库改建的，在现在的人民商场的西侧。当时正在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看电影的人，除了县、乡、村参加会议的干部外，县直机关的干部和城关的社员群众也都纷纷前来观看。把俱乐部大院挤得水泄不通。为了组织大家认真看好这部电影，宣传部和农林局共同起草了一个幕前词，在电影放映前，对影片作了介绍。大意是：感谢市领导和农业部及电影制片厂为我们房山拍了一部记录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影片，这对我们的工作和生产是很大的支持、鼓舞与鞭策。它纪录了我们房山广大干部群众，响应党中央号召，贯彻执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所取得的成绩和人民群众向共产主义迈进，忘我劳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冲天干劲。影片中出现的团结协作、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我们都亲身经历过，战斗过。那些争上游、插红旗的先进人物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掀起更大的生产跃进的新高潮。

因为都是第一次在影片中看到自己熟悉的家乡的人和事，观众的情绪特别兴奋。有的一边看一边找差距，认为自己不如别的乡干劲足，规模大，还有的看完电影回去就讨论修改计划，提高生产指标，放更大的“卫星”。

事隔近四十年，电影《跃进中的房山》从一个侧面记录下1958年大跃进年代的情景和影片中房山人民在生产建设中所发挥出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同时也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解放前后的房山民谣民歌

张广明

房山地区的民谣和民歌是很丰富的，尽管雅俗不一，良莠交杂。但是都和房山的历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风情紧密相关。这里搜集整理的是解放前后流传在房山地区的一小部分民谣、民歌。

解放前房山人民生活异常困难。黑暗的统治，地主的剥削，致使民不聊生：

房山的石头都姓古，
房山的百姓都姓苦，
养儿峪里养儿难，
凤凰亭下堆白骨，
一亩地打不了几斗谷，
采石、挖煤、捅驴屁股(驮脚)。

过去，山区人民群众的生活，缺水是最大的问题。有些村子，冬季不得不靠积雪、背冰化水过日子。有的村方圆几十里，没有一门井，吃水要到十几里外的山泉去背去驮。

杏儿地到井儿湾，
背一桶泉水走半天。

吃水倒比吃油贵，
山里人常年不洗脸。

山区和平原的生活有很大差距，村与村之间贫富也不一样。曾流传过：

穷辛庄，富小营，
北市姑娘打麻绳。
穷辛庄，富北市，
顾册姑娘买嘴吃。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歌颂共产党、新社会的民歌民谣，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太阳出来一朵花，
如今人民当了家。
白天下地去生产，
晚上识字班里学文化。

贫下中农翻了身，
拔掉穷根栽富根，
翻身不忘共产党，
毛主席是咱大恩人。

群众对新生活的喜悦也表现在下面的歌谣里：

三十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吃香的，喝辣的，
腰里掖着“恒大”(烟)的。
早晨窝头加稀饭，
中午烙饼摊鸡蛋，
晚上来碗过水面。

翻身的农民对国家大事也表现出很大的关注。在解放后“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民谣，家喻户晓。

猴皮筋，我会跳，
“三反五反”我知道。
反贪污，反浪费，
官僚主义我反对。

1958年大跃进年代，北京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周口店区民歌选》，其中不少民歌是反映当时的形势和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的。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号召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土法上马一哄而起，兴建了一批小钢铁厂、小五金厂、小化肥厂，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低，不能用，群众很不满。如化肥厂生产颗粒肥，伤害了农民利益。当时群众就编了这样一首歌谣，加以讽刺：

远看一堆灰，
近着颗粒肥，
上地地发板，
社员倒了霉。

还有一首是反映当地民风 and 生活的(指三年困难时期):

二龙岗，三面敲，
不是打架就是嚷，
大人孩子吃食堂，
家里缺锅又少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方针，房山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论平原和山区，人民的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解放初期流传的歌谣：

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
点灯不用油，
耕地不用牛，
走路不小心，
果子砸你头。

这在当初只是人民群众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梦想，而现在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我教小水电

侯国智

1973年底，我正在六渡学校任教。当时六渡公社筹办六渡中学第一个高中班。大家对办班的方向进行了热烈讨论。校长许素玲和教师唐汝钦、杜学温、孙燕俐、王秀华、刘积玉、徐国华等人认为：办学是为改变山区贫穷面貌培养用得着的人材。山里缺动力，缺医生，缺能写文章的人。于是决定办班向这三方面倾斜。因为学校老师少，就决定由我和孙燕俐、徐国华三位老师包管包教，我任班主任。

1974年2月24日六渡第一个高中班开学。当时，平峪、西庄等地已办成了用水轮泵做动力发电的小电站，七渡村的小水电也要上马。我与徐国华老师配合，就教《水轮泵——异步电动机发电》。我搞机电部分，他搞水工与测量部分。

在大学时虽然学过船上电站，但对用水轮泵做动力用异步电动机发电还不明白。1973年12月23日，我顶风去西庄电站进行了参观。大队电工刘国玉热情接待了我。

春节回老家石楼，我的心还在小水电上。几天后，我又去了房山电力局，请教了罗国玉。还向广东罗定县电机厂赵大伦发信求教，因为他在《科学实验》上发表过有关文章，赵大伦3月15日发来了回信，详细介绍了水轮泵的情况。3月16日我又去了房山水利局向孙梦礼求教。3月21日又带学生去七渡参观了水轮泵，参加了七渡电站工地的劳动；以后又带学生去了西庄电站现场参观。

与此同时，我还搜集了许多有关资料，还买了一套清华大学出的《电机学》。

有了这些感性知识和理性的资料，我就着手编《水轮泵——异步电动机发电》的土教材。这本小册子，总

共写了两稿,共13节。然后就自己与学生一齐动手刻蜡板,油印成册,发给学生人手一册当教材,开始上课。

不久,六渡大队也向栗元厂和七渡学习,组织了创业队。由大队书记穆希才和老队长蔡增柱带领,于1974年5月开上改地工地。他们也要修水渠,搞水轮泵发电,要求六渡中学师生协作,进行可行性研究。5月15日我与徐国华老师带领高中班学生隗功启、隗合忠(北港)、穆启祥等人,会同大队干部,进行初步踏勘。他们原想从二道沟到铡草峪,到七渡桥拐角,到称家里上水面挖渠。后来看工程量太大,改为从七渡桥到六渡桥的白老洼引水,要求六渡中学师生测出水的落差来。

搞测量,起码得有水平仪、标杆等工具,那时我们是一无所有。任务压在头上怎么办?

我的房东隗甫新大叔给了我很大启发。这位老木匠说:“平不过水,直不过线。农村盖房‘抄水平’,就是用一个盆子一只碗!”于是我从卫生所隗甫龙大夫那儿要了两只玻璃眼药瓶,用一根塑料管把两瓶的尖端联起来,再弯成“U”型,把它绑在教学用的45度木制大三角板上,注上一定量的水,再滴上几滴红墨水,就成了一只联通器式土水平仪。把它架在跳高用的架子上,就可以用了。郑地军同学找了三根特直特长的向日葵杆,按一定距离糊上红色白色的纸,制成了标杆。

五月中旬开始现场数据测量,测得由七渡桥到六渡桥水的落差是5.3米。完全可以装水轮泵发电。

为准确起见,徐国华老师于6月8日又带领隗功启、隗淑坤、蔡淑红、郑地军,借用十渡公社水平仪进行了复测,水位差是5.2之米。这更证明了我们的土仪器照样办大事。

这也证明了,科技与实际需要结合,会带来多么大的变化!一个原来对水轮泵发电一窍不通的我,半年之内懂得了这些知识,向高中班四十名学生传授了这些知识,同时也向六渡社员宣传了办小水电的好处。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参加“思想改造会”的回忆

刘振祥

河北省中等学校教职员思想改造开始于1952年7月中旬,1952年9月下旬结束,历时两个多月。

1952年7月上旬,我当时在河北省良乡中学任出纳会计。经过半年多“三反”运动的洗礼,一天未休,便随着良中几十名教职员奔赴省政府保定市参加解放后首次全省范围的中等学校教职员思想改造会。当时良中留下了高少峰、郝爽、张守文等教职员和少数暑假不回家的学生,负责看护学校。

这次思想改造,省委非常重视。省委书记林铁、省政府主席杨秀峰都曾给大家作动员。省政府副主席薛迅亲自抓这次思想改造工作。省文教厅孙敬文、纪之莱正副厅长均参与领导。通县专区地委副书记彭洪也来到保定市。

良乡、房山两县共建一个支部,主要成员有房中校长杨怀堂,良中校长马余三,良乡县教育科长张书明等。我参加了支部领导下的核心小组。

通过党内外一系列会议,特别是薛迅副主席的精辟论述,使参加思想改造的教职员弄清了这一工作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迫切性。解放初期的教职员队伍主要有以下几种成分:一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解放区的少数教职员;二是解放前原有学校留用的教职员;三是解放前后从不同岗位投向教育战线的新的教职员。因此,

思想改造就成了一项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

这次思想改造特别强调从思想教育入手，实事求是，效果显著。一方面针对当时教师队伍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和问题，通过大会、小会反复动员解释，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杨秀峰主席作过几次动员报告，他说自己也当过教师，很熟悉和理解教师的思想。他讲的很生动，有说服力和号召力。最后他郑重宣布：“我代表河北省三千万父老同胞向与会者保证，不论有何种重大问题，只要主动坦白交待，都会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宽大处理的。”

这次思想改造重点学习的文件有：列宁的《论忠诚与老实》，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斯大林的《关于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并组织大家看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通过学习讨论，绝大多数教职员提高了思想觉悟。在讨论发言时，学员们都自觉批判了“不问政治，不谈国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看教科书”“人随钟声入，话随钟声停”等不正确的思想。有的对照方志敏同志爱国主义高尚的革命情操，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有的还交出了手枪和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

全体学员经过这次思想改造，达到了“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目的。当时薛迅副主席从苏联参观回省后立即向大家作报告，介绍苏联各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和教育工作情况。记得当时有人问他，我们教师是否算工人阶级？薛迅回答：算工人阶级，但还不够成熟。

在学习期间，省地委领导经常到食堂、宿舍了解情况。当听说教师们饭量减少时，就一方面叫食堂改善伙食，一方面把学习安排得宽松一些。

1952年9月下旬良中参加思想改造的教职员回到学校，开始了新的教学工作。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民国时期出版的一册《房山游记汇编》

张寿江

笔者素来喜爱游览名胜古迹，亦对房山文史颇感兴趣，并时常注意收集有关书籍和资料，但对民国时期曾出版的一册《房山游记汇编》却一无所知。近日在友人处，欣然见到此书。在惊喜之余，为了让房山故里的文史爱好者也能窥见到六十年前编辑出版的房山游记，现将此书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房山游记汇编》一册，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初版，由王毓霖编纂，竖排印刷（每册定价国币壹元），未标明印数。书名由我国著名藏书家、书法家傅增湘先生题写。书前有藏园老人（傅增湘）和王毓霖本人写的序。书中收录了明代周忱等人所写的7篇，清代费密等人所写的5篇和民国蒋维乔等人所定的7篇，最后收有法国人蒲意雅写的两篇，由周文蒸译。

此书共辑录了明清和民国人所作游记21篇，明代曹学佺、刘侗等人的几篇，在其它有关书籍中也曾收录，但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十余篇，却很难见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者各自不同的身份：费密，新繁人，乾隆时期的一位道士、诗人；查礼，宛平人，乾隆年间专司督运，后任四川布政使，还是一位画家；谢振定，湘乡人，乾隆年间进士，嘉庆年初官至御史，擅长古文辞；麟庆，满州人，道光年间任江南河道总督，后官至四品京堂。民国时期的作者，除傅增湘、周肇祥二人是名噪一时的文化界人士，其他几位还不仅仅只是文

人墨客：蒋维乔(1873-1958年)，是一位佛学家和哲学家，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东南大学校长，建国后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陈兴亚(1885-?)，曾任北京宪兵司令，京师警察总监，东北宪兵司令；李书华(1890-1979年)，曾任北平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部长。尹赞勋(1902-1984年)，曾任中国生物研究室主任和副所长，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层研究的创始人之一，无脊椎古生物学先驱和全国政协委员。

以上这些作者，从不同时期和不同角度看房山，所写的游记，也就异彩纷呈，有其各自的代表性。这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有关房山的风土人情，无疑是一本珍贵资料。另外，从目录版本学和地方文献方面来说，这本书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关于编纂者王毓霖，《民国人物大辞典》、《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均无记载，生卒不详。但翻阅此书得知，王毓霖，字泽民，淮阴人，曾在房山周口店一带采矿。夙好游历，“东逾辽沈，西入长安，江南河北，游历殆遍，舟航所至，遇山水佳处，辄作登临”。从他所作的序言中，可以看出此人对文学及史地民俗颇有研究。他说：“记游之文，不应限于模山绘水，而要在征掌故，述风土，考沿革，明形势，留待修国史方志者之采择。”他指出：“昔人游记写景者多，研学者少，纪事者多，征实者少，其能因古迹而发知，寻史地之变迁，考文明之进化者，益不数觐。”并举例说“……徐霞客游记出，蔚成巨观，举凡方位，里程，山脉，河流，纤琐糜遗，穷深极奥，真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作也”。

据编纂者说“蓄意辑此汇编，远在五六年前，盖动于蒲氏记录之详尽，考证之严密，及阅东方学报，尤感兴奋，近复以傅公敦促，爰于治事之暇，亟为搜辑成之”。

编纂者虽不是专业著书人和职业出版商，但能“并商于平汉路局，斥资出版”此书，这在当时真是难能可贵的。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傅增湘先生所作的序中，还可以了解到王毓霖还是一位打通上方山道路的“开拓者”。傅序说：“友人王君泽民，采矿于周口店，其地距上方山伊迤，得肆游观。喜其岩壑之深邃，洞天之瑰奇，而亦以道途深阻为忧。常过余藏园，谈其胜概，因相与谋开通之计，泽民慨然引为己任。躬亲履勘，至于再三，规画精详，锐图启发，闻于当道，深荷嘉纳。并荷邑令之护持，路局之赞翊，为之披山通道，叠石架桥，百年险阻化为夷庚。从此驰车而往，计时可达……”由此可见，王毓霖不但是位热心辑录地方文献的文化人，而且还是一位勇于开山凿石的实干家。

《房山游记汇编》的辑录出版，从中可以看出房山自古旅游资源就十分丰富，引得各界人士前来登临游赏，并为我们留下了一篇篇佳作华章。

附一：

傅增湘《房山游记汇编序》

余生平雅嗜山游，三十年来，南北名胜，攀徒殆遍，而燕京近郊山水，登览尤频。尝谓旧畿之内，有三胜区，其幽奇不逊吴越。一为蓟州之盘山，一为宛平之百花山，一即上方是也。上方幽邃而雄奇，颇类昌平之响响岩，而清迥过之。云水洞中之奇丽，尤为生平所罕觐。戊午之春余参与阁员，建议安置德奥侨人于西域寺，得乘便道一揽其胜。自此春秋佳日，必策杖登临，流连至不忍归。顾山在旧京西南百余里，溪涧纵横，径路险僻，荒弗久不治，车骑难通，游履往还，淹留或至信宿。都市之人，拘于职守，限于时日，恒望云山而兴叹。即名流耆硕，夙嗜清游者，亦惮其艰阻，往往闻而裹足焉。友人王君泽民，采矿于周口店，其地距上方山伊迤，得肆游观。喜其岩壑之深邃，洞天之瑰奇，而亦以道涂深阻为忧。常过余藏园，谈其胜概，因相与谋开通之计，泽民慨然引为己任。躬亲履勘，至于再三，规画精详，锐图启发，闻于当道，深荷嘉纳。并荷邑令之护持，路局之赞翊，为之披山通道，叠石架桥，百年险阻，化为夷庚。从此驰车而往，计时可达。

更于僧寺辟精庐，设宾榻，凡铺被饮食之需，咸为供备。行舆策蹇之费，悉有定程，在途无行役之劳，客至有如归之乐。盖至是而百里之修途，引于寸晷。深山之清景，纳之目前。乘兴而来者，可以游目骋怀，踌躇满志而去矣。余又以游目交通既利，筇屐沓来，必有纪胜之编，用为导游之具。乃属泽民汇集古今游记文字，凡十余家，都为一集。而法兰西人蒲意雅氏上方山石经山西域寺三记，亦译录以附刊焉。沿途风物，环山胜景，及云水洞中之殊形诡状，更摹写为图，别印成册，以供赏玩。附录二编，则日本人考证之说，及云居寺石经山石刻目录也。昨岁以路工葺事，余特偕周君养庵入山，周游详览。时节届初冬，霜林炫采，泉石增辉，吴门之天平，日本之高雄，殆无以过。盘桓三日，窃见崎岖石径，悉就坦夷，梵宇精岩，可资栖息，至洞门探胜，昔必蛇行而进者今可佝偻而行，行之便安，逸情飙发，因欢吾辈频年措画，幸底于成，卒使荒辽之境，列诸游赏之区。不事愚公移山之力，而获长房缩地之方，山水有灵，亦当欢知己于千古也。顷以汇编将付刊行，属为缀词弁首，爰追叙经始，以告方来。至如山中名迹，咸载图经，今古俊游，尤多鸿制，手披目玩，胜异自呈，无劳鄙人之赘述矣。丁丑六月藏园老人识。

附二：

《房山游记汇编》目录

例言

傅序

自序

明

周忱游小西天记

徐渭上方山记

袁宏道游红螺险记

曹学佺游房山记

刘侗于奕正上方山

刘侗于奕正云水洞

刘侗于奕正石经山

清

费密游上方山记

查礼题上方二山记游

谢振定游上方记

麟庆游上方山记

释自如上方山记

民国

蒋维乔大房山游记

吴其轶上方山纪行

《房山游记汇编》一书封面

(张寿江 提供)

傅增湘游房山红螺险记并诗
周肇祥重游上方山及红螺险记
陈兴亚上方山游记
李书华房山游记
尹赞勋北平附近的一大奇迹

法国

蒲意雅记石经山西峪寺
蒲意雅记上方山
日本太田喜久雄华北之地势与地质
房山西峪云居寺碑目
游览余言
附图三张

注：傅增湘(1872—1949年)，四川泸州江安人字沅叔、藏园居士等光绪进士，1898年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辛亥革命时曾参加唐绍仪和谈代表团。1917年入王士珍内阁任教育总长。五四运动中，因抵制北京政府罢免蔡元培的命令受牵连而被免职。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辛亥革命后，开始大规模收藏古籍，所藏总计达20余万卷，著有《藏园警目》、《藏园东游别录》、《双鉴楼杂咏》等。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作者系原燕化集团公司化工一厂干部

观石经山拓经记

段汝连

1956年夏天，云居寺石经的发掘、拓印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是在石窝村下乡时听说这件事的。受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我登着自行车，冒着炎炎烈日，沿着崎曲的山路，直奔小西天而去(小西天是石经山别称)。

这里的石经发掘、拓印工作十分繁忙。工人们把石经从洞内取出来，抬到工棚，平放在工作台上刷洗干净，有专人用毛笔在经版侧面编号。拓工将已经润好的宣纸铺在经版上，进行拓印。工人们赤着背，只穿一条短裤，头上背上流着汗水，双手操拓包，有节奏地进行拓印。这是一个由一大片工棚组成的拓经工场，几十位拓工同时工作，“噼啪，噼啪”的拓经声此起彼落，仿佛千年之前刻经的锤鏊声再度响起，场面十分壮观。拓工说：山上共有四千多块经版，每块经版都要拓印七份。经版大小不一，大的有两米长，七十公分宽，

小的也有七十公分长，四十公分宽。成品拓片黑底白字，字迹十分清晰。后来得知，小西天的石经拓完之后，对云居寺地穴中的 10082 块石经也进行了发掘和拓印。这项工作一直到 1958 年底才全都完成，历时三年。若干年后，我调到县文化局工作时，有缘在法源寺中国佛教协会图书文物馆，认识了当年主持云居寺石经发掘拓印工作的黄炳章先生。我开玩笑地对黄老说，当年静琬法师在石经山刻经代代相相传达千年之久。您老五十年代拓历时三年，使这宗宝贵的文化遗产让世人得以了解，可称为当代静琬了。黄老笑着说：“那可不能比，不过当年拓经，条件确实艰苦，要去云居寺，先要从城里乘火车到周口店，然后步行七十多里才能到云居寺，那时云居寺还是一片废墟，食宿无所依托，开始时住在山洞，后来住工棚，一干就是三年……”。

使我没有想到，1956 年初登小西天后的 1964 年，我被临时调到云居寺经版库看守了 40 天经版。1987 年，区领导又让我参与了云居寺的修复和石经陈列馆的布展工作，使我有机会领略石经的深邃内含，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房山文史资料》第 12 辑）

建国初期的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

蔡炳溪 张双全

周口店，这个普通的北方小镇，在每个中国人心中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五十多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远祖——“北京人”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们文明探索的第一步，中华民族悠久恢弘的历史由此掀开了第一章。

1929 年 12 月 2 日，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象一声春雷掠过隆冬北京的上空，所有的炎黄子孙闻之都精神振奋，全球各大新闻媒体更是竞相报道，并誉之为中国近代科学所摘得的第一枚世界级金牌。周口店，这个以前既在最详细的世界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乡村小镇的名字通过电波一夜之间传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并从此成为世界各国爱好科学的人们心目中神圣的“麦加”，前来朝圣的中外人士每天都是络绎不绝。以后的几年中，经过中外科学家坚持不懈的努力，“北京人”神秘的面纱逐渐被揭开，人类探索自身发展历程的追求终于开始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可惜的是，由于旧中国战乱连年，科学发掘工作几度被迫停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一停就是十余年。早年主持或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老专家、老工人七零八落，纷纷另觅他途。周口店这个一度在世界上引起巨大轰动，曾经为亿万中国人带采无上荣耀，也曾经很是热闹过一阵的圣地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

1949 年 2 月，北平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的锣鼓声尚未完全散尽，新成立的临时人民政府就委派徐特立老人找到了当时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任职的著名学者贾兰坡，希望他能够重新出山，主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贾兰坡是饮誉世界的古人类学家。1936 年秋冬之交，他曾经在 11 天之内发现了 3 具“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创造了人类学发掘史上的伟大奇迹，为“北京人”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各国科学家的广泛赞誉。1949 年初秋，因连年战争而荒芜了十余年的周口店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贾兰坡和他的同事们重新开始了艰苦单调但却意义重大的发掘工作。当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在天安门广场响起的时候，贾兰坡和他的同事们是在周口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新中国献礼。

这次发掘工作的收获仅仅是“北京人”的三颗牙齿和两段肢骨化石，但是因为以往所发现的全部“北京

人”化石，包括完整或比较完整的5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都在抗日战争期间丢失了，这次所发现的“北京人”化石就成了当时唯一保存的“北京人”化石标本，意义还是非同一般的。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艰苦创业时期，普通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也都还十分缺乏，贾兰坡等于是在发掘工作之余，自己动手在发掘现场旁边因陋就简的盖了几间小屋子，利用两块旧门板陈列刚刚从“北京人”遗址发掘出土的化石材料，弥补了以往游人在周口店只能参观“北京人”遗址，而无法见到发掘出来的经过修理、复原、研究、鉴定过的更加科学化和通俗化的“北京人”化石及文化遗物的欠缺。

1951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教授到周口店遗址参观，他发现贾兰坡等人是在用一种极其原始的手段在进行着一种极其不寻常的事业，竺院长一行被深深的感动了。后来，贾兰坡等人又在北京人遗址周围开始了大规模的植树绿化活动。当年他们所栽种的梨、桃、杏等果树今天还在开花结果，大叶杨、小叶杨、洋槐、丁香更加郁郁苍苍。1953年春，经过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慎重考虑，在当时各行各业都十分需要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拨专款一万元用于“北京人”遗址陈列馆建设。同年9月，面积约300平方米的“中国猿人陈列馆”宣告建成，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陈列馆建成开放之后，立即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大批的观众。由于参观者日益增加，当时仅有一条通往陈列馆的小道往往被前来参观学习的各界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不得已又在旁边新开辟了一条小道，两条道分别供游人上下，原来拥挤的状况才稍有改观。

从建国第一天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始至终对周口店的工作给予巨大的支持和关怀。为了周口店发掘和群众参观的方便，政府拨专款修筑了北京到周口店的专有公路，这也是现在京周公路的雏形。在周口店建立陈列馆之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周口店参观或指导工作。1955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一行数人到周口店遗址参观，著名学者——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裴文中教授陪同参观。同年，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及其家人参观周口店的陈列馆，并欣然题词留念，贾兰坡负责接待了他们。随后，又有贺龙、叶剑英、宋庆龄、郭沫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马寅初等一批民主爱国人士来到周口店遗址并挥毫留言，对周口店的发掘和陈列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正是由于有这些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同志和社会知名人士的不断关怀与支持，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才能够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得以进行并取得重大的成果：1959年发现了“北京人”的一个下颌骨化石，1966年又发现“北京人”的一个头盖骨化石，这是1927年正式发掘至今的第6具头盖骨化石，也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唯一一具“北京人”头骨化石。

1955年裴文中教授（左二）陪同刘少奇（左三）、朱德（左一）、董必武（右三）、林伯渠（右二）参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管理处提供）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作者蔡炳溪系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管理处主任、张双全系管理处干部

五十年代房山县贯彻《婚姻法》运动

王硕儒

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一项反封建主义的社会民主改革。建立新型婚姻制度，改善家庭中的夫妇、婆媳关系，改变旧的传统习惯和道德标准，真正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基础上建立民主和睦家庭、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社会道德，对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祖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0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决定1953年的3月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为此，中共房山县委决定：动员全党和党外一切宣传力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规模壮阔、移风易俗、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

1953年1月，中共房山县委在认真学习《婚姻法》的基础上，讨论制定出贯彻《婚姻法》的宣传计划。县委明确4名县委委员专门领导贯彻《婚姻法》运动，并成立执行《婚姻法》委员会，由县委书记杜恩霖任主任，副县长王腾超、宣传部副部长佟建和、县妇联副主任郭旭光、县法院副院长王奎玉任副主任。下设办公室，由佟建和、郭旭光分别兼任主任、副主任。决定在羊头岗村进行贯彻《婚姻法》的重点调查，在上中院村进行贯彻《婚姻法》的试点工作。

1953年2月，召开县、区、村干部大会，县、区除值班人员外全部参加。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和妇联主任参加，对贯彻《婚姻法》运动作了专题布置，同时，普训了党的报告员42名，宣传员3456名（男2958名，女498名），集训了村级委员以上干部和党员4706名（男3706名，女1000名）。普训内容除学习《婚姻法》外，还学习了《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与解答》（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发表）、《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1950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坚决贯彻婚姻法，保证妇女的权利》（1952年9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婚姻法给全党的通知》等。2月下旬，县委抽调干部117名组成工作组下乡，同区、村干部一起，开始了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

宣传贯彻《婚姻法》，教育的对象首先是县区干部。要求县区干部正确认识《婚姻法》，肃清封建残余思想，确立新的婚姻观念，既要从自身做起，模范执行《婚姻法》，又要领导广大群众进行婚姻制度的民主改革。因此，县、区各机关、团体、企业、军队、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停止文化、理论学习，专门学习《婚姻法》和有关材料，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普遍进行思想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凡是封建残余思想严重，违犯《婚姻法》的少数人，要作反省，对个别是严重的人由党委决定给予处分。在学习中，县委作了三次报告：首先是启发动员报告；其次是批判封建残余思想和动员干部进行思想检讨，县直机关某干部，因同爱人发生口角，曾当众受到副县长王腾超的批评，最后还在全体干部会议上作学习总结。

在农村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广泛、深入地宣讲《婚姻法》。全县有42名县、区报告员，分别下乡召开群众大会作报告，多者报告15次，最少者也报告3次。宣传员和村级委员以上干部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对所包户每人进行三次以上《婚姻法》的教育。动员中学教职员和学生每人深入到5至10户中宣传《婚姻法》。同时，利用幻灯、收音机、读报、广播、黑板报、文艺演出等形式进行宣传。全县有幻灯18台，分散到农村巡回放映，平均每台放映4次，观众达2000人；有收音机8部，到农村巡回组织群众收听。组织读报组172个，398人；广播组464个，3948人，有广播筒810个；板报组337个，714人，有黑板910块；组织较大型的业余剧团54个，巡回演出，每个剧团一般演出4场，演出了《刘巧儿》、《小女婿》、《三全齐

美》、《柳树井》、《罗汉钱》等有关宣传《婚姻法》的节目。这次教育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在宣传教育中，出现了不少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向封建思想严重的家长进行说理斗争，受虐待的妇女为了获得解放，与自己的丈夫或公婆论理斗争。同时，妥善地解决和处理如家长包办、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青年妇女因婚姻问题造成的自杀等事件共607件，这对几千年旧的封建婚姻制度是一次重大的冲击，从而建立了男女平等民主和睦的新型家庭关系。

这次宣传《婚姻法》运动，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男女群众的认识，划清了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调整了村级妇女组织，建立健全了妇女代表会制度，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各村都选出了夫妻平等、婆媳和睦的模范家庭，树立了榜样，许多家庭还订立了家庭公约。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从“屋顶广播”说起

侯国智

房山城解放五十周年了。随着祖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房山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就是鲜明的一例。

刚解放时，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新闻，除了开会，读报之外，就是晚上通用的“屋顶广播”了。房山县城方圆一里，虽然是座小县城，站在城中心的“大角”（即现在城中心十字路口环岛处）喊话，四城也是听不到的。于是，房山中学就组织了一支“屋顶广播队”。一到晚上，每个队员拿着一个象“拔火罐”样的铁皮筒——“广播喇叭”上了街。队长站在“大角”，东西南北四街每隔二、三十米站一个广播员，一直排到四座城门之上。广播稿是事先准备好的，由一位同学一句一句念给队长，队长再一句一停地大声喊话，像部队“传口令”似的，传向四街，直到四座城门，开头几句总是：“老乡们，注意啦，现在屋顶广播开始了！”下面接着广播当天要宣传的内容。这“拔火罐上房”的阶段，正是我在房山中学读初中的时候，当时人们议论国家大事时说：“土广播说……”。

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脚步，房山“跃进”到北京市，改称周口店区。5月27日，周口店区委决定建立周口店区人民广播站。同年12月，周口店区人民广播站开始向全区广播，“电催的大喇叭”上街了。广播站的第一任站长是王永才，后来王珍当了编辑，李平当了广播科长。那时站里的人既采访、又改稿、又广播，几个人又敲锣又打鼓，忙得不亦乐乎，当时人们一说国家大事总是说：“大喇叭里讲的……”。

“大喇叭上街”十多年之后，人们又总觉得它有回音、吵得要命，效果也差。从1972年到1973年，出现了陶瓷压电式小喇叭。为增强广播效果，政府号召“小喇叭入户”，每家每户都安装了一只陶瓷压电式小喇叭。下工回来，一边吃饭，一边听小喇叭广播，农民议论国家大事就改成：“小喇叭里讲了……”。

六十年代，农民结婚要置齐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七十年代就要“三转一响”了，即除了原来有的三大件，加上了收音机。人们从收音机里可以直接了解国家大事。这时议论国家大事就改说：“收音机里都说了……”。

七十年代，农村里电视机还极少，几年后黑白电视多了起来，到八十年代电视带了色，以后就很快普及起来，连深山区都能看电视了，人们议论国家大事就改成：“电视里不是讲了吗？”从八十年代开始，电话又走进了农民之家。近几年，电话普及了，加上农民自建的小楼，解放时讲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哗啦啦，铁牛耕地气死马”的诺言都相继实现了。

解放以来到改革开放仅仅是五十年，这日子确实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近年房山出土的石刻与石雕

薛宝华

房山历史悠久，古迹众多。近些年来埋藏在地下的许多石刻和石雕陆续出土，为研究房山的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本文就房山区近年来发现的石刻与石雕作简要概述。

石刻

1、大唐大将军刘公(字如泉)墓志：

1992年10月13日，石楼镇吉羊村在烧砖用土时发现。墓室已被铲平，仅存唐建中三年(782年)墓志一合。墓志青石质、方形，墓志长、宽各0.47米，厚0.06米，盖呈覆斗形，中间篆书“大唐大将军刘公墓志”，四坡刻十二生肖，每面三个，人身兽首。四角卷刹处雕刻莲花纹。志文首题：“大唐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兼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刘公墓志铭并序”。建中四年(782年)春二月戊申朔廿五日壬申葬于良乡县西南尚义乡之原。行书，无撰者。

2、蔡雄墓志：

1991年，城关办事处北市村烧砖取土时发现。墓已破坏，结构不详，幸存墓志一合。墓志汉白玉质，方形。盖长0.52米，宽0.49米，厚0.09米，盖覆斗形。中间篆书“蔡君墓志”。四坡刻十二生肖。生肖人身胸前抱动物，每面三个。四角刹处雕刻莲花纹。志载：“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瀛州别驾莫州刺史上柱国中国公蔡府君墓……蔡公讳雄……贞元十九年十月廿五日子于良乡邑北复业乡之原。”

3、史光墓志：

1987年3月7日，城关办事处东坟村烧砖起土时发现唐墓一座，墓已被盗，仅有汉白玉墓志一合。墓志方形，长宽均0.52米，厚0.07米。盖中间篆书：“史公志铭”，四坡刻人身兽首十二生肖，四角卷刹处雕刻莲花纹。志文载：“大唐故徵君史府君墓志铭并序……元和三年三月廿七日卜吉址于良乡县仁凤乡以夫人孙氏合莹于此石之原……”。首题下部残，缺“撰者”朝议郎试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渤海李再字安固……。

4、唐故幽州副将乐安郡孙府君夫人太原王氏合祔墓志：

1992年4月于东营乡韩村河村砖厂发现。方形，长宽各0.46米，厚0.05米。志首题：“唐故幽州副将乐安郡孙府君夫人太原王氏合祔墓志铭并序。”志文载：“府君开成二年四月廿七日葬于良乡县金山乡韩村管

西南三里大莹。夫人咸通八年二月廿一日权窆于丘园以咸通十一年十月十六日龟筮祔于府君旧莹”。

5、杨麟墓：

1992年紫草坞乡平整土地时发现，墓已残。志盖已缺半，志方形长宽各0.50米，厚0.23米，盖中间篆书：“杨公墓志”。四坡刻人身兽首十二生肖，志首题：“唐故妫州怀戎县令相府君夫人河南达奚氏墓志铭并序”。志文载：“长庆三年十月廿八葬于良乡董村”。

6、大金国镇国上将军前广宁府判致仕班公(演)墓地立石：

明昌五年七月置石葬主忠显校慰长男德同葬主次男讳详

碑文载墓地“大金国中都大兴府良乡县明昌年拨属涿州奉先县所辖北辛安里”。立石于1995年3月在坨里镇沙窝村出土，青石质，长0.49米，宽0.40米，厚0.06米。

7、杨瀛神道碑：

1991年春于石楼镇石楼村西发现，碑已断为两截，碑高2.33米，宽0.86米，厚0.17米。

中顺大夫吏部尚书护军武威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贾益撰

文林郎益都府临朐令武骑尉赐绯鱼袋张光祖篆额

堂弟承务郎绛州太平簿武骑尉赐绯鱼袋沅书丹

首题：“大金奉仪大夫合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兼劝农安抚事上骑都尉弘农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杨公神道碑铭并序”。

碑文载：“……大安三年岁次辛未有四月壬年朔十六日丁酉立石。”

8、全世宗文睿宗谥号碑：

汉白玉质，螭首龟趺，碑高2.1米，宽0.86米，厚0.25米。碑阳镌刻双勾体：“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该碑为北京近年重要发现。该碑于1989年在周口店车场村龙门口金陵陵内发现。

9、焦公墓志：

1989年紫草坞乡大董村出土。碑高0.92米，宽0.47米，厚0.14米。志首额横书“焦公墓志”。志文载：“公生于丙辰二月，卒于泰定三年五月廿二日。大元泰定五季岁次戊辰二月乙卯十五日戊申男焦伯义立石焦□□同立。”

10、周瑛墓志：

1990年春崇各庄乡长乐寺村村南出土。一合青石质、方形，长宽各0.65米，厚0.09米。盖中间篆书：“明故昭勇将军义武中卫指挥使周公墓志铭”。志文楷书首题同盖。

明进士第浙江道监察御史前行人广阳张翰撰

赐进士出身徵仕郎兵科给事中夷陵王良佐书

赐进士出身承德郎精膳青吏司主事长洲徐明篆

志文载：“昭勇将军生于明正统丙寅九月廿五口，卒于正德癸酉八月十日，享年六十八岁，葬于房山县之落平屯。”

11、明故张母相孺人墓志：

1990年石楼镇坨头村西南出土。墓志一合、方形，长宽0.54米，厚0.11米。志盖中间篆书“明故张母相孺人墓志铭”首题同盖。楷书。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前通政使司右通政翰林院庶吉士上党郭秉聪撰

赐进士第承德郎刑部四川清吏司署员外郎主事丹职朱应奎书丹

赐进士第承德郎户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新城崔峨撰盖

志文载：“张母生于弘治丙辰七月十八日得寿五十有二，嘉靖丁未秋八月二十二日张母相孺人以疾终……”。

12、明故孺人贾氏合葬墓志：

1990年秋石楼镇坨头村西南出土。汉白玉质，方形，志长宽各0.62米，厚0.10米。盖中间篆书：“明故孺人贾氏合葬墓志铭。”志楷书。

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吏部验封司主事宜文渊阁语溪张文宪撰

赐进士出身奉训大夫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欧宁李默书

赐进士出身国子监五经博沧州李钦昊篆

贾氏生于天顺己卯十二月初九日卒于嘉靖戊子三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岁，择四月二十日合葬于夫君侧……

13、张瀚墓志：

1990年秋于石楼镇坨头村西南出土。墓志一合，汉白玉质，方形。长宽各0.56米，厚0.10米。志盖中间篆刻“明故北川张公墓志铭”。首题同志盖。

赐进士出身承取郎刑部陕西司主事清洛程绅撰文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广西等处提刑佥事前湖南道监察御史新昌俞则全书丹

锦衣卫昭勇将军都指挥同知淮阳杜承宗撰盖

张公讳瀚，字惟容，号北川，志载：“北川生于弘治丁己正月初四，卒于嘉靖乙己七月初二日享年四十有九年……”，“是年九月迁葬于祖圻之侧”。

14、张廷信墓志：

志盖中间篆书“恩荣官张公墓志铭”，志文首题同盖。

赐进士出身前承德郎刑部贵州清吏司署员外郎主事淮南郭璋撰

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同邑赵锦书

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任丘李垣篆

志文载：“公生于天顺口年庚辰(1460)，卒于嘉靖丁亥，德寿六十八……。”

从志文及出土地点分析，张氏家族墓地在坨头村。

石雕

1、石墓门。1990年春于紫草坞镇十三里村发现晋墓一座，出土有铜印等陪葬品。石门汉白玉质素石高约1.5米，宽约1.3米，两扇。

2、雕龙柱一对。汉白玉质。1991年春于周口店车场村金陵区域内出土。柱高约0.50米。柱浮雕二升龙，五爪倒发。为金代遗物。

3、石象生。1990年春于紫草坞镇大十三里村发现。石人一对，文武官均为2.1米，文官宽0.67米，武官宽0.70米。

4、石函。1990年6月1日于岳各庄乡天开村东天开塔地宫内出土一座高3.19米，砖石结构小塔，须弥座前刻有捐资人芳名，束腰处刻“大辽燕京良乡县金山乡(今岳各庄乡)乐深村西约一里地有古严陵洞……”方形石函，函盖及四面楷书铭文，函内还套有铜函、银函，函内装舍利5粒，另外还出土辽代木桌、椅子、玉佛、净水瓶、铜镜、银钵、瓷碗等。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作者系区文委文物管理所所长

云居寺已毁文物纪略

赵思敬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居寺，建于隋末唐初，历经千余年，屡有修葺，声名远播。寺中收藏无数珍宝，文物价值极高，惜毁于日军炮火，令人长叹！

为迎接辽金石经归安地穴，目前，云居寺复建已具规模，今从中外文人雅士之游记诗文中，将寺内已毁匾额、楹联及诸殿佛像等作一辑录，简述如下：

匾额楹联

云居寺内各殿均有匾额与楹联，且多为帝王所书。

毗卢殿外悬一匾，上题“慧海知珠”，殿内两旁悬对联为乾隆帝御笔，联句为：林外钟声开宿月；阶前幡影漾清辉。

释迦殿外悬一匾，上题“耆窟香林”，楹联一副，联句为：

石洞别开清净地；经函常护吉祥云。匾及楹联均为乾隆帝御笔。

药师殿额悬一匾，上题“香云常在”。

弥陀殿外悬一匾，上题：“金轮正觉”，为乾隆帝御笔。

文殊殿计悬三匾，内为：“慈云普照”，外为康熙帝御题“别有洞天”与乾隆帝书“慧海慈航”。

大悲殿上悬一匾，为乾隆御笔“莲台净域”。

小西天外悬一匾，为乾隆御笔“见春亭”。

云居寺座西面东，有三门，中门上悬一匾，题：“西域寺·云居寺”，二名并列，匾为近代所刻。据查清人查礼于乾隆元年(1736)游云居寺时，寺门匾题为：“西域大云居寺”。疑二名从此演化而来。

诸殿佛像

天王殿内塑四大天王像，分居左右，殿中有小法台，上塑弥勒佛，坐西向东。

毗卢殿内毗卢佛旁有环侍二弟子造像，名“花神、香神”。像前有香案，上列锡五供。

毗卢殿后为韦陀殿，内供韦陀为木雕像，刻工精绝。

释迦殿中为释迦佛，左右为阿难、迦叶。殿后祭台左有燃灯佛像、二天王像、千手观音像及数尊菩萨像。

殿后祭台右有弥勒造像及二天王像，并有送子观音像一尊。

药师殿内药师佛像左右，有“日光遍照”、“月光遍照”二侍者造像，二侍者手皆持一镜，镜上各书“日”、“月”两字。

药师殿后左右为大菩萨像四尊，左右又有十二尊面目狰狞的夜叉造像。

弥陀殿内阿弥陀佛像左右环立观音菩萨、大势至善菩萨造像。殿后左有华装观音像一尊，为千手千眼法身。两壁为十八罗汉画像。

大悲殿内大悲菩萨立于神龛之内，左为护法韦陀像，右为藏经处。

石碑·香炉·古钟

天王殿平台下，有小石碑三通，分别为光绪三十三年(1905)、宣统元年(1909)、民国五年(1916)所立，三石碑环形排列。

释迦殿外廊下有明万历四年(1596)所铸钟一口，院中有道光十二年(1832)铸香炉一座。

药师殿内有香炉一座，为光绪十二年(1886)所铸，上有“药师殿”字样。

大悲殿尽处，石碑甚多，已知有乾隆十一年(1743)所立；道光八年(1828)重建大悲殿所立；咸丰元年(1851)所立；光绪十六年(1890)立石碑四通。

千佛殿前，有石碑四通，依次为嘉庆二十五年(1320)；道光九年(1829)；同治三年(1864)；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立。

寺内皇帝行驻蹕所之庖厨，有巨锅数口，为昔日供给进香者煮粥炊具。

南塔附近，老槐树下，有石刻经幢，为元代至元二年(1336)所立。塔下平台南有石碑数座，其中一为明万历年间；一为清乾隆年间，一为清嘉庆年间，三碑皆清代所立。

明代周忱，曾于永乐十七年(1419)游云居寺，惊见庙碑数座，兴奋异常，寺内老僧言后苑中石刻犹多，且多贞观、开元年刻。惜多断裂，亦有扑倒于地者，不能尽读。

综上所述，皆见于前人文字记载，云居寺内文物，应不止于此。

参考书目及文章：

《日下旧闻考》

北京古籍出版社

《白带山志》

中国书店

《苾题上方二山游记》

清查礼 著

《记石经山云居寺》

法国·蒲意雅 著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回忆河北乡广播网的建设

王奎武

河北乡广播网于大跃进前期1957年开始兴建，1958年春节前夕正式通电播音。由于党中央的声音直接深入到群众之中，加上自办节目，为活跃河北地区的文化生活，并为即将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及以后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创造了舆论条件。河北地区自1952年划为北京市京西矿区后，工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刚解放不久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决心为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上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而奋斗。当时的乡党委书记是从抗日到解放一直就在河北地区工作的张成

基同志。在他的领导下涌现出了北京市成立最早的檀木港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北京市劳动模范——王江。为了庆祝这个合作社的诞生，1954年春节期间市委曾派阵容强大的文工团慰问演出了四天。到一九五六年河北乡实现了一乡一社的高级农业社，即永成农业生产合作社，跨入了北京市的先进乡社行列。为了实现党中央1956年发布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京西矿区决定首先在永定社(门头沟)、永成社(河北)、永丰社(坨里)、龙骨山社(周口店)建立试点广播网，以便在全市、全区大范围推广。

当时全矿区只有一个电影放映队。农村的宣传文化工作主要靠乡党委、乡秘书刻写的生产简报下发到群众传阅。各行政村有了突击性的中心工作，比如大搞环境卫生、预防疾病或选代表等，就组织老师、学生搞屋顶广播、出黑板报。春节期间有的村成立小剧团，有的村有大鼓会、高跷会、小车会、腰鼓队和秧歌队等，另外在河北还有一矿区直属文化站，主要是借阅图书，或对各村的文化活动给以必要的指导。有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又加上当地自然资源丰富，老百姓吃穿再也不发愁了。富裕了的农民盼电、盼听“话匣子”，有不少户开始自己拉天线安装矿石收音机。当上级党委决定在本地区建设广播网，并给每产都安上小喇叭的消息传开后，群众自然都非常拥护。

1957年我初中毕业，找到抗日时期就在我家乡打游击的张成基同志，他说：你就来建设广播网吧。并派我首先去坨里乡学习架线技术，回来后在北京市广播管理处、京西矿区社教科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乡党委责成以副乡长郑继顺和副社长郝玉柱为首的架线队伍，并且从房山矿机电科和北京市朝阳区请来四名会架线懂技术的电工师傅。社里还委派一名专供广播网建设的采购员吕务清，从河北村挑选了一名大师傅刘树松。

由于是北京市直接帮助勘察设计又是试点单位，所以在电料耗材等方面，由北京市广播管理处直接调拨配给。到各村的支线，由村里伐些榆树、柏树为架线电杆；小喇叭、瓷瓶、皮线由永成社出资购买。

大秋一结束，我们这支近30人的架线队伍在乡社干部的带领下就兴高采烈的干起来了。我们每天起早贪晚爬山越岭挖坑、立杆架线，终于在大冷之前使全长20公里的主体线路工程基本完成。

在深入各村、各户架支线装小喇叭的时候，北京邮电学院副书记李丰同志带领50多名知识分子到本乡李各庄村下放劳动。由于他们对广播网业务精通，在这支下放干部的指导帮助下，河北乡真是如鱼得水，条条银线连通了千百户农家，又从原六十九中学架通了220伏电源。1958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三，广播站正式播音。当时的广播室就设在铁瓦殿内，地上铺了比较好的木质地板。开始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鼓舞人心的军乐加上广播员王玉荣清脆嘹亮的“河北乡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那激动人心的声音，使静悄悄的山村沸腾起来。河北乡十二个村的八千多口人，加上煤矿工人达上万人，毫不夸张的说，第一次听到电喇叭在自己家说话，真是人人喜气洋洋，高兴劲就甭提了。

当时我们专找群众喜欢的评剧、河北梆子、歌曲、曲艺来播放，最流行的是评剧《刘巧儿》、《小女婿》和歌剧《小二黑结婚》等，人们形容这叫“无人的大戏满院听”。由于张成基书记喜好文艺，又善于鼓动宣传，在百忙的工作中，他经常深入广播室，亲自发表广播讲话和转播群众喜闻乐听的唱片。由于电源足，又是新设备，真是好听极了。人们听不够，高兴不够，在饱食娱乐文化的同时又受到了时事政治、科学知识等各方面的教育。

过去乡里召开干部会得有人亲自送信或带信，书记、乡长有什么工作要布置得层层开会传达。这回好，有什么事在广播室一讲，全乡老百姓坐在炕头上不用出屋就知道了。如当时为了尽快在全乡实现农田水利化，党委在大年三十发表广播讲话，一是向全乡父老拜年，另外是号召全体社员正月初一吃过饺子去工地挖水渠。当时群众为了尽快使家乡变化，十分理解党委的号召，男女老少纷纷响应，而且在工地上安上喇叭，建立了临时广播站。记得在李各庄后坡、辛庄西坡、东庄子岭南每次大兵团作战都是这样。1958年，北京医学院、农学院、林学院、地质学院、航空学院和北京师专等院校陆续下放一部分师生来本社参加劳动，又加上本乡的干部和学校师生的积极参与，保证了广播稿件的来源。工地上出现的好人好事，每天在广播里都能及时得到表扬。

那时没有录音机，也没有正规稿纸，都是直播。稿件内容大部分是：在某某工地上年过半百的老人干活赛黄忠；小脚老太太王李氏等克服山高路远和青年小伙子比着干；哪位好社员发明创造了什么；哪村干部搞了试验田等。

在文化娱乐方面，经常有下放干部晚上散工后去广播站教唱歌曲。广为传唱的歌曲有《社会主义好》、《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

通过鼓动宣传，人人精神焕发，干劲冲天。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一呼百应，上级布置什么工作都能按时完成。仅1958年一年原河北乡就建扬水站11处，挖主干渠一万多米，有3000多亩梯田旱地变成了水浇地。

由于河北乡的工作搞的好，1958年3月班各庄首先提出和河北并乡，后来又有佛子庄乡、磁家务、秋林铺共六十个行政村组成了河北公社。

河北乡发展到哪儿，广播网也发展到哪儿，同时还附带电话网。河北乡广播网的建设，由于领导重视，基础打的好，虽然经过了京西矿区、周口店区、房山县、矿务局工农区、房山区近40年的行政区划反复划分，但始终搞的不错，多次被市、县级有关部门评为广播系统先进单位。

现在，河北镇广播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停播了，但现在河北地区年岁稍大一些的人，提起河北乡广播站来，都会有一段美好的回忆。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小陶村农民篮球队发展始末

唐占忠

窑上乡的小陶村农民篮球队，在北京市房山区农民业余体育运动发展史上曾一度威震房山，鼎誉北京，是我区农民体育运动的一枝奇葩。

小陶村农民篮球队于1964年6月萌建。当时小陶村不大，几十户人家，处小清河左临岸边，土地贫瘠，人们生活水平很低，是窑上公社倒数一、二名的经济、文化落后村。每年春、冬季节，北风一吹黄沙飞起遮天蔽日，给人一种偏僻、凄凉、贫困的感觉。然而，就是在这个小村庄，怎么出了个叫人刮目相看的篮球队呢？这得从球迷卢振刚说起。

卢振刚1959年参军，服役在东北大连空军消防部队，其间，每当晚饭后连队便组织战士进行各种文体活动。尤其是篮球，战士们最重视。当时连队把篮球项目列为体育锻炼劳卫制一级达标，谁通不过谁就不是合格战士。由此，卢振刚对篮球产生了兴趣。1962年，连队根据中央军委批示调卢振刚到河北省邯郸做备战工作，每天专门从事担架实战演习。业余时间他常与战士们凑在一起玩篮球，用来丰富文体生活。1964年服役期满，三月份他回到家乡当了社员。这时天气渐热，一天劳动过后特别是中午晚上工余时间没得干，呆在家里非常寂寞，连收音机都是矿石的，怎么办？于是他把张家珍（下放工人）、高维（复原军人）、周广琦、纪士贤（社员），招集一起商议成立五人篮球小组。这几个人对现实生活都有同感，一拍即合。然而困难很多，没有需要的场地和器材。穷则思变，五人信心十足。他们分工合作立即着手办理三件事：

一是场地。这件事由卢振刚和周广琦办。当时村西头河边小学校门前有一小块空地（学生玩的场所），他

俩向张玉海老师舍脸求援,得到了也喜欢篮球的张老师的支助。这样,安半副球筐的场所算解决了。

二是球筐。这件事由张泉珍和纪士贤去办。他们不动用生产队物品,靠自力更生。张泉珍从自己家扛来一根旧檩条当球筐支架。纪士贤从自己家破农用大车上拆下几块板,锯成篮板面用钉子将其钉在檩条上。篮筐需是铁的,他把家里不用的破木水桶上的铁箍卸下来,用铁钉将它拧在板面,解决了第二个问题。

三是篮球。这件事由高维和卢振刚去办。买球没钱,只有想法借。他俩跑到窑上中学,向中学老师将困难一说,得到了体育老师的同情,设法给他们找了一个旧球(球的封口处缺一条皮线),回到村里从生产队跟大车把式要了一条鞭梢当皮线,封好口打上气,球也解决了。从此,他们五个人每天下工后中午晚上就在球场玩起来,热了跑到河里洗个澡再继续玩,他们感到生活增添了乐趣,小陶村篮球之风也随之兴起。四清运动开始后,卢振刚当了贫协主席,四清工作队中有个北京市体委下来姓南的篮球运动员,他借工作之余作训练指导。特别是他教的“一、二、三”战术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所谓“一、二、三”战术,即是三角战术。中间一人左右各一个,若中间人前进或后退,其他两人则与中间人成三角之势穿插进行进攻、防守、突破。经技术难度很高的反复训练,提高了球员的素质。

1965年卢振刚当了生产大队长,小陶村男、女篮球队在他的领导下便正式成立并发展壮大。男队球员是:卢振刚、周广月、高晓冬、张立均、张士良、纪晓兰、周祖兴、周广海、张泉珍、高维、周广琦、纪士贤等。女队球员是:王彩霞、周秀珍、周秀芬、周秀荣、周秀婷、高淑芳、王彩云、刘秀清等。命名为“小陶村青年生产突击队”。球队劳动与一般社员不同,生产队那些活茬最急、重、累、苦、难的都由他们去干,是生产战线生力军。业余时他们便练球和赛球。这时,球场已由小学门前移到村中间路南高家一块空地上。球架已配成两个,但仍是一根独木支撑,球员自筹资金买了新篮球,换上标准的铁篮筐。条件较前优越了,但美中不足的是球员装束仍为农家服,男队员为了省鞋,夏天练球就光脚,练完到河里洗了再穿鞋,用队员的话说:“平时艰苦多流汗,真正赛球稳夺冠。”

由于小陶村篮球队的发展,对周围各村和机关单位影响很大。象窑上公社的窑上、辛庄、鲍庄、任营、肖场、韩营,附近涿县的北蔡、陶营、大兴庄、四柳树、任村、码头,南召公社的常舍、务滋、兴隆庄等村都先后成立了篮球队。还有窑上公社驻军的10多个农场,如海军后勤部、海军司令部、海军政治部、北京卫戍区三团等单位,也都修建了球场,成立了球队。那时,窑上地区的篮球活动非常活跃,兄弟球队互约、互访、互赛(多数在晚上)经常不断,对发展农村的体育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1966年卢振刚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对球队更是关怀倍致。为调动球员积极性,推动球队发展,他决定从生产队拿出1.3亩地作为球队的实验基地,种上苗圃、棉花和粮食作物,以解决球员待遇问题。夏天,他冒着酷暑带领队员到永定河防汛指挥部金门闸去,搬石头修石坡挣钱。秋后卖了苗、棉花和粮食,有了钱、布票和粮票则开始装备球队。首先从北京天桥废品回收站廉价购回一些铁管和球场淘汰的照明灯,让窑上公社修配厂加工修置一套标准的铁管篮球筐架,球场打上水泥,上空架起夜明灯,为球队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其次,给球员买了一套鲜艳的球服。第三,球队外出赛球如果遇到占用劳动时间和误餐情况,给球员记工分发粮票。

第四,为使球队提高声威,买了两块红布做条幅,上边分别印有黄颜色大字,一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二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由此,小陶村篮球队更加发展壮大,在窑上地区兄弟篮球队中威震群雄,一领风骚。

1968年秋季房山县委举办篮球赛,在县联社工作的万里村人吴谭向体委举荐了小陶村篮球队,县委将其列入赛事日程。赛前卢振刚对球员鼓励并要求说:“我们虽是农民队,但要看得起自己,一定要振奋精神夺冠军!”经过三天实战比赛(循环淘汰赛),结果,小陶村篮队把县里老牌职工尖子队县粮食局队和县联社队一一击败而夺冠。从此,小陶村篮球队在房山县名声大震,引起县政府、体委的极大关注。

窑上学校校长韩尚德有个弟弟在北京市体委工作,得知小陶村篮球队如此强盛,他想借此教育一下他们

内部一个青年篮球队。因为那个青年队骄气十足，不求进取，教练都管不了。1969年春节期间，经他联系将小陶村篮球队请去，赛场在先农坛体育场。比赛开始，小陶村篮球队不太适应，因为对方个头高技术全面，自己个子矮一时不好对付，所以前半场比分落后对方。后半场小陶村篮球队针对不利因素调整战术，采取“走低路，严控球，猛打猛冲不含乎，联防配合要严密，没有把握不投球”的打法，弄得对方晕头转向，乱了手脚，最后小陶村篮球队取胜。这样，小陶村农民篮球队在北京市挂了号。第二年春季北京市体委举办全市农民运动会，小陶村篮球队代表房山县农民队参加了比赛。结果，小陶村篮球队逐个击败了各区县农民篮球队而得桂冠。从此，市体委对小陶村篮球队更为重视，随之将其作为扶植对象和市体委培训基地。

1971年春，市体委群体组负责人张清，带领市男、女排球队下放小陶村一边劳动一边训练，时间半年。这期间，市体委在小陶村还组织了体育活动，如拔河、投掷、长短跑比赛，以及武术队表演赛、篮、排球表演等。《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记者和北京电视台经常到小陶村采访拍照，报道农业生产和文体活动情况。当时北京电视台还以《欢乐的小陶村》为题向全市作了报道。1972年秋季，国家体委在东北沈阳举行农民运动会，市体委决定让小陶村篮球队代表北京市参加，赛前训练时，县委书记孙海同几次到小陶村视察以示关怀。开赛历时一个月，小陶村球队在沈阳苦战一个月。赛后，小陶村男女篮球队双双荣获亚军凯旋而归，为北京市争了光，在全国也出了名。1973年春，国家体委在江苏省芜湖举办全国农民体育运动事迹报告会，小陶村大队政治指导员周广义代表小陶村农民篮球队出席了会议并介绍了经验，为北京市赢得了荣誉。

1975年秋季，举行全国男篮赛，安排北京赛区的球队是陕西和湖北队，市体委将赛场定在小陶村。市、县、公社领导极为重视村貌整治，场地修饰，市里还拨款，从房窑公路起到小陶村街里修起一条6米宽、1.5公里长的柏油公路。县卫生局防疫站在小陶村的防疫点投资修水塔，让自来水入户。赛前准备使得小陶村面貌焕然一新。

比赛那天比过年还热闹，社员放假半天，成群结队到赛场庆贺助阵，公社附近各村社员也来赛场参观。赛场周围彩旗飘扬，人山人海，高音喇叭歌声嘹亮，大街上各机关单位的汽车川流不息。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房山广播站和外国记者争抢比赛镜头，小陶村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全国男篮赛小陶村之赛后，小陶村篮球队更是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十多年中大赛、小赛、友谊赛，经过几百回合球场拼搏，战绩辉煌，硕果累累，小陶村人每当看到大队部墙壁上挂满光彩照人的奖旗奖状无不感到幸福和自豪。小陶村还为我国各界体育事业输送了人才，如周祖兴光荣参军，高晓冬被涿县体委招走，张士良、张士均被房山师范破格录取，王彩云被市体委手球队选去等，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小陶村篮球队的发展经历了自己的辉煌，然而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说，它必然有起落兴衰的交替过程。1976年后它开始走向低谷，原因是卢振刚被公社敬老院调去当了院长，没有精力去关心球队了。另外球队队员周祖兴、高晓冬等主力队员离队高就，球队实力大减，锐气受挫。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实行个人承包，人们为发展经济而为土地所吸引。

小陶村篮球队走入低谷是暂时的。如今小陶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经济建设和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文体活动有所复兴。村里青年人想把过去小陶村篮球队家业拾掇起来，老球员每年春节回家聚会与青年人联欢赛球并集资建设新水泥球场，从精神和物质上予以鼓舞和帮助。

愿小陶村年轻一代球队重整旗鼓，再现雄风。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在河北公社广播站工作的日子

王奎武

大跃进筹建新线路

1958年11月花果山人民公社与百花山人民公社合并称百花山人民公社。1959年11月改称河北人民公社，由60个行政村组成，开始下设9个工作站，后来又合并为6个管理区。即：东庄子管理区、班各庄管理区、南窖管理区、长操管理区、大安山管理区、史家营管理区。

行政区的扩大，忙坏了我们搞线路的工作人员，因为一级政府的建立，首先要解决通讯联络和广播网的联播问题。

1958年大跃进以前，史家营、金鸡台的电话通讯由门头沟区斋堂电话局管辖，划归河北后，史家营管理区的电话及联播需由河北直接往上重新架线。(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联播线走低压信号由电话线传输)

12月份公社副书记李占津把这项任务交给我，叫我一人前往史家营去勘察地形，顺便熟悉一下山里各行政村的地理环境。当时我刚18岁，要自己去近百里山路的史家营，心里一点谱儿也没有。当时公社只有一辆美国万国牌10轮汽车，这天李书记对我说：今天下午1点咱们的大汽车去山里办事，你可搭汽车去。记住，过柳林水从山神庙下车走正西的沟一直就到史家营了。汽车行驶了70多里的河滩，不知拐了多少个弯，过了多少道河，简直把我走迷糊了。下午4点左右，来到了山神庙。下车的人都往北边金鸡台方向去了，由于没有社会知识，也不好意思向别人问路，只有我一人独自往西钻进一条狭窄的山沟，走了大约半小时，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窄，天气渐渐的黑下来了，仍不见村庄的影子。这时我心里就开始嘀咕起来了，莫非自己走的不是史家营方向的路，若大一个管理区怎么一个人也见不着？只是自己脚踩河卵石的撞击声。那时候，我刚看过水浒传，就用武松打虎精神来鼓励自己继续行走。转过一个弯又一弯，忽见眼前出现一个亮点，细看在左边的山坡上有一户亮灯的人家。我赶快上去敲门问老乡，这是什么地方？并说明来意。大妈说：你走错了。这条沟是青林台，这一个村就有十五里长。西北那条沟才是史家营。大娘和大伯给我出主意说：再往前走一里多路有一片人家，那里有农民食堂，你可以住在那里，明日一早，你再奔秋林铺，爬过一道山梁，再到史家营。我谢过大娘大伯，顺着他们所指的方向，很快来到那片村子并找到这里的负责人，说明来历。村干部比较热情，首先带我在农民食堂吃了饭，然后把我安排在一户住下，答应我明日起早和去秋林铺驮煤的社员一块结伴走。

我住的光棍屋真够穷的，爷俩个盖一条破被子，炕上什么都没有，幸亏火炕还比较热。他们无法照顾我，我只能把头枕在自己腰中挎的钳子和皮带三联上睡，把小棉袄脱了盖在身上。由于年龄小，不会打长问短拉家常，所以和人家的感情也建立不起来。只听对面坡上那户人家有一老者在教一伙娃娃们学唱山西梆子戏，老人对我说：我们山里人爱唱戏，从小谁去什么角儿就订下了，比如：王宝钏、薛平贵等，唱一辈子，一代一代往下传。那时我对梆子戏不感兴趣，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刚亮，队干部很负责的叫着我随着驮煤的社员就上路了。山路崎岖，很不好走，大约九点多，来到了秋林铺村。这是一个富饶的山村，村内有一座古代修的城堡，山村有自西向东流的一条小河，很是优美，比青林台的自然条件强多了。我找到村支书李万泉，对他说明来意，他帮我要通了史家营管理区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很热情，高兴的回话说：马上派人前来接我，叫我不要着急。

管理区派来的电工史福帮终于来了。比我大一、二岁，朴实热情也挺好说，我俩边走边谈，边介绍情况，很开心。我们爬上北面的山坡，上面很平坦，地势很开阔，距百花山顶已经不远了，看的很清楚。他指给我说：百花山顶有几棵松树的地方是百花山庙，那里夏天的景色是如何如何的好。路过莲花庵村和曹家房村时，他又给我介绍了文化古迹遗址——小西天。通过介绍和观察，百花山地区确实是物产丰富，风景优美的好地方。尽管走了十几里山路，没有一点累的感觉，我的心情和昨天来的时候已形成了显明的对照。来到史家营管理区，李德江书记、张成仕副书记待我都非常热情。首先领我去农民食堂吃了饭，然后领我参观了广播室，广播员史文兰正在播放当地老百姓喜欢听的各种戏剧唱片。又带我参观了史福帮亲自操纵的锅驼机发电站。他们向我介绍说：这800瓦广播机和发电机都是从北京新买来、运在山下河沟，又从山下抬到管理区来的，当时史家营村根本没有通公路，只要买东西全凭人背，牲口驮。

第二天，李书记安排史福帮领我去看线路以及设计如何从柳林水到史家营沟通至河北方向通讯线路的办法。

第三天，金鸡台话务员张淑梅又把我接到金鸡台以便参谋金鸡台广播喇叭如何安装，叫全村百姓都能听到的办法。这里的人性格都很开朗，一见面就跟自家人似的。张淑梅自我介绍说，他是青土涧村人，爱人在柳林水粮店工作，还告诉我，前三天你一出发，李书记就从河北公社打来电话，叫我们好好照顾你，说你还是一个孩子。一句话说的我心里热呼呼的。来到金鸡台，真是另一番景色，完好的四合院，古色古香，机关院内结构严谨青砖青瓦，窗明几净，好像一座庙宇。这里原来是京西矿区金鸡台小区所在地，又是原百花山公社所在地。安装有中天厂出产的50门交换机一台，有通往斋堂电话局和通门头沟的直拨电话，又有划归房山后新架通河北的电话线路，很是方便。电工兼线务员刘广存又领着我到金鸡台村走了个到，并谈了必需由领导同意才能实施的架设广播线的方案。

这次去史家营下乡，一共是4天。使我这从来没出过远门的人，受到了锻炼，开阔了视野，从我接触的人的言谈话语看，都迫切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能及早听到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声音，也进一步鼓励我尽快架通线路，办好全公社广播的决心。

年三十雪天搞检修

1959年春节前夕，我接到南窖管理区打来的电话，说800瓦广播机广播不出去了，这是个关键时刻，说什么也得叫社员过一个欢乐的春节。作为刚刚工作1年的电工，我还不会修理广播机，只好求助上级派人来帮助修理，打通县广播站的电话，说修理广播机的罗西湘同志到其他公社修理去了；又打通北京市广播器材修造厂，因全市修理任务重也派不出人来，经有关单位推荐，又打通北京广播器材厂领导的电话，经过公社主管领导的呼吁，该厂决定派一名工程师前来支援。

第二天，北京广播器材厂的项师付坐长途客车来了。在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交通工具就成了大问题，到河北有客车，到南窖就不通车了，公社机关有一头大马，是专供党委书记下乡用的。已经是下午2点了，要是我一个人就走路去了，可城里的师付又很胖，让他走路去实在不合适。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千方百计想办法从公社机关找了一辆自行车，又从河北西头烟酒专卖处借了一辆自行车，我俩带着工具和仪表就上路了。

往山里骑车步步登高，在河滩路上只能沿大马车压过的辙内骑，一出辙就骑不动或容易摔倒。虽是数九寒天，骑到红煤厂已是汗流夹背了。我俩又推自行车边走边问路，到南窖管理区已是灯火通明。

张绍尧书记和该广播室的杨学龙、王申、杨瑞娟等兴高采烈地欢迎和招待我们，感激地说，可把你们盼来了。本来应去农民食堂吃饭，可领导破例非得领我们去村南供销社饭店就餐。对南窖人的盛情款待，我和项师付都非常感激，因此决定连夜修好广播机。经细心检查和测试，原来是805功率管供高压用的电阻器全烧坏了。项师付是工程师，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机器就恢复正常。整个南窖地区的大喇叭又响起来了。

机关领导及全体干部职工欢声鹊跃，那高兴劲就甭提了，尤其张绍尧书记拿自己的好烟、好酒、好茶招待我们。我们对张书记说：广播机修好了，明天一早我们就骑车赶回河北公社。张书记待人非常亲热，项师付也没有架子，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外面纷纷扬扬下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起床，隔着窗户往外看，雪仍在下，积雪厚度已有一尺多深。大雪封山，我们处在一片茫茫的雪海之中。哪是公路哪是河滩已经辨认不清了。要想回河北一、两天之内是不可能了，我俩人很发愁。张书记和广播室工作人员那样百般热情地招待，我们更过意不去，认为这是给领导和同志们添了麻烦。项师付主动提出给广播室全体人员办个小培训班，讲解广播机的构造原理和使用常识。

就这样，一直呆了4天，直到能辨认出道路了，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再呆下去了。尽管领导和同志们再三挽留，我俩还是婉言谢绝，告别上路。趟着埋膝盖深的雪，走到黑龙关就中午十二点了，整个河套沟一片沉静，路上没遇到一个人。就这样，我俩趟了四十多里路雪，终于回到了河北公社。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五十年代初期上万中心学校的共青团工作

杨文祥

1951年9月，我从通县专区高师轮训班结业回县，经良乡县教育科派我到上万中心学校任教导主任，时年18岁，县团委任命我兼任良乡县第二区学校教师共青团总支书记，负责二区各校教师团支部工作。当时上万属于良乡二区，区委书记是李连贵，区长马良民，县团委书记李景云、教育助理杨义，上万中心校长高子厚。

上万中心学校包括8个村的小学，即上万北车营、焦各庄、晓幼营、西石府、长乐寺、北四位和南四位。我负责学校教导工作，每周兼12节语文和历史课，重点还是抓团的工作和社会工作，一年内很少有休息日。那时教师队伍还没建党，共青团组织就成为党在教师中的唯一的政治组织。共青团工作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如：人口普查、“三反五反”、开展“树立专业思想”、学习讨论改进教学方法、抓政治宣传、抓各校少年先锋队活动等。二区教师团总支设在魏各庄村，团员大会每月一次，支委会每月两次。

我每天完成自己的本职业务工作之外，其余时间全部投入到共青团政治思想工作之中。那时，每月只挣135斤小米，再无其它补偿，当时只知道拼命的工作，为革命事业付出从不讲报酬。

五十年代初期的宣传工作形式简陋艰苦，主要是教唱革命歌曲，组织团课讲座、进行时事广播、演幻灯、电影。那时，不论大会小会，组织大家教唱或合唱革命歌曲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国内正处在“三反五反”运动时期，国外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歌曲的内容也大多是“贪污份子你睁开眼”、“雄纠纠气昂昂”、“嘿啦啦”、“鸭绿江小唱”等富于战斗气息的激昂的曲调，歌词通俗易懂，绝对对工农化，往往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学会一首歌。由于学的快，人们很爱学，也很爱唱，唱起来越唱越带劲儿，情绪越高，因而对人们的思想感染力很大。

进行时事广播也是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广播和现在的广播不同，叫做“屋项广播”，一般二至三天进行一次，时间在晚饭后进行。事先要把广播稿写好，把团员和青年组织起来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三个人，叫做广播小组，事先分布好每个小组在村里哪家的房上。三个人的分工是：一个人专门负责举灯，手里端着

一盏小油灯来照亮，一个人负责小声读广播稿提词，另一个人手持一个拔火筒(广播筒)站在房上大声重复，读稿的人小声读一句，持广播筒的人高声喊一句。头一句是：“老乡们!注意啦!现在屋顶广播开始啦!今天广播的题目是……”广播稿是事先从报纸新闻的摘要和当前国内外大事摘抄编写的，时间最低不少于半个小时，所以每播完一次，播音员的嗓子都喊得嘶哑了。尽管广播形式简陋、却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它成为向群众传播国家大事沟通信息的重要渠道。

进行政治宣传的另一种形式是讲团课，听众不只有学校的团员、青年，甚至村里不少的中年人也自动到场听课。讲课的地点在学校的大院。这所学校在上万村大河滩西上坡的一个经过改建的大庙里，院内一棵上百年的高大粗壮的白果树，每逢盛夏的夜晚，微风轻拂，的确凉爽怡人。讲课人在大殿的台阶上，放上一张旧课桌，点上一盏扣玻璃罩子的煤油灯。讲稿内容多是报纸摘要、国内国际大事和从“朝鲜通讯集”选出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故事。如黄继光、邱少云等动人事迹等。每次讲课不少于一个小时，讲到故事的高潮处，人们精神倍增，常常暴以热烈的掌声。这种讲课一般每周进行两次，广大青年群众听了讲课都深受教育和鼓舞。

致于放映“幻灯”，有时是文化馆来人带着幻灯机播放。为了方便，学校索性从办公费中挤出钱，自己买了一台幻灯机，自己播放。实际上这幻灯机就是一台带放大镜的汽油灯。我们时常从县文化馆借来幻灯片子给人们放映。放映方式十分原始，要把片子依次一张一张的插入幻灯机里，每插进一片，就要进行一次口头解说，因为这是无声的，解说完了再换一片，就跟老天桥“拉洋片”的一样。幻灯内容有抗美援朝战斗英雄的故事，有农村卫生常识，放映一套片子至少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虽然形式简单，每次放映都有不少的群众前来欣赏。

那时，全县也没有一支电影放映队。在上万村往西穿过北车营的一个山沟约四里地，有个叫大南峪的火药厂，每半个月要为职工演一场电影，每次人们都不放过看电影的机会。当时到那里看电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团支部要找村政府开介绍信，还要专去人和厂方联系。看电影的人员必须是团员，要定好人点好名，事先要讲纪律，步行四里路排好队、有秩序地进厂。所以每去一次要费很大的周折。影片比较新颖，每次演出先播放一些抗美援朝战场的新闻记录片，曾演出《白毛女》、《神秘的伙伴》等片子。团员们以能看上电影而感到骄傲，故事情节使团员们深受鼓舞和教育，归来的路上大家回味畅谈电影内容，津津乐道。回去后向未能享受看电影待遇的人们高谈阔论。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啦，如今忆起这些往事，心中另有一番感触。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作者系原良乡办事处干部

忆房山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段汝连

1969年，房山县为适应当时宣传工作的形势，成立了“房山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参加了最初的组建工作。1974年又派我去宣传队担任队长，到1978年底调到县革命委员会文化科工作。这当中，在宣传队一共工作了5年多。现将当时一些工作、生活片段记述如下。

一

196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市里决定“十一”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欢庆活动。6月份市革委会成立了国庆办公室，农口也成立了相应的办公室负责组织各区、县农民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文艺演出节目。农口国庆办公室要求京郊每个区县要创作排练三至五个节目参加广场农民区的组台演出。当时我县没有专业文艺演出团体，经请示县革命委员会同意，由我县的农村、机关、厂矿、机关选拔抽调了30多名文艺骨干，经政审合格，组织起一支临时性的文艺演出队伍，负责完成国庆节的这项政治任务。具体的节目选题、创作、排练演出的组织领导工作，由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站长王建忠同志负责。在完成了国庆天安门广场演出任务以后，向县里领导作了一次汇报演出，革委会主任孙海同等领导同志看了觉得还不错，指示宣传队暂不要解散，充实一些节目搞成一台晚会到农村、工矿去巡回演出。1969年底，市里分配给我县北京戏校的一个班毕业生。他们是学河北梆子专业的一共30多人。县里遂决定将我们与分配来的这两部分人合并到一起成立房山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又从学校抽了12位教师充实乐队，从基层业余剧团抽调12名演员一共80多人，就住在原房山评剧团旧址。这时正值全国上演京剧样板戏的热潮之中，宣传队也排练了《红灯记》、《沙家浜》两出样板戏到农村演出。两年后，因队伍比较大不便于下乡演出，再加之在宣传队内部产生一些矛盾，为此进行了两次整顿。这以后只留下了30多人。以短小精炼的歌舞、曲艺、器乐、独幕小戏为主要演出节目。1979年根据市文化局的精神，宣传队解散，原戏校的毕业生大部分回到市属文艺团体，乐队和一部分演员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这支文艺宣传队从创办到解散历时10年，10年间为丰富房山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演出了1200多场文艺节目。

二

文艺宣传队的任务有两项，一个是完成市里每年“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的游园演出活动；一个是日常的下乡演出和每年春节到驻房山部队、中央厂矿慰问演出，10年间创作了一批反映农村生活的文艺节目。有些节目还产生过一些社会效应。

《公社喜开丰收镰》：浩然词、王同群曲。1969年8月，市农口下达了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联欢会的演出任务后，当时浩然同志正在新街村下放劳动。经王建忠同志同意，我们请浩然到宣传站来创作歌舞节目。记得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们几个同志和浩然一起在宣传站美工室的一张桌子旁分头进行创作。到夜里12点多有四首歌词都写出来了。大家也都饿了，伙房给我们煮了一锅面条汤作为夜宵。每人吃了一大碗以后，开始念稿

子。当然是浩然同志写的歌词《公社喜开丰收镰》水平最高。“雄鸡高唱艳阳天，社员集合到村南。精神抖擞浑身动，就像战士上前线。一片笑声一片歌，公社喜开丰收镰。……”这首歌在国庆节天安门广场演出后，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在全国播放流传。每年麦收时节，各公社、村广播站都播放，成了麦收开始曲。

《写封信儿寄回家》：由我作词，马风岩、董雅琴作曲。是一首女声表演唱。内容反映城里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通过劳动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学会了农业技术，写封信向家长汇报情况。由于题材正适合当时形势，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时台下反映热烈，两次翻场，三次谢幕。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纪录片。一周后《北京日报》发表了这首歌曲。当年底收入了北京市文化局出版的歌集。

《电影队进了山》、《赤脚医生心最红》、《小喇叭安到俺家中》等一批歌舞节目，在1972年5月还参加了市文化局在民族文化宫剧场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文艺汇演》。

为了下乡巡回演出排练了小戏《渡口》、《划线》、《带响的弓箭》、《送货路上》、《大红马》、《挡马》。器乐合奏《乱云飞》、《百鸟朝凤》和曲艺独唱等观众比较喜欢的节目。由于受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方针的局限，多数节目有着明显的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倾向性。

文艺宣传队的工作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几十人住在原房山评剧团的旧址。一间房放三套双层床，住四、五个人。下乡演出大多是步行，自己背行李和乐器。在山区演出每天要走三、四十里路。后来有了一辆130汽车，外出演出要装上全部服装、灯光设备、乐器，还要坐20多人（严格地说是站20多人）严重超载，好在那时没有交通警察。在张坊镇惠南庄演出时，每天劳动半天，下午排练，晚上演出。在社员家吃饭，住在学校教室里。到木城涧、大台矿演出后转移大安山，队员们步行爬山，中间还坐了两段矿车走了一天才到了大安山煤矿。都很累，宣传站站长王建忠同志也和我们一起走。大家情绪饱满，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以自己演出的实际行动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受当时“左”的影响，县革委会政治组调一部分工农出身的同志到宣传队工作，叫作“掺沙子”去改造知识分子——戏校来的学生。给这些同志造成了小小的思想和精神压力。但同志间一起生活工作，个人关系上还都是很不错的。这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但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一册《房山史料》残本

赵思敬

手中有一册残本房山史料，石印、16开、24页、手写两面印刷、线丝平订，纸呈草黄色，用手轻轻一翻，折痕处便会断裂，从这一点来看，它的寿命已经超过50年的期限，这是由谁主办的杂志，共出版过多少期，每期有多少个页码？这个残本是第几期，无从知晓。但从里面收录的《纪念九一八告同胞书》，可以推断，这本杂志编辑、印刷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残本现存7篇文章，现分述如下：

- 1、房山县民众教育馆告民众书
- 2、“同胞们赶快入民众学校罢！”
- 3、纪念“九一八”告同胞书

- 4、卫生常识
- 5、谈谈农民合作
- 6、国难期中告民众书
- 7、劝种美棉

另外，还有漫画5幅，穿插其间：

1、不识字的人。此图分为两幅，一为农人在“禁止便溺违者重惩”的告示下撒尿；一为公安人员追打便溺者。

2、荷锄识字。此图插在“同胞们赶快入民众学校罢”文后，为一农人荷锄行走间读《千字课》。

3、吃乳。图为一妇人抱婴儿吃乳。此图左下角有“21、10、21”字样，据此可知，此图画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亦可知此书必印于十二月底或十一月。

4、誓血国耻。此图为一奔跑高举小旗，游行状。旗上书“誓血国耻”，这幅漫画应是最有感染力的作品，不失为已知房山早期漫画。4幅漫画皆为毛笔所画，线条沉着、凝重、流畅，似学丰子恺之画风。惜作者失名。

现在说说各篇文章内容：

《房山民众教育馆告民众书》：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知道了“教育馆”为“本县(房山)所办”。内部组织分为三个部：“1、图书部——地址在文庙内(今东街房山中学所在地)，备有许多书籍——“古今的文艺”、“应用的科学”、“民众读物”……2、讲演部——地址亦在文庙内，每周必举行公开讲演；并有巡回演讲团时常到乡间讲演，还带有留声机及各种乐器，用助余兴。3、卫生部——地址在福圣寺胡同(今北街)的中间，内有体育场，备有篮球、网球、排球、单杠、滑梯、轩轻板、沙带……”。从本文中亦可得知，此时“房山民众教育馆”开幕时间不长。民国年间成立的这个部门，存在了多长时间，都收到了什么成效，史无记载。在新编写的《房山区志》中，也没有收入只言片语。

《同胞们赶快入民众学校罢》：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什么是民众学校；二、不识字的害处；三、识字的好处；四、识字困难的解决。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感叹。“四万万同胞，不识字的倒有多半数”。“我们中国不识字的这般多，科学如何能发达，如何能强国，与外国如何抵抗呢？不识字的同胞！我们要打算救国，那是非识字是不可的，希望大家要有决心，抱着做到老学到老的宗旨，向前努力读书识字吧！”

《纪念“九一八”告同胞书》：本文分析了亡国的种种表现，提出“我们除掉国病的方法是：上下一心，精诚团结。要合手出坚强的毅力；恒久的决心，抵抗日本”。本文写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即1932年。

《卫生常识》：文中注明“节录民教养成半月刊”。本篇分为“个人卫生”、“产妇卫生”、“婴儿卫生”、“病人卫生”四个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条目属于卫生知识一类文章。

《谈谈农民合作》：是一篇农村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议论文。文中提出了：合作社是调节市场的良好组织；合作社是最好的储蓄机关；合作社是平民的银行；合作社可以养成良好的道德；合作社可以养成勤俭的习惯；合作社可以改良农工的生活；合作社可以促进生产的发达。应是民国年间，房山地区有关农民合作社雏形的极有价值的一篇范文。

《国难期中告民众书》：分析了中国丧权辱国的历史，希望同胞赶快行动起来，给日本以迎头痛击(全文附后)。

《劝种美棉》：本文介绍了美棉优于中棉，还说：“本县农事试验场自试种美棉以来，经两年观察和实验的结果，(美棉)适于本县栽培。”文章还概括地介绍了“劝种美棉十八要”从气候、土质、种类、整地、施肥、浸种、播种、间苗、中耕、灌溉、摘心、去疯枝、去旁芽、剪枝叶、去晚花、忌窝风、收获等方面讲述了种美棉的过程。

综合以上文章，我认为，这是一本由民国年间房山县政府主管部门办的杂志，它集中了教育，卫生，农事等有关方面的人士，分头撰写文章。从手写字体看，大约出于4人之手，虽然字体多异，但都非常认真，而且都是比较工整的行楷。不管怎么说，这册残存的房山史料，为我们提供了68年前这块土地上的许多“新鲜”史料。

附：

国难期中告民众书

同胞们!莫不关心国事的同胞!常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醉生梦死的同胞们!现在借着这张纸和大家谈谈，日本侵略我国的情形，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来，大声的念他几遍，牢牢记在心头……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和我国同种同文同洲的关系，又因他们的人口问题，市场问题，以及工业原料问题，都要向中国侵略的结果，籍以巩固他的基础，延长他的寿命，故无论日本政府口头上宣传中日亲善是如何漂亮，实际上他的侵略政策，断不会放松一步，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依然鹰腾虎视，欲乘机单独吞并中国，以遂其野心。由此一看，我国稍有弱点可乘，即施其捷足先蹬的手段，我们看到历来的情形……真是可叹可哭!甲午之役，野蛮日本军队，到处奸淫掳掠，惨无人道，用武力压迫订立《马关条约》割据台湾、澎湖群岛，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至今思之，犹有余痛。民国四年，怂恿袁世凯称帝，而挟迫订立亡国灭种与惨酷无伦的二十一条；民国七年，以军事协定为条件，资助安福系以祸国；民国十四年，上海的五卅流血；民国十七年，出兵山东，酿成“五卅惨案”……诸如此类，实在书不胜书。同时更用商业政策，实行经济侵略，在我国内强设工厂，操纵金融，通行轮船，把持航路，运进洋货，使我手工业根本破产。

以上所写的一层层的国耻，痛苦是我们已经受过，希望大家记在心头才是。

不过在最近几年来因为我国内乱不已，灾害频仍，无力去打倒蛮强无理的日本，而日本竟乘我国危弱之际，在去年九月十八日更又无理的强占我们的东三省。抢掠财物，任意烧杀，惨无人道，后又炮轰沪，扰乱天津，等等的蛮强无理的行为发生，而侵略我土地，破坏我国权，实乃是我们现在的奇耻大辱!

同胞们，心灵没有死的同胞们!你们要打算立足于大地，要想做一个时间空间的分割者，要想使你的种族永久存在着，就赶紧精诚团结，刻苦坚忍，充实精神，锻练体格，务各屏绝浮华，节衣缩食，量力储金，移助国家。时机一到，就全体动员，与那狰狞的帝国主义——日本，以迎头痛击，同胞们!赶快行动起来吧!努力，奋斗……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我演《宝山参军》 ——五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张广明

最近在《房山文史资料》(第十三辑)上,读到刘振祥同志撰写的“解放初期良乡中学的文化生活”的文章,唤起我对那火红的年代,中学时期生活的一段美好的回忆。记得良乡解放后,在良中的第一次全体师生大会上,第一任校长赵亚平激动地宣布“从此我们良乡中学就是一座革命的,民主的学校了”同学们听后欢欣鼓舞,热烈鼓掌庆贺良乡中学的新生,正像振祥同志所说的当时的良中学生是朝气蓬勃,满腔热忱,追求真理、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一群革命学子,他们是唱着《东方红》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奋发学习,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在解放初期良乡中学的文化生活》一文中,还提到良乡中学上演的歌剧,称得起响彻全城深入人心,并谈到歌剧《宝山参军》。这使我想起五十年前排演这个歌剧时的情景,一些往事对这部歌剧当时演出的情形,翁向新同志在《房山文史资料》第二辑上撰写的《良乡中学的建立与新生》中有这样一段话:“1949年春,在翻身农民报名参军的热潮中,良中演出的歌剧《宝山参军》,一时成为轰动全地区的‘名角儿戏’,十里八村的群众拖儿带女赶到城里来看演出。”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十年了,那个在剧中扮演青年农民王宝山的就是我,扮演宝山妻子刘金莲和妹妹的是我同班的两位女同学:褚慧兰和袁淑华。今天当回忆起50年前的那场演出和良中的学生文化生活的时候,仍使我激动不已。

1948年12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良乡县城。按照上级批示,我察哈尔省十一分区对良乡县中学进行了接收。原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第三中学(在原宛平一区李各庄,今房山区河北乡),在校长赵亚平同志率领下,百余名老解放区师生,冒着大雪,背着行李,经过百余里行军,驻进了良乡县中学。两校合并后,正式定名为北岳三中。从此全体师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走上了新的历程。当时,平津战役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迎接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区掀起了广泛的踊跃参军热潮。学校党组织为了配合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组织起了宣传队,并决定排演歌剧《宝山参军》。我和两位女同学被挑选担任了剧中的主要角色。

《宝山参军》是一出表现翻身农民当家做主,踊跃参军保家卫国的歌剧。内容是青年农民王宝山,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主动报名参军,而做为妻子的刘金莲,不愿意丈夫去当兵,她舍不得刚刚获得的幸福生活,因而拉了丈夫的后腿,由此产生了矛盾和戏剧性的冲突。王宝山以在旧社会受反动派欺压,被地主老财剥削,父亲惨死在牢房,母亲气病身亡,一家老小无依无靠的遭遇,和幸亏来了解放军才得以翻身解放的事实,打通了金莲的思想,使她和小姑一起高高兴兴送丈夫参军上了前线。剧情生动感人,唱词通俗易懂,唱腔优美流畅。虽然经过了47年,那些充满激情的唱词至今我还能背诵:……雄鸡叫亮了天哪/太阳升乌云散/长流水流到了头/千年的冤仇要清算/有了房子有了地/有了吃来有了穿/吃米不忘种谷的人/不忘共产党搭救了咱,好男儿应当上前线/保卫祖国保家园。

由于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第一次演歌剧,又是男女同学合演,没有生活体验,但热情很高,克服了不少困难。记得有这样一情节:刘金莲思想搞不通,夫妻间产生了矛盾,宝山一气之下举起拳头要打妻子,这时刘金莲愠怒地瞪了宝山一眼,意思是说:你敢!宝山举起的拳头又落下了。辅导老师要求此时宝山要表现出对金莲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情,拳头落下时,手松开,从脑后顺脖子滑下来。几次排练我也找不着感觉,心

里非常着急，回到家对着镜子反复练这个动作，就是不到位。后来有一次我看到邻居小两口吵架，从他们的眼神和手势中，我找到了生活的依据，才完成了规定情节。

从拿到剧本背台词、练唱腔，到正式排演只用了 20 天时间。因为是歌剧，需要乐器伴奏，当时学校只有一架风琴，幸好我们院住着部队的文工团，他们正在上演《白毛女》和《反翻把斗争》，知道我们在排《宝山参军》时，文工团就主动派出一支小乐队为我们伴奏，并帮助我们排练，使这部歌剧更加趋于完美，同时也增添了不少色彩。演出的地点在良乡西门后海，原中山俱乐部的舞台上（那个地方过去有一个古戏楼，后来拆了，叫海，实际上是个大水坑，解放后填平，现在是部队的干休所）。演出的那天非常热闹，确实象翁先生回忆中所说的那样，观众有城内居民、当地驻军、十里八乡的农民和各界人士及学生，把个俱乐部挤得水泄不通，可算是盛况空前。演出后一些脍炙人口的唱段很快在群众中流传：边区的白洋布四寸三/做上那慰问袋真好看/六寸长四寸宽/黑线齐口红镶边/绿头那个绳儿把口来拴/先锈个“为”字在当中/一切都为了革命战争/为了土地为了革命/打垮老蒋去当兵/打倒那蒋介石才有太平/第二个字儿锈上个“人”/人民那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人爱/军民百姓一条心/军民那齐动员大反攻……这是姑嫂在大榆树下比赛做慰问袋时的一大段对唱。慰问袋上要绣“为人民立功”五个大字，每绣一个字，就有一段唱。

《宝山参军》演出后，为良乡地区的参军运动起到了一定的鼓舞和推进作用，难怪一些老同志在回忆录中还多次提出到它，这也是使我对此永生难忘的原因。

（《房山文史资料》第 14 辑）

袁枚与一首良乡题壁诗

赵思敬

清人袁枚，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乾隆元年（1736 年）丙辰荐举博学鸿词，乾隆四年（1739 年）己未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先后官溧水、江宁知县。解官后，作园于江宁小仓山下居之，曰随园，故世称随园先生。一生以书籍诗文为事，史家评其“古体诗奔放纵肆，时或流于粗率。近体诗较清新自如，且多应酬之作”。袁枚往来于南北，多次路经良乡。在乾隆十七年（1752 年）壬申夜宿良乡旅店时，发现了一首题壁诗，诗云：

满地榆钱莫疗贫，垂杨难系转蓬身。
离怀未饮常如醉，客邸无花不算春。
欲语性情思骨肉，偶谈山水悔风尘。
谋生消尽轮蹄铁，输与成都卖卜人。

这首诗感叹时事艰辛，命运多难，引起了袁枚的感叹。后来，王昶在《今传是楼诗话》中说：“题壁诗殊不易觅佳音，随园极称良乡旅店题壁诗”，并非虚话。因诗末只有“篁村”二字，作者姓甚，何方人士一概不知。袁枚决意寻访作者，即手录题壁诗，并留下《和良乡题壁诗》一首：

天涯鸿爪认前因，壁上题诗马上身。
我为浮名来日下，君缘何事走风尘。
黄鹂语妙非求友，白雪声高易感春。
手叠花笺书稿去，江湖沿路访斯人。

同样，与袁枚友善的方公(佚名)亦爱此题壁诗，并“禁止店主巧去”。袁枚诗中“手叠花笺书稿去，江湖沿路访斯人。”并非妄语，多年来，他一直寻访作者。苍天不负有心人，十七年后，袁枚果然在友人梁方伯的邀请席上，见到了这位良乡旅店题壁诗的作者“篁村”。而此时，同样欣赏此诗的劳、方两公已作古。袁枚感慨不已，当即作《喜晤陶篁村》诗：

当日相思村店壁，今朝相见菊花天。
同生此世原非偶，听说前缘各惘然。
有数才人天地内，无端良会水云边。
也亏彼此吟怀健，耐得人间十七年。

从袁枚的诗中，我们知道两人相见于九月“菊花”正开之时，会面的地点当在南方某地之“水云边”。袁枚在这首诗中还写有自序，记述其事：“壬申过良乡，和陶篁村题壁诗，遍访不知何许人。后十余年，劳观察宗发来云，渠宰此邦，同制府方公见诗而爱之，禁止店主巧去。今又隔六年矣，在梁方伯席上晤篁村，方知萧山人也，姓陶名元藻。告以故，陶感知己恩，而悲劳、方两公已亡。重赋二诗。”

查《中国历史人物辞典》，有陶元藻辞条，抄录如下：

陶元藻(1716—1801) 清文学家。字龙溪，号篁村。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时诸生。曾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幕客。诗文都负盛誉，归里后，于西湖建“泊鸥庄”，以著书为业。著有《泊鸥山房集》、《全浙诗话》、《凫亭诗话》、《越访遗编考》、《越画见闻》。

从袁枚的“和诗”和“晤陶篁村”诗看，绝不是“应酬之作”，而是出于“真情实感”。

遥想当年，陶元藻题诗的良乡旅店在什么地方，史记无考。不过，这段佳话却被写入《清诗记事·乾隆朝卷》中。

参考书目：

- 1、《清诗记事》
- 2、《中国历史人物辞典》
- 3、《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大跃进”时期的房山文化工作

段汝连

从1958年夏季开始，房山也和全国一样，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房山的文化工作改变了原有的布局和工作节奏，加入了“大跃进”的行列。这时期工作的特点是工作规模有所扩大，大力推进农村文化普及，工作方式以“大兵团”为主。

1958年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文化工作的规模扩大了许多。原来区里只有一个电影放映队，公社化后在六个人民公社中都建立了电影放映队，从事农村放映的电影队发展到七个，放映员由六人发展到二十四

人。为适应电影队发展的需要，区里建立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当时叫发行站)，负责全区电影队的影片发行放映、设备维修、放映员的培训和业务辅导工作。同年，房、良合并划归北京市，原通县专署评剧团划归我区，改名为周口店区评剧团。在全区六个人民公社中有房山、长沟、河北三个公社建立了半专业性质的文工团，总人数有二百五十余人。

这年7月，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由中央，市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组成文化工作队下到各区县。来我区的文化工作队是北方昆曲剧院、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摄影系师生以及中国评剧院二团、北京曲艺团、北京幻灯制片厂、北京文联美术组、首都图书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电影公司等十个单位五百余人，他们中间有著名的电影演员李百万、方辉；评剧演员魏荣元、小白玉霜、马泰；昆曲演员白云生、侯永奎、李淑君、丛兆垣；北京琴书演员关学增、画家凌成竹；电影学院教授汪岁寒、作曲家陆放等。文化工作队的任务一个是演出，一个是做农村文化的普及工作。先后在房山大礼堂演出了话剧《兵临城下》、《党的女儿》、评剧《秦香莲》、昆曲《红霞》，使房山群众有机会看到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文化工作队在区委的统一部署下分为六个工作分队，分赴六个人民公社。具体的工作任务是辅导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开展“诗画满墙”活动，并培训农村文艺骨干。工作队实行“三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一年作为文化普及的成果是在农村普遍地开展了大规模的“人人写诗，人人画画，诗画满墙”活动，琉璃河公社文化工作队征集上来的诗稿就有一麻袋。区里办起了《周口店文艺》月刊，主要是登载农民诗画作品。记得当时由我和电影学院的学生孙昌一来办这个刊物，他负责美术编辑，我负责诗稿编辑，工作十分紧张，差不多每天都要加夜班(1994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遇到时任副厂长的孙昌一时，提及此事时他还记忆犹新)。这一年的9月，作为文化普及成果的展示，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了《周口店区农民画展》，在西单剧场举办了周口店区群众文艺节目专场演出。

1958年冬季掀起了兴修水利工程的高潮后，我区先后有天开水库、牛口峪水库、崇各庄水库工程开工。文化馆组成三个工作小组分赴各水库工地，开展工地宣传鼓动工作。我和潘文彬去的是牛口峪水库，在水库指挥部的宣传科工作。具体的工作任务是办工地战报。这是一张八开纸的油印小报，每天一张，主要是宣传指挥部的工程部署，工程进度，各民工团涌现出的先进事迹等。报纸不大，但工作很忙。当时工地劳动场面十分火热，就连1959年元旦都没休息。夜里民工们冒着零下二十度严寒用双轮车、手扶拖拉机往大坝上运土，个个汗流浹背。我们每天上午到各团和指挥部各科室采访，收集通讯员稿件。下午修改、编稿，晚上排版刻印，第二天一早分发到各单位。

在“大跃进”年代，房山各条战线先进事迹层出不穷，在文艺作品中反映也不少。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黄山店供销社王砚香和邮局任成水的先进事迹拍摄了故事片《红色背篓》、《红色邮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大型新闻纪录片《跃进中的房山》北京文联作家先后深入我区农村体验生活，用文字作为反映我区农业战线先进典型：杨沫写了报告文学《南韩继人》；浩然写了报告文学《北京市迈开了大步》；管桦写了报告文学《在高高的富合山上》。这些文章相继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并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

“大跃进”年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一个全区上下干部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代，是一个热情多于理智的年代。回忆那段历史，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流行于房山地区的五首民歌

张广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市区有关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曾开展过一次广泛的民歌征集活动。原燕山区文化馆乔玉泉等同志,经过两年多时间,克服工作繁重、没有经验,缺少录音录像设备等困难,深入农村,厂矿、车间、地头,走访了百余名工人、农民,民歌爱好者和传唱人,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和技术性工作,搜集、整理起源或流行于房山地区的民歌五十余首。并编辑成册,有的还配上曲谱,成为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民俗资料,填补了房山地区民间文学的一项空白。

这些民歌题材广泛,历史跨度大,有的可前推百余年,有的则是军阀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流行的,有的则是解放后用旧曲填上新词,反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大跃进新时期的作品。有的(如《四辈上工》)就是起源房山农村的作品。

《四辈上工》

这是在周口店搜集采录的。演唱人叫刘金祥,还有一位叫赵金生,由乔玉泉采录整理,配有曲谱,唱的是羊耳峪村发生的故事。长工四辈给地主家扛活勤劳能干,被何大姐看中,相互爱慕,私订终身。全曲共分十五段,现摘录其中几段如下:

- 1、正月里来正月正,做活的四辈呀来上工,上工先挑两担水(太平年),吃完了早饭又起牛棚(年太平)。
- 2、二月里来龙抬头,何大姐在楼上来梳头,手扒着楼门朝下望(太平年),看见了四辈长的风流(年太平)。
- 4、四月里四月二十八,娘娘庙里把香插,婶子大娘全上庙,留下四辈跟我看家。
- 6、五月里麦稍黄,大麦小麦都上场,长工月工都下地,留下四辈跟我翻场。
- 8、六月里热难当,何大姐躺在象牙床,手拿着凉扇还嫌热,可叹四辈榜高粱。
- 9、七月里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牛郎织女天河配,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
- 10、八月里月儿圆,西瓜月饼供龙天,婶子大娘全都圆月,可叹四辈月不圆。
- 11、九月里秋风凉,做活的四辈没有衣裳,奴家有个红绸子袄,改改换袖给你穿上。
- 14、十二月来整一年,做活的四辈要使钱,有心跟东家算算账,等来零钱好过年。
- 15、十仟月一年多,叫声四辈奴的哥哥,钱多钱少你自等着做吧,没有钱花你朝着奴说。

由于历史悠久,民歌的变异性很强又有其民俗的独特属性,其中有的段子较低级庸俗,这里就不在摘录了。

《四辈上工》的曲调,采用的是单弦牌子曲(太平年),曲调优美,朗朗上口,易于传唱,流传很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从燕山新华书店购得一盘《北京地方民间音乐》盒带,发现四辈上工的第一段词曲被收录进去,并有两种版本。一个是城区的叫时调小曲《四辈上工》,一个是房山区的叫民歌《四辈上工》,都由崔伟丽演唱,可见它在北京地方民间音乐这个大家族中的地位。

《劝足》

这是一首民国初期的民歌。封建社会包脚缠足，是对女人的一种束缚。辛亥革命后提倡解放小脚，这首民歌就是在那个时期诞生的。歌词如下：

劝同胞明白的少，弄女儿包的那个什么样的脚，包松了它小也小不了，包的紧了它受也受不了。

啼哭皱眉又把那牙来咬。劝同胞你们快快的放脚，中华国属文明，大了脚的为高。

这首歌的演唱者叫李志彬，系长沟太和庄人。乔玉泉在采录、整理后，曾讲到采录这首民歌时的过程：李志彬常在周口店附近以拣破烂为业，在我遍访民歌高人之际与其相遇，经人介绍献歌二曲，一曲较完整的就是《劝足》，还有一首叫《小学生》正待讲述歌词，忽有人找，后再未见。从中我们感到民间采风工作的艰苦深入精神之可贵和这些民歌的来之不易。

《盼解放》

这是周口店一位叫寇申的人写的词曲。全文如下：

1、提起房山县哪，白箍一霸天，人民遭涂炭，何日见青天，嗯 哎哎嗨呦哇，得儿龙咚呛啊，何日见青天。

2、白箍能摆忙，要伏来围墙，炮楼修在龙骨山上，修在龙骨山上。

3、砌修起了比天头，又把地道挖，要杀民伏倒有好几千，倒有好几千。

4、清晨把活干，不让吃早饭，饿的百姓歪歪真可怜，歪歪真可怜。

5、小锄锄二遍，命令要挖完，苗草儿荒了一大片，荒了一大片。

6、七月七事变，八路到这边，盼望着解放军，快快来救咱，快快来救咱。

此曲演唱赵金生，采录整理乔玉泉。

《何日见青天》

这是一首抗日歌曲，由田玉珍填词，刘金祥演唱，乔玉泉采录整理。歌词通俗易懂，声声血、句句泪，控诉日军暴行，表达人民群众抗战到底的决心。全文如下：

1、众位老乡们哪，听我告诉你，我才从那敌占区偷跑回来的。

2、从小见着的呀，鬼子在村里，打媳妇呀骂百姓，怎叫咱忍下去。

3、鬼子修据点，四外铁丝圈，几十年的好房子，炸成大河滩。

4、百姓们没地方住，四外搭草铺，七家子八家子，住在一个屋。

5、屋子都不大，住也住不下，外面下大雨，屋里闹蛤蟆。

6、鬼子要烧煤，跟着清剿队，七八十的老太太，全都去挖煤。

7、挖煤鬼子烧，百姓烧柴草，烧草就冒烟，两眼泪不干。

8、鬼子拉狼狗，拴在大门口，你不让他奸淫，那是不能够。

9、鬼子要开款，缺少联合票，卖粮食卖老婆，都得把款交。

10、你要不交款，鬼子来到了，找你去，拉你走，叫你喂狼狗。

11、狼狗一大群，百姓不敢出门，东斋堂下英水，狼狗咬死人。

- 12、天黑到夜晚，不敢把灯点，偷偷点上灯，心里打寒颤。
- 13、百姓点上灯，鬼子门外听，你要是说闲话，拉出去就枪崩。
- 14、叫声八路军，怎么不救咱，苦日子何时完，何日见青天。
- 15、鬼子真可恶，大家团结紧，不打倒小日本，坚决不甘心。

《十二棵树》

《十二棵树》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旧词，借树名树花唱古代英雄，另一种是新词，也是借树名树花，是歌颂解放后人民生活的。新词是由隗有华演唱，乔玉泉采录整理。全文如下：

- 1、正月里来是新年，劳动人民把身翻，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生活多么喜欢。
- 2、二月里来是清明，解放军战士真英雄，抗美援朝得胜仗，咱们的祖国才安定。
- 3、榆树开花一串串钱，村上干部作宣传，宣传宣的是总路线，农业大战搞的更欢。
- 4、杨树开花一片白，农村的大队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力量大，搞什么工作都为咱国家。
- 5、柳树开花叶叶长，婚姻大事不用爹娘，爹娘包办做不了主，自己的婚姻自己主张。
- 6、柿子树开花一点红，国家普选人民欢迎，未曾普选先登记，人民做了主人翁。

本文采用的几首民歌是根据《燕山区民歌集成》(油印本)选录的，具有一定代表性。这里做了一些简要的论述与说明，对其中两处极个别的字句做了小的改动。在动荡的战争环境和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民歌作者不可能精雕细刻，有些作品就是口传心授流传下来的。应当感谢那些采录整理的同志和传唱的群众，他们为了抢救这份民间文学的遗产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研究历史、音乐、民风民俗的角度，这些民歌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为后人和民歌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和资料。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三袁”笔下的房良风物

赵思敬

“三袁”是指明代的三兄弟，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均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主要活动在万历时期，其文学主张是：反对自弘治以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主张的“文必秦汉，德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在文学创作中，主张变通，反对剿袭，提倡独抒作家个性表现，而不拘格套，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因为“三袁”的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其为“公安派”。可以说：“公安派”在文体的创新上颇有功绩，所遗游记、尺牍、小品文独具特色。许多读者也许还不清楚“三袁”都曾游览过房山、良乡地区，留下了极珍贵的游记、诗歌或笔记，为我们提供了四百年前房良地区珍贵的文史资料。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27岁时会试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曾向焦竑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士，任

东宫讲席。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即思想学问。力主“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其次是为文必有“真情实感”，认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创作的游记则率真自然。袁宗道游览过上方山和小西天，计有6篇游记，现抄录如下：

上方山一

自乌山口起，两畔乱峰束涧，游人如行弄中。中有村落，麦田林屋，络络不绝。媿妇牧子，隔篱窥，村犬迎人。至接待庵，两壁突起黏天，中间一罅。初疑此罅乃穴蛇径，或别有道达巅，不知身当从此度也。前引僧入罅，乃争趋就之，至此游人如行匣中矣。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视白日，跳而东西，踵屡高屡低，方叹峰之奇，而他峰又复跃出。屢陟屢歇，抵欢喜台，返观此身，有如蟹螯郭索潭底，自汲井中，以身为瓮，虽复腾纵，不能出栏。其峰峦变幻，有若敌楼者，睥睨栏楯俱备。又有若白莲花，花下承以黄趺，余不能悉记也。

游记中的“乌山口”，应为今日之“孤山口”，袁宗道穿过村中，喂孩子的妇人隔着篱笆惊看他这外来人，就连村中的家犬也在他面前摇头晃尾，真是一幅山村风俗画。在接待庵，他找了一位僧人做为导游，初入山中，有如蟹螯游行地缝的感觉。为了强调这种感觉，又用了井中之“瓮”作比喻。登上高峰，他仍心有余悸，只用眼睛扫视两边，自觉如登上长城一般。开篇便抓住读者，扣人心弦。

上方山二

自欢喜台拾级而升，凡九折，尽之百余级，始登昆卢顶。顶上为寺一百二十，丹碧错落，嵌入岩际。庵寺皆精绝，荷花种竹，如江南人家别墅。时牡丹正开，院院红馥，沾熏游裾。寺僧设供，山肴野菜，新摘便煮，芳香脆美。独不解饮茶，点黄苓芽代，气韵亦佳。夜宿喜庵方丈，共榻者王则之、黄昭素也。昭素鼻息如雷，予一夜不得眠。

从这篇游记中可以推知，袁宗道登上方山是在“牡丹正开”的季节，也就是农历四月，同时还了解了寺僧招待客人为“山肴野菜，新摘便煮”。使袁宗道不解的是以“黄苓芽”即黄苓代茶，但他仍觉得“气韵亦佳”。从作者“一夜不得眠”的原因看，与其同游者，即“鼻息如雷”的黄昭素，还有王则之两人。

上方山三

昆卢顶之右，有陡泉、望海峰。左有大小摘星峰。大摘星峰极高，一老僧说峰后有云水洞，甚奇邃。余遂脱巾褌衣，导诸公行。诸公两手扶杖，短衣楚楚，相顾失笑。至山腰少憩，则所谓一百二十寺者，一一可指数。予已上摘星岭，仰视峰顶，陡绝摩天，回顾不见诸公，独憩峭壁下。一物攀萝疾走，捷若猿猱，至则面目黧黑，瘦削如鬼。予不觉心动，毛发悚竖，讯之僧也，语不甚了了。但指其住处。予尾之行，入小洞中，石牀冰冷，跌坐少顷。僧供黄芽汤，予嘎罢，留钱而去，亦不解揖送。

诸公登岭，皆称倦矣，呼酒各满引。黄昭素题名石壁。蛇行食顷，凡四五升降，乃达洞门。入洞数大，有一穴甚狭，若瓮口。同游虽至羸者，亦须头腰贴地，乃得入穴。因此始篝火，一望无际，方纵脚行数十步，又忽闭塞。度此则堆琼积玉，荡摇心魂，不复似人间矣。有黄龙白龙悬壁上，又有大龙池，龙盘踞池畔，爪牙露张。卧佛、石狮、石烛，皆逼真。石钟鼓楼，层叠虚豁，宛然飞阁。僧取石左右击撞，或类钟声，或类鼓声。突然起立者，名曰须弥。烛之不见顶，又有小雷山、大雪山，寒乳飞洒，四时若雷。其他形似之属，

不可尽记。不抵皆石乳滴沥数千年，积累所成。僮仆至此，皆惶惑大叫。予恐惊龙神，亟呵止不得，则令诵佛号。篝火垂尽，惆怅而返。将出洞，僮仆敲取石一片，正可作砚山。每出示客，客莫不惊叹为过山灵壁也。

这篇游记字数较多，写得惊心动魄。在摘星岭下休息时，宗道遇一僧，其状如鬼，令其悚然。游览云水洞时，诸人皆作蛇行而入。因火把光弱，钟乳石高不见顶，引起僮仆“惶惑大叫”，宗道因“恐惊龙神，亟呵止不得，则令诵佛号”。火把将尽时，众人不得不“惆怅而返”。宗道让仆人敲下一片“钟乳石”，以作“砚山”。后来，每示来客，客皆惊叹不已。从这两句可知，上方山游记写于游后若干时日。

上方山四

从云水洞归，诸公共偃卧一榻上。食顷，予曰：“陡泉甚近，曷往观”？皆曰：“佳。”遂相挈循涧行。食顷至。石壁跃起百余丈，壁淡黄色，平坦滑泽，间以五彩。壁上有石。若冠若柱，熟视似欲下堕，使人头眩。壁腰有一处，嶙峋攒结，成小普陀，宜供大士其中，泉在壁下，泓渟清澈。寺僧云：“往有用此水熟腥物者，泉辄伏。至诚忏悔，复诵如常，故相传称圣泉。”余携有天池茶，命僧汲泉烹点，各尽一瓯。布毡磐石，轰饮至夜而归。

这最后一篇游记，叙写游兴余韵，并用“圣泉”之水，冲泡自己所带“天池”之茶。众人布毡铺地，每人一“瓯”，热热闹闹地饮食至夜。

从以上四篇游记，可知袁宗道等人从北京出发，中间应在房山休息一天，游览上方山用了两天时间，再返回北京，行程约用6天时间。

袁宗道不但游览了上方山，而且还游览了小西天，同游者为王衷白、黄平倩，从行者为两童仆。两篇游记分述如下：

小西天一

自卢沟桥折而西，眼中乍离车铎煤尘，路上马兰作花，碧紫满谷。如脱笼鸟日在缘绁，忽观平原草树，若归故巢矣。夜宿野寺，坏殿颓床，独画壁稍可观。早起行七、八十里，高嶂拒马首，破壁而升。至壁上，则群峰尽出，对面两尖峰拔地起，若双乳。其中一山雄峙，邪谓小西天也，度此路稍坦，马行山麓，上广下削，若走屋廊间。时天已暮，雷声隐隐出山腰，相顾忧雨至。亟走，始得达东峪寺。寺门白杨成林，风吹惨凄，夜不能寐。携诸公饮寺门右隙地，地光净似人家打麦场。余出一令，每人说一鬼一虎，须得一二年间新事，不得引古书中所载。不能者罚巨觥。一客谈虎，旋撰不成章，满座皆倒。

从游记开篇，便知这又是一次有目的旅行。作者与同道自卢沟桥而向西，骑马而行，夜宿荒寺，于第二天到达东峪寺，夜风凄惨，众人饮酒于寺门外右侧之空地，于此夜说鬼说虎，俱为可怕之事。因为，在当时房山一带是常有老虎出没的。鬼是虚的，但使人精神恐怖；虎是实的，危险随时存在。且每人所说，须是“一二年间新事”，“威胁”便更具“可信性”。

小西天二

是日天气晴朗，路无纤尘。过涧半里许，舍骑扶杖。甫升巅，忽坠井，凡三四，乃得高旷处休焉。俯视王、黄诸公，乘马过涧，若婴儿骑羊，不觉失笑。从行两童，窃放爆竹，爆声为四面群峰闷遏，回旋食顷方歇。至此始循石壁，行磬石上。壁陡起百余丈，缝间松柏丛生，若翠屏。诸公各踞路傍一石浪谑。途见平台

复廊，朱栏碧楯，出于山腰，如在天上。莫不踊跃，再陡再休，凡数折，始到所见栏楯处。栏内屋为石经堂，堂供石佛，四壁皆嵌石刻佛经，字迹疑出元人。石经洞凡七处，堂左二，堂右三，堂下二，皆下榫固，人不得入。惟近窗经，历历可读，字有道古者，亦有姿媚者。此隋静琬禅师护法深心，诸碑序其颠末甚详。自宋迄元，皆有石刻添入。乃今二百余年来，无有一人插石只字其间者。佛法凋零，殊可悲叹。更百余年，安知灵藏法宝，不为豪家墓碣乎？余欲与同游诸公，各斥月俸，增刻数片，为后来倡。但游履匆忙，不能知洞中所缺何经，俟异日检阅目录，了此一段因缘。

洞上为五台，相距虽不甚远，然台具一体，拔地特起，不相粘连。北台甚高，如莲花在水中央。东台亦奇，台上各有白石小浮图，乃唐金仙公主所建。又有巨石号曝经台，五台之外，环以巨嶂，其石纹或类雨点，或类卷云，具画家种种皴法，令低回难别。古碑甚多，人倦不能读。予犹记少时，同两弟读书杜氏庄，偶检游名山记，至石经洞，相与骇叹，此灵境奇迹，何时一瞻礼。令偶以编摩鄹晷，裹粮浪游，此间忽落我杖屦下。回想二十年前语，不觉忻喜过望，独恨两弟不在侧耳。丁酉四月初一记。

这两篇游记写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此时袁宗道已经38岁，他任东宫讲官，责任是给皇太子朱常洛讲课，就在五年前，其长子袁曾(16岁)，次子袁登(13岁)于一个月内先后病死，宗道之所以要“斥月俸”而刻石经，除了要了却“一段因缘”，恐怕也有祈求求善之意。不料一个月后，其女儿又因病而死。从游记中，我们还得知，在明代，已有人编写“游名山记”，石经山名列其中。

接下来，我们再说袁宏道。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选名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此后两入京师为官，又辞归故里，袁宏道为“公安派”领袖人物。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快，卓然成家。他有两篇关于房良的游记，现分述如下：

游红螺岭记

从葫芦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夹。从云会门而进，山始巧始纤，水始怒，卷石皆跃。至铁锁湾，险始酷。从湾至观音洞，仄而旋，奇始尽。山皆纯锷，划其中为二壁。后百余步，则日东西变；数十步，则岭背面变；数步则石态貌变矣。壁郭立而阴，故不树；瘦而态，故不肤，亦不顽。蛟龙之所洗涤，霜雪之所磨镂，不工而刻，其趣乃极。

窠中多老衲，或居至八十余不下，闻客至，则竟出观。导者曰：“老未见冠履也。”问为青曹，则曰：“是余宗主。”笑而合其目，亦如余之见此山此石也。山中非采药樵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之士，游小西天、上方者，日取道焉，而遗之睫前，是可叹也已！

红螺岭山旧名幽岚山，又叫金山，位于黄山店内，红螺岭东临黄岩山，西倚上方山，其间遍布寺、观，又分上、中、下三岭，红螺之名，始于上洞中传说有红螺出现。“红螺之岭”曾被称为“房山八景”之一。袁宏道游红螺岭，应在他31岁，即万历二十六年任顺天府教授前后。从文中可知，此时寺内有僧“八十余上下”，因险而少客至，故“竟出观”游人。见客亦少言寡语，如“此山此石也”。掩卷沉思，宗道所叙之景，仿佛在目下篇则可补良乡史料之阙。请看：

良乡三教寺记

庚子八月，余以使事过良乡，迟三弟中道不至，寄居东关外。偶同客步小石冈，过塔湾，材店四十余家，

垆烟尽处，碧瓦参差。路人曰：“三教寺也。”遂扣扉，良久，履声则从内出。一僧面瘦而黝，发寸余不剪，时客语甚健。问之曰：“江夏僧休空也。”余因谓：“荒街绝侣，飞埃蔽道，马驴丁丁之声，穷昼夜不绝，喧嚣荒恶，奈何庵此？”僧曰：“余本行脚老头陀。自入燕来，昼则挟册讲肆，夜则墙间树下，剪爪无工，何暇谋室？忆往岁曾与数开士，道出此乡，饥渴困乏，风霰交至，乃至求一孟饭不得，求一椽地暂止亦不得，饥疮内逼，寒鬼外虐，酸苦之际，此愿勃发。僧自是乞得一笠地，编茶棚半间，以待十方衲子。七八年间，赖诸侍中大檀之力，逆成精蓝。北参南询之侣，至者如归，官邮之使，络绎于门，汤茶之供无宁晷，辘轳之声，从鸣鸡达丙夜不休。此山僧藉手诸檀信之惠，以了行脚一念者也。地之喧嚣，不暇计也。”

余周视殿庑禅宝僧廊，备体而微，凡丛林中所宜有者，无不具。因叹曰：“贤哉僧也！使天下之为僧者皆如汝，天下之为儒与道士者皆如汝，郡邑之中，刹宇相望，贮粟以待饥，空室以伺往来，仁让相先，贫富相助，何至使凶年有沟壑之民，有司持筹展转不及也？今道士之纤蓄不足论。余儒者也，一钱不与，文曰俭德，但惧伤惠，不恤伤忍，怀市井锥刀之心，背先圣立人之教，沟中之瘠，宁复挂念？嗟乎，余之愧汝多矣！”休空名某，檀信名例书碑阳，不具载。

从开篇的“庚子八月”可知这篇游记作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此时，宏道已经32岁，这年三月，他升任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所谓“因事过良乡”之事，是他从北京前往河南瑞王府行丧礼。由于自己也是过客，于无意中结识了三教寺的僧人休空，了解了这座四百多年前良乡东关外，“垆烟尽处”的三教寺。在谈话中，感叹“贤哉僧也”，与他同去的“客”为谁，我们已不得而知，这位籍贯“江夏”(今武汉)的僧人，却给宏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他写定这篇游记后的一个月，他的哥哥于九月，病逝于东宫詹事府任所。时年只有41岁。这年冬天，他便上《告病疏》，而其弟中道则于这年11月，才得知宗道病逝的消息，并于当月启程赴京奔丧。

查《日下旧闻考》，在“京畿，良乡县”条目中，还有袁宏遭《月夜登良乡塔冈》诗一首，抄录如下：

秋山泚泚滴青雾，城外人家城里树。白埃一道冲红亭，正是马蹄离别处。

很显然，这首诗作于良乡塔下。从文中可知，作者是在秋天乘夜登高而作。

最后，我们说说袁中道。袁中道(1575—1630)，字小修，一作少修。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后历任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等职。他的著作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即《袁小修日记》)20卷。下面先介绍一篇碑记：

良乡窰店万寿禅寺碑记

国朝定鼎燕都，天下皆辐辏而走金台之下。其喉舌之最要者，无如良乡南二十里有地名曰窰店。昔窰建德为唐驱除，发难涿郡，故此地有遗城。虽仅存土阜，而人犹据其城以名店。呼为豆店者，讹也。窰店南有万佛禅寺院，其后枕房山，烟云层叠，极为秀媚。而其前为走神京孔道，日夜蹄轮鼎沸，雨汗袂帷。凡过此者，皆得沾甘露醍醐之味，而其中殿堂楼阁，凉轩燠室，丛林所宜有者，无不具备。问谁为檀主，则大侍中杨西山居士是也。

居士宿植善因，不味沙劫普度之愿。虽处膏脂之中，而具木义戒宝精进，沙门有不及者，自念六度中，檀度为先，遂捐贖缔造；且举上方所贖，并官禁所施者合营之。一栌一枿，一畦一径，一草一木，皆其心画手挥，无不精妍。夫世之行檀有及一人数人者矣，有及一村者矣。有及一邑者矣，有及一国者矣，有半天下者矣。今此地为五方之大榛，俱灌注而入神京。则已近乎天下。以尽天下之往来者，而皆受居士之檀，则居士之功德不可胜言哉！悠悠薰轘者，皆欲为千万年之计。金襕银题，后门铁限，然不而久已为荒田野草。即唐宫汉殿，今复何存？如窰建德之流，尤其么么不足齿者耳。惟如来之珠林宝地，千古不磨。孰为常住，孰

为变灭，有识者于此，亦可洒然悟矣。此居士所以矻矻营综，不忘资给者也。且也我明建都，居大河之北，以控制夷虏，襟带山海，其形胜非曩代所能及。圣子神孙，相绵且亿万世。惟国祚无穷，则辐辏此地者亦无穷。而此精合中之檀施，其功德亦与之无穷矣。此予所以乐为记也。

从这篇 600 多字的碑记中，我们得知万佛禅寺的修建，有赖于大侍中杨西山居士的捐资。而这座万佛禅寺的地点，就在“孔道”之旁。这篇碑记收入民国十四年编修（良乡县志），对于我们了解万寿禅寺的历史，是大有帮助的。至于袁中道是否应邀撰写了这篇碑记，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除了这通碑记，袁中道还有 4 首有关良乡的诗作：

琉璃河口占

其一

飞沙十里障燕关，身自奔驰意自闲。
日暮邮亭还散步，琉璃桥上看青山。

其二

余霞优自宿林丘，烟蕊岚翘天际头。
十里长桥莹似雪，一泓清水带冰流。

其三

寒泉日夜洗尘埃，无数青莲水外开。
滚滚游人桥上过，几曾着眼看山来。

其四

斜阳岚彩照清流，五色妖霞水上浮。
独倚危栏成一笑，北河犹自有南舟。

口占，是一种即兴创作。这四首诗作于某年初春，因为，从“飞沙十里”、“一泓清水带冰流”诗句中便可领略季节。（良乡县志）民国十四年（1925）版，只选录了第一首。在《人海诗区》中，“飞沙十里”，写作“飞沙千里”，这应是笔误所致。在《南归日记》中，中道也记载了路经良乡的所见所思。现摘录如下：

壬申，冒雪行，过琉璃桥，可三里许，其下即古所云圣水也。按《水经注》：“圣水出上谷，东迳玉石山，过良乡县，迳羊头阜，合于涿水、桃水，至河间入海。”《一统志》则云：“自房山龙泉峪流至霸州，入拒马河。”而予曾考《会典》所载，琉璃河自磁家务发源，潜流地中，至良乡东入浑河者也。详核莫如国典，当以为正。

文中所指圣水，即今之大石河，它属于北拒马河支流，纵穿房山全境。其芦村以下河段为琉璃河。上源有两支，一支发源于西部霞云岭乡堂上村西北；一支发源于史家营乡西北部山地。琉璃河在祖村出房山区境，入涿州马头镇与北拒马河汇合，在房山区境内河长 108 公里，流域面积 1243.4 平方公里。中道如此认真地考察琉璃河水道，可见对房良风物之爱尤甚。就在他走到定兴，回望西山，见“山色甚秀”时，还一再念叨此“即上方、红螺山屿诸胜”。在《游居柿录》中，记载房良地区的文字有很多，现摘录如下：

22：随中朗南归，辰出春明门，送人颇多，予皆未及晤。到卢沟桥，水涓涓流，即左桑乾水也。輿中

望西山一带,犹露雪痕。晚抵良乡,风大作,有寒色。时友人李素心弟雪里亦回归,夜同榻抵足,共叹求名之苦。予欲葺山居为终老计,而素心有志香光之业矣。

23:雪大作,报人不至,遂斥。至琉璃桥,白石砌成,可三里许,极为壮丽。其下即古所云圣水也,水出上谷,东迳玉石山,过良乡县,迳羊头阜,合于涿水、桃水,至河间入海。

这两段日记,使我们得知中道与他二哥是一同回乡的,在良乡遇大雪,又与友人相遇,共叹求功名之苦,入睡时,因天太冷,他们不得不“同榻抵足”而眠。翌日再一次过琉璃河,因是日记,便又简略记述圣水之源流。

148:定兴道中过范阳重地桃园,过督亢新城、汉桓侯张飞里,次涿州,止琉璃河畔。闲步桥上,看山听水,山色治甚。桥下载舟,其水乃白沟河通天津者。

这段记载,可能是作者第三次经过琉璃河,前者是由北往南,这次是由南往北,时间当在九月底。因为,下一条记载是“十月初三日至都”。请再看两则日记:

153:蒋子厚寓,见高房山画。房山,元人,官至刑部尚书,字彦敬。

154:往石磴庵放生,作主者吕孝廉浚也。庵主自南,常往来涿鹿白带山寺。寺有隋净(静)琬法师所藏石经,已三千余卷,自南有志补葺。其寺中塔院,往为居民所占,黄慎轩居士等鸠金赎还,得其与房山令书,其护法一念,真可钦也。……是日,放小鸟数千,各礼佛食斋而散。

以上两条记载内容,发生在京城。高房山为“元代第一画家”。久居房山羊头岗一代。姚庸曾有诗云:“月射羊冈玉树林,山斋犹在白云深。”高房山之故斋,久无考。日记中提到的石磴庵主“自南”,有志于补刻石经,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人发愿刻经的线索。黄慎轩居士等人集资将云居寺塔院从农民手中赎回,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事实。

49:得杨修龄书,略云:“良乡道中,取道房山,游上方小西天。上方山甚深幽,非复人境,径路盘纡,石磴直穿云表,道旁多磐石可坐。而树木扶疏,枝枝叶叶,恰相隐映,可当行人笠盖。如圣泉庵,一斗泉,皆周遭绝避,中间一洞天,真可避世。小西天在山半悬崖,为静琬师藏经处,贮四大部石经。经凡七,洞闭不可开,而其外间碑刻如金刚经等经,犹是贞观以前物。雷音寺便是一大石室,中坐佛像。四面墙壁皆经,笔法迥古,殆过于圣教序。登高骋望,洞壑幽奇,峰峦峭蒨,无远不见,下有东西二峪寺,西峪之泉,泻注僧厨下,澄泓清澈,涓涓不已,流为大河。有稻田水磨,气象仿佛江南。此地去涿州四十余里,即客路甚忙,何客过而不问?惜风尘行役,不能久留,犹是一恨。”予读此,游兴勃勃。

信写得颇为精采,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那便是西峪寺的泉水,被直接引到了寺僧的厨房之下,由于泉水澄泓清澈,涓涓不已,可知水是穿寺而过的。在袁中道的日记中,还有几处零星提到了房良风物,因篇幅有限,余不多记。

“三袁”笔下的房良风物,为我们探究四百多年前的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房山旅游资源的开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书目:

《袁中郎全集》

中国图书馆出版社

《日下旧闻考》

北京古籍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珂雪斋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人海诗区》
《三袁随笔》
《中草药彩色图谱》
《北京百科全书·房山卷》

北京古籍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福建科学院技术出版社
奥林匹克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云居寺的元代铜火铳

赵思敬

火铳，是元朝和明朝前期对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通称，有时又称“火筒”，今天统称为“火炮”。火铳是以火药发射石弹、铅弹或铁弹，是在南宋长期使用各类火枪的基础上，随着火药性能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火铳，是元朝军队的重要装备。我们房山的云居寺，就曾收藏有一件元代的铜火铳。

说起云居寺的铜火铳，就不能不先提到两个人：溥心畲和周肇祥。溥心畲是恭亲王奕沂之后，对房山的文化历史颇有研究，编著：有《白带山志》和《上方山志》，并写了许多有关房山景物的诗文，这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周肇祥这个人，一般人了解的可能不多。周肇祥(1880-1954)，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肄业于京师大学堂，为优等生。民国成立后，任四川补用道、奉天劝业道、署理盐运使、临时参议院参政、葫芦岛商埠督办。一度任湖南省长，后归北京，任清史馆提调、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晚年任团城国学院副院长，以金石书画教授诸生。

据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史树青先生介绍，民国二十四年(1935)，周肇祥先生应溥心畲之邀，来云居寺游玩，偶然间在佛殿见到一个奇异的铜香炉，长筒直立，大口向上，细看“炉”身，刻有“绥边讨寇军，至顺三年二月吉日，第叁百号，马山”字样。先生于无意中发现了这件刻有文字的元代铜火炮。忙向寺僧询问来历，寺僧都说不知道。周先生不露声色，向寺僧略作“布施”，便将“火铳”带回古物陈列所。当时，大家只知道这是元代的铜火炮，并不知道它的价值。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专家们的研究，才知道这是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火炮，也是世界上已发现的古老火炮之一。这门火炮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可以说，在历次布置的“中国通史陈列”中，都少不了这门火炮。火炮也可称“铜铸盞口铳”，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分册记载，云居寺的铜火铳：“盞口口径 105 毫米，身管直径 75 毫米，全长 35.3 厘米，重 6.94 公斤。”查《中国历史年表》，可知“至顺三年”为 1332 年，距今已有 1670 年的历史。从形制看，这应是中国古代第一代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它的出现，使火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促进了军事训练和作战方式的改变，从而创造和发展了火铳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

最近，在中国文物局和中央电视台合拍的“国宝”一百集电视片中，发现于云居寺的这件“火铳”也被纳入其中。本来作为战争杀伤性极强的武器，却在七十多年前被房山人当作“香炉”用以礼佛，真有点“铸剑成犁”的意思，至于这门“火炮”到底从什么地方发现的，又是怎么来到了云居寺，而又被当成了“香炉”，这极富戏剧变化的故事，还有待我们去探索。

参考书目:

《琉璃厂杂记》(周肇祥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说明》

文物出版社

《中国古代军事三百题》

上海古籍出版社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周口店支队”的大戏台

赵忠和

1958年，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密云水库开始动工修建。我家就住在密云水库潮河主坝附近的北碱厂村，这里首先成为水库民工的生活用地。

最先到达我们村的民工团体，是由房、良二县合并不久，划归北京市所属的周口店区组织出动的民工支队。

民工们在我们村南一处叫做南岭子的地段内开始安营扎寨，前期工作就是修路和搭建工棚。他们忍痛割掉未熟的庄稼，平整土地，用木杆、芦席、油毡，黄泥等材料建起一座座“一坡水”式简易工棚。从山坡上割来茅草晾干铺在地上，就算是床铺。

为了营造气氛，民工们在辖区路段上用木杆、芦席、松枝建起牌楼，上面悬挂“移山填海”、“气吞山河”等宣传牌，很有气势。

最让人欢欣的是，在周口店支队生活区内平整出一块能容纳几千人的广场，在北端搭起一座简易大戏台，用于开大会、演出和放电影。

1958年9月1日，密云水库全线动工修建。整个潮白河工地人来车往，机器轰鸣、高音喇叭不时播报各民工支队开展劳动竞赛战果，其场面非常壮观感人。

周口店支队担负开挖潮河主坝坝基的任务。民工们抡大锤、打炮眼、清石碴、运土料，劳动强度非常大。遇到创纪录、“放卫星”的日子，有时竟连班干。吃的是窝头、熬白菜、咸菜，隔三差五改善一次伙食，无怪乎是蒸馒头等面食。生活条件虽苦，但他们非常乐观。

那时，一些中央直属、市属以及天津和河北省的文艺演出团体，带着戏剧、歌舞、杂技等曲艺节目和电影纷纷到密云水库建设工地进行慰问演出，周口店支队大戏台是必到的一站。

每当周口店支队大戏台有演出，民工们都排着队伍，带着自制的马扎子、小板凳，按指定位置坐好。在鼎沸的人声中早烟味弥漫的气氛里，迎来了一次又一次赏心悦目的文艺演出。

我和小伙伴们为了开眼，经常钻进民工队伍中，一次又一次地观赏有生以来最难忘的演出。我至今还牢牢记得在周口店支队大戏台前看过的戏剧，其中有：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出的京剧《三不愿意》、《闹天宫》；中国评剧院二团演出的评剧《三里湾》、《刘介梅》、《闹严府》；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把一切献给党》；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演出的话剧《友谊》及杂技等节目。

此外，还在周口店支队大戏台前看过多部电影，让我从童年开始便受到了极好的艺术熏陶。五年后，我有幸来房山工作，这大概是命运中就与房山有缘吧！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座曾红红火火，让我大开眼界的“周口店支队大戏台”早已不复存在，眼前依然是碧绿的庄稼地，但它却永远永远并且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每逢归家路过“周口店支队大戏台”遗址时，抚今追昔，心中隐隐升起苦痛和留恋。那个如梦的童年不见了，那个令我日日向往的戏台不见了，但我又仿佛听到了那鼓乐喧天，民工们开怀的欢笑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难忘“周口店支队”大戏台，更难忘今日北京人的生命之水——密云水库，因为那里有房山人撒下的辛勤汗水和永不磨灭的功绩。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作者系长沟峪煤矿职工

不开宴的房山县

赵思敬

“京涿州，富良乡，不开宴的房山县。”

读了上面这个顺口溜儿，也许有的朋友要说：这几句话应该是“穷涿州，怯良乡，不开眼的房山县。”的确，有此一说。但关于这几句话，在房、良、涿一带流传很广，传闻也不尽相同，下面就搜集到的几种说法分述如下：

一、京涿州。京：此处指京畿，即指靠近国都的地方。涿郡：古称范阳郡，距北京62公里，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清代乾隆皇帝曾题一对联为：“世间幽燕无双地，天下范阳第一州”（另一说为“日边要冲无双地，天下繁难第一州”），这可以说是对涿郡的皇封，现在涿州原南门外所建牌坊上启功先生所书“天下第一州”五个大字即源于此。此外，尚有双塔晴烟、楼桑春社、拒马长虹、胡良晓月和通会灯市等八景。可以说，涿州风景如画，其文化、政治、风土人情简直与京城无二。另一种说法是“精涿州”，即涿州是人文荟萃之地，自古英才辈出，汉未有昭烈帝刘备；五代后有建立宋朝的太祖赵匡胤；北魏有地理学家酈道元；南宋有抗元英雄张世杰等风云人物……故称“精涿州”。说“穷涿州”，大概是因为这里曾经是县城狭小、房屋低矮、道路破旧年久失修的缘故。就连三国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刘备、关羽、张飞、那样的皇室贵胄和有万夫不挡之勇的人杰都不得不以经商养家糊口，涿州之穷，可窥一斑。

二、富良乡。良乡在战国时属燕国，秦统一天下后属上谷郡。汉代始置良乡县，亦见历史之悠久。“富”大概指良乡为南北进出京城的重要通道，所以燕京南郊附近山区的农副产品尽集于此地进行贸易。中外驰名的“良乡板栗”和核桃、大枣、京白梨等不都是从良乡这个商品的集散地走向全国以至世界的吗？在元代时，从芦沟桥到良乡以南广阳城（遗址在良乡城东的长阳乡，今名南广城），还有漕运码头，史称“雪浪盐沟”，可见航运发达，“富”甲一方。说“穷良乡”，亦有例证。据明代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记载：“良乡疆域甚狭，

山水冲没者七，起种地不满三千顷，其富不及大县一里。”而且离京城较近，不仅差使浩繁，而且供役甚多。使“民不堪命”。所以，当时的一个县令樊巍曾作《良乡行》诗诉苦说：“官钱私债频年借，前官后官总凄凉。”并“寄语四方游宦客，选官切莫选良乡。”良乡之“穷”已达到极点了。另一说法是“怯良乡”，大概因指此地贫困，民不聊生，人民恨官又怕官，没见过大世面，比较“怯懦”。记得解放前曾有一出评戏叫《三不愿意》，反映的就是良乡人打官司想见官又怕见官的事。“怯良乡”还有一种说法为“戚良乡”，是说良乡人自古好客，土地甘润而民多丰厚。他们待人热情，对过往的行人都以亲戚相待，故称“戚”（此处读“妾”音），据老人们说，为何称“客”为“戚”，是为避妓院称嫖客为“客”之嫌。

三、不开宴的房山县。先从地理位置上说，房山虽距京城近百里，但古时有70里设一驿站的规定，所以京城的第一驿站设在良乡（1969年时，由于挖防空洞，曾于良乡南街出土明代驿站所埋藏瓷碗瓷盘等30余件），以供公差换马和小憩。第二驿站设在涿州，而房山恰在此南北通衢之西侧约二十里，不设驿站，当然也就没有招待来往公差“开宴”的必要条件了。另一说为房山人淳朴，邻里之间办事不须请客，只要清茶恭候即可，所以称“不开宴”。还有一说法是“不开颜”，即房山多遭水患，且多贪官污吏。据光绪十年编修完的《畿辅通志，卷四》记载，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1月23日，嘉庆皇帝的二子和三子（即二阿哥、三阿哥）去西陵谒祭回京，行至房山县南之半壁店村时，“有民妇百余人跪求赏赈”，三日后，“复有涿州、房山老幼民妇三四百人环拥马前，阿哥等夺路而走，内有扯住三阿哥马缰者，并随至宫门，以仍未得赈同声呼吁，喧闹拥护，直至亥末方散。”后经调查，房山县已于半月前即将朝廷的赈银领到，只是县官沈一三本人想贪污而借故不予发放。为此，嘉庆帝震怒，将房山知县沈一三和涿州知州一同革职拿问。房山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就不会“开颜”了。更有一说法为房山为金代皇陵所在地，距房山西12里的大房山中，埋葬着金代的17个皇帝和众多的诸王“兆域”。在此“开筵”为大不敬，所以县衙不给过往的官员“开筵”。亦有说清代有一位皇帝到房山祭陵后，房山县令给皇帝摆了一桌“筵席”，但皇帝坐下后，只动了一下筷子就走了，故称“不开筵”。流传更广的一种说法是，明穆宗隆庆时，房山县令李琮以为房山土城墙既患低薄，又易塌坏，如遇战乱，则难防守。所以才采歇息冈一带花岗石，并拌合周口店出产之石灰、黄土和沙子，将房山的城墙砌成石城。但与其它城墙不同的是，房山城墙的垛口之间没有流水的水沟眼，不知是施工时的疏忽，还是有意不留水沟眼，所以在民间留下了“不开眼的房山县”之说。

综合以上几种说法，我觉得都有道理，这些说法的出现只是因为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人们生活环境各异而在流传中逐渐演变过来的结果。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房山旧志一瞥

张东升

房山旧志书，指的是过去官修的或私人编修的《房山县志》和《良乡县志》。因现今房山社区，基本上辖过去房山、良乡两县之地，虽然数百年来，两县境域曾数度变迁。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优良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自秦汉以来，历二千年持续不衰。北京地区

最早的一部志书，为元末熊梦祥编撰的《析津志》【辽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改南京为燕京，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为析津，幽都为宛平。其城址约在今西便门至广安门一带】，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房山县最早的志书当推《房山县图志》(佚)。本书卷数及撰人无考，仅见于《文渊阁书目》署字号第一厨旧志二册。现今能查到的较早的一部《房山县志》，成书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马龙川修，黄榜纂。刻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本书仅存七、八两卷，北京图书馆有藏，主要辑录房山县的碑记、诗文等。书末有顺天府涿州房山县儒学训导黄榜《房山县志跋》。此书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房山县志，为难得的珍本。距今年限最近的一部《房山县志》，为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由廖鹏飞、冯庆澜修，高书官等纂，于民国十七年铅印的一部志书。此书在内容上增加了交通、金石、宦绩、礼俗、实业等门，对研究清末民初房山县的农、工、商、矿等业，有一定参考价值。且此书在内容上较翔实，编排亦较为得体，为民国期间北平地区编修较好的一部志书。最早的《良乡县图志》及《良乡县志》均佚，仅见于《文渊阁书目》记载。明隆庆二年(1568年)，邑人杨守正纂修《良乡志》，成书六卷，可惜于明末毁于火，今仅存郭秉聪序。这样，现今能查到的较完整的一部《良乡县志》，为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李庆祖修、张璟等纂的志书。此书为抄本，二册，现残存七卷(卷1~卷7)，卷首有郭秉聪序、李庆祖序和张廷《重修良乡县志序》。主要记述良乡的舆地、建置、赋役、官师、人物、纪幽、物产、武备，缺“艺文志”，对研究良乡县的历史、地理、经济等方面有重要价值。距今年限最近的一部《良乡县志》，则为民国十三年(1924年)由周志中修、吕植等纂的志书，此书八卷，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均有藏。

为编修房山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房山区志》，以求获得珍贵的历史资料，区志办公室曾下一定力量来收集房山旧志书。这些旧志书，多为大图书馆、档案馆珍藏，有的为仅存的孤本、善本。故收集工作未尽如人意，但几种主要志书均收集到，计《房山县志》(包括志料)5部、《良乡县志》4部，只有极个别志书，为馆藏孤本，因严禁查阅、复制，未收集到。为研究方便，现将明清以来编修的房山、良乡两县的志书列表分析如下，有些不属于志书类的：一些资料性的东西(如《河北省良乡县事情》)未列入。

我国现存地方志书近万种，十万卷，约占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是我国文化的瑰宝。房山县和良乡县编修志书虽然自明代才开始，但以后则陆续修撰，相沿不断。现存的房山县和良乡县的志书，是研究房山社区历史的十分宝贵的资料，有着重要的价值。当然，这些旧志书，产生于封建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而且不管是官修还是私修，总不能摆脱封建时代的影响和阶级局限，内容上会有大量的封建性的糟粕。但是，我们切不可低估这些旧志的价值和作用。因地方志是以反映客观存在的历史为主体的地方百科全书，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内容丰富的有一定价值的历史资料和信息。说这些志书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观点，是指书中有不少地方对“皇言”、“恩泽”等大肆渲染，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另外，旧志“人物”篇中，用大量篇幅记载当地官僚地主、宦宦、富商等的所谓“德绩”；在“烈女”篇中，则宣扬“三纲五常”、“忠教节义”等封建礼教。志书中还有不少宣扬封建迷信的文字。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旧志中，确实保存了一些十分珍贵的史料。这些资料，无论是从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还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气象、生物等方面，都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有的要远远超出房山社区的范围。总之，房山旧志书所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方面，粗略剖析，涉及地理方面的有建置沿革、境域变迁、山川形胜、气候演化以及资源分析、灾情异象等，涉及经济方面的、大的方面包括生产力发展状况、生产关系变革，小的方面有作物种类、农机具、行业门类、城镇建设以及道路、桥梁分布、赋役数额等，涉及政治方面的有政权更迭、政权结构、宦宦政绩、曲章制度等，涉及军事方面的有驻军、军事设施，文化方面的有书院学校、诗文碑记、文物古迹等，社会方面有户籍人口、民风民俗、宗教会社，即使是“人物”篇中，也不仅仅记载些宦宦烈女之类，还记载了不少对社会发展有过重要贡献或影响的人物，如军事家乐毅、诗人贾岛、名僧静琬等。总之，这些旧志书，有多方面的价值，是房山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现在,全国不少修志机构在编修新志的同时,都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旧方志,目的是发挥旧地方志的价值,为当地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1984年3月25日至27日,在天津主持召开了旧地方志整理工作会议。会议认为:我国旧方志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材料,认真搞好旧方志整理工作,不仅可以为摸清地情,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思想文化建设服务,而且可以为编纂新方志创造良好条件。旧志整理工作项目很多,如原本复制、点校翻印、类编资料、辑录佚志等。因此,旧有的房山县志和良乡县志的整理工作,同样为房山社区的一项有益的文化建设。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房山游记

李书华

民国十九年十月下旬,余与徐森玉、徐旭生、顾颉刚、马隅卿、魏建功、庄尚严、常维钧诸先生,同游上方山、云水洞、西域寺、石经山。十月廿五日由平动身,廿八日回平。此四日中,于游览时,同人均各随处搜集许多材料。本拟将此行所获,分别整理,纂成一书,其后各以人事牵掣,卒未果行。今年春隅卿逝世,同游者诸人,偶一聚谈,辄相兴感叹。五年以夹,久思重游,以无相当时间,而未得愿。今年秋适有数日暇,乃与杨克强、白经天、汪申伯三先生约定同游。克强因急须到周口店发掘;不及久待,已先行矣,但与余约定在周口店相见。余与经天、申伯,于十月三十一日,由平出发,至十一月五日乃返。此六日中,计由北平而周口店;由周口店而西域寺、而石经山;由西域寺而上方山,而云水洞;再由上方山,经琉璃河返平,行程所经,颇有足纪,成此一书,聊供后之来游者作一参考焉。

第一日:二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由北平经卢沟桥、良乡、房山,至周口店,参观化石采掘,晚宿地质调查所办事处。

二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晨,天阴,先期由义和汽车行雇小汽车一辆,由北平起,送至周口店,车资国币二十五元;余与经天、申伯,同乘此车出发。晨八时二十五分,过西便门;八时五十五分,抵芦沟桥,在桥旁略停,并参观桥之建筑,桥长约三百米,其下为永定河,水自北而南,故桥即东西横亘其上。按此桥为金章宗明昌初建,桥东有康熙八年芦沟桥纪事碑;及乾隆时之“芦沟晓月”碑,碑阴镌有清高宗诗。桥西有康熙御笔诗树华表,而桥之石栏末端,又各有石象一,作鼻顶石栏状。

九时二十五分,由芦沟桥动身,十时十分抵良乡县城之中山东门。余等即下车,步行进城,略事浏览。城中街道夕颇为洁净。行至南街最热闹处而返。旋在东街路南小学校大门前摄一影,此校大门之上,尚悬有旧时(小学堂)匾一方。余等仍南原路出中山东门,登汽车绕城至南门外,于十时三十五分,离良乡向房山县城而进。

由北平至良乡之汽车路,为土马路,虽不甚平坦,但仍具马路形状。由良乡赴房山,过良乡城不远时,乃并此土马路而无之。凡汽车即在大车道上行走,更为不便。加以车夫因不识路之故,进而复退者数次,故迟至十一时五十分始达房山城东门。余等入城稍事观光,行至城之中心,乃觉有热闹气象。旋至北大街北海居进午餐。[按:北平与房山间,有北平永通汽车行北平煤市街南口路西六十四号,长途汽车每日开行:每

晨六时半由平开房山，每日正午十二时由房山开回北平。票价每人国币一元三毛。房山汽车站，即在北海居之北。午餐毕，已一半时，余等乃离房山向周口店前进；并由北海居铺掌柜代觅一本本地人，随车引路。距房山离县城不远，经过一沙滩，车轮陷入细沙中，不能前进。余等乃下车，改由数人推车越沙而过，始再登车继续前进；过周口村，至下午二时半，始到周口店。南行越过铁道至龙骨山，地质调查所办事处在焉。余等在办事处稍息，少顷杨克强、卞美年、贾兰坡诸先生亦由上方山同抵办事处。旋由杨、卞、贾三先生导引至洞穴层采掘处，参观一周；并承克强将采掘工作情形，详为讲解，余等深觉见益匪浅也。

周口店位于北平西南约五十五个千米(公里)，在西山山脚，为平汉线琉璃河支线之终点。其地高度(海拔)八十三米(公尺)，(北平高度四十三米)原为一小村庄，自光绪二十五年平汉支路筑成后，始渐次发达。周口店附近有黑白两种工业，一为煤窑，一为石灰窑。周口店低山山坡，从远处遥望，凡呈白色者即为石灰窑之所在。周口店附近煤窑，全用土法开采。其西北长沟峪煤量丰富，有高线铁路通长沟峪。长十三余里。此外周口店尚有一家专事开采石灰石，以之供给北平市修理马路之用者。地质调查所采掘化石之处则在龙骨山，因所掘出之化石，俗名(龙骨)，而山亦因以名也。按龙骨山在周口店之西北约半里许，此山最高点，高出海面(海拔)约一七〇米。(见地质专报乙种第五号及第七号杨钟健、裴文中论文)

人类究竟如何发生，发源地在何处，虽经许多学者研讨，但迄未能得有确论；周口店洞穴层之采掘；对于事实上之贡献，迄今已居初人研究中最重要之地位。周口店所得动物化石之丰富，猿人头骨，齿牙之完备，粗制石器之众多，皆远在地质时代，约略可比之爪哇猿人，及英国辟尔当曙人之上。(见地质专报乙种第五号翁文灏序)按周口店龙骨化石，为民国七年瑞典人安特生最初发现；民国十年安氏又与师丹斯基、谷兰阶同至该地，因本地人见告得知在距车站不远之地，有更多之化石堆积。师氏诸得化石多件，曾在瑞典研究，发现二形似猿人之牙。自民国十六年起，采掘事由地质调查所担任，李捷步林、步达生、杨钟健、德日进、裴文中、卞美年，陆续担任研究及实地采掘。计民国十六年曾发见极完备之下臼牙，由其性质上，步达生得以确定此种猿人为一新属，名之曰(中国猿人)；生于五十万年前至一百万年之间。民国十七年，发现一年轻人之下颚。十八年裴文中在猿人地点发现完美之头骨。十九年，又发现一头骨。二十年，裴卞两君在鸽子堂中，发现大批石器及用火遗迹。二十一年，亦发现石器多件及其他重要标本。二十二年，由山顶洞之开掘发现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遗骸遗物及遗迹。(见地质专报乙种第五号第七号杨钟健裴文中论文)今地质调查所诸人，在此仍继续进行采掘。据克强相告：周口店已得之猿人头骨牙齿等件，分属于廿四个猿人。其中男女各十二；老幼亦各十二；亦云巧矣。按中国猿人，实为科学中最重要之发现，周口店之采掘堪称世界科学中一件大事，故附记之。

晚饭后即宿于地质调查所办事处。

第二日：十一月一日

由周口店至西域寺宿。

本定今晨赴上方山，明日游云水洞，后日往西域寺。但今晨天有阴雨，未能成行；至午仍未放晴。若在周口店再住一夜，未免白费时间；若冒雨赴上方山，恐山路有水难行，不能连夜上山，势必在山脚下之接待庵住宿一夜，亦觉不便。于是申伯提议，先到西域寺，因由周口店至西域寺之路较平坦也。余与经天颇然其说，途雇驴四头，经天、申伯、余各乘一驴，其一则载运行李。午饭后，二时，冒雨动身，杨、卞两先生亦同乘驴，则转道赴琉璃河，搭火车回平也。当出发时，经天骑驴在前，气宇昂然，大有鹏飞万里之势。申伯骑驴居中，载行李之驴，在申伯后，余骑则在最后。驴夫四人；一为六旬老翁，两人为十五六岁童子，惟余之驴夫，为一中年人耳。途中与驴夫闲谈，乃知此四人均未到过西域寺，仅老驴夫曾至石门一次而已。雨中游山，别有乐趣，此中风味，亦惟吾辈游者可知，非笔墨所能尽达也。时河北久旱，两月未雨，致秋麦未能播种，今者得雨虽迟，究于农事有益，故余等衣帽虽湿，亦所甘心。

路经周口店车站，南行越一小岭，过楼子水村，南至瓦井村。按民国十六年新刊房山县志云：“村有古井，仿佛以瓮去其底，自井下蝉联而上，接至井口，村以此得名。元至元十年，魏必复撰重修天开寺碑文，有‘瓦井闾黎’之名，知其由来远矣”云云，则瓦井村之所以名可释矣。

出瓦井村经周各庄而至皇后台，按《房山县志·天开村南龙王庙碑》考之，知此为隋妃避暑之台。隋书炀帝纪，大业七年，四月庚午夕帝至涿郡临朔宫。八年正月辛巳。大军集于涿郡。九年幸辽东，七月癸卯班师，九月庚辰至宋郡，斯时萧皇后随驾年余云云，据此则后之避暑，当在此时矣。

再前进，为北甘池西甘池，西行至出山庙。复前行，则山路渐崎岖不平，且天色已昏，而雨复大，驴夫声言，谓不识由何路可达西域寺。此时四顾无人，无法问路，因告知老驴夫，姑先引至石门村，再定办法。比至村边，适有一乡人，因闻驴蹄声，出门相视，余等于黑暗中在驴背上，请其引路至西域寺。彼初未允，余等允后优赠以酒资为酬劳，彼方肯带路。此时雨益大，路益难行，驴夫因路湿滑倒而复起者再，余等祇可在驴背上，任驴自由前进，上一坡又下一坡。斯际夜色更浓，无法逼视，故此段道路之危险与平坦，此时亦无法而知矣。

过下庄村，入树林，过小桥，桥下流水声甚急，盖山洪顺流而下也。此桥直对西域寺大门，既至寺门前，先令引路人及驴夫叩门，门内有人应声询以来自何处，并问姓名，索名片方始开门延入，时已晚七时半矣。由周口店至西域寺，约二十五公里之谱，因天雨路滑，驴行甚缓，至费五小时半之久，亦良苦矣。入室后方脱去湿衣，未几寺僧进炭火盆，稍觉温暖，余等略进晚膳即睡。

第三日：十一月二日

游西域寺及石经山，晚宿西域寺

晨七时半起床，天尚微雨，进早餐毕，候至晨十时雨始稍停，逐游寺内务部，及南北两塔，下午游石经山。

西域寺一名西峪寺，又名云居寺，与北平直线距离为六十五公里，距平汉路琉璃河车站二十八公里，距涿州三十一公里。寺前小溪环流，寺后高山拱抱，树木甚多，风景绝佳，当欧战时，西域寺为拘留一部分德国人及奥匈国人之所。

北齐南岳慧思大师，每虑东土藏教有毁灭之时，遂发大宏愿，刻石经，藏诸岩壑中，以度人劫。其徒静琬法师，秉承其嘱，凿石刻经。自隋大业迄唐贞观五年，大涅槃经成。相传是夜山为三吼，生香树三十余株，六月水涨，为浮大木千统，至山下构云居寺。（见帝京景物略）所云三吼生香树，浮大木云云，自属齐东野人之语。考静琬为隋幽州智泉寺僧，（智泉寺在今北平宣武门外法源寺旁，建于东魏元象元年）乃石经山及西域寺之创办人。按刻经风气，北齐时颇盛。例如山西太原西风峪，有北齐时所刻石经（华严经），河南武安县鼓山北响堂山，有北齐唐邕刻经愿文及所刻华严，法严，维摩诘诸经，均极著名。静琬虽秉师命而刻经，然亦不免受时代潮流之影响而起也。静琬本发愿造十二部石经，但所成就者仅大涅槃经而已，未几即卒，时唐贞观十三年也。其徒弟道公、仪公、暹倭公、法公，相继造经。其后唐明开元十八年，金仙公主曾奏上赏经四千余卷，为石经本。（见房山县志）后此则有刘济以俸钱刻造大般若经，以唐宪宗元和四年功就。（见日下开所载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按大般若经大约刘济时仅刻一部分，至辽时始全部完成，见后，）自唐以降，未闻续造，至辽圣宗太平七年，涿州牧韩绍芳游石经山，取出经碑，验名对数，奏闻圣宗，乃命可元大师续镌。其后兴宗道宗各赐金续造，所刻之经，亦贮之石室内。至辽道宗大安九、十两年间，有僧名通理者，又造小碑四〇八〇片。其徒善锐，于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所造大碑一八〇片，通理所造小碑四〇八〇片，皆藏于此穴，上筑台建塔刻文以标石经之所在，（见《日下旧闻》及《日下旧闻考》）西域寺初为静琬所造，唐金仙公主复修之，迨明洪武及正统时，又屡加重修。寺身坐西向东，而略偏于北，地址极为宏大。正门外高度（即海拔）为一三〇米，正门上题有（西域云禅林）额，门前左右有石狮各一，正门内为天王殿，正中祀弥勒佛一尊，左右为四大金刚。正门之北有大车门一座，寺中人出入均由此门，余等昨夕亦由此门入也。

天王殿后为毗卢殿，殿前有宽大之院落，左为鼓楼，右为钟楼，中有牌楼三间。牌楼后左右方各竖旗杆一根，又各有白皮松一株，偏北修竹满畦，清翠可爱。正中为毗卢殿，殿前右边稍南，有康熙三十七年范阳郡白登山云居寺溟波和尚碑，碑文中多白话。殿前右边稍北，有康熙三十七年范阳白登山云居寺碑。

毗卢殿后循左或右行登石阶，入门为第二院。此院落不甚宽大。院中有巨龙石雕一尊，铜香炉一盏，正面为大雄宝殿，内塑佛像极精细。

大雄宝殿后又登石阶，至第三宽大院落。正面为药师殿。院中有丁香树，左右各有康熙时石碑一座。殿内祀药王菩萨八尊，及药师将官十二尊，塑像甚工，寺僧谓此寺中塑像艺术，可称全国之冠，非虚语也。

过药师殿，殿后亦有石阶，登石阶前行为第四院，院中为弥陀殿。弥陀殿之南有一小院，中有祖师殿，奉本寺中各代和尚之名位。

弥陀殿后为第五层院，正中为大悲殿，左有戒坛，右有藏经阁。院中咸丰元年涿州知州郭宝动撰并书之碑。

西域寺中路有五大院落，殿凡六层。每院均较其前一院之海拔为高，寺正门外高度为一三〇米，大悲殿之高度则为一四三米。至各院落之旁，每多跨院，未及一一往游。

南北两塔，在第三层院落之中，南北峙立。南塔，亦名压经塔，辽天祚帝天庆七年建（一一一七年）。塔建于方形基上，塔座为八角形，在莲花座上之一层有四门及四假窗户，再上为瓦顶一层。塔基上有石幢三：一在东北角。一在北面，幢上刻佛像一在西北角，上为七层，系辽幢，最完整，高约五米，幢上刻有辽天祚帝天庆八年五月十七日建之大辽涿州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中述刻经之始末甚详。

北塔亦即舍利塔，或名罗汉塔，塔形甚奇特。塔建于方形基上，下层五级为方角形，再上三层，带角无檐，再上为圆球形，再上为圆锥形，最高一层则为塔顶矣。按北塔为唐时所建。塔上虽未刻有修建年月，惟方形地基之四角小石塔，均有年代可考，由此可以推知北塔本身之年代。又因此顶小石塔之位置，更可推知小石塔年代或在北塔建筑之后，或与北塔同时建筑也。

四小石塔为石制，均呈方形，内空，高约丈许。每塔各有一门，门内壁上有造像。每小石塔上均有石刻，此种石刻封于塔之建筑年代，为极有价值之文献。现时小石塔之造像及诸石刻，与夫塔之全身，均极完整。

东南角小石塔之西面，刻有唐睿宗太极元年四月知州历阳丞王利贞文。

西南角小石塔之东面，刻有《大唐云居寺石浮图铭》，此铭乃太原王大悦撰，唐玄宗开元十五年仲春所建。

西南角小石塔之东面，刻有上骑都尉宁思道所书《石浮房记》，乃唐睿宗景云二年四月八日建。

东北角小石塔之东面，刻有《大唐易州新安府折冲李公石浮图之铭》，为易州前遂城县书助教梁高望书，乃开元十四月建。

按此四小石塔，建筑年代最早者为景云二年，（西历七一年）最晚者为开元十五年，（西历七二七年）北塔本身建筑年代，当在此期以前也。

北塔之前，有乾隆十一年大石碑一座。

西域寺附近西北山上，又有一塔，俗呼老虎塔，在寺前辽望可见也。余两次来游，均未登山一观，引为憾事。据法人普意雅(Bouillard)著《北京及其附近》书中西域寺一章所称，谓此塔亦为唐塔，以其下部之大砖，与北塔相同，则此两塔必为同时之物云。

游西域寺及南北两塔毕，时已下午一时半矣，乃急回寺用饭。食毕，余等三人往游石经山。石经山又名小八十。又向北登一百级，至平坦处，乃见、第一第二两石洞，内藏石刻佛经。石经板乃层层相叠，石门固封，门上部以石为窗，石经板之近窗而置者，游人从后窗隙内可窥见。从此继续北行，再登五十级，进一门，此处为看守石经山之僧人所居，高度三七〇米。时已下午三时有半，僧人早烹茶相候。余等少坐，即往观雷音洞。

由僧人居处向南，登石级向西南行，在长而狭之平台后，为第三石洞，洞中满藏石碑，洞门固封，其形状与前两洞相似。在此洞之左方，有重要石碑二座，其稍北者为清信女宋小儿金刚经碑，碑头上镌有造像三。

其稍南者，为袁氏金刚经碑。以上两碑，高约一·七〇米，碑之四面皆刻经文，为武则天时代之物。再向南行，至第四石洞，洞中亦藏石经，洞门亦固封。门上有《宝藏》二字，为董其昌所书。

西天，本名白带山，亦曰苾题山，因藏石经之故，名之石经山。山下东西两峪，原有东峪寺与西峪寺，东峪寺已毁，遗址犹存。

下午二时半，余等步行出西域寺，过石桥，向东北而行，至石经山之南面登山。山路回环尚易行，旋行至山之东面施茶亭旧址，高度为三一〇米，尚存有明神宗万历时之(石经寺施茶碑)，又一为明熹宗天启时(小西天施茶亭新建石记)。由此向西复折而北行，多条石作阶，计洞石级约回西域寺。

石经山各石洞，均在山之东面多坐西朝东。石洞左近，古核甚多，枝干苍老多极为奇特，除石洞附近外，则无树木也。

西域寺门前稍北，河之对方，有唐时碑一座，余等由石经山回寺时，曾往观之。此为(唐故建大德道行之碑)，乃唐懿宗咸通八年所立，碑之下段为土所掩，上段亦多剥落，其文字多不能识矣。

回西域寺时巳时三刻，少息，用晚膳。

石经山及西域寺南塔下所有石经板之数目，经名，及其所刻年代，自是一极有趣味之问题。但各书著录，每多不同，颇难得一正确之结论。兹就《日下旧闻》及《日下旧闻考》中所记者，为之统记如下：

顺平台再向南行，至第五石洞，即雷音洞，俗呼千佛殿。此为本山中最大石洞；盖就天然之形势，而稍加以人力之制造而成者。游人可入洞，洞为不规则之长方形，上幔覆，宽约十米，深亦如之。洞之中间，高约二·七〇米，洞之四壁皆嵌以石刻佛经，石块有大有小，共一四五块，大约皆时物。洞中有石柱四，皆镌佛像，故有千佛石柱之称，柱皆八角形，其高与洞等。四柱之中，二柱上各刻佛像二七二尊，又二柱各刻佛像二五六尊，此四柱共刻一〇五六尊，为隋唐时所作。

再向南行，第六洞与第七洞在焉。此两洞亦皆满贮石经。两洞之间在石壁内有唐玄奘法师像一尊。再向南则为天然石壁，迎面而立，游人至此止步矣。乃由原路回，至僧人居所，向北行，至第八九两石洞，内亦藏石经，门亦固封与前洞相同。在此两洞之前，有八角亭一座，乃前清末年所建。

由僧人住室过曝经台，可登至山顶，山顶上有一小塔，名山顶塔，亦唐代之物，与西域寺北塔四角小石塔相似，余前游山时，曾至此详瞻，今因时间太促，未能重观。下午四时三刻，余等由山上动身，顺原路下山。

(甲) 石经山共碑二八七五块

(乙) (一) 据辽赵遵仁碑略所载：辽太平七年韩绍芳验名对数时所得者：

(丙) (1) 正法念经一部全七十卷，计碑……二一〇块

(丁) (2) 大涅槃经一部全四十卷，计碑……一二〇块

(戊) (3) 大华严经一部全八十卷，计碑……二四〇块

(己) (4) 大般若经五百二十卷，计碑……一五六〇块

(庚) (二) 雷音洞妙法莲花等经，计碑……一四五块

(辛) (三) 辽圣宗与宗道宗三朝，自圣宗太平七年度宗清宁三年，可元等所续镌者：

(壬) (1) 大般若经八十卷(至是大般若经全)计碑二四〇块

(2) 大宝积经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至是四大部成)计碑三六〇块

(乙) 西域寺南塔下共碑四二六〇块

(一) 辽道宗赐金所刻大碑一八〇块

(二) 通理所刻小碑四〇八〇块

(甲) (乙) 两项共计碑七一三块

定于各碑所刻年代，可分为两个时期如下：

(子)隋唐时期,自隋大业至唐元和四年(西历六〇五年至八〇九年)

(一)静琬及其几代门徒所刻二一三〇块

(二)雷音洞中之石经一四五块

(丑)辽时期,自辽圣宗太平七年,至道宗大安十年(西历一〇二七年至一〇九四年)。

(一)辽圣宗与宗道宗三朝,至道宗清宁三年所刻六〇〇块

(二)辽道宗赐金所刻大碑(约在清宁三年以后)一八〇块

(三)辽道宗大安九年,通理所刻小碑四〇八〇块

总之石经山及西域寺南塔下所有石经板共计七一三五块。至于所藏帙数据沙门志才涿州鹿山云居续秘藏石经塔记(见《日下旧闻》)所载,谓:石经山七石洞内共计一八七帙,通理造经四四帙。又关于所藏石经字数,据王正燕山云居寺碑(见《日下旧闻》)所载:九洞内有经四百二十万言,余想为揣测之辞,非实事调查所得也。

是晚晚膳后,八时半即睡。

王绍清、侯之扬选自北京禹贡学会1921年编《房山游记》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窦店清真寺碣文浅谈

张宝贵

我区窦店清真寺的礼拜殿,山墙镶有碣石一块,历一百四十多年完好无损。建寺历史铭刻其上。碣文题目是“启盖礼拜寺来历清碣”。碣文字迹还清晰,但读起来有些词句难懂。笔者经请教解放初在寺掌教的第一任阿訇沙广禄,对碣文作一浅释,以了解这座清真古寺。

这块碣石立于何时?

碣文既未署明撰文者,也无立碣的时间落款。这种没有落款的碣文是很不多见的。我们只能从碣文的记述中来探讨这个问题。碣文说“丁国宣掌教在位四十余年后,修补照壁、半墙,铺地。”可见,这块碣石最早是立于丁掌教任职四十余年后,或者是在他修补照壁,修得半墙时立的,而决不是清真寺竣工之时。从碣文标题中,我们也可分析到立碣时间。“启”,有启发,陈述之意。“来历清碣”四字,说明这块碣石是为记述、追忆这座清真寺是怎样盖起采的。而不是随同竣工而立。按碣文开头说建寺于“康熙五十二年”、丁掌教任职四十年、基本可以明确碣石于清朝乾隆20年。清真寺建于康熙,过了雍正十三年,到了乾隆20年。也就是丁掌教修得照壁时立的,即公元1756年。

碣文是谁撰文记述的?

文中说“训蒙小学伍番陈曾常万不记白初立。”乾隆20年,房山并无训蒙小学。沙阿訇介绍说,训蒙小学是现在北京牛街的回民小学的前身。原址在牛街王老师傅胡同,现改名为“北京宣武区回民小学”。有伍老师、常老师、万老师、石老师在“番陈”时(阿文为星期四)共同“记白初立”的。也就是为了把建寺的情况记述明白而立这块碣石。

碣文511个字,有420多字是叙述建礼拜寺情况的。

是谁倡议建窦店清真寺的呢?从时间和情节上,碣文说的清楚,但说的离奇了,似乎神话。公元 1714 年(康熙五十二年),从西安府来了一位洋行客商,住在窦店街史家店。这位客商名叫马俊,是个“似疯不疯”、“人品苍苍”、“身矮目秀”的形象。此人住店不久。他的家下从西安赶忙奔来,告诉他妻子生了婴孩,叫他急速回去。得生子之喜,马俊立即找来店主,让店主请八位窦店的乡老(回民对年长的简称)到店内相商要事。夜深二更,店主请来了丁、杨、古、沙四位乡老,齐至客商房间。马俊开口谦称自己为弟说:“我举意拿出白银五十两,烦劳各位“苦苦兴心,军化阁教(宣传伊斯兰教),“盖寺开学”,“完话交银”,“是夜聚明去矣”。事后人们追寻马俊,但无下落踪迹。受马俊之托的四位乡老,开始筹建、开工。由学者王义良陪伴丁国宣向回民群众收“乜贴”(捐款)钱共 488 两白银。古老汉监工兴建。共耗用白银 533 两。建成礼拜店一座,规模为三进七间。并有固安县寒寨的傅云礼赠送的礼拜殿用的“闵畔儿”一座。“闵畔儿”即圣、俞台,高 3 至 4 个台阶。礼拜时,阿訇站在上边,领颂古兰经。这座“闵畔儿”还是傅云礼特意在广州用楠木制作的。礼拜殿土木完工后,由辛自明动手彩绘内外清雅精妙无比。碣文最后记述了丁国宣掌教其间给清真寺买了四亩六分地,其他清真寺也是这样,由阿訇请教民耕种、打来供寺食用。还买了一亩六分地为“异乡回民死亡义冢”,也就是回民公墓。

统观“启盖礼拜寺来历清碣”,虽有个别白字,遣词有些不规范,但记述还是全面的。我们感谢撰刻者把 276 年的历史清晰地留到今天。

附碑文:

启盖礼拜寺来历清碣

康熙五十年前豆店镇并无回民焚修公所直待五十二年春二月间谁不略偶然有西安府羊行一客住歇本街史家店中人品苍苍身矮目秀似疯不疯代不多时遂后有家下一人找到店内喜报爷知自爷起身之后三日家内大娘产一婴儿大娘唤吾速赶上老爹说吉信速回当人听话在耳定事在心敞面竟托店东请本处掌教再请年尊者几位议话时至二更丁杨古沙四人齐至客前会坐己定客先言我弟马俊举意以定留银五十两头上我劳列位苦苦兴心写化教顺心人等盖寺开学大家德其回慈莫大之功言不能尽诉全全至矣完话交银托托谢谢是夜黎明去矣我处人等全不思究来人易易交格财物耿耿言语次后事中人访问追寻并无下落宗迹奇异成功就理非几此后机缘巧凑连七相遇把总金自公到镇京都改伯亭出名协力各处下书学者王义良陪伴丁国宣写得钱外共归白银四百八十八两零古老汉监工浮计木料灰石砖瓦工匠匠用共费银五百三十三两零不足用费改宅重出包补完功造成前后三进七间大殿一座固安县寒寨傅云礼从广制楠木闵畔一座圣俞台便是送到此辛自明彩画内外清雅精妙无比训蒙小学番番陈曾常万石记白初立丁国掌宣教在位四十余年次后修补照壁左右半墙铺地养置民地四亩六分原业李姓又买进福寺零地一亩六分准备异乡回民死亡义冢印白契纸二张现存

(《房山文史资料》第 4 辑)

作者系原区政协经济室主任

流传在永定河畔的歌谣

张玉泉

在万恶的旧社会，永定河畔的人民灾难深重，他们不仅深受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而且受尽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掠夺，再加上连年战乱和洪涝灾害，使窑上地区的人民离乡背景、卖儿卖女，妻离子散，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至今仍有许多歌谣在民间广为流传。它反映了永定河畔上的劳苦大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遭遇和切身感受。有控诉、揭露、鞭挞，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敌人的丑陋；有祈盼、讴歌、憧憬，呼唤饱经忧患而自强不息的人民和用血肉之躯熔铸共和国基石的先烈们；向往经过艰苦跋涉带来了光明和幸福的新生事物，充分表达了劳苦人民的喜怒哀乐之情。

一

窑上地区三件宝，
盐碱沙荒芦苇草。
蚊子叮，虻蚤咬，
夜里睡觉蛤蟆吵。
十亩收个大棒子，
一到冬春把盐碱熬。
你说糟糕不糟糕，
你说难熬不难熬。

窑上地区在北京西南，地处永定河和小清河之间的狭长地带。这里地势低洼，易涝，有“十年九涝”之说。遍地是盐碱沙荒，从地上冒出来的水被风一吹，大地上就是白花花的一片，成为不毛之地。战乱年代，人们除去给地主种点地外，就是冬烧碱春熬盐去卖。

二

金门闸，大血口。
吃的是庄稼，吐的是沙丘。
吸干穷人血，嚼碎了穷人骨头。

据县志记载：永定河过去叫无定河。永定河与小清河之间，很早以前就是天灾人祸横行的地方，永定河象一匹脱缰的野马，每年六到八月，遇上滂沱大雨，就泛滥成灾，往往要吞掉沿岸（主要是西岸）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清朝同治十三年旧历五月，一场倾盆大雨。六月，大堤涨水。大堤右侧决口。同年八月初二（旧历）又开口子。这次大水冲走了右岸的村庄，留下了几个沙丘。清康熙年间，在永定河西岸修建了金门闸。每当河水上涨，就从金门闸放水，冲得附近村子墙倒屋塌，大树连根拔……时间一长，有的成为河道，有的成为沙丘，而沙丘全被地主霸占。穷人要活命就得租地种，或去扛长活。这首歌谣真实地揭露了这一事实。

三

弯锄钩、亮锄板，
箭杆肚子，吃不点儿，
干了一天给一个子儿。

这首歌谣流传在官庄一带的长工口里，它讲述了当地大地主许言午，雇用长、短工的标准：吃的少、干的多、工钱低。还有一首流传在窑上村、万里村一带的歌谣。揭露了地主的吝啬。为让长工们少吃饭、多干活，他们把饭菜故意做得很脏，别说吃，一看就想吐。

饿死不给焦家扛活，
棒子面，大粗箩，
老咸菜，象房柁。
要想吃碗连汤饭，
蝇子、鼠屎比豆多。

四

“七七”事变的当年旧历八月十二日，日寇侵占了窑上，国民党政权解体，同年十月五日，五间房村陈东来等人组织地方武装，当地称“老便”，兼有抗日活动。1943年春，我地下工作者郝永庆等人深入窑上地区，在青年、孩子中教唱的“探清水词调”，表达了人民痛恨日伪反动派的心情，拯救中华的情绪。

民国二六年，华北起狼烟，
芦沟桥的炮声响连天。
天不怨，地不怨，
只怨“九一八”这一天，
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
宣统回奉天，
汉奸做了官，
加上无数的苛税与杂捐，
高丽人到处开“白面馆”。
强迫百姓种大烟，
中国要玩完，我们怎么办？

五

1940年，日本鬼子妄图把我八路军阻挡在山里边。他们四处抓“民夫”强迫老百姓去挖壕沟。窑上地区有近千人被赶到周口店地段挖壕，无论年老年少，也不管体弱多病，在工地上除常常受冻挨饿和拳打脚踢外，还受酷刑：吊起来，灌辣椒面、煤油，用刀刺……等。当时流传的歌谣是：

日本鬼子真糟糕，
为挡着八路挖战壕，

挖战壕不要紧，
为啥累弯我的腰。
你挖土，我来挑，
挖出一条毁民壕。

六

抗日战争时期，苦难深重的永定河畔的人民，在苦海中挣扎，他们早就日夜盼望着救命恩人的到来，领导他们翻身求解放，他们从心底里发出这样深情的呼唤：

永定河水归大海，
穷人盼望亲人来。
千只绵羊靠头羊，
穷哥们靠着共产党。

七

1943年春，冰河解冻，大地回春，万木竞发。我党派来地下工作队，开辟这一地区的工作，发动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劳苦百姓向剥削阶级开展斗争。从此，穷人有了主心骨儿。一九四四年前后，我党先后在这个地区建立党组织，发展一批批党员。这一年，正是日本鬼子疯狂“扫荡”，残酷镇压人民的一年。为了巧妙灵活地打击敌人，壮大和发展革命势力，永定河畔的人民在联合县长李景森和六区区委书记张晋龄的领导下，白天坚持生产，黑夜挖地道。下边的歌谣，反映了他们紧张而有序的生活，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战斗生产，战斗生产，
永定河畔的人民越打越勇敢。
生产，就拿锄头，
战斗，就拿枪杆。
白天在田野生产，
黑夜在地下苦干。
你在村东挖，
我在村西铲。
为了早日接通地道，
你挖我运，
你追我赶。
为了打垮侵略者，
要想少流血，
就要多出汗。

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妄想侵吞我们的胜利果实，为占领和巩固平南三角地带（从永

定河到京汉线中间地带),四处建立地主武装(还乡团、白脖子队、讨伐队),对我八路军和农会干部疯狂搜捕,屠杀。这个地区的人民在党领导下,迅速组织地方武装,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在当时有一首小调儿大人孩子都会唱。

我们区小队,本是当地人,
奉上级命令,住在鲍庄村。
鲍庄村出了坏人^①.....
小队不声张,悄悄到肖场^②。
俘掳白脖子一大帮,
让他们小命见阎王,
哎嘿哟,让他们小命见阎王!

注:

①鲍庄大地主,日伪时期伪保长刘汉奎。

②当时肖场村是伪大编乡,筑有炮楼,住两个班的白脖子。

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到1948年底解放前夕。永定河畔成了敌我争夺最激烈的地带。敌白天活动,我夜里活动,并常常遭遇。1947年到1948年国民党覆灭前夕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三天两头进村清剿、杀害农会干部,袭击我地下工作人员,进行反攻倒算……就在1948年腊月三十这天,由于叛徒告密,我六区区委书记、武卫会政委张晋龄被捕,不久即被杀害。张晋龄(因耳聋群众叫张聋子)长期生活战斗在永定河畔,深受人民的爱戴。永定河畔的穷苦人民十分怀念他,每到春节前后都不禁唱起这个小调儿:

提起四八年,
让人泪涟涟。
腊月三十那一天,
地道被砸塌。
张聋子牺牲河东边。

十

解放后,这个地区的人民经过互助组、合作社、又走上了人民公社化的道路。窑上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六十年代后期,在人民中流传的一首赞歌。

鱼米乡,花果乡。
芦苇起舞,稻翻浪。
条条水渠翻银带,
你歌我唱丰收忙。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房山煤炭古诗选

潘惠楼

房山采煤“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榷税于清朝中叶”。至今，北京有文字记载的采煤历史已近九百年。其间不少墨客骚人还以诗文形式，表现房山采煤过程和矿工生活。现撷其两首，试做选笺。

《煤黑谣》

煤黑乐，煤黑得妇偏如玉。煤黑苦，煤黑遇着西山虎。
煤黑方自煤窑回，不见煤黑只见煤。向人倍觉双眼白，轩渠一笑齿如雪。
煤黑驮煤如驮钱，一煤一钱钱盈千。朝出驮煤铃啾啾，暮归驮煤铃啾啾。
煤妇闻铃争理妆，敷粉恨不如晓霜。手持扇鼓迎煤郎，出门击鼓身低昂。
此时黑白为一双，乌鸦鹭鸶如鸳鸯。灯前不觉煤郎黑，常恐镜中颜未白。
宛如棋子在楸枰，黑白分明相纽劫。昨朝猛虎下山岗，额白还如粉一般。
雄吞煤黑如吞墨，墨汁淋漓书大恶。煤黑遇到西山虎，煤黑不乐煤黑苦。

这首诗中的煤黑郎为煤炭工人。全诗通俗易懂，读后煤黑的生活情景跃然纸上，如同讲述一个煤黑的爱情故事。写煤黑之乐，饶有趣味，忍俊不禁。写煤黑之苦，悲惨之至，不忍卒读。煤黑乐，乐在何处？乐在家有美妇颜如玉，乐在煤黑夫妇之间情深意笃，爱之坚贞。煤黑为了自己美丽的妻子，朝夕驮煤，早出晚归，辛勤劳作。妻子体贴关心丈夫，尽管丈夫“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妻子却觉得一身煤屑的丈夫双眼白，齿如雪，黑白分明，英俊漂亮。为了使劳累一天的丈夫能够有一个温馨宁静的港湾，当妻子得知丈夫快要“下班”时，赶快打扮自己，以迎接丈夫到家。使人感到这对煤黑的夫妻生活很美，热爱劳动的心灵也很美。这首诗写煤黑苦，又苦在古代煤黑的劳动强度大，朝夕驮煤如同牲畜一般。即使在深山老林之中以煤为业，也要受剥削压迫，还要时时防备野兽的侵袭。这位煤黑的最终命运，还是葬身于山中猛虎口中。

诗的前边附有序言，明确指出是写房山长沟峪的煤黑。序言曰：“上房山长沟峪柴厂储产煤处，居人以驮煤为业，男子面黝，女子重施脂粉，既喜其黑白之偶，又怜其有猛虎之厄焉”。上房山长沟峪，其确切地点应为长沟峪煤矿以北十余里山沟内，即长沟峪煤矿之老井口附近。后长沟峪矿扩大规模，老井口随之报废。柴厂现名车厂村，亦在长沟峪煤矿附近。1920年，有皖系军阀支持的安福煤矿公司从周口店至柴厂村修建轻便路，准备凿通猫耳山大梁以运三安子之煤，在柴厂村修建了矿车厂，随之柴厂也被称为车厂至今。

《煤黑谣》的作者金玉岗，号黄竹老人，生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金玉岗生前与诸名士结社联吟，游履遍于天下名山邃谷，绝险幽幽，皆题以诗，著有《黄竹山房诗钞》。这首诗当是他到房山长沟峪亲眼目睹煤炭工人苦难生活的写照。

《探窑窟》

石炭发地宝，济彼柴薪穷。京华冠盖地，络绎输春冬。
我曾探窑窟，譬木穿蠹虫。计度数千百，屈曲通幽风。
曳筐臂下黑，灼灯头上红。专利属垄断，苦哉彩煤佣。

这诗采自《房山县志》，原诗很长，只取前半部分，题为编者所加。作者为浙江绍兴人高骧云。高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任顺天府房山知县，他在任留心时事，体察民情，卓有政声。他主持纂修的《房山志料》被清代方志大家缪荃孙誉为“条分缕析，并有考订，最为有用之书”。诗中的石炭即为煤炭。“计庾数千百”中的庾一种计算长度单位，一般为五市尺。千百庾指这所煤窑的深度。“曳筐臀下黑”的曳筐指拉筐。古时井下采煤运输，多以条筐盛煤，每筐约200斤，筐上有绳套，矿工把绳套套在肩上，如牲畜一般把煤拉出。“灼灯头上红”是说矿工拉煤时依靠头上戴的灯引路。这灯多为油捻灯，由于灯碗形同乌龟，俗称王八灯。用绳套等物固定在额头处，因拉煤时双手还要拄地以增加曳筐的拉力。在矿井深处拉煤，灯光如豆，幽然晃动，犹如鬼火，初见令人毛骨悚然。

《探窑窟》这首诗不但讲了房山煤炭在北京燃料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写了作者亲自到井下的所见、所闻、所感，读之如身临其境。全诗把封建社会矿工采煤的艰辛、生活的贫困、沉重的压迫以及地位的卑下和盘托出。更可贵的是作者身为一县父母官，竟能亲自到井下观察，体难矿工生活劳作，在封建社会实属罕见。这首诗的后一部分，对房山采煤的规模也有一定的反映，是一首难得的煤炭古诗。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高克恭与米派山水画

王书樵

《房山文史选辑》第二辑，“人物春秋”栏目刊登了戴家斌先生写的“房山一代名人——高克恭”对高克恭的身世和成就作了介绍。这里我就高克恭在中国画史的地位和艺术成就，再作进一步的阐述。

中国传统山水画领域，米派山水是构成文人山水画派系的一支重要流派，自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开创以来，历经数百年而代有传人，至现代山水画领域，米派山水画技法表现力也是很强的。明清正宗文人画家将米派山水画推崇为“逸品”，这是文入画的很高品位。在历代米派画家中，其中米友仁、高克恭、陈复明三位，可称的上宋、元、明三朝的代表画家。(米友仁、陈复明在此暂且不谈。)

高克恭是继米氏父子后擅画云山墨戏的一代名家。二米所创云山在宋代反响并不大。北方金朝有位叫王庭筠的，专学米派山水，当时有人说他的画不在米芾之下。到了元代，却涌现出一批追随者，如高克恭，方从义，郭畀等，其中高克恭是最有创意者。《图绘宝鉴》记载他“善山水，始师二米，后学董源、李成。”其成熟的画风，实是融汇了二米和董巨之长而自成一格。作品中多采用高远全景，中央主峰兀立，山脚林木，窠石、溪流、屋宇穿插，组成简中有繁的景致，合于法度又富动感，山形坡石用墨线勾勒出明确轮廓和结构，并以披麻皴展现纹理层次；树干变时用线条勾皴，这些都体现董巨的造型规则，只是有所简化和样式化。而点的运用则主要继承米氏的“落茄皴”但亦加以分离，简化和缩小，并进一步强调干湿，浓淡和大小错落的变化，横点成为既具有一定法度的造型手段，也不失独立的笔墨趣味，这

《春云晓霭图》

(王书樵 提供)

种源于二米，又加变化的点子，被称为。“豆瓣皴”。高克恭的云山将无法度可依，偶然性较强的墨手法，变为相对稳定的呈一定可依程式的表现形式，既简洁闲逸，又笔精墨妙，防止一味简而走向率易，对米氏山水是一重大发展。

高克恭存世的云山代表作是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云横秀岭图》轴和故宫博物院的《春云晓霭图》轴，两幅堪称姐妹作，无论景致、构图、笔墨、意趣等，在体现米派山水风格的基础上，又突出了自身的创造。可以说高克恭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尤其在继承和发展米派山水画方面有特殊的贡献。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作者系工商银行房山支行工会干部

历尽沧桑话链车

赵润东

我国发明车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传公元前一世纪，我国四川有一位名叫葛由的道士，制作了一只供他上山用的“木羊”。这便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独轮车。

到了公元3世纪，三国蜀相诸葛亮孔明也设计制造了独轮车——“木牛”和“流马”。所谓“木牛”是要人在前面拉，而“流马”则用人在后面推行。独轮车问世以后，在军事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载重几百公斤，用来载人或运送物资。尤其是在山路崎岖的丘陵地带作战时，主要依靠“木牛、流马”来输送军事装备和人员。独轮车使用方便，应用广泛。直至现在我国许多地区仍然使用独轮车。

随着历史的演变，车的用途范围越来越大，车的结构造型也不断改进，由原来的独轮车发展到双轮车、多轮车等。据《续世说》一书记载，公元610年宇文恺为隋炀帝制造了一辆宫殿式的车，能容纳几百人，行驶速度也很快。这辆车除了有动力推动设备，还装有船帆，行驶起来如同在水上行船。

那么，房山的车最早见于什么年代呢？据史书记载，到了商代，房山境内就有了车行道路。而琉璃河商周遗址出现的古城和十余处附葬的车马坑中发掘出土的“单辕四箱车”和“单辕两箱车”，证明当时房山境内的畜力车已成为较为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

房山地处“畿辅右肩”，不仅地域广阔，而且物产丰裕。尤其产于高庄村的质地精良、蕴藏量丰富的汉白玉早已以“国宝”之称而名闻中外。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在北京建都的宫殿、寺庙、陵寝、牌坊以及豪华、宏伟的大型建筑，所用汉白玉石料大多采运于此。当时，运送石料要靠人拉畜拽，速度十分缓慢。特别是几十吨、上百吨的石料，只能等到冬季天寒地冻、凿井泼冰进行运送，但耗费人力物力非常之大。经过多年改进，以后便出现了较为灵活、方便的“链车”。

据说，“链车”始创于清顺治二年（1666年），发起人应为长沟镇北正村焦姓人家的一位老太太。焦姓人家分为三门，一门在中山，二门在广平，三门在定州、宝坻。现在北正村焦家于乾隆二年由沿村搬来。早先，焦家生活比较贫困。第一代叫焦应元。第一代祖母给梨园店财主李大天王家当褙母哄孩子。孩子幼小淘气，

常常哭闹不止。老太太想方设法哄孩子。后来，她找来秫秸剥席蔑，用“格档儿”插大车。老太太插出的大车一个又一个，二轮、四轮、六轮……十六轮，以至插出的大车能拉动一块土坯。东家发现后想：“圣上运石料都在冬天泼冰运送，咱们不能打车吗？”于是，开始打车。

链车是焦家首创。起初，做出的车窄，拉不动石料。经多次改进试验，车轮逐渐宽到四寸，三九天在冰上走，结果还是不行。后来发现车轮不走一条线，又经改进，八个轮子走一条线方可成功。

链车形似拖车。车的板面多用质地坚硬的榆槐木。轴、轮都选用枣木。轴头儿用铁箍箍住。链车分为十六轮、十二轮、十八轮、小四轮四种。十六轮需500头骡子拉拽，十二轮需360头骡子，大八轮需150头骡子，小四轮有几十头即可。车的下面拴着两根水桶粗的主干绳。主干绳的外侧又拴上若干套绳套上骡子。根据石料的大小，还可把链车练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链车。运送石料时，几百头骡子和上百个把式，一列长队可达一二华里。总指挥手持铜锣，以锣为号。锣声一响，把式扬鞭另行吆喝，骡子奋力拉拽，一块碑砣子(荒料)几十吨重，用链车四五天就可运到东陵等地。

焦家历代相传两件事，一是哪门都要上学读书，二是哪门也不能没有木匠。从清王朝开始，十代皇帝统治天下，而焦家打链车侍候王朝也十辈。当年，焦家掌握开采汉白玉的塘口，太和庄张麻铺、于麻铺等打链绳，长沟李铁炉铸铁活，里穿160斤，外穿96斤，用于安装链车的轴轮。

一年，有人偷艺，把焦家做的链车尺寸记下来仿造，待皇宫来年用车时，偷艺人便首先疏通官宦，承揽业务。结果，装好荒石，车子不走。有人说，历年都是北正焦家的链车，今年不是偷艺的人干的？顶子(监管官宦)得知后马上盘查，唯恐延误朝廷期限获杀头之罪。不久，偷艺人坐着二马驹轿车来焦家拜访，一进门就放下三个元宝，说明来意，恳请解危。焦家弟兄几人坐在一起商量谁去合适，都认为大哥合适。于是大哥焦常旺只带一把板斧来到石窝塘口，一看，链车楔反了两个楔子。他退了几个楔子，重新贝上，让把式一叫号，链车一下出了塘口。事后，偷艺人又送了两个元宝，从此不敢再承揽运石业务。

链车的发明充分反映了房山古代劳动人民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链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汉白玉的运输量，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在解放生产力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房良文史钩沉

赵思敬

房、良为京畿重镇，民风醇厚，史料浩繁。现将夙日读书所见，附加阐述，权作房、良文史钩沉。

太平天国史料

太平天国起事于广西，定鼎于金陵，举凡十四载，攻占清朝半壁江山。1853年5月，太平军北伐开始，定胡侯地官正丞相李开芳、靖胡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自扬州率军北伐，直逼北京。10月13日，北伐军已进至离省城保定仅六十里之张登镇；北伐军之先锋营游骑已入直隶房山县境。清廷忙以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

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总统四将军，督旗营察哈尔兵会同钦差大臣胜保“进剿”太平军。而此时在兵部供职，曾任武库司行走、实录馆校对官的湖北武昌人，道光进士王家璧，则被派到了良乡，任务是“随堂官在良乡弹压过境官兵”，“过境官兵”指的就是北伐军。这期间，王家璧曾两次写信给他的父亲。第一封信写于咸丰三年癸丑正月初八日，现将有关史料摘录如下：

“大人膝下；正月初八日丁宅人自京至良乡，赍到大人客岁十二月初一手书，敬知家中老幼均安，为慰。……壁随堂官在良乡弹压过境官兵，约计二月中旬方得回京。”

第二封信写于咸丰三年癸丑四月二十日，信中说：

“大人膝下：先后奉到大人正月初四日、二十四日、二月十二日手书；三月二十五日汪腾舫亦至京，言我家事甚悉……家壁随堂上官在良乡弹压官差，先后已六十余日，今日月十八日又至良乡矣。”

从王家璧的两封《良乡上大人书》可知，由于清廷在良乡布下重兵，太平天国北伐军才不得不放弃从南进军而绕走天津，以图东进北京的计划。

有关良乡水灾的两封信

良乡地区地势低洼，水害频仍。曾任河南知府张度（1830—1895），浙江长兴人，家富收藏，与潘祖荫、陈介祺相互切磋金石之学，工篆隶，善丹青。有一年到良乡视察水灾，在作了一番调查后，给同僚写了两封信，报告灾情。第一封是张度致运斋：

运斋先生台鉴：别后沿途探问，知灾民多集房山，兼及良乡县界。此时琉璃河下游，惟腐尸堆积却多。涿州属地大致如此。同人公议在良乡与范大令商定兑钱事。今日同向房山一带沿途探下，全局即能了然。惟以银换钱暨各处运钱，殊不易办，一日常费动至数金，且非人多不可举动。不能速者，职里故耳。草草，恭候刻祺。

张度十九日黎明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张度对于水灾的了解是细致的，并为拯救灾民做了工作。再看第二封，朱滑、张度致运斋：

运斋先生台鉴：昨日情形，前函已略达闻。午后又接赞臣、雨民、正卿查探确信言，琉璃桥之西北，田禾均被淹没，房屋均已冲塌，不见灾民踪迹。窦店之西北，步行十余里，亲历各村，被灾较琉璃河尤重。赞臣等三人已冒雨起程，竟赴房山查看。我辈同人接此信后，即向范大令熟商将银兑成钱事。钱店统窦店所开银号不过数家，三千金款断难一时兑钱。觅得王姓绅商，善言耸动，慨允先兑千金制钱，分次兑齐，总在五六日间。钱价公平，不困商人，有益灾众，办理见协，此举大有眉目矣。惟雨后山径难行，拟定明日探一段走一段，不使赞臣三人笑我等之胆怯也。专此奉闻，顺颂日佳，不尽。

祈向烂面胡同代道平安，不写信矣。

弟朱滑张度同顿首

安圃处亦希。转达。河阳尚书处，弟已另有致查、蔡二君函，并属其转达矣。舍间亦望转达平安为荷。阴雨闷人，道途泥泞，车马不能行，奈何奈何！潘叩

从第二封信可以看出，与张度同到房山、良乡调查水灾的还有赞臣、雨民、正卿和朱滑等人。本来信已写完，但因时间紧，天又闷热，也就无心再写信了，因而嘱运斋先生转告安圃、河阳等人并自己的家属。从这两封信上看，两信是十九、二十日所发，从收信人一天可接到信的情况看，这个运斋先生肯定住在北京，而此时，张度也还没有任河南知府。这两封信，为我们提供了房、良地区水灾的新资料。

清军祭章宗陵于九龙岗

建于大房山下的金帝陵，尤其是金章宗的道陵，原来曾是“燕京八景”之一，名为“道陵夕照”，后因被破坏，才以“金台夕照”填补。对于金章宗陵的具体位置，几百年来亦无可考。既然是一处宏伟的陵寝，必然建于丘陵地带，但通过航摄照片，我们发现从大房山脚下的龙门口村到与它向北所相连以至往西的山中，沟壑纵横，根本不具备设陵条件，建于上店村附近的坤厚陵已被基本确定，但金章宗的道陵却只有从连泉寺遗址的碑文中得知，从章宗陵往上分林拨木，即至连泉山顶。章宗陵的具体位置，连一个地名也没留下。《明实录类纂》所引《崇祯长编》卷34有一段记载清军祭章宗陵的资料，摘录如下：

(崇祯三年五月庚寅)先是初二日，大清兵千余骑至房山县城外东岳庙，随遣一骑至城下云：“房山县是金大定年间建立守陵，县官应开门相迎”。知县杨某不应，骑遂以大斧劈城，城中男妇仓皇号泣。生员李元勋、弥愈杨、曹耿因事急，挺身而出说以“既系陵邑，不宜加害人民。”辗转陈警，自午至申始去。次日，前骑来言：“主帅已有谕帖，不许杀人。但十一日祭陵，尔等当前往扫除耳。”至日，果有三千余骑过县北，云祭品已备，毫不相犯，止呼生员数人引导。三生遂如约出城。又有本县典史及生员孟宗孔、张养中、张绳武、赵嘉胤、刘光远、马出图、董之渲、陈如吕等八人随往九龙岗。祭章宗陵毕，其日遂回良乡。次日，起营而去霸州。

这篇资料中，提到金章宗陵的确切位置是“九龙岗”。也就是今天我们知道的金太祖陵附近。因为金陵所依附的“九龙山”下的丘陵地带，也肯定就是“九龙岗”。这一地带也可能在今天燕化公司橡胶厂一带，因为前两年在基建施工中还有雕成龙头的汉白玉饰件出土，但确切位置还有待考证。

金章宗道陵赏月

金章宗道陵内建有“瑶光楼”，章宗曾与大臣们在中秋佳节登楼唱和。大臣赵讽曾写有“中秋”一诗，诗文如下：

秋气平分月正明，蕊珠宫阙对蓬瀛。已驱急雨消残暑，不遗微云点太空。
帘外清风飘桂子，夜深凉露滴金茎。圣朝不奏霓裳曲，四海歌讴即乐声。

诗后注文为：“道陵中秋赏月瑶光楼，召文孺对御赋诗，以清字为韵。道陵读至前句，大加赏异，手酌金钟以赐，且字之曰：‘文孺，以此钟赐汝作酒直’。士林荣之。文孺，公之字也”。再查《中国历史大辞典》，果有“赵讽”条目，现摘抄如下：

赵(?—约1195)金东平(今属山东)人，字文孺，号黄山。大定进士。仕至礼部郎中。工书法，小篆与党怀英齐名，时称“党、赵”。有《黄山集》，已佚。

金章宗在哪一年中秋至道陵，同行的还有什么人，如果赵讽的《黄山集》被发现，肯定能够得到有关这次中秋赏月的更多资料。但从以上资料也可推断出，章宗对自己的陵寝是比较满意的，否则，就不会在中秋之夜与群臣在远离京城的山野唱和了。

参考资料

- 1、《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史料》
- 2、《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 3、《中外历史年表》
- 4、《太平天国日志》
- 5、《清代名人手札》
- 6、《金中都》
- 7、《明实录类纂》
- 8、《天府广记》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考

杨亦武

龙泉即孔水，大历禅寺即万佛堂。

孔水洞万佛堂位于河北镇的云蒙山麓，是北京地区一处重要的历史文物古迹。孔水从洞中涌出，清爽甘冽，久旱不竭。孔水洞内有六尊摩崖佛像，为隋代雕刻，洞壁所刻佛经亦属隋代。据有关专家考证，与云居寺静琬刻经有关。孔水洞偏左，有明代佛寺三间，俗称万佛堂。万佛堂内两山墙和后壁所嵌唐代汉白玉浮雕“万菩萨法会图”，是我国古代石雕艺术之瑰宝。浮雕中天人持乐器作弹奏状的伎乐天部分，为唐代雕刻艺术之绝作。洞前寺侧各有古塔一座，一为辽代花塔，一为元代密檐塔。花塔在我国古塔家庭中独具一格，其形制仅流行于宋辽金二百年左右，故其数量有限。目前，我国现存的花塔仅十余处，而万佛堂花塔是北京地区仅存的两座花塔之一（另一座在丰台）。

隋摩崖佛像及石经、唐代汉白玉浮雕“万菩萨法会图”、辽代花塔堪称孔水洞万佛堂三绝，极具文物、历史、佛教、艺术研究价值。但是，文献有关孔水洞万佛堂的记载并不多见，可以凭考的只有民国十七年（1928）本《房山县志》收录的三篇碑记。一篇是明华英《重修大历万佛龙泉禅寺碑记》，一篇是清徐梦陈《重修孔水洞关帝庙碑记》，另一篇即是《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碑清代已遗失，1990年孔水洞万佛堂搞建筑工程于龙泉大历禅寺旧址出土，现立于孔水洞万佛堂关帝庙前。明华英《重建龙泉大历禅寺碑记》碑遗失。清徐梦陈《重建孔水洞关帝庙碑记》碑尚存。

其中，以《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史料最详实丰富。碑文记载了龙泉大历禅寺从创建至辽以后一段时间的历史经历。碑文的主体记载了历史上一次重建龙泉大历禅寺的过程。从碑文内容分析，该碑似早于明、清二碑。因此，该碑是研究孔水洞万佛堂的重要史料。龙泉大历禅寺为何人创建呢？考“唐幽州卢龙节度使颖国公朱公……水之前创造伽蓝殿一所……奏赐大历之名”，“节度朱公……择布金地，创成紺宇”云云。龙泉大历禅寺应为唐幽州卢龙节度使颖国公朱公所创。

龙泉大历禅寺创建于何年呢？从创建者朱公的身份可知该寺创于唐代。至于创建的具体年代，由于碑文残缺不得而知。经考证，寺应创于唐代宗大历年间。

据《日下旧闻考·京畿》：“云蒙山直上皆石壁，下有水涌出，为孔水洞，俗名水帘洞，旧有龙泉寺，唐大历中建，今四壁刻划佛像，更名万佛堂。”可见，龙泉大历禅寺创于唐代宗大历年间。朱公在龙泉之侧建

大历禅寺的同时,还在龙泉(即孔水洞)之上雕刻了精美的汉白玉浮雕“万菩萨法会图”嵌于龙泉之上的崖壁,后因年久脱落。明代重修禅寺,在孔水洞上建万佛堂,将“万菩萨法会图”嵌于殿壁内。

考《唐书》大历五年(770)的幽州卢龙节度使为朱希彩。可见,创建龙泉大历禅寺的幽州卢龙节度使“朱公”就是朱希彩。

据碑文记载,朱希彩爵封颖国公,是房山人。

《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的主体记述了“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经过,且以干支记年的方式记载了其开工、竣工的年代。碑文落款记载了作记树碑之年代即《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的年代,以及与重建禅寺相关的历史人物。

考金九帝的在位于支年限便知,庚寅(开工年)、乙未(竣工年)、丁酉(作记树碑年)具全的只有金世宗。开国之君太祖具备乙未、丁酉,而乙未是太祖开国之年,庚寅年太祖尚未称号立国;亡国之君哀宗具备庚寅年,而三年后金朝便亡国于蔡州。其他帝王便与记年干支无缘了。可见,“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年代为世宗在位期间。

庚寅为世宗大定十年(1170),乙未为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丁酉为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那么,重建龙泉大历禅寺始于世宗大定十年(1170),终于大定十五年(1175);大定十七年(1177)五月十六日作记树碑,此即《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的撰写年代。

龙泉大历禅寺继金初修复后,再毁于正隆六年(1161)。当时正值龙溪老人住持该寺不久。寺院焚毁后,他退居“圆明”即燕京十方圆明禅寺。

世宗就位后,金朝国运中兴,龙溪老人于大定十年(1170)回到禅寺故址,面对残垣败寺,禁不住一番感喟。他不忍寺院久废,于是“发上圣心”,主持重建龙泉大历禅寺。“舍己衣盂”,龙溪老人捐出自己的积蓄;“复丐檀越”,向社会化缘募捐;“乃征之土工、木工、石工”,召集工匠;“备器执用”,筹具动工;“剪剔榛芜,祛除繁秽”,工程之初清理残寺废墟之艰难;“斩枝除荇,挑筐荷畚”,描绘工程场面。“陶瓴甃,垒垣墙,创建法堂方丈……,内外三门,两廊有序……库司客位,莫不崇丽者矣”,是说建寺从烧制砖瓦到建筑院墙庙宇的过程以及重建的寺院规制。“粗堂宿德,云堂香积,海会临溪”,禅寺恢复之后佛事、香火之盛。

此次重建龙泉大历禅寺,在恢复寺院旧有建筑的同时还添置了寺产。“恢复水磨一盘,园林千株,地产数顷”,“恢弘旧制,完备新规。”

“于乙未岁萃众安禅遵仪,守法严净”。是说乙未岁大定十五年(1175)寺院工程竣工,召集僧众住持居守。碑文落款记载了十二位“本寺知事人”,不仅告知人们当年龙泉大历禅寺的主要僧众,而且还为研究金代寺院僧职保留了可贵的史料。当年重建龙泉大历禅寺,得到了中都佛教界的大力支持。据碑文落款,参与建寺化缘的僧人有尊宿通玄大师普圆、提点通觉大师圆聪、法嗣小师四人、庵主德贤、庵主德如、燕京十方圆明禅寺堂头德祥。

燕京十方圆明禅寺堂头德祥在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中是一位参与始终的人物;建寺之初他是筹资的化主之一,寺成之后,他又参与了撰文树碑的操办事务。

可见在这次重建中,燕京十方圆明禅寺起了重要作用。重建龙泉大历禅寺当时还得到了朝野权贵的支持。据碑文落款载,参与捐资建寺的还有太夫人徒单氏、元帅黄德震、广平郡公夫人、签事高逢臣、宣抚使王楫、太原郡夫人张氏、功德主宣差大使刘合任等。

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

竹林禅寺逍遥叟印彬撰

吾闻幽燕胜概者,房山也。排青献翠,泻碧堆蓝,耸五岳之高标,夺三山之秀气□□□□□□□□□□□□□□□□

曾宪梓先生为云居寺修复捐资

段汝连

编者按：1997年7月1日，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值此喜庆人心之时，本刊特发表段汝连同志回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曾宪梓在10年前热心赞助修复我区文化古迹云居寺一事，以为纪念。由此可见曾先生一片爱国之心。

云居寺的修复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修复了建筑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修复资金的大部分是来自海外友好人士的捐资赞助。香港金利来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曾宪梓先生就是一位热心赞助者。

1986年10月下旬，曾宪梓先生为参加叶剑英同志追悼大会，专程由香港来京(曾先生也是广东省梅县人，与叶剑英同乡)。在京期间，曾先生向市政府和云居寺修复委员会领导表达了捐资的意向，并希望

1986年11月1日，曾宪梓先生(左二)在颁发捐款证书仪式上。

(段汝连 提供)

在离京前把这件事情办妥。单昭样同志(首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府绿化办主任、云居寺修复委员会副主任)受副市长、云居寺修复委员会主任陈昊苏同志的委托操办这件事。为了做好曾先生的接待工作。高海量副县长让杜义同志和我找单老一趟，商量和安排一下有关事宜。

那几天单老患腿痛病，走路不便，就在家办公。单老介绍情况说：曾宪梓先生是香港知名人士，也是一位乐行善事的人，他曾为家乡办了许多公益事项，这次了解到云居寺修复，又愿意捐资赞助，我们要接待好。活动安排有：在市里安排一次由陈昊苏副市长接见曾先生的活动并表达谢意；以陈昊苏副市长名义邀请曾先生参观云居寺；在房山以修复委员会名义颁发捐款证书；以县政府名义赠送纪念性礼品。已经和曾先生约好11月1日到房山去，还有三天时间，今天一定要把请柬送到曾先生手里。接着就把礼品、当天活动的时间、节目、路线商量了一遍。关于请柬的事，单老说：就以陈昊苏副市长名义发，我再给昊苏打个招呼，曾雪麟同志(前国家足球队教练、曾宪梓的叔叔)陪同去，也给曾雪麟一请柬。在单老指点下杜义把请柬一一填写好。

离开单老家，杜义我们二人到北京饭店去送请柬。在总服务台通过电脑查询到了曾先生房间，并通了电话，在房间里问候之后说明了来意，曾先生愉快地接过请柬，对陈副市长的邀请表示感谢，并约好1日上午9点我们来接曾先生到房山。

在云居寺，曾宪梓先生和曾雪麟同志在单老、高海量副县长等有关同志陪同下详细地参观了石经陈列馆和正在修复中的云居寺殿宇。曾宪梓先生说：石刻佛经十分珍贵，修复云居寺，保护文化遗产很有意义。我的家乡也有一座古寺，可是老百姓在寺门前盖了许多住房，环境显得很乱，政府动员拆迁，就是没有人动，后来我给每户一万元，他们才搬走了。

曾先生一行参观云居寺后，下午在房山宾馆二楼会议室，单老代表修复委员会向曾宪梓先生郑重地颁发了捐款证书。高海量副县长代表县政府赠给曾宪梓先生一对汉白玉雕刻的小石狮，以表谢意。按照曾先生要求，我们把县政府银行帐户号写给了他，一个月以后八万元捐资自香港汇款到位。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疏证

包世轩

房山区大安山乡有古刹延福寺，存辽末碑石，碑呈圭首状，通高1.16米，宽0.8米。碑周边平雕双框，有莲花、蔓草纹饰。碑额为缪篆字体题：“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文首题《大辽燕京西大安山延福寺莲花峪更改通圆通理旧庵为观音堂记并诸师实行录》，由寄居本寺的云游僧琼焕撰文篆额。

大安山延福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目前可知，辽统和十年(992)已有此寺。斋堂川清水村双林寺辽代统和十年经幢上，有“大安山延福寺讲维摩经僧师、僧师行、僧继真”的题名，可见辽代初年已是一座有名的寺院了。大安山延福寺中这块辽碑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辽代云居寺通理大师身世赖此可以明晰；通圆大师事迹得以保留下来；寂照大师于此有所述及，同时碑中涉及众多辽代佛教史事，堪称是极为罕见的辽代史料。作注疏考证。

碑全文如下：

额题：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

首题：大辽燕京西大安山延福寺莲花峪更改通圆通理旧庵为观音堂记并诸师实行录寄当蓝云水沙门琼焕撰并篆

粤以觉雄现相、醒悟含灵，大士传灯开道，道眼宗裔大系于西印竹国。芽惊法雨，普沾于东土，震旦咸滋。永平岁摩腾入汉，□藏初兴，普递达磨(菩提达摩)来梁，玄风创扇，由是禅讲隆兴、久传唐宋，至我大辽历世已来，教传盛而三惠齐生，宗未隆而一心阙，即致口唱教虽隆，见性得地者□矣。

至康安二号，南宗时运，果有奇人来昌大旨。逐以寂照大师、通圆、通理此三土人，捷生间出□□中之龙焉。传佛心印、继累代之高风；□无胜幢、作不请文。俾祖光廻祖照、□灯无昧者，始自三师。玄风大扇，开迷云而显惠□；智□发光，没前疑而通后滞。潜资鞭影、得法益心者不记。

圣教暨今禅俊如林，洋洋乎满周沙界。得法传心浚浚乎名相莫拟。斯乃学□虽众、原其根本，唯三上人乃曹溪的嗣、法眼玄孙，为此方宗派之原，传心之首者矣。是知后学修进玄机激扣，咸有所归者，岂不□悉焉。

琼焕仰诸遗行、异迹超伦，虑成寢隐，无闻后进，强为纂录以俟来哲，具列如后：

燕京开悟寺内殿忏悔主持进守太师辅国通圆大师者□□师讳法绩，姓郑氏，燕京良乡县南石村人也。生

而神俊、性异常童，幼□佛乘，志乐出家。礼燕京开悟寺金刚大师为师，年未滿而受戒品。登于学肆，花严为业，才预其文义天朗曜。袂以容仪□伟、骨气昂藏，神用耸拔、辞音朗润。因倦学肆、访寻山水，闻此莲花胜概杖锡而至，与通理策公同时挂锡。自届此居，心坚志爽，唯务□学。冥心正受乎、寂寂然心虑虚怀；端身坐箕乎、亭亭然旦夕无倦。孤行异操类松竹常青；节志骨刚若顽石弥固。虎奔鹿难，一喝而驻足蹲躯。自卜休贞下卦而一混独立，尝经岛、出而自言：日当为佛法中大器。得岸忘忧，倘无此能甘后坠溺。言讫而进，将及海心，前后则潏动换尽统，蹶蹶唯足下冰。凝左右则滌预沸腾，雄雄似海神捧出。师之实德道播群方，道宗皇帝美其道风，行业恢隆，愿一瞻礼，宣请而至。睹师道器宇量环奇，尤加弥重，特赐紫袍、通圆之号。当今天祚皇帝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加特进守太师辅国通圆之号。钦师弥德不类于常。自此因缘大化，至于燕西紫金寺开坛，含灵步礼而来受忏灭罪者，日不減二十余万。五京三学龙象皆来奔湊，求摄为资者约千万焉。至乾统四年(1104)示疾而歿。五京门徒近□千数，著紫门徒近十有余人，寮宰已下愿摄为弟子不计其数。寿五十五，灵骨舍利敕葬建塔本寺坟□云尔。

永泰寺内殿忏悔主通理大师者□□师讳恒策、字开玄，姓王氏，上谷樊山县新安人也。世袭农业，家积纯善，父名保寿，母名刘氏。昆季三人，第三爱子也。生而异表，幼而神俊，肄居宝峰寺崇谨为师。七岁遇恩得度，本名义从。幼岁曾伏二虎，百法为业，十六启讲后习，性相靡不圆通。永泰寺守司徒欲摄为资师，资道合方改今号，自兹左右衲衣元倦。二十三岁从师门下宗，天皇太后、道宗皇帝见重，特赐紫袍，号通理焉。

至于涿州，讲罢之日杖锡孤征，暨至于此。结茅□宴居林下，精进弥勤，心通转益，笃爱此山，朝夕无倦。五京缙素响师道风者若葵心向日，谘决心疑者如蚁之慕□。暂预瞻仰者莫不消殃而致福；亲承垂训者咸得去危而获安。可谓清凉热烦增福之田者矣。

主上闻风宣请为内殿忏悔主。由是外缘四备，隐志难成。坚请下山顺缘赴感，复加检校司空，牢让不受。至于永泰寺开讲，五京缙侣闻风而至，龙象学徒日不減三千之数。踞登吼座，启凿玄开，玉挥而性相融。宣玄机叩而箭锋相柱。涌泻玄河之辩，□□乃根之机。可谓问难云兴，洪钟普应，随问应训，疑云风卷。一口宣扬、众心开悟，□□施为成大化焉。

造梵行直释三卷，记文四卷，□有遗文盛行于世。至寿昌四年(1098)戊寅岁二月十三日寅时入灭。是时奉圣巨桥折为两断，两岸旅人拥滞无数，其中神人大叫唱师入灭之期，语报含灵，用表徵祥之应。寿五十，腊四十三，茶毗之日，无云雨雪，状若天□焰□似紫莲，光明交错。双睛不烬，颌齿犹存。灵骨舍利分葬四处，各起灵塔。

度菩萨戒弟子一百五十余万；皇储已下及百官等八十余人；公主国妃已下等五十余人；并礼为师，善字训名上首学资一百余人；剃度门徒四十八人。师之灵异弥德不可具陈云尔。

据上二师旧□此地，前后萍孟约五六次。每来挂锡或经一捻二稔，或居一季二季。剷除妄想，均平定惠，玄味熏修，孜孜不倦。通理获悟观音之辩，毗卢亲记。通圆静力心凝，同道咸知。实谓智高德满。

(碑侧刻字)涿州范阳县西北乡独树村贺公严并男二人寿哥、闰哥携。

良乡县东开俗弟子韩□驾、乞奴法号道俊。

曹溪的嗣问题

中唐禅宗六祖曹溪慧能以后，至唐末五代时期形成禅宗的五家，称为“一花五叶”。其中曹洞宗在北京地区有大的发展。关于此宗在北京传承情况，大典本《顺天府志》有所记述：“大万寿寺。在旧城，按古记考之，本中都大万寿寺。潭柘禅师之古道场也。燕京之西有古刹，距京城百里，泉石最幽处名檀(潭)柘。师讳从实，(五代后唐时期 924—936)从湖南来，乃曹洞二代孙。辽太宗会同年间至世宗天祚初(938—950)，有开龙禅师

智常弘潭柘之道于燕，创此寺(大万寿寺)……”这是曹洞宗法脉在后唐辽初时期传入幽燕地区史事的记述。

又据清乾隆四年(1739)《岫云寺志》(潭柘寺)记载：“后唐从实禅师。师与其徒千人讲法潭柘，宗风大振。后示寂华严祖堂。建塔(潭柘)山中。余姚谢迁《嘉福寺碑记》载其事。”据寺志，从实禅师之骨塔，建于潭柘寺西南五里的莲花峰山腰，因年久失修，已塌毁无存。

后唐到辽曹洞宗僧人在燕京地区的这两座祖庭寺院——潭柘寺、大万寿寺，皆因从实禅师开创之功。

辽代佛教以重建律宗，重兴密教为其特色。辽代禅宗似乎是个空白的领域，研究涉及者寥寥。辽代中后期，在北京地区禅宗势力的确有过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并直接影响到金元时期。正如此碑所载，至辽大康年间(1075—1084)、大安年间(1085—1094)南宗(禅宗)时运，“果有奇人来昌大旨。”遂以寂照大师、通圆、通理此三位本土人士(燕京地区)“捷生间出，□□中之龙焉”。时人对三位高僧评价甚高，于此可见一斑。“唯三上人(僧人的尊称)乃曹溪的嗣，法眼玄孙，为此方宗派之原，传心之首者矣”。

寂照大师名寂照感，辽末人，身世失详，仅有一些痕迹可寻。通圆大师、通理大师碑文所述行实可资参证。显然当时佛教僧众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故有曹溪的嗣的盛誉。无疑这三人是辽代禅宗史的重要人物。

辽房山石经续刻倡导者通理大师

大安山碑之通理大师，即指续刻房山云居寺辽代石经者，所指为同一个人。通理大师身世史籍失载，赖此碑得以留存。

通理大师深得辽道宗器重，赐与紫袍，名号。“永泰寺内殿忏悔主”大约是为皇帝在内廷讲经说法的高僧尊称，与辽帝关系以及社会声望均超乎寻常。

通理大师辽僧界尊称通理策师。通理为辽帝所赐大师尊号。名恒策，字开玄(1049—1098)。生于辽重熙十八年(1049)，圆寂于寿昌四年(1098)。“姓王氏，上谷樊山县新安人也”，所指为辽西京道奉圣州所属的樊山县新安人。樊山县治旧地即今河北省涿鹿县矾山堡镇。此矾山辽代为奉圣州下辖县，元初撤并。据辽统和十年经幢记载，矾山县有“新安镇双峰院”。辽代新安为镇，镇上有双峰院寺庙。

通理大师少年时“肄居宝峰寺崇谨为师，七岁遇恩得度，本名义从。”这是大安山碑的记载，大师少年在宝峰寺出家为僧。

另据辽代沙门志才撰《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秘藏石经塔记》(《白带山志》、《全辽文》载塔记全文)……有故上人通理大师缙林秀出，名实俱高。教风一扇，草偃八宏，其余德业具载宝峰本寺遗行碑中”。

两相对照，大安山碑和石经塔记所讲通理大师确实是同一个人。诸君之疑惑可以抛开了。读碑考据之乐还在于此间的对比感悟和发现。

那么通理大师出家为僧的宝峰寺是否即矾山县新安镇双峰院呢?显然不是。宝峰寺在哪里呢?据考证，这座宝峰寺在今门头沟区西斋堂村北二里的坡地间，此寺仍存。辽代斋堂地区这条东西长达百余里的宽阔谷地，尽属幽都府(后改析津府)玉河县地。这里南达大安山，西通矾山县、怀来县，斋堂以北仅20里，今之沿河城乡即归属矾山县地(《通悟大师塔铭》)。

斋堂以北十里山地间有辽代寺院——白贴山院(辽统和十年经幢载此寺僧众)，为唐代创建，至今仍残存，寺格局颇壮阔。白贴山院的下院为此宝峰寺。现在寺内存元至元三十年(1293)《重修灵岳寺记》碑，此灵岳寺即辽白贴山院。据碑称：“西斋堂宝峰寺乃灵岳寺之下院也，(缘)恩公又重修佛殿、钟楼，僧舍亦革故鼎新而已。恩公谓门人曰：余自住山勤于修造，今颇成趣，欲工石以纪之……”。

据此可知西斋堂宝峰寺是座金元时期已存在的古刹。而此寺辽代状况虽不明了，不过推测定然存在了。这座宝峰寺正是通理大师少年出家为僧的祖庭。通理大师的遗行碑应立于此寺。

通理大师二十三岁在燕京永泰寺某守司徒高僧处得法，之后得到天皇太后辽道宗的推崇，特赐紫袍，并赐通理大师之号。通理大师最伟大的功绩在于续刻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壮举。大安九年(1093)他开始了房山石经的续刻工程。沙门志才《云居寺秘藏石经塔记》：“师(通理)游兹山，寓宿其寺，慨石经未圆，有续造之念，兴无缘慈为不请友。至大安九季正月一日，遂于兹寺开放戒坛，庶遮道俗入山受戒，叵以数知海会之众，孰敢评之。师之化缘实亦次之。方尽暮春始得终罢。所获施钱乃万余缗，付门人见右街僧录通慧圆照大师善定校勘刻石，石类印板，背面俱用，镌经两纸。至大安十年(1094)钱已费尽，功且权止。碑(刻石)四千八十片，经四十四帙，题名目录具列如左。未知后代谁更续之。又有门人讲经沙门善锐，念先师遗风不能续扇，经碑未藏，或有残坏，遂与定师(善定)共议募功。至天庆七年(1117)于寺内西南隅穿地为穴，道宗皇帝所办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四千八十片，皆藏瘞地穴之内。上筑台砌砖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知经所在”。这是通理大师刊刻石经的全过程。

通理大师“造《梵行直释》三卷；《记文》四卷；□有遗文盛行于世。至寿昌四年(1098)戊寅二月十三日寅时入灭。”据此可知，大师门人善定善锐将石经板建塔瘞藏的天庆七年(1117)，已是通理圆寂近二十年后的事情了。

通理大师“灵骨舍利分葬四处，各起灵塔”，岁月流逝，今已不可确知其地，推测大师祖庭宝峰寺应立下一座，并有大师遗行碑。

明年1998农历二月十三日为通理大师圆寂九百周年纪念日，有关部门应举办相应的纪念活动。

戒台寺悟敏参访通理寂照二大师

辽末通理大师和寂照大师与慧聚寺(北京西山戒台寺)僧悟敏有师生之谊。今戒台寺所存《传戒大师遗行碑》记载此事，碑立于金天德四年(1152)。碑文追述了咸雍年间(1069)普贤大师法均为开山第一代，“始授高弟太尉大师裕窥，再传嫡孙悟敏者，即第三代也”，这位悟敏曾参访通理、寂照二大师。据碑“师(悟敏)孙氏，临潢府临潢人，八岁教书再阅辄能成诵。十四岁从浮图法，时普贤大师方召赴鞞鞞，一见录为门弟子”。从法均为侍童，“言谨洒扫应对其甚得其职，后执卷授经大部凡八帙，他人读之浹旬，仅能同师一日而毕。其过人多类此。”法均示寂后(大康元年1075)，悟敏从法兄经主大师裕窥至报德寺。二十岁进具(受具足戒)。又研习《唯识论》达七年之久，“即究通奥义启席演说，剔疑析滞、辩若泉涌。宿学硕德叹息座下”。又经过五年讲肆时光，“益厌文学之说，感慨叹曰：此乃道之鉴蹄，滞之则去道愈远，胡然务博以溺志为哉。”二乃遁居山林养心缮性。至佛崖山谒通理策师，言下有省，豁然知所归。又造寂照感师，密受指迪所资益深”。此后“乃于雕山栖云寺招延高道，无远近之问。食者日众，而诸待益多。久之太尉窥师(裕窥)顺世(入寂)。遗命以戒本授师(悟敏)，有司上闻可奏。明年选□天庆寺，又二年赐紫服锡号传戒。时在辽天庆九年也。又二十载于皇朝皇统元年(1141)七月十八日寂。寿八十五，夏腊六十五，其年十月八日葬于寺西北隅。”此碑由悟敏的同门第僧人“燕京管内右街僧录传菩萨戒文悟大师赐紫沙门悟铎立”。悟铎为第四代传戒宗师。

戒台寺内《传戒大师遗行碑》成为又一佐证，证实通理大师和寂照感在辽末的声望地位。悟敏这位辽末金初的律学高僧，曾拜谒通理大师(通理恒策)于佛崖山，亦知他造访的寂照大师为寂照感，唯寂照大师行实失详。这是有“曹溪的嗣”大名的通理大师，寂照大师与戒台寺悟敏的参究机缘，不啻僧史上一段奇缘。

关于佛崖山。笔者治京西内外僧史有年，初步考定为系百花山的显光寺。百花山距大安山路仅三十余里，同处一个地域。

至此，辽代致力于房山石经续造事业的通理大师身世可以明了无疑了。号通理者，有金大定年间任竹林寺，潭柘寺住持的广慧通理，有清乾隆年间的达天通理，识者不可不察也。

关于辽代燕西紫金寺

金中都城内有紫金寺，往往使人误认为辽代紫金寺在辽南京城内，其实辽代紫金寺在京西山地间。

《大安山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称：“通圆大师法责，……至于燕西紫金寺开坛，含灵步礼而来受忏灭罪者，日不减二十余万”。《马鞍山故崇禄大夫守司空传菩萨戒坛主法均大师遗行碑记》辽大安七年(1091)闰八月立。(碑在今北京西山戒台寺内)。此碑记载“前知则有京西紫金寺非辱律师，目击净器收而教之。”此紫金寺是法均大师的祖庭无疑。称寺在“京西”。

法均大师弟子裕窥亦到紫金寺赈济灾民。据《补续高僧传》卷十七“慧聚寺传戒大师之号，赐崇禄大夫检校太尉，提点天庆寺。并赐御制菩提心戒本，命师(裕窥)开戒坛，说戒一如师(法均)在日。年七十而化。”“窥性退让，每事不欲上人。劝人完慈止杀，鱼者焚网更业数十家。奏罢猎地、置义仓备凶岁者数处。方说戒时，有食鱼者，肉上现光气。其人惧而茹素。即过黑伐野，有童子牧牛，牛见窥至，跪而迎之。其主即以其牛并童子为奉。中年亦预僧务，僧以事至窥，先好语诱掖，终于无论。其人辞谢，仍以念珠一串付之。歉岁尝抵紫金寺，赈饥人擅粥，或告爨下乏水，窥以杖拄地，掘尺余得甘注。暨终事取足。窥既去，水亦随竭。此窥遗迹之概尔，窥如是师，可勿详而悉矣。”法均少年出家的“京西紫金寺”；通圆大师倡法的“燕西紫金寺”；裕窥歉岁所抵紫金寺。显然是同一座辽代著名的寺院。从赈饥人 粥爨下乏水，以及牧牛、罢猎、渔者焚网等情况看，这座寺院地处山区可猎，傍河流可渔，山区缺水炊爨有困难。而这座地处山区的紫金寺，还是辽道宗时期有天下大名的法均大师出家为僧的地方；且可能正是法均的家乡。因而其嗣法门人裕窥，不忘师恩，秉承师志，故尝有紫金寺赈济之举。

笔者考证，这座紫金寺在北京西部山地间的门头沟这田庄乡田庄村。辽代属析津府玉河县地。地处“京西”、“燕西”方位地貌极合，故紫金寺不在辽南京城中。

田庄村内有一座古刹，名曰紫荆寺。据明《宛署杂记》卷十九：“紫荆寺，在田家庄。相传隋田真、田广、田庆兄弟三人分居，议分紫荆，一夕枯死。兄弟感悟，复合。荆亦复荣。即此地也。”

考寺址，前临沟谷，殿皆东向，位于村中部沟谷的西侧坡地间。村民称之为大佛殿，佛殿座西向东，亦合辽代寺院規制。京剧著名剧目《打灶王》、《打灶分家》、《紫荆树》均以隋代田廷三兄弟故事为原型，盖源于此。

通圆大师“至于燕西紫金寺开坛，含灵步礼，而来受忏灭罪者及不减二十余万”，除有夸大成分外，所指似为庙会期间邑社活动而言。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作者系原琉璃河商周遗址管理处书记

一方“良乡”封泥印

赵思敬

在我收集的篆刻资料中，有一方“良乡”封泥印，现介绍给读者。

封泥，也叫芝泥，它可以追溯到战国至汉代。是古人在书写公文、书信的简册上，封发时用绳子捆扎后，以及在其它以绳封绑的器物交叉处粘以特制的粘土，然后在粘土上盖上印章，这种作为信验的印章，就叫封泥，这是古人防止私自拆信的一种做法。

说到“良乡”这方封泥印，就不能不说说良乡县的建置。良乡县建于西汉，东汉时期曾改为广阳县，唐代时又改为固节县，不久又复为良乡县，以后相沿不废。良乡是古幽州的南大门，历来被称为陆路咽喉。由此可见，这方“良乡”封泥印很可能是西汉时期的遗物。

“良乡”封泥印何时出土，在什么地方出土，已无从考证。但翻开有关资料，得知封泥印于清朝道光初年(1822年)首先在四川、山东等地出土。当时曾被称为“印范”，后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为其正名为“封泥”。光绪戊戌年(1889)年秋，吴式芬、陈介祺广泛搜集多地出土的封泥拓片，编成了十卷《封泥考略》出版。此后，清末的王国维又对封泥加以研究，基本上解开了封泥之谜。他认为：“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尤多，其是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的确，清末乃至后来的许多学者，据封泥出土的地点和印文，对比史料，详加考订，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果。此后，封泥又引起了艺术家们的注意，赵古泥、邓散木等人从中吸取“方劲处而兼圆转”的特点，使其作品自成面目，独立印林。

仔细观看“良乡”这方封泥印，确有独特的艺术魅力。首先，它的边框是其它印章所不具备的，它呈圆形，由于盖印时没有人为意识的创作，所以更多率真。又因为年代久远，泥质干燥变形，用墨拓后，显得古趣盎然。从封泥留下的“朱文”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方形印，阴刻，它的形体笔势以平直方正为主，而圆又易于转，有方劲而不失其圆转，才显得高古雄深。请看四边的栏线，断续有致，极具变化，上下两条线一虚一实，恰当地留出了天地高度。三条竖线的“破残”也恰到好处，“良”字上边的篆书写法呈“H”形，被巧妙地在底下封上了一笔，而成为出头的“口”字，同时使其向右边倾斜，与中间的“日”字既相称，又有变化，减少了呆板的结构，良字下边的“匕”，因为太短，又被看似多余的封泥填上了，请注意，不要以为这是偶然发生的变化，其实，这是治印人有意刻下的“败笔”，以使本来很难处理的“空白”，变成了漫不经意的“黑”，正所谓“计白当黑”。这样一来，“良乡”的“乡”字就可以随意变化了。再看繁体的“乡”字，作者实际上是制作了一幅对称的装饰画，但因为篆刻的需要，又不得不使其在细微之处发生变化。应该说，左右两个偏旁是一样的，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左边的圆形是出“头”的，而右边的圆形是不出头儿。左边的“竖”偏直，而右边的“竖”偏弯。一竖一弯，变化自然就在其中了。再看两个偏旁中间的“良”字，又一反前边那个以方正为主的结构，而代之以圆转的面目出现，“良”字的上边被处理成了篆书“日”字多加了一“点”，下边则是一个断续的“尾巴”，这个“虚尾”又与两边的竖划紧密相连，而且是中“虚”下“实”。纵观这方“良乡”封泥印，不能不叹服古人这种虚中见实的高超构思和艺术杰作。

虽然封泥的出土已有一百多年了，但直到1971年底，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才能够看到封泥的真正实物。原来，在绳索的交叉处，还有一个两边高，中间低且又有孔的木板，称为封泥匣，绳索就是从这个孔的背面穿进封泥匣，然后在打结处粘以特制的泥块，盖上印章才成为封泥印。后来，随着纸张的兴起，简牍

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用封泥封文书、杂物的办法也就被取消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方从《封泥汇编》中发现的“良乡”封泥印，为我们研究良乡的历史，提供了又一个很好的佐证。

参考书目：

-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
- 2、《马王堆一节汉墓发掘简报》
- 3、《中国文化知识辞典》
- 4、《中国艺术三百题》
- 5、《封泥汇编》

（《房山文史资料》第 11 辑）

良乡胡同名称的由来及轶事

张玉泉

在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胡同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和街、巷、道、里相同，又是它们的统称。胡同不仅是街巷名称，还囊括许多从历史到现实的，从自然到人文的，从物质到精神的等等诸多类别的文化范畴。它还是体现民俗风情的窗口。胡同不仅形成了城镇交通的网络，关系到城镇的格局，是人们生息活动的场所，而且又是时代发展，历史演化的舞台。良乡城里的每条胡同的形成、演化都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据《房山地名志》载，良乡胡同共有 17 条。其实不仅仅是 17 条，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小胡同，只是有的因已改了名，有的因城市改造已不复存在。但这些胡同古老的遗迹包括一些碎石烂砖都会令你生出一些感悟来。每个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其实每个胡同都有不同说头和来历。里边都包含有趣闻轶事。这些胡同的形成年代，有的十分古老，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如罗府街，饮马井街；有的可追溯到元明时代，如鞑子胡同，城隍庙大街等。

良乡的胡同名称由来，可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一）以人名命名的胡同。这些人中有民族英雄，也有达官贵人，还有用平民百姓的名字命名的胡同。如良乡南大街，南门往西有条胡同，贯穿东西叫罗府大街，就是以唐初镇守幽州的名将罗艺在此地建府第花园而得名。他是唐初名将（?—627）湖北襄樊人，寓居京北云阳，隋大业中期驻涿郡。公元 616 年起兵杀渤海（辽宁）太守，自称幽州总管。武德六年归唐，赐姓李，封燕郡王。此后助唐攻窦建德、刘黑达战功卓著。入长安后受命防突厥镇泾州（甘肃泾州）。唐太宗继位后他因与隐太子关系密切，心不自安。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起兵袭击陕西郿县，在甘肃泾州为部下所杀。罗府街东门北侧有条小胡同，早期曾叫牌楼底下，此地即是通往罗府花园的门口。曾有“罗成叫关”的传说。一天深夜，窦建德率兵攻良乡城情况十分危急。把守东门的将官为罗艺的儿子罗成。他要向父亲罗艺禀报敌情。不料牌楼下大门紧关，守大门的不经罗艺许可不敢轻易开门。罗成被挡在关（门）外，心急火燎，便不顾一切在深更半夜中大喊大叫，惊动了他的父亲罗艺，也惊动了驻府的卫兵和仆人们，于是忙开门请其进关。抗战前此地曾驻守国民党 29 军。解放前夕驻伪良乡县公安队。解放后

驻公安警察,以后划给北京地毯厂。大街最西端为良乡镇的幼儿园,中间有北京地毯厂等单位。

良乡地区办事处后墙外有条贯穿东西的小胡同叫鞑子胡同。元朝建立初期,当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对京师以南地区的统治,控制通向南北的交通要塞,便派了一队鞑子兵驻守此街。为防止百姓起来造反,把民间的铁制工具;如菜刀等都收缴上来,按每10户一把借用。此外还抢男霸女,掠夺百姓财物,终于激起良乡百姓的反抗。在一年中秋节起来造反。杀死大部分鞑子兵,赶跑了小部分。故此胡同原叫杀鞑子胡同,为了顺口,便叫鞑子胡同。

(二)以市场店铺命名的胡同。这些胡同一叫就明白是经营什么的,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胡同名字就是市场的所在地址。良乡的大商店多数在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主干道上。在大街上一看牌匾就知道是卖什么的。但是有些铺子在小胡同里,该胡同就以店铺名而命名了。如良乡南大街东侧,良乡政所北墙外曾有个澡堂胡同,进胡同向东是一条只有一米宽,百余米长的胡同。出东口往北一转头就见一家院子,大门口的影壁上“澡堂”两个醒目的大字。这是过去(从晚清至民国时期)良乡县城唯一一家澡堂。而且只限于男人洗澡。一问筒子屋里,有三个大池子,分别放凉、温、烫的水。后面有二、三十张铺位。

良乡东街南侧,现轮胎厂的西墙外(即东斜街的北口),原有一个武德庙,前面叫市口,即人市,出卖劳动力的市场。旧社会没着没落的人,一清早就蹲在庙前等着用人的叫,农忙时还带着农具。谁家用人干什么活儿,是用多少天,每天多少钱,说定了就跟着用人的走了。一早儿等在那里的最多时达几十人,少则也有十余个。大部分是青壮年,也有工钱很便宜的小孩和老人。蹲在那儿的人除农忙时,多数找不到活儿干。此地是出卖劳动力的集散地,故叫市口。

还有良乡五街南胡同门的文化阁胡同。一看就知道里边是卖文化用品的。胡同因有文化阁而起名。

(三)以胡同的走向和形状命名的。良乡城内四条主干街道的两侧,有许多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的胡同。也有的因种种原因形成的斜道,如东斜街,从良乡南门东侧,直向东城门的南侧,跨过良乡城半个城角。这条胡同历史悠久,里面的古建筑比较多。一进东口北侧的孔庙,亦叫圣人殿,建于辽代,曾历经沧桑,现保存基本完好,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孔庙的对面南院曾是国民党良乡县县党部所在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的营地也在此,在斜街一侧筑有岗楼。荷枪实弹的鬼子终日在此巡逻。

在东斜街正中北侧原有座古庙叫孝贤祠,建于宿代中期,良乡人修贤德、敬父母有功者都可以进祠立牌位。1947年冬良乡国民党还乡团在夜间袭击我军区小队,不料反被我军袭击,打死十人,打伤若干人。敌人的十具尸体曾存放在孝贤祠院内等着入殓。祠里有几个木匠昼夜赶做棺材。三天后装入棺材里,抬到良乡中学圣人殿前,国民党还乡团的头子组织良中学生参加追悼会,会场前边摆着十个白茬儿大棺材,当时学生看了都挺胆小。

从孝贤祠前行60余米往南即是“良乡水门沟子”,这是良乡东南部往城外排水之处。沟的上宽约8米,下宽约4米,深约5米,与城墙同时建成,以后多次改建。这里曾有被日本鬼子无辜杀害的良乡百姓的冤魂。1938年农历七月初七,良乡二街白如其的父亲在外教书回家休息。驻良乡的日军进家查户口,发现他家有抗日牌背心,另有一个邻居也发现此物,被日军杀害在水门沟子里。

良乡城内按胡同形状命名的胡同有:北大街西侧有一条东通北大街西通乔家胡同,窄得只能走一人的笔直胡同,长度仅有6.70米长,两侧住家房屋林立。此胡同又直又细很像一只箭杆,故此得名箭杆儿胡同。

(四)以居住当地最早的家族姓氏命名的胡同。这些姓氏有的是大户、财主,出过社会名流,有的居此最早,未成胡同之前便居于此地,形成胡同后便以该姓命名。良乡城内有乔家胡同、陆家胡同、史家胡同、北后街吴家院胡同等等。史家胡同最早出过财主。现仅有两三户史姓。民国初期,飞贼“燕子李三”的家曾住此地。其母亲绰号“花架子”。身高脚大,花白的头上总是插着花,她经常出入于此胡同中。日伪时期此胡同有新民会,驻会的日本人脚踏木板鞋迈着小碎步,经常出入此胡同。

北后街吴家院胡同在良乡文化街东南端，后头是吴家大院。1948年冬末北京面临解放。解放军把城团团围着，等待傅作义在和平解放协议书上签字。此时，已经成立的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设在吴家大院。这个四合院里有东西房各四间，南北房各三间。院子座东向西，门向西开。当时军管会副主任徐冰、吴晗、秘书长薛子正和徐冰爱人张晓梅住此处办公。叶剑英也时常光顾。一天晚上三间南屋的东墙上挂起毛主席像，三张办公桌对在一起，这是张晓梅的女儿要在这个晚上举行结婚仪式。婚礼正举行中，从外面开进辆吉普车，在院中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个身材魁梧戴墨镜的中年人，后边跟着警卫。后来才知道是叶剑英来参加张晓梅女儿的婚礼。婚礼结束后，叶剑英又坐上吉普车回去了。

(五)以地上物(含建筑物)名称命名的胡同。良乡城内以地上物而命名的胡同颇多，不下十多条：如沿城边的胡同有南城根胡同，沿护城河的胡同有南河沿胡同，还有楸树街胡同，黄土坑胡同，饮马井胡同；以地上建筑物命名的有城隍庙街、城隍庙北街、署前街等等。

楸树街因街心有一棵古楸树而得名。此树的树龄谁也说不清。原来该树在街心老住户王玉林宅前，因建筑用地，现在在王老先生的院里，他爷爷6、7岁时楸树就这么粗，现在仍是这样。因先有树后有胡同所以胡同以树得名。

城隍庙街，因城西有城隍庙而得名。良乡的城圈内庙宇林立，计有关帝庙、天王寺、文昌祠、节孝祠、五道庙、穴道庙、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等10个，最古老的要属孔庙和城隍庙。城隍庙兴建于明永乐元年，是从良乡西门外迁进来的，1948年拆毁。城隍庙街贯穿南北，附近建有良乡二中。庙地已建成铁道兵的干休所。以此庙命名的胡同沿用了近六百年一直叫到今天，它不仅与寺庙的宗教活动有关，更主要的还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庙会有关。像城隍庙除去逢年过节，烧香拜佛者很多，还有每年两个大的庙会在这儿举行。摊贩们在庙前庙后搭棚摆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成为物资交流的重要场所。此胡同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黄土坑胡同位于西大街南侧。黄土坑先为修城时使土而挖，后为民间农闲使土，坑越挖越大，致不可收拾。清光绪年间，县衙曾明令禁止使土，根本没起作用。因地势过低，雨后积水成深坑。曾有当地人钓到尺长之鱼。解放后，由地毯厂占用，起骆驼岗上土垫平后才建起厂房。黄土坑无踪，名称却留传下来。

像饮马井(马号)胡同，名称都有一定的来历，这里就不详述了。

总之，每个胡同，都有一段趣闻轶事，都有一段生动的故事，都是历史的见证。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